世纪前沿

Culture and Power
The Sociology of Pierre Bourdieu

[美] 戴维·斯沃茨 著
David Swartz

陶东风 译

文化与权力
布尔迪厄的社会学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架建议：社会学

ISBN 978-7-5327-5802-9

9 787532 758029 >

定价：39.00元

文化与权力

布尔迪厄的社会学

[美] 戴维·斯沃茨 著　陶东风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美) 斯沃茨(Swartz, D.)著;陶东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5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书名原文：Culture and Power
ISBN 978-7-5327-5802-9

Ⅰ.①文… Ⅱ.①斯… ②陶… Ⅲ.①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研究 Ⅳ.①C91-09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8337 号

图字：09-2002-495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56135113

责任编辑 衷雅琴

装帧设计 王小阳

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
[美] 戴维·斯沃茨 著
陶东风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www.yiwen.com.cn)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mm 1/16
印 张 23
插 页 3
字 数 309 000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5802-9/B·347

定 价 39.00 元

出 版 说 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乐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 年 1 月

文化与权力

鸣　　谢

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研究行为——阅读、反思一个从理论上加以建构、从经验中得到激发、最终指向政治的社会学的丰富而复杂的体系——的产物。尽管如此，本书还是得益于一些朋友与同事的帮助与支持，我愿意在此表示感谢。

在法国，让·巴赞首先把布尔迪厄(Bourdieu)的著作介绍给我，而且提供了关于法国知识界的有价值的见解。菲利普·贝斯纳德、穆罕默德·沙尔卡维、莫德·埃斯佩罗、莫尼奎·德圣马丁以及米歇尔·皮亚卢，他们每个人都通过自己的方式在多种场合帮助与鼓励我。我还要感谢布尔迪厄，当我在巴黎大学文理学院做学生期间，他对于社会学方法的严肃认真的关注把我从知识的浅尝辄止的诱惑中解救出来。他的社会学激发了我以后的教学与研究，他还友善地约我讨论他的著作的各个方面。无疑，布尔迪厄希望看到我的论述不是对他的亦步亦趋，或者与他的完全不同。我努力成为他的著作的一个有理解力的读者，而不是(布尔迪厄的)一个信徒。希望这本书既能阐明布尔迪厄的社会学想象的丰富复杂性，又能引起人们对这种丰富的复杂性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在美国，我要特别感谢杰里·卡拉贝尔，他在巴黎“招募”我，通过各种方式支持我的工作。他把我介绍给一个非常好的社会学家群体，这些研究美国高等教育分层的社会学家，在当时被称为“休伦学会”(Huron Institute)[1]的地方组成了一个生气勃勃的研究群体。史蒂

[1] 休伦是北美的一个湖的名字。——译者

夫·布林特、保罗·迪马吉奥、凯文·多尔蒂、大卫·卡伦、凯瑟琳·麦克莱兰、迈克·乌斯姆，他们在不同的时期通过不同的方式，在我的这次知识之旅中提供了有益的忠告与支持。特别感谢彼得·基尔比与鲍勃·伍德，他们在困难的时候伸出了团结之手。薇拉·佐尔贝克则帮助我熟悉法国学术界。

我还要感谢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道格·米切尔对于本书的自始至终的友好支持，感谢克劳迪娅·雷克斯对于本书手稿的精心编辑，感谢美国学会理事会提供的基金，使我在法国的学术之旅成为可能。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深深地感谢我的家人对于这项工作的自始至终的支持，并把此书献给我的妻子丽莎以及我的两个孩子埃琳娜与丹尼尔。

目录

鸣谢/1

第一章　布尔迪厄导论/1

第二章　职业生涯与思想影响/17

第三章　布尔迪厄社会学知识的原理论/61

第四章　布尔迪厄的关于符号权力的政治经济学/76

第五章　习性：关于行为的文化理论/110

第六章　权力斗争的场域/136

第七章　社会阶级与权力斗争/163

第八章　教育、文化与社会不平等/218

第九章　知识分子与知识场域/248

第十章　科学知识分子与政治/279

第十一章　为客观性而斗争：布尔迪厄对反思社会学的呼唤/304

第十二章　结论/320

参考文献/332

译后记/353

第一章

布尔迪厄导论

文化为人类的交流与互动提供了基础；它同时也是统治的一个根源。艺术、科学以及宗教——实际上，所有的符号系统，包括语言本身——不仅塑造着我们对于现实的理解、构成人类交往的基础，而且帮助确立并维持社会等级。文化包括信仰、传统、价值以及语言；它还通过把个体和群体联系于机构化的等级而调节着各种各样的实践。无论是通过倾向(disposition)、客体、系统的形式，还是通过机构的形式，文化都体现着权力关系。而且，许多发达社会中的文化实践建构了相对自主的、为了区分而进行斗争的舞台。知识分子——专业化的文化生产者与传播者——在建构这些舞台及其机构化的等级中发挥了核心的作用。这就是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这位今天法国引领潮流的社会科学家力图说明的观点。

随着布尔迪厄在 1981 年当选为地位显赫的法兰西学院社会学主席，他与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一样，成了战后法国最受尊敬的社会学家。作为一个多产的、创造力超常的研究者，在 1958—1995 年间，布尔迪厄已经出版了 30 多本书，发表了 340 多篇文章。其中许多是合作的，因为布尔迪厄是他自己的研究中心——欧洲社会学中心——的创建者与主任，[1]他同时主编自己的社会学杂志《社会科学研究会刊》(*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1] 进入法兰西学院以后，布尔迪厄把他的大部分工作转向了教学，而把中心的管理工作交给他以前的合作者，包括莫尼奎·德·圣马丁以及让－克洛德·孔贝西。

Sociales），并与子夜出版社一起主编自己多达 60 多本的文选［《常识》*Le sens commun*）一书正在印制中］。[1]的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布尔迪厄的努力已经在发展真正的法国社会学新学派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足以与 20 世纪早期的涂尔干（Emil Durkheim）——布尔迪厄的主要灵感来源之一——相媲美。

由于近来出版了大量布尔迪厄著作的英译本，使得人们对于布尔迪厄的了解越来越多。受此推动，在英国与美国，人们对布尔迪厄的兴趣也急剧上升。20 世纪 80 年代末，在美国，布尔迪厄已经成为引用率最高的法国社会学家之一，超过了列维－斯特劳斯。[2]在社会学家中，布尔迪厄是因为他早期与帕斯隆（Jean-Claude-Passeron）合作的关于法国高等教育的研究，特别是他们被引用最多的著作《教育、社会与文化中的再生产》（*Reproduction*，*In Education*，*Society and Culture* 1977）而被最广泛地了解的。[3]但是，布尔迪厄还因为其对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研究而著称（特别是在人类学家中），这方面的研究见于他的《阿尔及利亚人》（*The Algerians* 1962a）*、《实践理论大纲》（*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1977c）、《实践的逻辑》（*The Logic of Practice* 1990h）。此外，布尔迪厄对于文化与社会阶级之间关系研究［《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1984a）］的贡献，对于语言社会学的贡献［《语言与符号权力》（*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1991c）］，对文化社会学的贡献［《文化生产

---

[1] 1993 年，布尔迪厄离开了子夜出版社，转而与门槛出版社（Editions du Seuil）合作。

[2] 《社会科学引用索引》在 1989 年排列的法国知识分子引用率（从高到低）的情况是：福柯，布尔迪厄，列维－斯特劳斯，德里达，阿尔都塞，萨特，普朗查斯，图雷纳，拉康，博德里亚，布东，以及阿隆。布尔迪厄在知识界的声望并不总是这样大，特别是在专业的社会学领域。一项关于在美国社会学会的核心出版物（包括《美国社会学》与《社会力量》上发表的研究布尔迪厄的论文数目的调查表明，从 1971 年到 1985 年，雷蒙·布东（Raymond Boudon）与阿兰·图雷纳（Alain Touraine）以及米歇尔·克罗齐耶（Michel Crozier）受到了更多的关注（《*Cumulative Index of Sociology Journals*》，1971—1985）。

[3] 事实上，《再生产》一书已经成为某种被引用的经典，特别是在教育社会学中。布尔迪厄更近的关于法国高等教育的研究收集在《学术人》（1988b）与《国家精英》（1989c）中。

* 本书中凡括号内标有年份，未标外文姓名者的著作均为布尔迪厄所著。——译者

的场域》(*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1993b)]，都在迅速得到承认。他的许多著作正在成为像文化社会学这样的新兴学科门类的标准参考书。他的研究涵盖广泛的研究课题：从对阿尔及利亚农民文化的人类学研究到对19世纪的艺术家、作家的社会学分析，再到对于现代法国社会的语言、教育、消费者与文化趣味、宗教以及科学的社会学分析。布尔迪厄是一个同时进行经验研究的重要的社会理论家。

同时，对于他的著作的了解在盎格鲁－萨克逊国家却是零碎的。缺少代表作的翻译，这个早先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他的某些强调法国教育的社会再生产的作用(Bourdieu 1973a；Bourdieu and Passeron 1977)的著作在他较早的关于实践理论反思的著作(1972)之前被翻译成英语。这样，对于布尔迪厄的解读没有遵循他的理论发展线索，他被狭隘地当成了一个社会再生产理论家而不是因为他的一整套范围极为广泛的、赋予他的思考以活力的理论关切而被欣赏。然而到了1994年，布尔迪厄的主要著作已经全部翻译成为英语。

第二个问题是：对于布尔迪厄的早期的兴趣是围绕专业的学科部门展开的，这就把对布尔迪厄著作的知识限制在经过选择的专业兴趣上，比如人类学或教育社会学。他早期的国际声誉以及社会学界对于他的最早的批评都是建立在他关于法国教育的研究、特别是《再生产》一书上，而不是他早期对于阿尔及利亚农民的研究上。教育社会学家没有注意到他对人类学的关切——这种关切来自他早期在阿尔及利亚的研究经验，而正是这种研究经验推动着他对现代法国的社会学研究。这样，他的整个理论框架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他的某些最重要的对于社会理论的贡献相对没有被注意，而且某些针对布尔迪厄的批评好像建立在对他的研究社会生活的整个方法的片面理解上。[1]但是，正如我在

[1] 参见华康德(Wacquant 1993a)关于美国对布尔迪厄著作的不平衡接受的清晰分析。在法国，对布尔迪厄的著作的接受也是不均衡的，参见 Accardo 1983；Caillé 1992；Collectif "Révoltes logiques" 1984；Ferry and Renault 1990。华康德与布尔迪厄合作的《反思社会学导引》(1992)对布尔迪厄著作的综合介绍有助于矫正对布尔迪厄整个社会学规划的零碎接受。

第三与第四章将要解释的，布尔迪厄的社会学出现于一个广泛的跨学科背景之中，这一跨学科背景反映了法国20世纪50、60年代知识话语的特定组合，正是这种组合使得这个年代显得与众不同。

第三，对布尔迪厄著作的接受常常在(布尔迪厄的)信徒们的不加批评的喝彩与(布尔迪厄的)批评者们的不加思索的贬低之间走极端。[1]即使在法国，布尔迪厄的著作也令人惊讶地很少受到富有同情心的批评性的评论。[2]这无疑部分地源于布尔迪厄对社会科学中最正统的方法的尖锐批判。他的批判风格既为他招来众多的信徒，也树立了不少敌人。

现在是更全面综合地呈现、批判性地评价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研究模式的时候了。本书加入布尔迪厄与华康德(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哈克、马哈尔与威尔克斯(Harker, Mahar and Wilkes 1990)，詹金斯(Jenkins 1992)，罗宾斯(Robbins 1991)，汤普森(Thompson 1991)等人的行列，努力完成这项任务。本书将阐明并批判性地评价布尔迪厄的整个理论框架并把它定位在法国的知识语境中。虽然本书尝试全面把握布尔迪厄的社会学规划，但是并不以事无巨细地介绍布尔迪厄的作品为目的。它提供的是对于布尔迪厄的社会学规划的几个核心主题与概念(其中的一些在盎格鲁－萨克森世界的布尔迪厄研究文献中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富有同情但又是批判性的考察。虽然本书对于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与习性概念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关注，但是对于文化场域的关注却相对要少一些。然而，场域(field)概念是充分理解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关键，也是充分理解他阐述文化与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方式的关键。他对知识分子的分析，对于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生产

---

[1] 一些例外应该在这里提及。罗杰斯·布鲁贝克(Rogers Brubaker)的《重新思考古典理论：皮埃尔·布尔迪厄的社会学视点》(1985)，迪马吉奥(Paul DiMaggio)的《评论：论布尔迪厄》(1979)，都是对于布尔迪厄著作的主要方面的既富有同情心、又不乏批判性的研究；卡尔霍恩、利普马以及波斯通(Calhoun, Lipuma and Postone)等人的分析评论集《布尔迪厄：批判性的视角》(1993)代表了向这个方向迈出的重大步骤。

[2] 两个极端的例子分别是阿兰·阿卡尔多(Accardo 1983；Accardo and Corcuff 1986)对布尔迪厄著作的富有同情而没有批评的普及化；布东在他的《意识形态：习以为常的观念的起源》(Boudon 1986：227—228)一书中对布尔迪厄社会学的傲慢否定。

专家与符号权力的创造者的核心作用的分析，以及对于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的分析，都已经受到了注意但是没有得到足够的阐释。但是，正如我将在第九章与第十章要表明的，知识分子的理论位于布尔迪厄社会学规划的核心。而且，他的关于科学知识分子与批判的社会学实践的规范性视点几乎没有受到关注。这些都是布尔迪厄著作的基本要素，至今仍未受到足够的承认或批判性的评价。本书的目的就是帮助填补英美两国的布尔迪厄研究文献中的这些空白。

布尔迪厄的理论世界的充分复杂性抵制任何简单化的概括。[1]很少有别的著作像布尔迪厄的著作一样全面、复杂而富有创意。在依据经验研究的认识论前提与哲学前提细察这种研究的操作机制方面，很少有人达到布尔迪厄那样的精细缜密。很少有人把实践的和策略的——实际上是政治的——定向运用于他们的社会学研究工作——这种研究工作使得对于社会学研究成果的严格的“理论解读”具有潜在的误导性。[2]布尔迪厄把自己的概念塑造为对于相互对立的观点的矫正。他的著作可以被解读为一种与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现象学、经济主义、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个人主义以及宏大理论的持续的论争。[3]他通过批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知识形式与他认为遍布于主观主义与客观主

---

[1] 米勒与布兰森(Miller and Branson 1987：214)怀疑布尔迪厄的理论框架的复杂性与广泛性能够在几页纸中简洁地概括清楚。卡尔霍恩、利普马以及波斯通(Calhoun, LiPuma and Postone 1993：12)注意到，“布尔迪厄的著作抵制简单地把概念或主题进行先后秩序的排列。但是，华康德(Wacquant 1992)通过一个紧密的合作者(译按：应该是指布尔迪厄本人，1992 年他们共同编写了《反思社会学导引》)在阐明贯穿布尔迪厄著作的系统整体性方面进行了极有启发性的努力。

[2] 布鲁贝克(Brubaker 1993：217)认为，布尔迪厄的著作“特别严重地受到了概念论的、理论的逻辑中心主义的错误解读，这种解读把布尔迪厄的著作当作一套由精致的、毫不含糊的概念构成的、逻辑上内在联系的命题系统。”布尔迪厄的概念不应该被理解为特定的经验现象的指示器，或者系统理论的构成材料，而应该被理解为把一种总体方法传达给社会世界研究的启发性的程序。我将强调，布尔迪厄的文本基本上是政治性的，当然同时也是科学性的：它们都反映着特定的实质性领域中的知识问题，并策略地指向在这些领域生产一种符号效力。

[3] 事实上，布尔迪厄从这些理论对手的每一位那里都进行了借鉴，特别是结构主义。他认为每一种对立的理论都提供了重要的(即使是片面的)对社会世界的洞见。布尔迪厄的雄心则是克服这些理论各自的弱点、结合它们各自的力量，以便建构一种总体性的实践科学。

义之中的实体主义的现实观，来反驳这些相互对立的观点。

这样，布尔迪厄的首要关切不是对概念系谱学(conceptual genealogy)的关切，也不是忠实地追随任何特定的理论传统。布尔迪厄是一个理论家，但不是一个帕森斯传统中的系统理论家。他事实上尖锐地批判“理论化的理论”(theoretical theory)，因为它强调独立于经验研究对象的抽象概念化。布尔迪厄的概念首先不是为了对应于内在连贯、可以普遍化的形式规范而设计的，相反，它们是实用地从经验研究中以及与相互对立的知识观的论争中塑造出来的。他的概念在重点与范围上依据它们所处理的相互对立的观点而不断变化。然而，它们揭示出非常一贯的、指导他的所有研究的一套潜在的元社会学原则。

布尔迪厄是一个理论上的策略家，他的理论语言的选择明显地为了确立与相互对立的观点、特别是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知识形式之间的距离。他相信这种知识形式阻碍了总体性实践理论的发展。出于这个原因，我对布尔迪厄的社会学得以从中发展出来的知识背景与研究经验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特别是在第二章)。第三章介绍布尔迪厄对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知识形式的批评，第十一章概述他的独特的总体性实践理论，包括反思性的社会学实践。第十章概述支撑他的社会学规划的政治方案。

最后，布尔迪厄已经发展出与行动、文化、权力、分层以及社会知识相关的独特理论，但是这些理论通过一种复杂的方式相互交叉、相互缠绕，以至于把其中的一个从另外一个中抽象出来变得非常困难——即使是为了讲解与说明的目的。本书尝试阐明(布尔迪厄的)主要概念之间的相互联系以便提供对布尔迪厄社会学的更加丰富的理解。第三章到第六章分析(布尔迪厄的)核心主张与概念，第七章到第九章转入对于实质性的研究领域(社会阶级结构、教育、知识分子)的理论探讨。这种实质性的领域对于布尔迪厄的社会学规划具有特别关键的意义。

文化、权力与再生产

布尔迪厄提出了一种关于符号权力的社会学，这种社会学要解决的是文化、社会结构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这个重要主题。无论布尔迪厄是在研究阿尔及利亚的农民、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作家和艺术家，或者教会，一个中心的潜在前提是：分层的社会等级与统治系统如何在代际之间进行维持与再生产而没有受到强有力的抵抗与有意识的识别。[1]他认为，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研究文化资源、文化过程以及文化机构如何把个体与群体纳入竞争的与自我延续的统治等级体系而得到解释。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主张，认为所有的文化符号与实践——从艺术趣味、服饰风格、饮食习惯，到宗教、科学与哲学乃至语言本身——都体现了强化社会区隔的利益与功能。为了社会区隔而进行的斗争，是所有社会生活的基本维度；而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个体、群体以及机构(特别是教育系统)之间的权力关系问题。对于布尔迪厄来说，权力实际上不是一个孤立的研究领域，而是位于所有社会生活的核心。[2]而权力的成功实施需要合法化。因此，他的研究焦点集中于：文化的社会化如何把个体与群体置于一个竞争性的等级体系中，相对自主的斗争场域如何使个体与群体陷于争夺有价值的资源的斗争，这些社会斗争如何通过符号的分类得到折射，行为者如何通过各种策略获取利益，以及他们如何在这样做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再生产着社会的分层秩序。这样，文化不能免于政治的内容，而是政治的一种表达。[3]

---

[1] 这是涂尔干对于“什么产生了社会团结”这一理论关切的一个变体，尽管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秩序是一个带有个体之间、群体之间等级化与不平等安排的分层秩序。(参见 DiMaggio 1979；Sulkunen 1982：105)。

[2] 对于布尔迪厄而言，社会性的所有表达或符号再现都不能离开其建构性的权力关系，而权力的成功实施需要合法化。

[3] 对于布尔迪厄(1987b：36)而言，一种批判性的文化理论“很自然地导向一种政治理论”。

以阶级为基础的权力与特权的行使与再生产是布尔迪厄研究的一个核心的、统一的主题。他的雄心是要创造一门可以应用于所有社会类型的、个人与群体中间的、社会与文化的权力关系再生产的科学。在一个早期的表述(Bourdieu 1973a)中，他呼吁一种“关于结构之再生产的科学”，这种科学将是

> 对于法则的一种研究，在这些法则中，结构常常通过生产被投资于倾向系统——该倾向系统能够促生适应于这些结构的实践并因而有助于这些结构的再生产——的行动者来再生产自己。

在近期的一个表述(1987b：92)中，布尔迪厄又把他的研究描述为提供一种群体的发生理论。这种理论将解释群体，特别是家庭，如何创造并维护整体性并因此使他们在社会秩序中的位置永久化或得到改进。他敦促社会学家去探究“所有的社会学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即集体的存在与存在模式问题”(1985e：741)。他集中关注文化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群体如何寻求策略以生产并再生产其集体的生存条件、文化如何具有建构这个再生产过程的作用，对他来说是社会学与人类学中的一个统率性的问题，也是一个贯穿其工作的重要主题(参见Bourdieu 1985e：741)。

处于布尔迪厄知识规划之核心的，是马克思以降西方社会思想的要害问题：文化唯心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争论。布尔迪厄的社会学就是要尝试通过提出一种唯物主义的、但又不是还原论的对于文化生活的解释，找到一条超越经典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两极对立的中间道路。[1]

---

[1] 布尔迪厄解释说，他所以献身对文化的关注，是因为文化是一个被忽视的方面，而不是说文化拥有理解社会世界的理论优先性。在1983年的一次访谈中，布尔迪厄(1987b：61)回忆说，在50年代末研究阿尔及利亚农民的时候，他发现了文化这个实质性的领域遭到了极大的忽视。在布尔迪厄看来，那个时候流行的文化概念，在把文化归结为上层建筑、从属于经济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与把文化唯心化的非马克思主义之间被分裂为两半。布尔迪厄把自己的研究方法看作是努力超越这两种极端对立的文化观念。

他的思考开始于马克思但是更多地吸收了涂尔干与韦伯的思想。

在研究文化的时候，布尔迪厄发展出了一种关于实践与符号权力的政治经济学，它包括：关于符号利益的理论、关于资本的理论、关于符号暴力与符号资本的理论。 他的符号利益的理论通过把经济利益的观念扩展到文化领域而把社会生活的符号方面与物质方面的关系加以重新理论化。 符号利益就像物质利益一样客观存在着。 他把文化阐释为一种具有特殊的积累法则、交换法则与运行法则的资本形式。 他认为，权力的实施需要合法化，这样，他还提出了一种符号暴力与资本的理论，这种理论强调符号形式作为既建构又维持权力结构的资源所起的积极作用。 这些都不是整体划一的论述，而是相互交叉与渗透的、具有导向性的主题。 它们主要受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科学哲学以及经典社会学传统的影响。 我们将在第三与第四章对此进行讨论。

能动性／结构问题

布尔迪厄的另一个持久的关注领域是个体的行为与社会结构的关系。 是什么推动人的行为？ 个体行为是对外在原因的回应么（比如主流的社会学传统就是这样认为的）？ 个体行为是由“文化”、“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决定的么？ 或者，行动者是因为自己认同的原因作出行动的么（比如现象学、阐释学以及社会科学主流中的理性选择理论认为的）？ 相应地，行动者的概念在解释行动者的行动时处于什么样的认识论地位？ 是否应该认为它们不具备认识论的可靠性（就像在涂尔干传统中的情况那样）？ 或者它们应该成为科学解释的基本建筑材料？吉登斯（Giddens 1979）认为这些问题——行动者的能动性与结构的关系问题——是当代社会理论的基本问题。

布尔迪厄是二战以后最先把能动性/结构问题当作社会学基本问题

的这一代社会学家之一。他提出应该通过一种“辩证的关系”来把能动性与结构联系起来。他反对把人的行为理论化为直接的、不经中介的对于外在因素——不管它们是微观的互动结构，还是宏观层次的文化、社会或经济因素——的反映。同时，他也不认为行为是内在因素（比如主观意图、精心计算）的简单结果——像唯意志论与理性选择理论认为的那样。在布尔迪厄看来，相互排斥对方的、要么强调宏观方面、要么强调微观方面的这些解释，只不过是在维持古典的主观/客观的二元论。他想要通过深入阐述行动来超越这种二元论，以便把行动的微观方面与宏观方面、唯意志论方面与决定论方面综合进一个单一的理论中，而不是割裂为相互排斥的解释形式。这样，布尔迪厄构想了一种关于实践的结构理论，这种理论把行为与文化、结构、权力联系起来。这个理论从根本上为他的基本概念——习性——奠定了基础。“习性”这个概念与“文化资本”一起成为他的理论标志。我们将在第五章考察他的这一理论关切以及他的习性概念。

权力场域

实践发生于被称为**“场域”**的结构化的斗争领域。布尔迪厄社会学中的这个核心概念把习性行为（action of habitus）与现代社会中权力的分层结构联系起来。布尔迪厄把现代社会阐释为一系列相对自主但具有结构同源性的、由各种形式的文化资源与物质资源组成的生产场域、流通场域与消费场域。场域调节着社会结构与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场域的概念晚于他的更为人所熟知的文化资本概念与习性概念，这个概念相对地不怎么著名，但是它已经成为布尔迪厄的理论大厦的支柱。我将在第六章讨论这个概念的主要方面。

我在第六章的结尾中概括说明了布尔迪厄总体性实践理论的完整理论模式。在第七章、第八章与第九章，我将阐述布尔迪厄如何通过场

域分析的视野把他的习性概念与文化资本、符号/象征资本概念结合起来，以便分析现代法国的社会阶级、教育系统以及知识分子。[1]

作为社会分析的社会学

根据布尔迪厄的观点，由于行动者在很大程度上“误识”（mis-recognize）文化资源、文化过程以及文化机构如何把个体与群体锁定在统治的再生产模式中，所以社会学的任务就是揭开权力关系的这个隐蔽的方面。布尔迪厄把社会学的实践看作是一种社会分析，在这里，社会学家要揭开“社会的无意识”，就像心理分析学家要揭开病人的无意识一样。[2]社会无意识是由行动者在参与不平等的社会秩序时加以追逐的那些不被承认的利益构成的。在布尔迪厄看来，由于正是对这些具体化的利益的误识构成了权力实施的必要条件，所以他相信公开暴露这些利益将会摧毁其合法性，并开启改变现存的社会秩序的可能性。通过暴露这些把个体与群体捆绑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之中的隐在利益，社会学就成为让人从统治的压制中解放出来的斗争工具。在这里，布尔迪厄的社会学与批判理论相互交织在一起。

布尔迪厄相信，社会分析工作的好坏的一个指标，就是看它在何种程度上引起抵制。就社会学的分析触及到行动者的不被承认的重大利益而言，它将常常引起抵制。布尔迪厄（1987b：7—10）明确地承认自

---

[1] 我没有讨论的布尔迪厄著作中的一个重要的实质性领域是他对于语言的分析。语言是作为实践（包括语言实践）的促生者的习性的一个关键性载体；语言也发挥着一种文化资本形式与符号资本形式的作用，并受到他的场域分析视角的影响。参见布尔迪厄（1991c）关于语言的社会用途的几篇主要论文以及汤普森（John B. Thompson）写的富有洞察力的导言。同时参见几篇把布尔迪厄的语言分析与教育（Collins 1993）以及语义学（Hanks 1993）联系起来的信息量很大的论文。

[2] 布尔迪厄的作为一种“社会心理分析”的社会学概念可能最明显地体现于他的《区隔》（1984a：11）一书中。在这本书中，他写道：“当社会学面对像趣味——统治阶级场域与文化生产场域中的斗争最重要的赌注之一——这样的对象的时候，最接近于社会心理分析。”

己的社会学批判是指向特殊群体的至关重要而又不被承认的利益的。[1]

社会科学的反思性实践

但是，揭示实际的社会生活的潜在利益的可能性，在布尔迪厄看来并不是简单的事情。因为依据他的理论，所有的符号形式的功能都生产社会区分，社会科学本身的实践也不能免于社会分化的过程。他因此反对科学的实证主义以及它的价值中立的客观性理想。那么，如何实践一种本身就是文化符号与文化实践的机构的社会科学，它将能够暴露行动、文化、社会分层以及权力之间的潜在关系、而又不同时产生相同的社会区分的效果？由于社会学家们自己不能避免符号区分的社会逻辑，他们自己的社会分析就不能免于潜在的利益。那么，什么样的客观学科知识形式是可能的？

面对这个悖论，布尔迪厄坚持认为，社会分析同时需要反思性，即社会科学的系统而严格的自我批判实践。本书的第二章描述了布尔迪厄如何吸收法国科学哲学家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的思想，后者的非实证的认识论呼唤一种对于使科学研究成为可能的认知条件与社会条件的反思性监测。追随巴什拉，布尔迪厄要求把批判性探索的标准同时应用于正在观察的社会科学家们以及他们的观察对象。这并不意味着布尔迪厄反对所有科学客观性的可能性，而偏爱一种彻底相对主义的研究方法以理解社会世界。相反，他认为**只有**通过一种社会研究的反思性实践，才有希望获得关于社会世界的理想水平上的客观性。

更进一步，当布尔迪厄说“科学规划与科学进步的前提就是反思性

[1] 当布尔迪厄依据社会分析的术语看待对于他的研究的批评时，还存在一种令人尴尬的倾向，也就是说，把这种批评看作是一种抵制暴露布尔迪厄所界定的至关重要的利益的形式。虽然在许多情况下这或许是正确的，但是它依然存在把适当的批评还原为所谓的自我利益的形式的危险。

地回溯到科学的基础，也就是阐明使科学成为可能的前提与操作程序”的时候，布尔迪厄(1971c：181)已经把反思实践等同于科学实践本身。他把社会学的社会学(a sociology of sociology)视作把社会科学家从科学场域中的符号斗争的制约中解放出来的必要手段。因此，他最为坚定不移地反对斯科普尔(Skocpol 1986：11—12)，后者警告社会学家说“千万不要迷失在元理论的死胡同中”。布尔迪厄明确地介入了一系列元理论问题，他相信这些问题将为社会学确立坚实的认识论基础(参见第三与第十章)。同时，他也不同意里泽尔(Ritzer 1988)的做法，即把社会学元理论确立为社会学学科的次场域。对布尔迪厄而言，社会学的社会学必须成为所有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构件，“它是任何严格的社会学实践的必要前提。”(Bourdieu 1989b：385)在布尔迪厄看来，一种真正的社会科学的实践**要求**一种对于自身的“反思的回归”。

这种对于社会科学实践本身的反思回归的要求，既为布尔迪厄刻画出了一种独特的研究模式，也为他划定了实质性的定向。事实上，布尔迪厄认为他的社会研究中的这个方面，是他与别的社会学家的最根本区别：

> 我相信，如果我设想的社会学与别的、包括过去与现在的社会学有什么重要的方法上的区别，那首先就是它持续地把它生产的科学武器反过来运用于它自己。(Wacquant 1989：55)

实际上，对于社会科学范畴运用的批评性的反思从一开始就是布尔迪厄著作的特征。布尔迪厄(1990h：15)把对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关系的批判性考察描述为“我所有工作中最重要的成果。”这也证明了布尔迪厄在教育与知识分子等实质性领域的研究的合理性。对于布尔迪厄而言，这些实质性的问题是与元理论的问题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他的绝大多数研究工作同时反映了这两者。当布尔迪厄探索文化在社会阶级再生产中的作用的时候，以及在他探索使得反思地、客观地

研究文化成为可能的认识论条件的时候，这种方法丰富并提高了他的思想的复杂性。他声称，适当建构的反思社会学具有这样的承诺：将个体与群体从社会决定与统治的制约中解放出来，这个声称代表了对于批判的社会理论与社会研究的独特贡献。[1]

作为政治学的社会学

这样，布尔迪厄的著作不应该被看作是严格学院化的社会科学著作；它同时也代表着一种政治参与的模式。他把自己的社会学实践视作提供了对于普遍流行的误识形式的一种纠正。正如我在第十章中将要解释的，它是以科学的名义进行的一种政治实践形式。大量此类政治参与的目的在于反对作为普遍文化价值的携带者、独立于政治与经济决定的知识分子的自我形象与傲慢自大。由于与布尔迪厄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充分承受了布尔迪厄的批判性社会分析的冲击力，并再现了布尔迪厄著作中反复出现的核心主题，我将在第九章讨论布尔迪厄的知识分子理论。而第十章则考察布尔迪厄对于现代社会中社会科学家的批判作用的看法。

学术生涯

关于布尔迪厄生平传记方面的出版物目前寥寥无几，而且布尔迪厄自己也抵制公开的自我介绍。但是，他的社会学得以发展出来的社会条件与思想文化条件，对于理解他对于法国教育、社会学以及知识分子

[1] 虽然布尔迪厄没有把自己等同于法兰克福学派，但是他依然是一个批判理论家，并与霍克海姆、阿多诺共同具有以下的三个核心特征：对于被广泛接受的范畴的批判；对理论实践本身的批判；对日常生活的批判(Calhoun, LiPuma and Postone 1993)。

生活所采取的尖锐的批判姿态具有重要意义。他的社会学产生于对外界社会动荡的不同寻常的经验，产生于非常广泛的知识影响与职业经验，这一点在其他的社会学家中是比较少见的。对于法国知识界精英而言，他是一个文化与社会的“旁观者”，他在哲学领域得到训练，作为人类学家开始自己的职业研究生涯，并吸收了英国、美国、德国以及法国知识界的传统。

写作风格

最后说一说布尔迪厄的写作风格也许是适合的，因为许多人发现这是一个难以越过的令人生畏的障碍(Jenkins 1992)。布尔迪厄既是善于修辞的文体家，又是一些深奥散文[1]的作者。他用许多相互勾连的短语构成的复杂长句子进行写作。逗号与分号大量出现。他的散文充满着争论、佯谬句式、否定、双关语，这使得他的著作对于那些不熟悉布尔迪厄写作所处的法国知识背景的读者而言，显得很难懂。轻松地解读布尔迪厄是永远不可能的。

尽管这样，三个方面的观察可能增进对布尔迪厄的写作风格的理解。首先，布尔迪厄有意识地使用修辞技巧以便与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世界保持距离。因为布尔迪厄认为，正是习以为常的经验(the experience of familiarity)代表了一种对社会世界进行科学理解的主要障碍。他有意识地选择术语并培养一种与日常语言的使用保持距离的写作风格。其次，他的文体是对法国风格化的正统学术话语习惯的精心策划的挑战。法国是一个把理论阐述的明晰性提升到民族美德高度，把它看作是民族聪明智慧的真正标志的国家。布尔迪厄的散文风格可以看

[1] prose，这个词指的是与虚构性的文艺作品不同的所有文类，包括学术论文、议论文等，与我们习惯上说的抒情散文不同。——译者

作是对这个特定学院正统的反抗，是为了粉碎作为民族才能的优雅观而设计的批判性回应。第三，虽然自己不承认，但布尔迪厄的写作风格无疑代表了一种在法国的学术市场上为自己划定特定位置的学术策略，正如巴尔特、福柯、拉康等都发明了自己的相应的特殊写作风格一样。[1]

这些观察指出了布尔迪厄修辞策略中的一个基本悖论：如果他的社会学的确要成为反对所有形式的符号统治的斗争工具，而且这个规划应该有集体的和个人的益处，那么，专业化的学术圈子以外的传播问题就是不可回避的。布尔迪厄在近来的一系列著作中更多地使用通俗易懂的谈话体文风(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1] 参见华康德对于为什么许多英美两国的社会科学家把布尔迪厄的散文单独挑出来进行批评而提出的有启发性的分析(Wacquant 1993a)。但是，华康德很少从知识消费场的角度讨论这个问题。我的观察把布尔迪厄置于他的知识生产场内部。这些观察指出了布尔迪厄致力于一种独特的职业化社会学话语的程度。它们也使布尔迪厄愿意接受米尔斯(Wright Mills 1959：219)的为人熟知的劝告："为了战胜学术上的枯燥无味，你必须首先战胜学术上的装腔作势。"

第二章

职业生涯与思想影响

为了更加充分地评价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研究的总体方法，本章考察布尔迪厄生涯与知识传承的几个关键特征。我并不尝试写布尔迪厄的传记，这样的任务有待他人，我将只集中关注在塑造他的知识规划方面看起来最具有决定性的几个因素。

目前已经出版的布尔迪厄的传记材料非常少，而布尔迪厄自己很少谈论自己的生活。与其他许多已经出版个人回忆录的法国引领潮流的知识分子——比如阿隆（Aron 1983a，1983b）、图雷纳（Alain Touraine）、拉杜里（Le Roy Ladurie 1982）——不同，布尔迪厄抵制公开的自我亮相。他对于知识分子自我卖弄趣闻逸事深感悲哀，认为“传记写作”是一种自恋形式，一种沉迷于个人主体性的自鸣得意，缺少真正的社会学洞见的自恋形式（参见 Bourdieu 1987a）。在为数极少的几个谈及自己生涯与知识发展的地方，他所提供的信息是社会学的而不是个人的。下面的传记信息是从布尔迪厄已经出版的著作、[1]从1970—1976 年间我在巴黎读大学并参与布尔迪厄的讨论班的时候的个人观察、1976 年以来与法国和美国的观察者的谈话以及与布尔迪厄的几次谈话中推测出来的。本章包含相对较多的关于布尔迪厄早期而不是 1981 年入选法兰西学院以后的信息。我相信，从知识的形成时期对

[1] 关于他的社会学的几个关键性的理论来源，布尔迪厄自己为我们提供的少数几篇文章包括：Bourdieu 1990c：3—33，1990h：1—29；Bourdieu and Passeron 1967；Honneth，Kocyba and Schwibs 1986。

于确立贯穿一个人终身的知识倾向的影响程度看，这样做是合理的。人们“摆脱”其早期教育的情况是非常罕见的——这是布尔迪厄自己的习性理论所强调的一点，也得到了他对于教育对法国知识分子的持久影响的分析的支持。 这个观点还得到了罗宾斯(Derek Robbins)对于布尔迪厄著作的历时研究之发现的支持。 罗宾斯(Robbins 1991：178，181)的结论是，布尔迪厄在其早期的生涯中获得了自己的知识框架，后来并没有在实质性的意义上改变它。 在回应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以及知识的变迁的时候，布尔迪厄当然反复检测、实验、阐述并通过某种方式使自己的框架变得更加精细，我将在适当的地方强调这种变化。 但是，我与罗宾斯一样，为布尔迪厄所有著作的连贯性以及反复出现的知识构架而感到惊讶。

布尔迪厄的研究起源于非常不同的知识资源与职业经验，实际上，将他在当代西方的思想地图中加以定位是非常困难的。 但尽管如此，几个主要的影响来源还是可以找到：学生时期的哲学训练；对于马克思、韦伯以及涂尔干三位经典社会学理论家的解读；战后法国的总体思想氛围——尤其是结构主义的影响；在阿尔及利亚的人类学田野研究。

布尔迪厄的职业生涯

布尔迪厄的职业生涯遵循了一条不同寻常的向上流动的轨迹，他从边缘的文化与社会出身爬升到法国知识金字塔的顶峰：法兰西学院。1930 年，布尔迪厄出生于法国南部小镇德甘(Deguin)的一个低层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乡村的邮递员)。 他的早年就生活在贝阿恩(Béarn)的这个偏远的农村地区并说一口地方方言。 作为一个特别聪颖而勤奋的学生，布尔迪厄先进入了波城公立中学，然后又进入著名的、学术上严格筛选的巴黎路易－勒－格朗公立高中(1949—1951)。 1951 年，他进入巴黎的精英学校——高等师范学院(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简称 ENS)，在那里，他准备哲学教师资格会考，同时还在巴黎文学院修课。

作为法国最著名的高等学校之一，高等师范学院原先是培养学术上有天赋的学生成为法国公立中学教师的地方。它通过严格的竞争考试选择中学生并为他们提供通过国家竞争考试进入教师职业的最好的预备训练。成功的候选人就进入地位显赫、学术上强有力的师范学校男毕业生网络，它对法国教育中的课程、考试以及教学委任施加着巨大的影响。

高等师范学院还成为法国知识分子的首席预备学校。在高等师范学院的学生中，我们发现有阿尔都塞(Althusser)、柏格森(Bergson)、康吉扬(Canguilhem)、德布雷(Régis Debray)以及福柯(Foucault)、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梅洛－庞蒂(Merleau-Ponty)、保罗·尼藏(Paul Nizan)、以及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e)。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法国顶尖级的社会学家，包括法国社会学的奠基者涂尔干。事实上，高等师范学院是“世纪之交年轻的涂尔干者的培育基地”，也是二战以后法国杰出社会学家［包括雷蒙·阿隆、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以及让·施特策尔(Jean Stoetzel)共同的教育经历(Karaby 1981：37)。阿兰·图雷纳在布尔迪厄之前于 1945 年进入高等师范学院，雷蒙·布东于 1954 年进入高等师范学院。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与拉杜里则与布尔迪厄同时就读于高等师范学院。

看到像布尔迪厄这样出身低微、却极为成功的学生进入高等师范学院的大门是不奇怪的。高等师范学院无疑是法国所有大学中最以学术为中心的，而且在招生中相对少地受到家庭背景的影响。西里内利(Sirinelli 1988)用文献证实：历史地看，有足够数量的向上流动的新生表明该校的精英教育形象的合理性。[1]但是正如布尔迪厄以及他人的研

[1] 最为惊人的例子之一是已故的乔治·蓬皮杜。他的祖父母是农民，父母是小学教师，而蓬皮杜在学术上非常出色并进入了高等师范学院，最终成为法国总统。

究(1989c)所表明的，大学(包括高等师范学院)的精英教育形象代表了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使人们忽视了大量有特权背景的学生。由于来自法国最西南部的僻远省份，布尔迪厄在高等师范学院的众多同学中没有文化和社会的优势可言。[1]

当然，布尔迪厄并不是被他的巴黎同辈看作是“乡下人”的惟一一个人——还有许多别人。在巴黎知识界的同行看来，福柯也是一个乡下的“外来人”(Eribon 1991：15)。的确，正如布尔迪厄(1988b)所说的，布尔迪厄、福柯以及德里达三个人的反体制立场，可能部分地来自于他们各自与文化上和社会上受巴黎人统治的环境格格不入的外来者的背景。

高等师范学院以培育强烈的批判精神著称，而布尔迪厄正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很少有什么东西能够逃过他锐利的批判眼光：同行、教授以及学校本身。布尔迪厄以尖锐无情地批判法国教育机构而著称，这一点在高等师范学院时期就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令人惊讶的是，恰恰是布尔迪厄的作为学术体制中的一个外来者这种自我概念以及他对于学术机构的尖锐批判态度，使得他跻身知识界名流成为可能。布尔迪厄在高等师范学院的经历不仅使他成为紧张的学术选择的奇迹般的幸存者，而且成为文化与社会的旁观者。布尔迪厄在高等师范学院的同行之一回忆说：布尔迪厄对于统治高师的巴黎学术界怀有“异常强烈的复仇欲望”(Dufay and Dufort 1993：196)。这个看法在后来的《继承人》一书中得到了印证。在此书中，布尔迪厄把法国大学文化分析为是与普通大众敌对的，它所特别嘉奖的是个人化的风格特异性而不是真正的知识探究。

有时候人们说，在每个愤世嫉俗者背后都有一个失望的理想主义

---

[1] 高等师范学院的社会科学主任克里斯坦·博德洛(Christain Baudelot)曾经报告说，高等师范学院从来不是法国社会最下层的人向上层移动的主要策源地(哈佛大学欧洲中心的报告，1995 年 3 月 23 日)。根据布尔迪厄的看法，今天，只有 5%的高等师范学院的学生是代表普通阶级的。由于来自偏远西南省份，布尔迪厄既没有高等师范学院多数同学的文化优势，也没有他们的社会优势。

者。这种说法或许也适合于布尔迪厄，他把自己与法国学校教育的关系比作一个受挫的“献身宗教之人”（oblate）的关系（1988b：xxvi）。布尔迪厄借用这个宗教术语来指那些出身贫贱的教师所体验到的非常强烈的机构忠诚，这些人把他们的文化的、社会的以及职业的成就都归功于教育系统。[1]但是布尔迪厄拒绝忠诚于使他的成功成为可能的那些机构。法国教育所宣称的普遍主义的崇高理想与统治教师和学生之间关系的学术权力的实际做法之间的鸿沟深深挫伤了他。那些把课程教条强加于人的法国学术官僚激怒了布尔迪厄，而这些官僚本身却很少做或根本不做经验研究，他们对有前途的学生实施严格的控制。[2]布尔迪厄在法国学院文化中经验到的对于下层阶级的深藏不露的偏见冒犯了布尔迪厄。[3]他严厉批评那种鼓励学术上的循规蹈矩而不是鼓励艺术与科学探索的传统的课程体系、教学方法以及成绩评估。这种在法国学术界内格格不入的个人经验促使他在自己的后期著作中对学校教育进行了批判性的考察。[4]但是它也激发了布尔迪厄对所有机构的研究。的确，我们发现布尔迪厄把自己的批判立场规范化为一种成功的社会学研究本身的应有的——如果不是必须的——要素。[5]

人们或许会期待布尔迪厄的反叛会使他加入法国共产党。在20世

---

[1] oblate这个宗教术语指的是那些对教会表示无限忠诚的男孩，因为教会把他们从非常低贱的社会出身中选择出来，以便训练成为牧师（Bourdieu 1988b）。

[2] 他把乔治·戴维（George Davy）、乔治·居尔维奇（George Gurvitch）作为主要的例子加以引用（Honneth，Kocyba and Shwibs 1986：37）。居尔维奇对于列维－斯特劳斯——他在进入法兰西学院之前不遵守精英的学术成规，不写博士论文——的蔑视只是一个传说。这个故事说居尔维奇草率地把一个学生评定为不及格，原因只是这个学生在一个口头考试中提到了列维－斯特劳斯。

[3] 后来布尔迪厄把教授对学生论文的评价判断为事实上是一种对于其阶级根源的社会判断（Bourdieu 1988b：194—210）。

[4] 在一个很罕见的谈论个人的场合，布尔迪厄写道：“关于大学机构的社会学在我的著作中占有的特殊地位，无疑可以通过我所体验到的一种特殊的力量加以解释，带着这种力量，我体会到，一个‘献身宗教之人’在面对他所献身的真理与价值的毁灭时理性地控制失望感的必要性，而不是躲避到自我—毁灭的怨情之中。”（1988b：xxvi）

[5] 布尔迪厄暗示，那些最可能接受他的那种批判社会学的学者，是那些不仅擅长科学研究，而且“拥有一种反抗精神与距离意识，一种特殊的、常常根植于对于学术界的疏离感的文化的学者，这种反叛精神与距离使他们不因其表面价值而‘购买’它，或者说，这些学者具有一种抵抗的形式以抵制由在社会学中占据社会支配地位的话语所提供的关于社会世界的不真实的、了无生气的再现”（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249）。

纪 40 年代后期与 50 年代早期，高等师范学院，就像法国的其他地方一样，已经变得高度政治化。 法国知识分子被清晰地划分为法国共产党的追随者、赞成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但是批评共产党者，以及更加关心个人自由与有意义的个人参与的存在主义者(Poster 1975)。 在那个时候，法国共产党及与其联合的劳工组织对政治左派具有最大的影响力。 而且，共产党人因为在二战期间的法国抵抗运动中发挥了作用而享有巨大的合法性。 即使是萨特这个在 50 年代统治法国知识界的人物也在《现代》杂志(*Les Temps Modernes*)中与梅洛－庞蒂、克洛德·勒福尔(Claude Lefort)以及加缪(Albert Camus)就对苏联与法国共产党的忠诚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高等师范学院也不能逃脱这个热烈的政治论争。 每个人都被要求在拥护工人或拥护政治右翼之间“站队”(Eribon 1991：33)。 1949 年进入高师并成为高师共产党领袖的拉杜里(Ladurie 1982：79)回忆道：大约 20%的学生成为共产党成员，虽然并不是所有这些成员每次都参加会议。 除了同龄人的压力之外，某些受到高度尊敬的高师教师也是党员并积极地吸收学生参加。 比如让·图桑－德桑蒂(Jean Toussaint-Dessanti)，一位马克思主义与现象学专家，一个“狂热的共产主义者”与“杰出的教授”……对高师的学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有助于使得共产党党员身份变得更加有吸引力(Eribon 1991：31—32)。 阿尔都塞作为学生导师也对众多的高师学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福柯主要就是在阿尔都塞的影响下于 1950 年入党的，一直到 1953 年退出共产党，虽然福柯在高师的党小组活动中并不积极。 福柯组成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小团体，这些人比较宽容但是依据党的标准来看却被认为不够正统(Eribon 1991：50—51)。 布尔迪厄的最后一位合作者帕斯隆就是福柯小团体中的积极分子。

但是与他那个时期的师范学校同学不同的是，布尔迪厄并没有参加共产党。 事实上，布尔迪厄(1990c：3)回忆起曾经与其他几位高师学生，包括德里达，在斯大林主义时期创立了一个捍卫自由委员会，并受

到拉杜里的公开指责。[1]虽然布尔迪厄参加了阿尔都塞的讨论班，但是他却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忠实的追随者。[2]当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逐渐统治法国知识界的大多数人的时候，布尔迪厄又成了其追随者的尖锐的批评者。[3]尽管如此，布尔迪厄早期生涯中与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的相遇显然影响了他的研究。这一影响可以在布尔迪厄所关注的一些学术问题中发现。关于文化的相对自主性的观点就是一个例子(Bourdieu 1990c：7)。而且，布尔迪厄的某些理论术语可以被理解为对阿尔都塞的修辞风格的呼应。最后，拉杜里(Ladurie 1982：9)回忆起在所有进入社会科学界的他的师范同辈中，首先是布尔迪厄能够在当代法国知识界发展并确立一种在那些年里由高等师范学院中的马克思主义气氛所塑造的核心观念，即：法国的学校系统与它所传播的文化基本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50 与 60 年代的法国社会学

当布尔迪厄进入高等师范学院的时候，法国社会学的机构基础还非常薄弱。法国知识界在50年代早期被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所支配，存在主义的反实证主义与正统的法国共产党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都不鼓励发展社会理论与经验研究的独立基础。涂尔干的丰富遗产在二战之前就已经趋于衰落，这既是因为其最有前途的继承人的夭折，也因为其

---

[1] 三十多年以后，布尔迪厄与高师共产主义者的关系的事实真相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敏感的问题。1988年，在法国《解放报》的一个访谈中，皮埃尔·朱坎(Pierrie Juquin)——布尔迪厄在高师时期的同辈人之一、后来成为政治局委员——断言布尔迪厄曾经加入高师共产主义小组。布尔迪厄则在下期的报纸中言辞激烈地否定了这点。皮埃尔·朱坎则反过来坚持认为，“即使布尔迪厄不是成员，但他确实参加了小组的重聚”(详见Dufay and Dufort 1993：197)。

[2] 虽然不是高师的阿尔都塞圈子中的成员，布尔迪厄却从来不公开地评判阿尔都塞。在一次访谈(巴黎，1987年12月19日)中，布尔迪厄坚持认为阿尔都塞的贡献之一是鼓励高等师范学院的学生超越共产党所强加的常规的陈词滥调与标语口号来阅读马克思。

[3] 参见布尔迪厄在《社会科学研究会刊》(*Actes de la recherché en sciences sociales*)(Bourdieu 1975a)中的特别指名道姓的攻击。布尔迪厄认为，阿尔都塞主义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已经施加了一种消极的影响(此观点公开地在1989年3月31日—4月2日于芝加哥心理社会研究中心召开的“布尔迪厄社会理论研讨会”上表达)。

在法国学术机构中的边缘位置(Karady 1981)。 1945 年以后进入社会学教职的有限几个新来者不得不去国外实现自己的学术抱负。 他们为自己的工作把一些专门的学术方向引进到法国，就像让·施特策尔在社会心理学领域所做的那样(Karady 1981：42)。

在大学预科中是不教社会学的。 大学中也没有社会学的学位。 在 1949 年，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e de Recherche Scientifique)只有 18 个人涉足社会人口统计学，在 1950 年，在整个法国只有 4 个社会学的教授职位(Amiot 1984：281—282)。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法国社会学学科中非常有限的机构被牢牢掌握在乔治·居尔维奇与乔治·戴维的手中，他们是巴黎大学文理学院的教授，[1]是真正的大学官僚，而不是实践性的社会科学家。 他们更像社会哲学家而不是职业化的研究型社会学家。 而且，让·施特策尔与乔治·弗里德曼的经验研究在带有哲学趣味的年轻的师范学院学生眼里并没有合法的地位(Bourdieu 1987b：15)。 这些研究者没有“遵循光荣的道路——高等师范学院以及师范学院资格会考”。 他们不是被看作社会学家，而是失败的哲学家(Bourdieu 1990c：5—6)。

但是，如果说 50 年代的法国社会学很少提供对像布尔迪厄那样的年轻学生来说有吸引力的职业地位的话，它的机构化程度与职业化程度的相对不足却为他提供了一个尚未被充分占据的知识市场的机会，而哲学领域的机会就没有这么多。 但是在第一次作为人类学家在阿尔及利亚作田野研究，并且也没有阿隆这个强有力的提携者之前，布尔迪厄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在 1955 年完成了教师资格会考后，布尔迪厄像许多在他之前在哲学领域获得教师学衔的其他人一样，到巴黎以外的省份教二流的哲学。他开始是在正好靠近巴黎的穆兰中学教学。 但是与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开始了，他应召入伍。

---

[1] 阿隆在 1955 年接替了戴维在巴黎大学文理学院的位置。

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对于布尔迪厄的职业生涯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正是在那里，他作为一个“自学成材”的人类学家实质性地开始了他的社会科学研究(Honneth, Kocyba, and Schwibs 1986：39)。他的第一本著作《阿尔及利亚的社会学》(*Sociologie de l'Algérie*)，于 1958 年出版，[1]就在同一年，布尔迪厄成为阿尔及尔人文学院的助教，正是在那里，他开始了两项对阿尔及利亚社会结构在殖民与战争下发生转型的大型研究。这一研究的成果则是两本合作的著作：《阿尔及利亚的勤劳劳动者》(*Travail et travailleurs en Algérie*)(Bourdieu, Darbel et al. 1963)与《背井离乡》(*Le Déracinement*)(Bourdieu and Sayad 1964)，以及大量的文章。这一研究也为后继的得到广泛承认的三部著作奠定了基础，即：《实践理论大纲》(*Esquisse d'une théorie de la pratique*)(1972)，其修订完善后的英文译本《实践理论大纲》(1977c)，以及《实践的逻辑》(1990h)。

与许多其他的法国知识分子一样，布尔迪厄反对法国的战争努力，由于这个原因，他最终被迫离开阿尔及利亚回到巴黎。在巴黎，他获得了一个机会，成为雷蒙·阿隆在巴黎大学文理学院的助教。他在那里的教学从 1961 年延续到 1962 年，然后到里尔大学的人文学院任教直到 1964 年。在 1964 年，他成为社会科学高级研究学院(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缩写为 EHESS)的研究主任之一。[2]但是，布尔迪厄并没有接着攻读他的博士学位，而在法国博士学

---

[1] 这本书翻译成英文时名为《阿尔及利亚人》(*The Algerians*)，1962 年。

[2] 阿隆与图雷纳在 1960 年就成为研究主任了。1964 年，提名权实际上是在高级研究实践学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的“第六部”那里。高级研究实践学院创立于第二帝国时期的 1868 年，处于大学的结构之外，目的是把研究与教学结合起来。1947 年，两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与吕西安·费夫尔(Lucien Febvre)，也是历史研究领域中著名的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在高级研究实践学院内部创立了以经济与社会科学为方向的“第六部”。第六部很快就成为法国社会科学研究与教学的主要中心。1975 年，高级研究实践学院改名为社会科学高级研究学院，而且这个机构还被赋予了与大学不相上下的地位。今天，它已经有了与高等学校相似的自主性。这个任命给予布尔迪厄重要的机构基础，以便在传统的大学教学与职业以外来发展他自己的研究。这个任命因为有了阿隆、布罗代尔以及列维－斯特劳斯的联合支持才得以实现。

位通常是寻求大学教授职位的必要条件。[1]

对于早期的布尔迪厄来说，阿隆是一个关键的支持者，就像他曾经是许多今天法国的其他杰出社会学家的关键性的支持者一样。[2]让－克洛德·雷诺(Jean- Claude Raynaud)、埃里克·德·当皮埃尔(Eric de Dampierre)以及克洛德·勒福尔也是阿隆的早期追随者。作为巴黎大学文理学院的一个教授，雷蒙·阿隆是许多今天法国社会学界领袖人物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成员，在他们当中，有勒福尔和阿兰·图雷纳。在1961年，阿隆用福特基金会提供的基金，创建了他的欧洲历史社会学中心。他在布尔迪厄身上发现了一个前途无量又特别勤奋的学者——一个把古典社会理论的浓厚兴趣(特别是对于马克斯·韦伯)与经验研究结合起来的学者。布尔迪厄同时也是一个哲学的师范生和取得教师资格的人——就像阿隆本人一样。阿隆在1964年邀请布尔迪厄主持中心的行政事务。正是在共同管理阿隆的中心的时候，布尔迪厄物色到了他早期研究队伍的核心成员：吕克·波兰斯基(Luc Boltanski)，伊薇特·德尔索(Yvette Delsaut)，克洛德·格里尼翁(Claude Grignon)，帕斯隆，莫尼奎·德·圣马丁(Monique de Saint Martin)。

---

[1] 这样做的一个后果是，布尔迪厄不能主持法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答辩委员会。这又一次表明他在法国学术机构中的“内部的外人”(outsider as insider)的身份。在这方面，获得了博士学位的福柯在他们两人中倒是更加大学化。布尔迪厄追随列维－斯特劳斯的模式，后者也没有满足这个学术要求(即同样没有获得博士学位——译者)。

[2] 值得一提的是，在有限的关于自己的生平陈述中，布尔迪厄谈到了自己的知识背景，但是却没有提到阿隆。尽管这样，阿隆在60年代却为布尔迪厄提供了许多非常重要的机构化资源。

在二战以后的法国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中，阿隆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战后法国的社会学研究最先是在大学之外，在像乔治·弗里德曼这样的先驱人物的领导下在经验性研究机构[比如社会学研究中心(Centre d' Etudes Socialogiques)]中发展起来的。1955年，阿隆在巴黎大学文理学院被选为社会学教授的时候，他与社会哲学教授乔治·居尔维奇、社会心理分析教授让·施特策尔以及另外两位社会学教授一起讲授一门在全法国只有四所大学才讲授的知识，这四所大学分别是：巴黎大学、波尔多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图卢兹大学，而且没有正式的学位。在那之前，社会学一直被当作是完成哲学学位的部分学分来修的。在1958年，阿隆使社会学学位得到了认可，他在只有一个教学助手的情况下于1955年开始他在巴黎大学文理学院的职业生涯，到1968年结束。像阿隆这样一个对于革新学院的社会学具有指导性意义的人物，布尔迪厄的职业生涯与之发生紧密的交叉是不奇怪的。

在政治与性格上，布尔迪厄与阿隆截然不同。[1]但是，最初他们之间还是相互尊重的。[2]尖锐的分歧出现于 1964 年布尔迪厄出版《继承人》(*The Inheritors*)之后。在这本书中，布尔迪厄与他的合作者帕斯隆一起对法国大学人口与学生文化的那种以阶级为基础的特征进行了极为尖锐的批判。[3]一场尖锐的冲突终于发生在 1968 年。这一年，在回应学生运动的时候，阿隆公开提倡限制学生参与大学的生活，并把他的研究中心作为思想接近的人的集合处(Colquhoun 1986：339—340)。[4]布尔迪厄愤而离去，带上他的一些最亲近的合作者，成立了自己的欧洲

---

[1] 阿隆与布尔迪厄都是高等师范学院的学生，他们在经典社会理论方面——特别是韦伯——也具有共同的兴趣。但是在政治上他们是不同的：布尔迪厄属于左派而阿隆处于中右。而且阿隆作为记者是一个定期就当前的政治事务写文章同时又进行学术研究活动的公共知识分子；而布尔迪厄则把自己的兴趣集中于学术研究活动，他对以阿隆为代表的那类公共知识分子角色总是持尖锐的批判态度。

[2] 阿隆对于布尔迪厄的最初尊重体现在他为布尔迪厄的《阿尔及利亚人》(1962)写的前言中："这是我的朋友布尔迪厄写的一本书"。同时，在前言中他还声称这本书是一本"关于阿尔及利亚而不是阿尔及利亚战争的书。布尔迪厄，这位社会学家与哲学家，在那个国家生活了许多年。他具有超越的观察能力与满怀同情心的理解能力，有重新建构同一个时代不同共同体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体系的能力，他经验了这些共同体在组织起来反抗殖民状况时的逐步增长的团结性。"尽管阿隆有这些赞美之词，但是布尔迪厄对于阿尔及利亚农民共同体的分析是与他对于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主义以及战争的分析不可分离的。实际上，布尔迪厄此书以最后一章"革命内部的革命"结束，而这一章就是集中关注战争的。

作为报答，布尔迪厄把 1965 年出版的《一种艺术的方法》一书(Un art moyen)献给阿隆。

[3] 回忆一下布尔迪厄与帕斯隆对之进行激烈批判的那个时候的法国世俗公立教育角色的象征意义是非常重要的。世俗的与免费的公立教育系统是第三共和国在与教会、贵族寡头以及保守主义进行的斗争中获得的一个值得骄傲的成就。在许多法国人的眼中，学校是与精英主义相对立的平等主义的象征，是与寡头政治相对立的民主的象征，是与教会以及统治阶级的控制相对立的自由的象征。

阿隆自己也一直批评法国大学教育。早在 1959 年，即他在巴黎大学文理学院人选社会学教授之后的第四年，他就为《费加罗报》写了题目为"巴黎大学文理学院的巨大不幸"的文章，在文章中他抱怨大学中人口过密。在 1960 年，他连续发表了四篇论述"危机中的大学"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公开指责法国高等教育趋势——强调"修辞质量"、学习一些"大众文化"而不是提高教师与学生的研究技巧。这些也是布尔迪厄与帕斯隆批评的内容。但是，布尔迪厄与帕斯隆的以阶级为基础的对于大学文化以及教学的控诉对于阿隆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4] 这两个人之间关系的破裂所留下的是深深的沮丧感与期待的落空，这是没有疑义的。在阿隆的回忆录中，阿隆对此的反应是："那个时候，他在所有自己已经实现的东西方面都非常出色，他是他那一代人中的'大师'之一。但是(当时)没有迹象表明他已经成为这样的人：一个学派的领袖、自以为是又盛气凌人、精于大学的诡计、对于任何可能引起他恼怒的人冷酷无情。从人的角度看，我期待的他不是这样的。"(引自 Colquhoun 1986：10)对此事件，布尔迪厄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

社会学中心。[1]

然而即使在这次破裂以后的几年中，依然可以感觉到阿隆的影响力，布尔迪厄有时还要求助于这种影响力。阿隆的支持帮助了布尔迪厄在1981年入选法兰西学院。而且，布尔迪厄推荐自己的候选人获得社会科学高级研究学院以及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职位的努力常常也只有在得到阿隆的支持下才能成功。[2]

即使布尔迪厄在1968年5月与阿隆决裂，那也不像图雷纳(Tauraine 1968)那样是因为热情地支持学生运动。布尔迪厄与学生运动的关系实际上是暧昧的。与其他的法国杰出思想家一样，布尔迪厄并没有参与1968年的学生运动。《继承人》一书的确助长了学生领袖的批判意识，让他们意识到法国高等教育中的阶级不平等，(Lindenberg 1975：31)。但是，那个时候，他的理论以及对于法国高等教育的研究强调的是法国社会结构的再生产，而不是它的变化的可能性。实际上，这本书因为暗示法国大学的学生并不构成一个阶级并因此不能进行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动员而遭到批评(Bourdieu and Hahn 1970：19—20)。1970年，布尔迪厄与帕斯隆本想出版他们的《教育、社会与文化中的再生产》一书，在这本书中，最为显著地突出了教育机构的社会再生产这个主题（这本书实际出版于1977年——译者）。而且，在1968年，布尔迪厄与尚博勒东(Chamboredon)、帕斯隆出版了《社会学的工艺》(*The Craft of Sociology*)，这本书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为一个在认识论上有启示性的社会学实践界定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直接参加政治实践。[3]

布尔迪厄早期对1968年事件的沉默是引人注目的。因为法国的学

---

[1] 在对于1968年5月的学生运动的态度的问题上，与阿隆尖锐对立的不止是布尔迪厄一个人。由于图雷纳热烈拥护5月的事件，阿隆与他的交往也破裂了(Colquhoun 1986：340)。

[2] 有一种偏向于阿隆的、关于他们两人之间关系的解释参见Baverez 1993。

[3] 作为60年代——这个时候阿隆正在筹备《社会学思潮》杂志——阿隆在巴黎大学文理学院的助教之一，布尔迪厄讲授涂尔干以及其他的社会学经典而不是社会运动或行为导向的社会学(action-oriented sociology)。

生运动受到了同时期其他所有重要社会学家的特别关注。[1]只有在得到法兰西学院这个法国学术界最高位置的保证以后，布尔迪厄才出版了他的《学术人》，发表了他对学生运动的看法。[2]这一批判性的研究(我们将在第七章介绍它)强调的是在大学的教学职业内专业人员的利益对于危机所产生的作用。虽然布尔迪厄本人是对现状持批判态度的人，但是他依然怀疑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的真正意义。即使在今天，他还是把它描述为仅仅是一场“象征性的革命”或“集体的创伤”(collective trauma)——它虽然有助于文化保守主义在学术界的再次出现，但是一直“没有政治意识”或真正的社会变革(Bourdieu and Haacke 1994：72)。

职业化与发展一个中心

对于二战以后的那一代法国社会学家来说，到社会学的圣地美国去朝圣已经开始成为一种惯例。有些人由于输入美国的思想成果而在法国一举成名。施特策尔引进了社会心理学和民意测验，布里科(Bourricaud)带来了帕森斯的功能主义，布东也借用了拉扎斯菲尔德[3]的某些传统的研究方法。布尔迪厄也在60年代到美国普林斯顿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高级研究机构进行了短暂的访问。在宾夕法尼亚他遇到了埃尔温·戈夫曼(Erving Goffman)，布尔迪厄曾经帮助戈夫曼把他的研究成果通过翻译介绍到法国，布尔迪厄声称戈夫曼深刻地影响了他，尽管他很少引用戈夫曼。尽管说布尔迪厄创造了法国社会学中的戈夫曼热是不正确的，但是他的确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了戈夫曼的一些概念，如“整体性机构”(Bourdieu 1989c：112)。更为重要的是，布尔迪厄在

---

[1] 例如，阿隆(Aron 1964)、克罗齐耶(Crozier 1960)、布东(Boudon 1969，1970，1971)以及图雷纳(Touraine 1968)都发表了自己对于1968年事件的看法。

[2] 在1971年的一篇题为“捍卫身体”(la defense du corps)的文章中(Bourdieu，Boltanski，Maldidier 1971)，布尔迪厄的确表达了一些重要的、在后来的《学术人》中得到发展的观点。

[3] 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奥地利出生的美国社会学家，他在方法论的研究上有独到的见解和开创性的影响。——译者

戈夫曼对于能动性的强烈感受中发现了对于法国结构主义的策略性的纠正。

布尔迪厄在20世纪60年代以及70年代初期的努力集中于发展一种不同于大学中所教的学院式社会学、也不同于盛行于法国知识分子中的媒体导向的社会学的一种专业化社会学。布尔迪厄早期几篇对于图雷纳的行为社会学(Bourdieu 1974b)以及莫林(Morin)对媒体的关注的批评文章(Bourdieu 1963)，将有助于划定布尔迪厄在法国社会学中的适当位置。布尔迪厄的社会学虽然不是预言性的，却是批判性的，虽然是可以经验地加以研究的，但又是理论性的，虽然不是实证主义的，但却是科学的。沿着涂尔干的传统，布尔迪厄努力建立一个能够把他自己的社会研究视点加以合法化与机构化的学派。他在社会科学高级研究学院以及高等师范学院这两个学校的研究生讨论课上尽心教学，很少按照巴黎知识分子的传统发表公开的政治言论。一开始活跃于法国的出版界与职业社会学舞台的时候，他就重新调整自己的努力方向：发展自己的研究中心，并成功地吸引了一批有能力的合作者。[1]布尔迪厄出版的绝大多数著作是在他的研究中心完成的，而且带有这些合作努力的印记。由于布尔迪厄未能在法国最重要的社会学杂志《法国社会学评论》(*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获得他所追求的权威性的发言权(他与《理论与社会》杂志合作的状况亦如此。在那儿，他与阿尔维·古尔德纳有过短暂的合作)，1975年，他创办了自己的杂志《社会科学研究会刊》(*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这使得他成为当代法国惟一有自己的专业性杂志的社会学家。1975年以后，他的许多著作事实上是最初发表于这个杂志的许多文章的精心汇编。[2]

---

[1] 布尔迪厄的欧洲社会学中心属于这样一种机构化的学术舞台，即半公开的、处于大学之外的研究中心，战后法国绝大多数的社会学事实上都是在这样的研究中心生产出来的。虽然布尔迪厄的确接受了柯达公司的基金来研究摄影(Bourdieu, Boltanski et al. 1965)，但他的中心并不依赖私人基金，也不依赖政府的合同研究而发展。布尔迪厄主要通过来自社会科学高级研究学院的公共资源建立自己的中心(参见Drouard 1982)。

[2] 在创办《社会科学研究会刊》以后，布尔迪厄停止了在《法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文章，这进一步证明了他创办自己的社会学学派的坚定意愿。

20 世纪 70 年代，布尔迪厄对法国消费实践、文化趣味以及生活方式的进一步观察，以及对于自己在阿尔及利亚获得的材料的进一步分析，在《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1979)以及《实践的逻辑》(1980)中达到了顶点，这两本书使得布尔迪厄在 1981 年进入法国的法兰西学院。[1]《区隔》书的出版是一个商业上的成功，同时也使布尔迪厄受到媒体的极大关注。但是新的公众声望并没有减少布尔迪厄的产量。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他的长期的努力——批判性地研究法国的大学以及国家精英体系——开始结出硕果。他对于大学教员与教授的研究在 1984 年出版的《学术人》中达到顶峰，对于国家精英的研究开始于 70 年代初，最后于 1989 年出版了《国家精英》一书，在 1992 年，他出版了《艺术的法则》一书，此书汇集了他对于福楼拜的研究——对萨特的一个社会学的回应——以及对法国文学与艺术场域的产生的研究。

在 20 世纪最后一个十年快结束的时候，他开始了对法国公共住房政策的研究(Bourdieu 1990b；Bourdieu，Bouhedja and Givry 1990；Bourdieu，Bouhedja et al. 1990)。紧随这个研究的是 90 年代早期与中下层阶级个体就“社会苦难”问题进行的大量访谈。这个研究的结果是《悲惨世界》(*La Misère du monde*)的出版(1993)，这本书在商业上也非常成功。

在 1993 年，布尔迪厄因为其杰出的科学研究贡献而荣获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金质奖章，这一享有盛誉的奖励很少授予社会科学界人士，因而代表了法国科学界对于社会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特殊承认，以及对于布尔迪厄作为其最杰出的代言人的承认。[2]

---

[1] 由弗兰西斯一世在 1549 年创办的法兰西学院是为了高深的学术研究而设立的、享有学术特权的机构，其人数非常有限的终身教授(略多于 50 名)是由作为其学科中最有威望的代表组成的选举团遴选产生的，布尔迪厄入选法兰西学院使他陷入与他在社会科学高级研究学院的主要竞争者图雷纳的对立之中。阿隆、列维－斯特劳斯以及布罗代尔的有力支持使布尔迪厄的胜出成为可能。(法国国王弗兰西斯一世卒于 1547 年。因此，这里的说法恐有误。一般认为，法兰西学院由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首相黎塞留于 1635 年创立。——译者)

[2] 列维－斯特劳斯在 1968 年曾经获得该奖。

尽管持久进行着自己严谨的学科研究，布尔迪厄在他出版的著作中还是表现出风格的变化。 在 80 年代与 90 年代，布尔迪厄的数量不断增长的出版物是由访谈、演讲以及会议论文组成的（Bourdieu 1990c，1993d，1994；Bourdieu and Haacke 1994；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 他越来越适应于访谈的形式，而不是其前期著作的那种高度规范化的写作。

在 1981 年以后，布尔迪厄的时间与兴趣从欧洲社会学中心与社会科学高级研究学院转向法兰西学院。 在巩固了自己在法国社会学界与法国知识界的地位以后，他现在能够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投放到国际知识市场，他到欧洲、美国以及日本的访问也越来越多。

在 1989 年，布尔迪厄创办了《图书评鉴：欧洲书评杂志》，旨在为知识分子提供一个独立的论坛，它与所有把知识分子分裂开来的民族的、地区性的、专业的地方保护主义形式截然相异。 由于经费的限制，它后来变成《社会科学研究会刊》的副刊。 在 80 年代后期与 90 年代初期，我们可以看到布尔迪厄的政治积极性越来越高，越来越受到媒体的关注。

哲学思想对于布尔迪厄的重要性

接下来我将考察对形成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具有关键性意义的思想影响。 由于布尔迪厄涉猎的范围极为广泛，所以我只能选择其中的一部分。 我集中关注巴什拉、萨特、列维－斯特劳斯、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以及他早期在阿尔及利亚所做的田野研究经验。 布尔迪厄同时也从卡西尔（Ernest Cassirer）、奥斯汀（J. Austin）、海德格尔（Heidegger）、胡塞尔（Husserl）、梅洛－庞蒂以及维特根斯坦这些人身上吸收灵感以发展自己的实践逻辑、特别是关于语言的作用的看法。我注意到了但没有系统研究过这些影响。 它们对于布尔迪厄的语言研究的影响（本书没有考察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布尔迪厄关于语言的论文

集以及约翰·汤普森所写的令人获益匪浅的导言而观察到(Bourdieu 1991c)。

在走近布尔迪厄著作的时候，特别是对英美的社会科学家来说，记住他原先研究过哲学并通过独特的哲学关切来进行社会科学研究这一点是非常有帮助的。[1]布尔迪厄自己解释说(1987b：40)：

> 我难以道尽哲学家在我的著作中所起的作用……我所理解的社会学研究，同时也是一个着手做奥斯汀所谓的“哲学中的田野调查”的好场所。

的确，把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解为“哲学中的田野调查”是合适的。他的有些工作非常明显地寻求把哲学问题、哲学概念与社会科学研究结合起来。[2]而且，在这种努力中出现了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即：通过处理一些堂皇的概念，比如康德的美学理论，发现它们在世俗的、实际的日常生活活动(诸如穿着、饮食、体育活动)而不是心智或理性运动中的体现，来废黜唯心主义的哲学传统——这个传统在法国学术界特别强大。[3]对于布尔迪厄而言，哲学是一种理想型的符号暴力的形式，而这种暴力要求具有完全独立于其社会定位的普遍形式的知识。他尖锐地批评那些抵制被置于社会情境之中的各种形式的——特

---

[1] 哲学在布尔迪厄这一代法国社会学家中起的建构核心作用远远大于它在英国，尤其是北美国家的社会学家中起的作用。布尔迪厄的一些同时代人，如布东、图雷纳，也在哲学领域受到训练，我们可以在他们后来的著作中发现这一建构时期的轨迹。比如布东(Boudon 1980)，他曾经写过社会科学认识论方面的著述。但是没有一个像布尔迪厄的社会科学那样自觉地与系统地研究过与知识、知觉、行为、选择以及决定论等相关的核心哲学问题。

[2] 例如，在《区隔》一书中，他把自己对法国的生活方式与趣味的研究与对康德审美判断思想的批判结合起来。

[3] 认为社会学可以处理哲学问题这种极端化观念表明了布尔迪厄如何把矛头对准战后法国的精英知识传统的核心。正如让·多梅尔松(Jean d'Ormesson)所观察到的，“战争刚一结束以及随后的几年，哲学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我不知道我现在能否描述(距离如此之近)它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或许19世纪是历史学的世纪，20世纪中期则献给了哲学……文学、绘画、历史研究、政治学、戏剧以及电影，全部都在哲学的手掌之中”(引自 Eribon 1991：17)。

别是哲学的——实践形式(参见 Bourdieu 1983b)。

但是，把社会学的研究放在坚实的认识论基础上也是布尔迪厄的明确的目的。[1]布尔迪厄为此吸收了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曾经塑造过法国知识分子思想的各种不同的哲学思潮。 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的最突出特点之一，就是努力把来自这些哲学思潮的各种要素综合到他的社会学中。

福柯(Foucault 1978b)曾经观察到，法国哲学自 1930 年以来被划分为两个主要的传统，一个是现象学/存在主义的传统，另外一个是历史与科学哲学的传统。 前者关注经验、知觉以及主体性，因为它处理的是知识与认识的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 不管是梅洛－庞蒂的现象学还是萨特的存在主义，都属于这个传统；后者关注的是知识本身，探究独立于认识主体的科学理性的发展与结构。 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就是来自这个传统。 布尔迪厄的知识谱系明显更多地属于后者，但是他的知识规划代表了与这两个传统的批判性的对话。

在 50 年代的大学生时代，布尔迪厄研究了海德格尔、胡塞尔、舒茨、梅洛－庞蒂以及萨特等人的主要的现象学著作，他的同代人明显地感受到萨特的巨大影响，虽然在 50 年代偏离存在主义的转向已经明显出现。 反思其学生时代的经历时，布尔迪厄(1987b:15)说他“从未沾染存在主义者的习性”。 这种习性是一种知识的定向，它对于资产阶级出身的学生的吸引力要远远大于中低阶级出身的、来自巴黎以外省份的学生(比如布尔迪厄自己)。 尽管他在哲学领域训练有素，尽管存在主义对战后的法国思想有重要影响，布尔迪厄在早期却发展出了对科学的偏爱。 事实上，有一个时期，他还曾经考虑主修生物学。 他评论说，存在主义思想的广泛影响，起到了阻碍社会科学在法国的发展的作用。 特别是萨特，使得社会科学不受尊重，使社会科学对有抱负的法

[1] 这个规划在《社会学的工艺》一书中得到了正式的表达。 在这本书中，布尔迪厄与尚博勒东、帕斯隆一起为富有认识论活力的社会学实践制订了一个规划。

国青年知识分子缺乏吸引力。这样，布尔迪厄认为现象学家梅洛－庞蒂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他通过在他的哲学工作中严谨地解释社会科学而对年轻的布尔迪厄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事实上，在布尔迪厄的回忆中，对他的早期知识生涯产生最重要的哲学影响的，正是梅洛－庞蒂、巴什拉、康吉扬、维耶曼(Jules Vuillemin)等科学哲学家。

然而，在布尔迪厄的著作中，无论在实质上和概念上都存在着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影响。从实质性角度讲，在他的后期哲学生涯中他进行了一项研究，把海德格尔置于他的政治与知识语境中(Bourdieu 1991f)。但是非常明显，是萨特激发了布尔迪厄(1988a)去研究福楼拜。从理论角度讲，布尔迪厄把能动性重新引入结构分析的这种兴趣反应了存在主义的早期影响。而且从现象学那里布尔迪厄(1967)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即使是最世俗的人类生活活动，也可以是哲学研究的对象。[1]

然而，更加重要的结构性的影响还是来自战后法国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福柯(Foucault 1978b：ix)在指出这个知识传统的时候评论说，“你如果撇开康吉扬，就无法很好地理解阿尔都塞、阿尔都塞学派以及在法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发生的一系列讨论。”在谈到自己的著作的时候，布尔迪厄指出，“我努力把以巴什拉、康吉扬以及柯瓦雷(Koyré)为代表的整个认识论传统引入社会科学的场域。”(Bourdieu, Chamboredon, Passeron 1991：248)这个法国科学哲学传统并不十分为讲英语的社会科学家所熟悉。它早于库恩(Kuhn 1962)关于科学范式的富于生产性的著作中许多广为人知的信念，但与之不谋而合。[2]作为学生，巴什拉与康吉扬对布尔迪厄来说是“韦伯意义上的典型的预言家”(Honneth, Kocyba, Schwibs 1986：36)。他们的认识论遗产在布尔迪厄的

[1] 布尔迪厄将会使我们看到他对生活方式及其对于理解当代法国社会分层的帮助的关注，这与研究工人阶级文化和机构、政治动员、当代资本主义与国家的法国左派社会科学家的那些宏大主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 布尔迪厄这代高师哲学系的学生在库恩的著作出版之前就非常熟悉巴什拉、康吉扬、柯瓦雷的认识论传统。

著作中延续至今天。 的确，布尔迪厄的许多核心理论所关注的问题对于许多英国与美国的社会学家来说，依然有些难以捉摸——除非他们依据这个哲学传统来理解它们。 因此，我转向对巴什拉——对于布尔迪厄来说他是更加关键性的思想家——的几个核心观念的讨论，这些观念激发了布尔迪厄社会科学方法的概念。[1]

作为一个科学哲学家，巴什拉认为：哲学必须紧紧把握 20 世纪早期的物理学领域的革命性变革。[2]对巴什拉来说，相对论与量子力学彻底改变了哲学的使命以及哲学本身的性质。 他的结论是，这些变化削弱了现存的唯心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哲学传统。 哲学不再能够在理性的先验范畴(康德)、语言结构或者超越的主体(黑格尔)中找到自己的基础。 理性是历史的，因为现代物理学证明，在理性的结构与科学标准自身的内部存在着历史的发展。 这种历史发展在理论与经验世界的对立中展示出来，因而削弱了唯心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的现实观。 科学知识是“被建构的”、“辩证的”知识，它并不能抵达最终的真理，而只能作为一种持续的纠错过程进行下去。 这样，巴什拉认为科学发现的逻辑指向一种新的哲学使命，这种使命必须摆脱传统的基础才能完成。 哲学家必须采用科学的“辩证理性”，这种理性并不需要建立在一个认知主体的先在推理能力上，或建立在一个独立的经验世界中。巴什拉因而设想了一种反思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是历史的，非连续的，辩证的，不再集中于某些持续的、不变的以及常新的“我思”(cogito)。

巴什拉对于辩证理性的理解不应该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混淆(Tiles 1987：146)。 对于巴什拉而言，科学中的辩证理性模式并不是用

---

[1] 巴什拉的影响在《社会学的工艺》中非常容易发现。

[2] 这里对于巴什拉的简要叙述，属于出于理解布尔迪厄的目的而对巴什拉进行的解读，而不是提供对于巴什拉的知识规划的系统介绍。 我的资料引自巴什拉的《精神科学的形成》(*La Formation de l'esprit scientifique*)(Bachelard 1980)——此书收集的巴什拉的文本出现于布尔迪厄方法论著作《社会学的工艺》(1991)中，以及基亚里(Chiari 1975)与蒂莱什(Tiles 1984，1987)对于巴什拉的出色研究。

一种理论取代另外一种与之矛盾的理论；相反，思维运动从一个有限的概念构架——它与经验的某些重要方面紧密联系在一起——向一个更大的构架发展，后者包含了原先被排除的方面。例如，通过这种方式，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并不是被取代而是在一个更大的非欧几里德的时空概念构架中被接替但依然占有位置。辩证理性把原先的理论定位于一个更大的概念空间，这个概念空间既阐明了原来理论的力量也揭示了它的局限。这个辩证的思想模式能够包含若干不同的理论，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它们在一定的逻辑水平上是矛盾的，但是，一旦被置于更大的概念空间，它们就处于互补的关系中。原先的知识不是被拒绝而是通过一种重新的排列而被改变。在这种重新排列中，新的知识领域被开启出来，迫使对于原先不加反思地接受的东西进行重新评价。思想上的这种转向建构了巴什拉所谓的与原先理论的“认识论的决裂”。[1]

因此，科学发现的逻辑通过认识论的断裂或者范式的转换而运行，这些断裂与转换是认知的不连续性或逻辑关系的破裂，在其中，原先的理论阐述被更大的、更具有包容性的构架所接替。这意味着，科学并不是不断地拓宽其基础，不断地建造一个越来越高的发现之大厦的累积的知识。毋宁说，巴什拉坚持认为，科学成果具有不连续的特征。科学的进步是以不连贯的转换而不是以累积的知识为标志的。早期的理论阐述和建构被新的、更具有包容性的理解所代替。[2]

但充分意识到认识论的断裂却是断裂出现以后的事情。现存理论的局限不是一下子显现出来的。实际上，巴什拉声称，原先的理论可能事实上对科学的进步起“认识论障碍”的作用。当它们在规范科学研究的时候获得一种必然的、自明的地位时，它们就成了障碍。巴什

---

[1] “认识论的断裂”这个词通常更多地与阿尔都塞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是阿尔都塞对巴什拉思想的推演、而不是巴什拉本人使得这个术语在法国思想界流行起来。阿尔都塞(1970：257)声称，这个术语很少出现在巴什拉的著作中，而康吉扬“也没有像我那样系统地使用过这个术语”。但是正如阿尔都塞自己承认的，这种观念却清晰地出现在巴什拉的著述中。

[2] 这个观念当然也体现在库恩(Kuhn 1962)的范式概念中。

拉认为，在科学史中，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在早期的科学史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建构。但是当它们成为正在从事研究活动的科学家的日常理性以后，它们就成了进一步前进的认识论障碍，因而需要拒绝它们而选择新的建构。

如果科学的进步是以关于现实的概念的重大变化为标志的，那么，如何能够促进这种变化——特别是考虑到科学思想中进步的障碍在真相暴露之前从来是看不见的？巴什拉的回答是，辩证的科学的推理是通过否定进行的，就像一场不断进行的、针对现存的业已确立的程序与理论的争论。通过拒绝给予现存理论以一种普遍的地位，辩证的推理为转化提供了动态的潜力。而且，找到并克服认识论障碍所需的相关知识，应该超出一个知识学科的概念基础与认知基础，而把塑造着我们对特定理论问题的知觉以及我们对它们的理论把握活动的所有社会的、文化的以及心理的因素包括在内。在这里，巴什拉开启了通向作为塑造理性过程与科学发现的条件的社会学因素的大门。他把认识论的独特作用看作一种为提高对塑造并限制现存的科学工作的认知条件与社会条件的意识所必需的反思性监控工具（reflexive monitoring instrument）。对以前的理论的认识论反思使得我们能够探究这些理论所假定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能够增加认识论决裂（产生）的机会。

因此，巴什拉认为他的科学哲学是“开放的”（open），因为科学的推理是历史的、非连续的、辩证的、反思的。新的科学知识是通过一种持续的否定过程与新的综合过程而获得的。由于这个动态的过程总是通过纠正过去的错误而不断地得到修正并把看待过去的新视角引入研究方法，科学建构的任务因而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得以完成。科学家总是面对认识论的障碍，这种认识论的障碍必须加以克服以便获得新的科学知识。对巴什拉来说，谬误总是持续地把自己当作具有必然真理地位的现存理论加以重新肯定。

最后，在巴什拉看来，科学知识必须通过与人的心智的自发倾向即通过表面价值处理事件与经验，或者易于被特别生动的印象所迷惑这样

一种自发倾向的斗争，通过与日常实践经验的对立而得到建构。巴什拉认为，人类思维的这些自然倾向对艺术与诗歌不无好处；但是科学是一种被建构的知识，它只有通过一种与日常推理的认识论的断裂或决裂才能得到发展。[1]

布尔迪厄从巴什拉思想的这些方面吸收到灵感以发展他的社会学方法。与巴什拉一样，他尖锐地批评经验主义与实证主义。在《社会学的工艺》——在这本书中他对巴什拉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中，他提出了他早期的关于社会学方法的纲领性的论述，以此来纠正20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法国社会学中实证主义者的风气。在那本书中，布尔迪厄指责经验主义与实证主义只关注证实的逻辑而未触及科学发现的根源。布尔迪厄想把理论建构的过程从个人的知觉或天才的领域中脱离出来，以发现其潜在的逻辑(Bourdieu, Chamboredon, Passeron 1991, vi—vii)。他感兴趣的是请大家关注研究的过程本身。他强调，社会学家与其研究活动的关系经常受到价值、态度以及它们的再现的调节，而这些价值、态度以及它们的再现常常远离正规的证明标准。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他对巴什拉的兴趣以及巴什拉对他的影响。巴什拉呼吁关注科学知识的“建构”的特点，呼吁对进入科学建构过程的假设作反思监测。布尔迪厄采用了这种方法作为其社会学的标志。

布尔迪厄从巴什拉的辩证理性中为社会学研究推断出三个认识论的监测点(Bourdieu, Chamboredon, Passeron 1991, II)。他从“巴什拉的前提，——科学事实是赢得的、建构的、被证实的”——出发进行建构。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这样的观念：科学知识必须突破业已被接受的关于社会世界的观点，不管它是日常生活中非专业的建构，还是被不加反思地接受的理论视角。科学知识是一种建构出来的知识，是

[1] 最重要的科学发现与日常的常识性假设相对立这样的观念不仅是巴什拉所持的观点，而且也是其他许多科学哲学家所持的观点，包括著名的英国科学家刘易斯·沃尔珀特(Lewis Wolpert)。沃尔珀特(1993)的主要论题之一是：最重要的科学发现打破了常识性的格言。他声称，科学的基本法则中使用的思维方式与人们在日常理性中使用的思维方式是极为不同的。

针对以前的理论而建构的知识；其次，科学方法牵涉到形式化模式的建构；第三，这些模式必须接受经验的检验。这三个认识论行为的每一个都可以与一种特定的研究技术相结合：

> 与人种学词汇的距离化力量决裂，通过特殊的形式化效果而进行建构，或者通过最标准化的提问方式进行验证。(57)[1]

布尔迪厄是按一个逻辑的而不是历时的顺序设想这三个认识论行为的。这三种认识论行为不是一系列不连续的步骤，毋宁说，每一种行为同时呈现于研究过程的所有阶段。理论的形成、材料的收集、概念的检测以及分析的技巧，对布尔迪厄来说都是紧密相关的。理论不仅需要材料的验证，而且根植于材料；材料及其组织与验证体现了理论。

布尔迪厄把自己的认识论检测看作是对实证主义的一种必要的矫正，在实证主义那里，证明的逻辑(被认为是科学方法的本质)脱离了假设形成与理论发生的逻辑。布尔迪厄与在他之前的巴什拉一样，强调理论形构的重要性以及某种心理导向(布尔迪厄称之为“科学习性”)的发展的重要性，这种心理导向对于研究过程的所有方面都执行“认识论的监测”。就像巴什拉的认识论拒绝唯心主义与经验主义一样，布尔迪厄也拒绝在社会学理论与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之间进行区分。他的方法强调在社会学研究的每个阶段都把这两者综合起来。

最后，我们可以观察到，布尔迪厄采用了巴什拉的“应用的理性主义”(applied rationalism)以论证一种定位于两个认识论极端——唯心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社会科学(221)。与巴什拉一样，布尔迪厄采用了一种认识论策略，努力为那种超越了他所说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片面性、同时又把它们综合到一个更大的框架中的社会科学建构一种认识论的意识。布尔迪厄用“主观主义”这个词指所有集中

[1] 但是，布尔迪厄抵制把认识论的要求还原为特定的研究工具的使用。

于关注个体或主体之间的意识与互动的知识形式，而用“客观主义”这个词指所有集中于关注人类行为的统计学规律性的知识形式。他的关键性概念“习性”与“场域”展示的是相似的思想活动。习性呼唤我们走向一种关于行为与结构的概念，这个概念突破并超越了传统的关于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二元对立；场域通过把个体、群体以及机构定位于一个更大的结构关系的母体之内而遵循相似的运动轨迹。第三与第四章将更加详细地探究这些概念策略。

萨特和列维－斯特劳斯，一直是二战以后当代法国思想界必定提到的两位杰出人物。很显然，对布尔迪厄来说，这两个思想模范之间的对立塑造了他的思想与职业取向。在布尔迪厄看来，他们代表着知识分子的两种对立的知识模式与使命模式：萨特是主观主义的与介入的人文主义者，而列维－斯特劳斯则是客观主义的与超越的科学家。[1]对于理解布尔迪厄在他的研究工作与职业生涯中发展出来的(对于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综合来说，这两个模式都是非常重要的。

就作为战后法国怀有政治使命的知识分子的模范来说，萨特已经成为充分地献身于政治的“总体”知识分子的预言家形象的体现，他也是可以应用于当时所有问题的世界观的承载者。萨特热心地追求这样的知识与政治议程。通过引用萨特在《现代》杂志第一期的声明中为人所熟知的格言“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我们时代的一切”，布尔迪厄观察到萨特事实上的确很少错过(时代的一切)。(Bourdieu and Passeron 1967：175)从关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宣言，到是否追随法国共产党的理由，到对殖民主义与越南战争的批评，再到对艺术与戏剧的评论，萨特与他的《现代》杂志的追随者是“在思想的前线冲锋陷阵并参与所有先锋运动这个政策的杰出表征”。(157)他们“总是……追随最新的、由‘不错过任何东西’的欲望所激发的‘叛逆’”(176)。然而，布尔迪

[1] 波斯特(Poster 1975：323—334)对列维－斯特劳斯与萨特在60年代早期活跃的交往提供了很好的概括。

厄从一开始就追随一种非常不同的知识分子角色，这种角色更接近职业的社会学家而不是公共的知识分子。

与萨特的总体性知识分子模式形成鲜明对比，列维－斯特劳斯的出现为年轻的布尔迪厄提供了一种更加有吸引力的知识分子使命。布尔迪厄在《实践的逻辑》(1990h：1—2)的前言中描述了列维－斯特劳斯在战后如何作为一个关于知识分子使命的对立模式出现在布尔迪厄的面前：

> 描述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在法国知识界产生的社会影响，或者描述(列维－斯特劳斯)把整个一代人引向采用一种新的思考知识分子活动(这种活动通过一种完全辩证的方式与萨特所代表的献身政治的“总体”知识分子形象相对立)的方式的具体中介作用并不容易。

正是列维－斯特劳斯为布尔迪厄提供了一种与萨特不同的“新的把知识分子的活动加以理论化的方式”，这种方式“通过一种更加谦逊的、更加负责任的方式实现其作为研究者的任务，使理论的目的与实践的目的相协调、科学使命与伦理或政治使命相协调。”(8)“在摆脱纯科学的同时，摆脱楷模式的预言家”，布尔迪厄的知识分子使命(我们将在第十章中加以详细的讨论)是用科学去揭开权力关系的神秘性，这在本质上将是一项政治规划，但是它的方法体现于科学的实践中而不是体现于获取政治位置的公共实践中，如萨特那样。

这并不是说布尔迪厄与萨特就没有任何共同的政治情感，或者说他根本就不出现于法国的政治舞台。从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求学开始，布尔迪厄曾经一直处于法国政治的左派阵营。在60年代，布尔迪厄在《现代》杂志发表了五篇文章，并经常与社会党工会(the Socialist trade union)保持联系。但是，布尔迪厄的“政治实践”明显不同于萨特的实践，也不同于其他巴黎左派知识分子的公共形象。布尔迪厄很少在公

开的请愿书上签名，很少参加公众示威，或者就政治参与的策略写文章。

布尔迪厄把自己的知识分子使命看作是提供理论武器与研究成果，以供政治活跃分子在各种反对统治的斗争中使用。这正是他的“以科学训练的方式探讨热门政治问题的希望”（Honneth，Kocyba，Schwibs 1986：43）。布尔迪厄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反应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他没有参加巴黎的公众反战游行，而是研究了阿尔及利亚农民对于其变化着的经济状况的态度与行为，写了这方面的学术性的文章。他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承认，这个努力没有影响战争也没有影响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政策。（39）

确实具有重要的公共影响并第一次使布尔迪厄在法国成为公众人物的是他的研究成果《继承人》。虽然这本书在1968年被学生中的活跃分子所用，并可能影响了他们对法国大学的阶级基础的某些分析，但是这本书首先是作为批判性地考察学生人口中以阶级为基础的教育机会与文化理念的学术著作而撰写的。

但是，对布尔迪厄而言，列维－斯特劳斯与萨特还代表着两种极为不同的理解社会生活的方式。萨特强调自由选择的、创造性的、未被决定的个体主体意识的作用，而列维－斯特劳斯则关注结构的因果力量，这种力量在个体意识之外起作用并塑造个体的选择。布尔迪厄在这种范式的对立中看到了构造出所有知识思想并阻碍着真正的实践的社会科学之发展的更广泛、更基本的对立的根源。（Bourdieu 1990h：43）。以萨特为代表的主观主义与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这两种知识模式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并存在于大量的社会科学形式之中。

布尔迪厄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努力识别使这两种知识形式成为可能的社会的与认识论的条件。其实，他的著作可以被解读为是一种“超越这两种知识模式之间的对立，同时保留从两者中获得的洞见”的努力（Bourdieu 1990h：25）。巴什拉的辩证方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第

三章将讨论布尔迪厄如何尝试建构一种处理这种两难选择的一般的社会理论。

经典的社会学理论

虽然布尔迪厄积极地避开与三个经典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中的任何一位的联系，但是他事实上吸收了他们每个人的成果，这种吸收是意义重大的、有选择性的。布尔迪厄在两个方面把他们的著作加以综合。首先，他认为，虽然涂尔干、马克思以及韦伯持有尖锐对立的关于社会世界的理论，但是他们事实上共享着相同的“关于社会知识的认识论的与逻辑的原则”（Bourdieu 1968：682）。他们的社会学知识理论事实上在布尔迪厄所说的“无意识原理”上趋于一致（Bourdieu，Chamboredon，Passeron 1991：15—18），这一无意识原理坚持认为：对社会生活的科学解释不能还原为普通的日常知觉经验或个体的观念或意向。在这里，布尔迪厄与巴什拉一起加入了经典社会学的传统。

其次，布尔迪厄追求一种“辩证的折衷主义”，在这种折衷主义中，布尔迪厄通过阐明被他看作是他们的各自贡献以及研究象征权力方面的局限的东西，而批判性地综合了马克思、韦伯以及涂尔干（Bourdieu 1977d，1991b，1993d；Bourdieu and Passeron 1977：4—5）。第四章将考察这一综合。现在，我将分辨布尔迪厄从这三位经典社会学家那里吸收的核心主题。[1]

马克思

虽然在英美国家某些早期的对布尔迪厄的研究著作中，人们错误地

[1] 我对于布尔迪厄与经典社会学传统的关系的陈述部分引自布鲁贝克（Brubaker 1985）的一篇重要文章。

把他归为马克思主义者(特别参见 Inglis 1979)。但是近来更多的批评性的评论却正确地认识到涂尔干特别是韦伯对布尔迪厄的相对而言更显著的影响(参见 Brubaker 1985；DiMaggio 1979)。[1]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特别指出了涂尔干的谱系。尽管存在这些批评，但是，很明显，布尔迪厄的确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挪用了马克思的一些基本主题。同时，他又保留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尖锐批评。

从马克思那里，布尔迪厄制订了撰写一本关于再生产的社会学著作的总体规划。他从历史唯物主义那里接受了阶级冲突与物质利益作为现代社会中社会不平等的支柱具有优先性的观点。但是他尖锐地批评对文化生活的阶级还原主义的解释。第七章将表明布尔迪厄并没有把阶级概念限于人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他依据更一般的存在状况来思考阶级，这种存在状况可以包括教育、性别、年龄、社会地位以及财富。

从把人类的意识根植于实际的社会生活这个意义上说，布尔迪厄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也关注错误意识的形式，或用他自己的术语来说，对权力关系的误识。他接受马克思的观念，即象征/符号系统执行的是阶级不平等的控制与再生产的社会功能。但是他批评那种极大地关注符号商品与符号实践的社会功能却不能表明它们为什么是实施社会实施的必然特征的意识形态观点。

虽然布尔迪厄接受了马克思关于文化实践的功能是把阶级的不平等合法化、永久化的观点，但是他拒绝把社会生活中的符号方面看作孤立的、从社会生活的更基本的物质要素中衍生出来的东西。事实上，他

[1] 奥内特(Honneth 1986：55)以及加纳姆和威廉斯(Garnham and Williams 1980：129)在布尔迪厄对阶级斗争在塑造当代文化中的作用的强调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谱系。但是正如我们将会在第七章中看到的，布尔迪厄的阶级概念很难说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而他对于斗争的强调更多地源自一种人类学的假设——对于差异的追求构成了社会认同的基本动力，而不是源自资本主义特有的动力学。但是，认为布尔迪厄基本上属于马克思主义者这个错误的归类不止限于英国与美国的观察者。有些法国的批评家(比如，Ferry and Renault 1990)也大而无当地把布尔迪厄定位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框架中。

反对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概念区分，认为这种区分根植于必须被超越的经典的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的二元论。在这里，布尔迪厄与阿尔都塞(Althusser 1970)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有分歧。[1]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之区别的修正中，阿尔都塞阐述说，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上层建筑的东西，比如文化、意识形态、宗教以及政治，可以获得对于经济基础的相对自主性，并在阶级关系的塑造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最终经济总是决定性的。布尔迪厄拥有与阿尔都塞相同的基本的唯物主义观点，同样也强调宗教以及文化相对于政治与经济的自主性。[2]尽管如此，布尔迪厄的立场与阿尔都塞依然有别。受到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强调所有的社会生活作为实践活动的潜在整体性——的影响，[3]布尔迪厄(1984a：467)反对社会存在可以被划分并按照等级被组织成不同的领域（例如社会的、文化的、经济的领域)的观点。布尔迪厄没有像阿尔都塞那样去研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各种结合形式，他认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起初是不能分离的。布尔迪厄把社会世界理论化为一系列相对自主但在结构上同源的场域——各种文化与物质资源的生产、流通以及消费场域，而不是把上层建筑从经济基础中区分出来。布尔迪厄的场域概念是作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调节地带而起作用的，在这个调节地带，文化生产者与他们的机构化生产领域把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分离开的两个领域重新结合起来。布尔迪厄寻求建构一种关于实践的一般理论，这

---

[1] 布尔迪厄出于三个原因尖锐地批评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首先，阿尔都塞把文化看作是结构的附属物；其次，他把文化贬低为高度形式化的上层结构系统；第三，他不赞成实际的经验研究。

[2] 的确，布尔迪厄经常与阿尔都塞的立场产生共鸣，比如说，当他坚持行动者的倾向(dispositions)“说到底是由社会结构中的经济基础产生出来的”的时候就是这样(Bourdieu 1977c：83)。

[3] 《实践理论大纲》(1977c)的座右铭引自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第一篇文章：“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发展了，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的。”(引自 Tucker 1978：143)

种理论综合了(实践的)物质的与符号的方面，因此强调社会生活的基本统一性。 但是布尔迪厄对社会生活的符号方面与物质方面的关系问题以及结构与能动性之关系问题的极大关注，部分地源自他早期与这个特定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对立。 他的关于场域的相对自主性的概念带有阿尔都塞思想的印记。

最后，就像马克思一样，布尔迪厄在建构他的社会科学的时候，也使用了批判的方法。 但是布尔迪厄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与其说在于尝试借用马克思主义的特定概念并在自己的著作中赋予它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含义，还不如说是在努力通过更多地吸收涂尔干特别是韦伯的思想，来阐述从马克思那里继承的特定主题(Brubaker 1985)。

韦伯

布尔迪厄从马克思转向马克斯·韦伯以寻求概念工具来阐述能同时超越阶级还原论和唯心主义的符号商品与符号实践理论。 布尔迪厄(1990h：17)评论说，韦伯“远非像通常所想象的那样与马克思完全对立，主张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理论，他事实上把唯物主义的思想方式带入了被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拱手让给了唯心主义的研究领域”。 布尔迪厄(1990c：36)认为韦伯提供了“关于宗教的政治经济学”，它释放出了“对宗教进行唯物主义分析的充分潜力，而同时又不破坏宗教现象的真正的符号特征”。 布尔迪厄社会学的核心主题之一就是把韦伯的宗教政治经济学模式推广到所有的文化与社会生活。 的确，布尔迪厄(1990c：107)认为自己的文化社会学与韦伯的文化社会学具有同样的特征——后者运用了“经济的模式把唯物主义的批判扩展到宗教的领域”。 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应该是一种“普遍化了的”或“激进的”唯物主义，但也是避免了阶级还原论的唯物主义——布尔迪厄相信阶级还原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特征(1990c：17；1993d：12)。 布尔迪厄相信，他已经在这种普遍化了的唯物主义中发现了一种超越社会科学中经典的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二元对立的方法。

布尔迪厄的研究对韦伯关于观念型商品与利益的观点作了精心阐述。[1]“宗教利益”的观念来自韦伯对于宗教信仰所激发的行为的“今世性”特点的强调。韦伯(Weber 1978：399)写道：“由宗教的或魔幻的因素所驱动的行为的最基本形式是指向今世的。”他继续强调说：“绝不应该把宗教的或魔幻的行为或思维与日常生活中的有目的的行为分离开来，特别是因为即使是宗教的或魔幻的行为的目的最终也是经济的。”布尔迪厄(1990h：4)认为，通过坚持宗教行为的今世特征，韦伯提供了“把神话话语的内容(甚至是它的语法)与生产这些话语的人的宗教利益联系起来的方法”。这样，韦伯提供了把宗教的信仰、实践与生产和操纵这些信仰、实践的人的利益联系起来的方法。

但是，布尔迪厄(1987d：122)认为韦伯的“宗教利益”观念“没有得到充分阐释”，因为它对于利益范围的限定是“由行动者的存在状况所决定的”。相反，布尔迪厄强调宗教利益——以及更普遍意义上的象征/符号利益——“也是通过宗教供给以及宗教职业行为，通过其形式以及表达的条件所决定的”。尽管如此，韦伯的思考还是使我们得以把一个

> 宗教信仰与宗教行为的系统建构为不同类型的专家群体的策略的多少有些变形的表达，这些专家为了争得对宗教商品以及对宗教服务感兴趣的不同阶级的垄断性的控制而展开斗争(Bourdieu 1991b：4)。

布尔迪厄通过论证所有的实践——不论它是指向物质的还是象征的对象——本质上都是“与利益相关的”，而把“利益”的观念扩展到包括所有非物质的商品。他要建构一种“实践的科学”，这种科学将把“所

[1] 请回忆一下韦伯的著名宣言：“不是什么观念，而是物质的与观念的利益，直接支配人们的行为。”(Gerth and Mills 1970：280)

有的实践”都分析为“指向物质的或符号的利益的最大化”(Bourdieu 1990h：209)。他所设想的研究规划将包括传统地被认为是经济的(利益相关的、物质的)以及非经济的(超功利的、符号的)行为形式与客体形式。这样，符号的利益与物质的利益被视作两种同样客观的利益形式。行动者追求符号的以及物质的利益并在特定的条件下把它们加以转化。

虽然把利益的观念从物质的商品扩展到了观念的商品，但是韦伯依然为不同的行为类型保留了分析性的区别(analytical distinctions)。韦伯(Weber 1978:24—25，339)分析性地区分了以下的行为类型：“工具理性的”、“价值理性的”、“情感性的”以及“传统的”。他并没有把所有的行为都看作是经济的。一个行为要成为经济的行为，就必须满足于这样一种需要：建立在相对稀缺的资源与数量有限的行为的基础上。这样的区分在布尔迪厄的著作中彻底消失了。而且，行为是利益驱动的这个观点在布尔迪厄看来是一个基本的前提而不是有待验证的假设。他并不考虑是否有些实践可能比别的实践更加带有自我的利益(self-interested)。

布尔迪厄把韦伯的宗教利益观念扩展开来，从而发展出了像“宗教资本”、“文化资本”这样的概念——作为不能还原为经济资本、却又可以与经济资本进行相互转化的权力形式。通过文化资本这个概念，布尔迪厄把韦伯的社会闭合(social closure)的观念加以扩展以便把更加细微的、非正式的排除性实践(exclusionary practices)包括在内。[1]当一种资源因其具有很高的价值而成为争夺对象，并发挥“社会权力关系”的功能时，布尔迪厄(1989c：375)就把这种资源阐释为资本。布尔迪厄(1991b：9)的宗教资本概念与韦伯的宗教“资格”的观念是十分接近

[1] 闭合理论家雷蒙·墨菲(Raymond Murphy 1988：18—19)也把布尔迪厄理论框架的这个方面看作是从韦伯的实证主义立场上的扩展。通过把资本的概念从通常的经济意义上加以扩展以包括非物质的对象，布尔迪厄也持有这样一种观点(这种观点是闭合理论的核心)：闭合不仅包含“在市场上以资本为基础的垄断(以及排除)”，也包含“其他的垄断与排除过程，比如那些以种族、性别为基础的垄断与排除”。柯林斯的(Collins 1975)的著作也遵循着同样的脉络。

的。它代表“累积的符号劳动”（accumulated symbolic labor），并与“宗教场域的建构”联系在一起。在这个宗教场域中，一群宗教专家能够垄断宗教商品与宗教服务的管理。宗教资本是一种权力资源，因为它通过建构“俗人”（laity）——依据定义，“俗人”是那些没有专家所控制的资源同时又需要这种资源的人——包含了一种“客观的剥夺”。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涉及大量的资源，比如词语的熟练运用、一般的文化意识、审美偏好、科学知识以及教育文凭。他的目的是要表明文化（在这个术语的最宽泛的意义上）可以成为一种权力资源。

布尔迪厄吸取了韦伯的卡里斯玛与合法性观念，以发展一种关于符号权力的理论。这个理论强调习以为常的假设在权力关系的建构与维持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与韦伯一样，布尔迪厄声称，权力的实施需要合法性。他认为，潜在于所有的实践——特别是文化领域中的实践——中的自我利益的逻辑，被误识为“超功利”的逻辑。误识对布尔迪厄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概念。与马克思传统中的“错误意识”的观念相似，误识指的是对存在于一系列实践中的经济与政治利益的“否定”（denial）。布尔迪厄因而认为，符号的实践使我们的注意力偏离了实践的功利性特征，并因此有助于被假定为超功利的追求。某些活动与资源在其变得与潜在的物质利益相分离，并因此代表非功利的活动与资源形式的意义上，获得了符号权力或合法性。那些能够从自我利益向非功利性的转化中获益的个体和群体，获得了布尔迪厄所说的符号资本。符号资本是一种“被否认的资本”（denied capital），它掩盖与它相关的潜在的“利益”关系并赋予它们以合法性。符号资本是一种特定的权力形式，这种权力形式并不被看作是权力而是被看作对承认、服从或其他服务的合法要求。[1]符号资本是对韦伯的权威观念的再阐述，这种卡里斯玛权威通过把精英身上选择出来的个体特征突出强调为被认

[1] 关于符号资本概念的详细阐述，参见 Bourdieu 1972：227—243，1977c：171—183，1990h：112—121，1991c：163—170。

为是优越的、自然的特征，藉此把权力关系合法化。但是，布尔迪厄并不把这个概念看作是一种理想类型，也不把它限于领袖，而是把它扩展到所有合法化的方面。[1]

对布尔迪厄而言，韦伯对宗教领袖的关注为理解利益关系如何转变为非利益关系以便创造符号资本提供了钥匙。正是专家的“符号劳动”把权力关系转化为超功利的荣誉(Bourdieu 1977c：171)。布尔迪厄(1987d：122—124；1991b：5—13)突出地强调，韦伯把新兴城市资产阶级的宗教需要的伦理化与系统化分析为专家宗教劳动的产物，这是特别富有洞见的。专家的宗教劳动创造了对特定群体的特定社会生存条件的宗教理解。符号劳动通过把利益关系转化为超功利的意义而创造着符号权力。符号劳动表明了布尔迪厄在分析社会分层的时候赋予知识分子(符号的生产者)的关键性作用。

布尔迪厄的场域概念同样部分地是从韦伯的宗教社会学发展而来的，布尔迪厄用它来指竞争性的场所，经济资本以及其他形式的资本(比如宗教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都在这里投资、交换和积累。[2]这个概念受到了韦伯关于牧师、预言家和巫师之关系的论述的启发(Bourdieu 1991b：49)。[3]韦伯区分了“相互竞争的”主要的宗教领袖类型与机构类型的特定而对立的利益(Bourdieu 1990c：107)。较之韦伯，布尔迪厄(1987d；1992：260)更强调宗教领袖类型之间的互动如何通过其对立的利益而得到建构，而这些利益又如何反过来与更大的权力建构发生联系，布尔迪厄藉此而提出一种对韦伯分析的结构主义的再阐释。布尔迪厄(1987d：121)认为，韦伯通过集中关注行动者之间的人

[1] 虽然韦伯常常把卡里斯玛权威与前资本主义社会联系在一起，但是布尔迪厄却在现代社会(在这里，合理化、科层化的权威类型占据支配地位)中有关杰出个体的意识形态中也发现了这种卡里斯玛权威。

[2] 在阐述这个概念的时候，布尔迪厄(1987d)首先引证的是《经济与社会》第六章以及论述统治问题的第十五章。他同时也解释了标题为“冲突的概念”、“僧侣统治组织”的第一章的一部分。

[3] 它也与韦伯的“生活一秩序”的概念相似，这个概念启发格思和米尔斯(Gerth amd Mills 1964)提出关于“机构秩序”的理论。

际关系或主体间关系，而把自己的分析限制在一种“互动理论的”观点上。 而场域分析的视角，则引入了对于在行动者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塑造他们之间互动关系的建构性条件的更广泛的理解。 韦伯关于主要宗教领袖之间特定的、对立的利益的讨论使布尔迪厄能够表明特定的文化生活的场域如何通过专门的文化生产团体的发展而呈现出来。 在第六章，我将对这个核心概念进行详细的讨论。

从韦伯的社会阶级概念与身份群体(status groups)概念出发，布尔迪厄通过提出一种系统地把生活方式的独特标志、特权和荣誉的特征与其存在的物质条件相联系的理论，而重新阐释阶级与身份的关系。[1]韦伯把阶级与身份(status)看作是可以用以比较与建构具有历史特殊性的社会的不同的理想类型，而布尔迪厄却提出了一种把阶级与身份联系在一起的基本原则。 身份文化(status culture)是通过把阶级利益掩盖在超越功利的外表下而将阶级利益合法化的装饰物，身份群体与身份区隔就是伪装的阶级与阶级区隔。 布尔迪厄因此强调的是阶级与身份之间的互补的而不是对立的本质。 我们将在第七章中进一步阐述布尔迪厄思想的这个方面。

最后，布尔迪厄为他的阶级分析从韦伯的方法论中借用了一种基本的区分方法。 韦伯认为，“阶级”是有共同生活机遇(common life chances)的人的集合体，而不是真正的社会群体。 布尔迪厄采用了这个区分以论证一种与现实主义方法对立的、研究社会阶级的“关系性”的方法。 对于布尔迪厄而言，社会阶级是一种或然性的建构(probabilistic constructs)，它不能与现实混为一谈。 通过修正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对阶级的）区分，布尔迪厄认为，“纸上的阶级”(classes-on-paper)只有在存在符号的与政治的操作以对它们作出实际的认同与动员的时候，才可能成为“现实中的阶级”(classes-in-reality)。 与韦伯一样，

[1] 这一点在《区隔》(Bourdieu 1984a：xi—xii)一书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阐述。 在这本书的英文版的前言中，布尔迪厄写道：“本书所提出的经济世界、社会条件与生活方式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建立在重新思考韦伯关于阶级与立场的对立的基础上的。”

布尔迪厄想要强调的是，我们不应该假设阶级意识与阶级行为必然产生于客观的阶级状况。布尔迪厄强调阶级分析的符号方面。

涂尔干

涂尔干对布尔迪厄著作的影响已经开始得到承认（参见 Miller and Banson 1987；Wacquant 1992），但是却很少获得应有的强调。[1]涂尔干虽然被战后第一代人所忽视，但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第二代法国的社会学家对他重新产生了兴趣，包括布尔迪厄。正是在这个时期，一些法国社会学家寻求发现一种可以替代法国社会学学术传统的东西，这一学术传统原来是以巴黎大学文理学院的乔治·居尔维奇以及二战以后从美国输入的经验主义为代表的（Besnard 1987：209—210）。回归经典，特别是回归到涂尔干与韦伯，对于布尔迪厄这一代法国社会学家来说，不失为把自己区别于上一辈经验主义者的一个良策。[2]

从这个角度看，1959—1962 年间，阿隆在巴黎大学文理学院讲授经典作家，如孟德斯鸠、孔德、马克思、托克维尔（Tocqueville）、涂尔干、帕累托以及韦伯的学说，其意义就非同寻常。这些讲座成了他的两卷本《当然社会学主要思潮》（Colquhoun 1986：7）的素材。作为阿隆的助教，布尔迪厄也教授过涂尔干的著作。对布尔迪厄来说，涂尔干以及索绪尔（Saussure）代表了科学方法的重要的思想先驱，这种科学方法在结构主义名下变得十分时髦。

布尔迪厄从涂尔干那里借用了以下立场以作为方法论的核心原则：科学必须打破对于社会生活的日常理解与再现，以便确立一种真正的科学研究。[3]的确，布尔迪厄带着所有的雄心与激情精神抖擞地追随涂尔

---

[1] 涂尔干是布尔迪厄在 1968 年出版的方法论教科书《社会学的工艺》中最常被参照的一个思想家。

[2] 曼海姆（Mannheim 1956）的“知识分子代际”（intellectual generations）的观念在这里显得非常贴切。

[3] 在《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中，涂尔干（Durkheim 1966：32）坚持认为，社会科学家“必须把自己从统治外行人的头脑的错误观念中解放出来。他必须永远地摆脱这些经验性的范畴，这些范畴长期积累成习，已经变得专断独行”。

干的计划：把社会学确立为一门科学而不是社会哲学。当然，布尔迪厄通过把行动者的再现综合进他的结构主义解释中而一直与涂尔干的客观主义保持距离。但是布尔迪厄与涂尔干一样，带着“‘把社会事实当事物看待’这个方法论的判定”开始其社会学的研究(Bourdieu, Boltanski 1990：2)。[1]

布尔迪厄与涂尔干都有这样的冲动：在表面上看来最为个性化的行为方式中揭示其社会性。遵循涂尔干在《自杀论》(1951)中的方法论规划，布尔迪厄选择一些好像依据个体选择或动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理解的研究对象——诸如摄影与趣味——来表明社会学解释的力量。在最为主观的经验的核心发现社会性，这是布尔迪厄，也是涂尔干的主要目的(Bourdieu 1990c)。的确，他早期的摄影研究是用典型的涂尔干社会学的术语(即群体的整合程度)而不是对于摄影的心理分析的解释来形构自己的问题的(参见 Bourdieu, Boltanski et al. 1990)。

涂尔干关于不断强化的劳动分工这个基本主题明显地存在于布尔迪厄的对未分化社会与分化社会的划分中。与涂尔干一样，在布尔迪厄(1980c：376)的研究中存在着历史变迁的观念：从早期的高度整合的、未分化的社会到现代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不同的文化表达模式分化了而且被建构为相对自主的场域。事实上，布尔迪厄的总体社会观——社会是一个相互缠绕的、由争夺各种有价值的资源的场域组成的网络——与涂尔干关于持续的分化过程的观念是一致的。

布尔迪厄扩展了涂尔干的神圣的/世俗的划分范畴以分析当代的文化形式。在布尔迪厄的教育社会学中，他(1989c：164)把法兰西学院看作一个涂尔干意义上的“宗教范例”，因为它生产与神圣/世俗的划分相似的社会的与心理的疆界。法国教育中的精英方式与精英机构的

[1] 这与布尔迪厄在另一篇文章中对涂尔干的客观主义的批评并不冲突，在那篇文章中，布尔迪厄观察到“社会科学不能‘把社会现实看作事物’。既要与涂尔干的著名格言保持一致，而又不忽视一点：所有的这些社会现实都归于这样一个事实：它们是在社会存在的客观性内部的识别(首先是误识)的对象(Bourdieu 1990h：135)，就像我们在第三章将要看到的，布尔迪厄把这两个断言当作是研究过程中不同但必要的步骤。

功能与宗教秩序相似，因为它们被作为卓越的东西突出出来，并分离出一种世俗的精英，这种世俗精英带有准宗教的、公共合法性与符号权力的特征。如果我们记得法国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反牧师(anticlerical)传统的国家，而且在法国，世俗的公共教育一直是被当作法国大革命的持久的遗产而加以珍视，那么，这个类比的重要性——实际上是它的有争议的特征——就可以得到更充分的理解。

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布尔迪厄相信，宗教的神圣只是下列更普遍的观念的一个特例：社会的区隔，不管是应用于个体、群体，还是机构，都带有理所当然的特征，正是这种特征使之赢得了认同与尊重。符号权力是一种“神圣化”的权力，是使对象变得神圣的权力。布尔迪厄就这样把神圣的概念与合法性——特别是在高雅文化与艺术中的合法性——联系起来(在高雅文化与艺术中，把合法与非法加以区分的边界是特别坚固的)。[1]在这个意义上，布尔迪厄能够声称他的文化社会学事实上是“关于神圣的社会学”(Bourdieu 1992：210，260—261)。

布尔迪厄继承了涂尔干的规划：发展一种关于知识与社会知觉的社会学理论，以探索“思想框架、知觉框架、欣赏趣味框架以及行为框架的社会起源”。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认为，符号的划分对应于社会的划分。布尔迪厄(1991b：5)紧随这个观点写道：

> 如果我们认真地考虑涂尔干关于思想、知觉、欣赏、行为等框架的社会起源的假设，同时又认真考虑阶级分化的事实，那么，我们就一定会被导向这样一个假设：在社会结构(严格说是权力结构)与心理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对应性，这个对应性是通过符号系统、语言、宗教、艺术等等的结构而获得的。

[1] 布尔迪厄(1993d：161)认为，宗教——涂尔干“通过在神圣与世俗之间设定边界而界定它——只不过是所有建构边界行为的一个特例而已，通过这个边界，本质的差异得以在不同的现实之间建构出来，这个现实‘实际上’是通过微不足道的、甚至无法觉察的差异分离出来的”。

在《区隔》一书中，布尔迪厄(1984a：468)系统地把社会阶级与生活方式以及文化消费模式联系起来，他把自己的研究对象界定为辨别“社会主体在其关于世界的实际知识中履行的认知结构，以及内化的、‘具体化’的社会结构”。与涂尔干一样，布尔迪厄把符号系统看作提供逻辑的与社会的整合的分类系统。他强调“集体表达”以及“原始分类”的社会功能及其认识功能。但是如果说对涂尔干而言，整合力量所起的作用是为社会秩序产生人们想要的、一致同意的一体性，那么，对布尔迪厄而言，它产生的则是统治。这样，布尔迪厄关心的是分化的功能以及整合的功能。对布尔迪厄而言，最紧迫的问题不是——对于涂尔干来说则是——团结是如何得到强化的，而是在一个以等级、冲突、斗争为特征的社会秩序中，团结是如何被建构出来并得到维持的。[1]布尔迪厄的理论努力是把社会的再生产问题与社会分化问题结合起来，这个努力最后达到的是“对于涂尔干式的秩序问题的修正主义的研究”(DiMaggio 1979)。[2]布尔迪厄(1980c：52—53)把这个努力看作是一种把涂尔干与马克思、人类学与社会学加以配对的尝试。

在阿尔及利亚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的重要性

虽然在哲学领域得到训练，但是布尔迪厄是作为一个人类学家开始他社会学家生涯的。作为人类学家，他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阿尔及利亚的农民中进行他的田野调查。从这一人类学与社会学之间的跨学科的最初研究经验中，布尔迪厄认为自己加入了：

---

[1] 参见 Cherkaoui 1981，Giddens 1982 and Wacquant 1993c，这三个人提出这样的观点：涂尔干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更加关注冲突，他对于秩序问题的关注并不是像帕森斯(Parsons 1968)认为的那样是在回应霍布斯问题时形成的。

[2] 涂尔干也很关注无序的社会基础问题。他的“失范”概念表明了他不仅关注整合社会机体的力量，而且也关注瓦解社会肌体的力量。但是，我们发现布尔迪厄对“异常”少有关注，尽管有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特例如 Bourdieu 1989c：259—264，以及 Bourdieu，Boltanski et al. 1990：39—46。

> 一代新的社会学家的行列，他们从哲学起家，但是在人类学领域得到专业训练，（他们带来了）人类学与社会学两种兴趣的重新结合，而这两种兴趣曾经被新实证主义者完全分离开来（Bourdieu and Passeron 1967：198）。

布尔迪厄相信，在涂尔干传统的核心，不存在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实质性区别。

这个早期的研究经验开创了贯彻布尔迪厄后期研究的特定研究母题与方法特征。四个基本的理论问题凸显出来：个体倾向与外在结构的关系问题、结构主义分析中的能动性问题、把认知结构与社会结构联系起来的问题，以及更加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与符号方面的关系问题。阿尔及利亚的研究也表明了作为职业社会学家的布尔迪厄将会采取的政治行动主义的类型。

第一个问题产生于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布尔迪厄在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所遭遇的特定情境。他回顾说（参见 Honneth 1986：40），他个人处理战争的方式是进行一种能够把理论目的与政治目的结合起来的研究。作为一位反战者，布尔迪厄感兴趣的是辨认在阿尔及利亚最可能推翻法国殖民统治、开辟新的民主秩序的社会力量。因此，他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阿尔及利亚无产阶级与亚无产阶级（sub-proletariat）之间的区别，以及他们的“革命意识”的不同形式。

战争加速了市场经济借助法国殖民主义的力量侵入到阿尔及利亚传统的农民社会。法国军队的强制性重新安家政策摧毁了农民的村落，迫使他们迁往别处，这样就迅速地将传统的农民引向不期而至的现代市场经济。布尔迪厄研究了传统与强制性的现代化是如何相互作用的。[1]新

---

[1] 他的两本著作《背井离乡：阿尔及利亚传统农业面临的危机》（Le Déracinement：*La crise de l'agriculture traditionnelle en Algérie*，Bourdieu and Sayad 1964）、《阿尔及利亚的辛勤的劳动者》（*Travail et Travailleurs en Algérie*，Bourdieu，Darbel et al. 1963）解释了对于这个新情境的适应模式。

进入的以及强迫进入的金融经济要求农民有一种新的对待时间的态度以及新的“以理性的参与为基础的行为模式”（Honneth，Kocyba and Schwibs 1986：40）。但是，布尔迪厄观察到，农民最初是通过由他们的传统经济秩序生成、塑造的倾向（dispositions）来对新的经济状况作出反应的。布尔迪厄不是依据现代的经济标准把这种卡比尔农民的反应看作是非理性的，而是吸收涂尔干的传统以便阐明一种更加深层的社会理性。新的结构要求被传统的倾向所渗透，因为农民的倾向“并不依照与经济结构相同的节奏发生变化”。只有当个体行动者策略性地使自己的倾向适应新的、由新经济所强加的制约因素与机会的时候，农民的行为才发生变化。

从这个最初的研究经验出发，布尔迪厄发展出了一个更加正式的、对于内化的倾向与客观结构之间关系的理论反思。布尔迪厄认为，一种适当的对于实践的解释，要求一种特殊的理论语言，这种语言呼唤人们关注内化的倾向与客观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行为将被理论化为一种受到文化调节的对结构限制与变迁的反应。这个问题在他的关键性的概念——“习性”（habitus）——中得到了系统的阐述。

第二个理论主题来自布尔迪厄把列维－斯特劳斯对神话、亲属关系以及仪式的结构主义分析应用于阿尔及利亚柏柏尔人社会（Berber society）的努力。在对婚姻进行统计上的汇编的时候，布尔迪厄发现，列维－斯特劳斯提出的堂兄妹联姻规则实际发生的比例不到5%。与此相似，通过对仪式的精心研究，布尔迪厄发现，列维－斯特劳斯为对仪式的结构主义进行分析所提出的系统的对立类型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实践（Bourdieu 1990c，1990h）。这些现场观察指出了结构主义的两个显而易见的弱点，即：缺乏适当的能动性的理论以及一些正式的模型解释行为的能力有限。

与其他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者一样，布尔迪厄感受到了材料的收集与分析的实际问题。特别是他面对着作为外部观察者的社会科学家与观察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布尔迪厄看来，这个问题存在于行动者执

行的日常活动的实际逻辑和必要性——社会学家乐于对此进行观察、理解和解释——与社会科学家建构的形式化的解释之间的差距中。这个研究的两难选择是所有具有田野调查经验的社会科学家所熟悉的。布尔迪厄强调社会科学家建构的理论知识从本质上说不同于行动者所使用的实践知识。但是，正是这种实践知识指导着行动，因此应该属于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对象。布尔迪厄把这个难题转化为一个所有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而不是把它当作人类学观察的必然约束置之不理。贯穿于他的研究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询问如何建构一种关于实践的实际逻辑的科学，这种逻辑本身解释着这个基本的差异。

第三个理论问题直接指向布尔迪厄从涂尔干、莫斯(Mauss)、列维－斯特劳斯那里继承的理论遗产。在阿尔及利亚的农民中，他遇到了一个仪式、神话与日常生活的社会机构、物理机构充分交叉的世界。后来他出版了对柏柏尔农民房子的结构主义分析，以表明仪式与象征的分类如何体现于房子的空间组织内部(Bourdieu 1970)。然后他把认知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这个关系问题推广到法国的学校教育，他在这里发现了当代法国精神状况在法国高等教育的社会机构中的具体体现(Bourdieu 1989c：98)。这样，符号分类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的主题，既来自他的阿尔及利亚的田野调查经验，也来自涂尔干的遗产。

第四个问题来自他在卡比尔人那里观察到的仪式、庆典与宴会以及关键性的象征仪式之于群体生活的维持与再生产的意义，不亚于经济基础。实际上，布尔迪厄的结论是，在这个传统的社会中，把物质的或经济的活动与符号的活动加以区分是不可能的。他把符号活动重新理论化为一种权力的形式，一种资本的类型，它可以用以产生社会的优越性，并实施社会控制。这个理论的转化意义深远地表现于他对法国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还原主义的批评中，并走向一种唯物的却(在他看来)非还原的对社会生活的符号实践的解释。

最后，这个最初的研究规划表明了布尔迪厄所采用的政治参与的风

格。 布尔迪厄拥护社会科学家扮演这样一种左派政治角色：以科学的名义介入公共领域，反对一切形式的统治。 布尔迪厄的研究规划就是首先作为科学著作发表的政治参与的形式。

第三章

布尔迪厄社会学知识的原理论

在尝试写一本批判的社会学著作——它将揭露通过文化资源、文化过程以及文化机构生产与再生产出来的权力关系——的时候，布尔迪厄遇到了一系列方法论的难题。本章将先讨论布尔迪厄对“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知识模式的批评，表明他如何力图把它们综合进一个总体的知识框架中——他自己称这个框架为“关于实践的一般科学”。其次，我们将讨论实体主义(substantialism)的问题，考察他用以取代实体主义的“关系的”分析方法。

主观主义/客观主义的二元对立

布尔迪厄的著作中一个一再出现的主题是提请人们注意产生于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二元对立的关于社会现实的一种褊狭的、残缺的观念。[1]正如布尔迪厄看到的　主要的挑战在于阐述一种可以超越二元对立的符号权力理论以及一种关于实践(包括知识实践)的经济(学)。回顾三十多年的研究工作，布尔迪厄发现克服这个二元对

[1] 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经指出的，布尔迪厄力图超越根植于实证主义的主观主义/客观主义的二元对立，他对这一核心问题的关切来自他的哲学训练。康吉扬的历史与科学哲学以及巴什拉的历史认识论指出了知识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复杂互动，以取代传统的主体/客体的二元对立。这一理论关切也来自对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通过指出实践活动的基本同一性，这种同一性不能通过基础/上层建筑的区分来把握。

立是“指导我的研究最坚定的(在我看来也是最重要的)意图”(Bourdieu 1989d：15)。[1]

布尔迪厄在贯穿社会科学的许多不同的形式中发现了主观/客观的二元对立。表 1 展示了一些问题、方法、标签以及理论家的选项，布尔迪厄把它们与这个潜在的二元对立联系在一起。[2]正如表 1 所暗示的，布尔迪厄使用这个二元对立来把大量的理论与研究传统、理论家以及对立的方法加以归类。粗略地看，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划分似乎是十分任意武断的。比如，韦伯的理解社会学 (Verstehen sociology) 中难道没有“主观主义”的东西？人类学难道没有经验的观察？有时，这个分类意味着阐释的与实证的两种把握社会现实的方法；有时，则意味着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区别，有时还是参与的与旁观的观察者的区别。我们还发现这个区别还涉及理论与方法之间的关系的论争。而且，对于这个抽象的二元对立的各种详细阐述经常是重合的。我们发现，无论是微观水平的阐释分析还是微观水平的实证分析，都被混合在一起并被标以“主观主义”的标签。这个微观水平的研究中的区分在布尔迪厄对“主观主义”这个术语的一般化的使用中消失了。[3]这个区别还表达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对于经济商品与非经济商品、观念的利益与物质的利益、阶级的主观程度与客观程度之间的关系的论争。

---

[1] 这个主题一直可以追溯到他早年的一些研究。在《阿尔及利亚的辛勤劳动者》(*Travail et travailleurs en Algérie*)(Bourdieu, Darbel et al. 1963：3)中这个主题已经出现。在这本书中，他认为：从前资本主义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化，并不是要么由物质因素要么由文化因素首先推动的，而是由它们的“辩证关系”推动的。从松巴特(Sombart)那里获得启示，布尔迪厄认为：企业家精神的形成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并发的过程，在《一种艺术的方法》(Bourdieu, Boltanski et al. 1965：18—20)中，他提出了一种“总体性的人类学”，这种人类学将综合并超越主观的与客观的知识形式。

[2] 这个表从布尔迪厄的一些文本中集合而来，在这些文本中，他抽取了主观/客观这个二元对立的各个维度。特别参见 Bourdieu 1977d，表 7.1，在这个表中，布尔迪厄在他关于符号权力的理论中划分了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一些要素。

[3] 一个例子是布尔迪厄倾向于把互动社会学(interactionist sociology)归入主观主义，但是对互动的微观世界的许多处理却倾向于高度的经验性。比如在当代的宗教研究中，我们发现正是宗教信仰被当作一种主观的态度，而人际网络则变成这个信仰得以建立的客观基础(Wuthnow 1981：28)。里泽尔(Ritzer 1988)认为，微观—宏观与主观—客观无论在经验上还是在理论上都不是相互连接的，因此应当给予清楚的区分。

表 1：客观主义/主观主义的二元对立

客 观 主 义	主 观 主 义
列维－斯特劳斯	萨特
黑格尔	康德
索绪尔	卡西尔
涂尔干	萨丕尔
马克思	沃尔夫
韦伯	
结构主义	存在主义
理论主义	现象学
功能主义	文化人类学
马克思主义	唯心主义
经验主义	
实证主义	
唯物主义	
左派社会学家	保守主义社会学家
经济	非经济
事物	观念
自在的阶级	自为的阶级

这样，布尔迪厄用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对立来指称范围广泛的问题与知识传统。但是，布尔迪厄的研究似乎自相矛盾地被这个对立所困扰，而不是有效地超越这一对立。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是：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设立虚假的对立立场的方法，而这种对立立场又可以通过布尔迪厄自己的替代方法加以瓦解。这种“知识的三分化”（intellectual triangulation）方法如果启发式地加以应用，或许不失为一种有用的思考工具。它是一种有用的提醒：社会学必须把握社会生活的双重特征：包括它的主观方面以及客观方面。但是，正如布鲁贝克（Brubaker 1993：227—228）深刻地指出的，这种技术也可以导致对社会理论的过分两极化的解读，它所提供的其他社会学家的肖像，是简单化的、误导性的。

显然，布尔迪厄通过各种方法使用主观主义/客观主义的区分来指称不同的理论与方法问题。宽泛地说，主观主义的方法包括那些强调微观互动的方法、唯意志论以及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具体包括：符号互动理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人类学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现象学以及理性行动者理论(rational actor theory)；而另一方面，在布尔迪厄(1977：27)看来，客观主义似乎有两种主要形式：(1)对于人类行为的经验规律的非批判的记录与统计的分析；以及(2)倾向于把形式化模式(formal models)的特点转嫁给社会现实的那种概念抽象方式。客观主义的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身份获得研究(status attainment research)、功能主义、法国的结构主义以及只关注宏观层面的各种经验研究。布尔迪厄认为对立的双方都提供了对社会生活的重要见解，但是如果孤立起来思考就依然都是片面的。应用巴什拉的辩证推理，布尔迪厄认为这些各种各样的对立可以被超越并综合进一个更加具有包容性的知识框架。

当人们在一个非常一般的水平上论述这个问题时，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把这种主观/客观的二元对立看作是社会科学中的永久性的方法论上的两难选择之一；很少有人会反对布尔迪厄的观点：这种二元对立对于建构一种总体性的社会现实图景是一种障碍。[1]大多数人将会同意这种观点，即结构的逻辑应该与个体行动者的信念与实践联系起来。另一方面，这个非常普通的二元对立把特定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问题加以归类，正是这些问题把社会科学家区分开来，而布尔迪厄在这些问题上也有自己的特定立场。在当代的社会学中，这一对立以及其他与之相关的区分常常围绕知识生产者的三个占支配地位的划分展开：理论研究

[1] 布鲁贝克(Brubaker 1985：750)注意到，这样一种规划“可能会被像帕森斯与马克思那样截然不同的理论家所认可(帕森斯的确明显地参照客观条件与主观规范和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来建构他的理论)”。布鲁贝克继续暗示说，在这样一个非常普泛的与抽象的水平上，主观/客观的两极划分事实上依然是一个假问题，除非把特定的意义赋予这两个术语。布鲁贝克事实上区分了可以被归于这个非常普泛的理论上的二元对立之下的八种不同的特殊表现。

与经验研究；集中关注社会生活中的符号形式的研究方法与关注社会生活中的物质客体的研究方法；宏观层面的分析与微观层面的分析。而布尔迪厄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认为，这样的分类“具有社会的基础而没有科学的基础”（Bourdieu 1990c：34）。他们所提出的不只是认识论的问题，而且是社会的问题，最终则是政治的问题。这种主观/客观的二元对立的各种变体，来自社会科学家之间为了权力与承认而进行的潜在斗争（Bourdieu and Hahn 1970：14），也来自更广大的阶级与社会集团之间的潜在的社会分化。[1]

为了超越主观/客观的对立，布尔迪厄提出了认识论反思的两步骤模式，这种反思模式把主观主义的知识模式与客观主义的知识模式综合进一个更全面的第三种知识模式——他称之为“关于实践的一般科学”[2]。第一步要求我们与关于社会实践的主观主义知识模式决裂，而第二个步骤则要求我们与客观主义的解释决裂。

与主观主义决裂

布尔迪厄认为，由于社会学的基本任务是揭示统治系统把自己强加于人、同时又不为社会成员觉察的方式，因而，求助于参与者的主观知觉只能强化统治系统本身。社会学因而不能采用行动者表面上采用的日常生活的分类与表征。社会学家的首要任务必然是开始于通过建构关于实践的统计学规律，与常识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表征进行认识论的决裂。科学知识开始于一种客观主义的步骤，因为客观知识确立了互动

---

[1] 布尔迪厄也把主观/客观的对立看作日常生活中为了区分与权力而进行的斗争的一个内在特征。比如，我们可以考虑一下这样一种策略：把自己的观点当作是客观的而把对手的观点当作是主观的。

[2] 对这两个步骤的粗线条勾勒参见 Bourdieu 1972：162—174，1973b，1977c：1—4，1990h：25—29；以及 Bourdieu，Chamboredon，Passeron 1991。布尔迪厄（1972）又称他的第三种知识模式为“人类行为学”知识（praxeological knowledge）。“人类行为学”（praxeological）这个术语又见于布尔迪厄 1973b，它是布尔迪厄 1972 的英文版。在这本书中，布尔迪厄提出了理论知识的三种类型。在布尔迪厄 1977c 中，第三种知识的类型被标为“关于理论的理论与关于实践的理论”，或“关于实践的科学”。从一次访谈中的观点来看，布尔迪厄不再使用这个术语的原因可能是为了把自己区别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流行的“实践”（praxis）这个术语（Honneth，Kocyba，Schwibs 1986）。

得以发生、主观知识得以生产的条件。

这样，布尔迪厄论证了社会科学知识建构的第一步必须是与行动者的自我理解进行果断的决裂，并因此而赞同涂尔干的认识论客观主义以及巴什拉的辩证理性。这种认识论立场的必要性来自知情者(insider)[1]对自己实践的解释的本质。知情者的表征反映着他们在自己的社会世界中为人处世的实践逻辑，因而必须被理解为为了实际的利益而斗争的工具，而不是描述行动者行为的连贯而客观的图景的尝试。[2]虽然科学的再现是从日常实践的再现中建构出来的，但是后者不能替代前者(Bourdieu 1990h：14，94—95)。

与主观主义的决裂还要求对“提供资料的本地人”对于自己的同类所提供的解释进行批判性的检验(Bourdieu 1977c：16—22)。对那类为研究者揭示潜在的实践原则所必须的细节而言，提供消息的本地人的报告可能假设太多，而且过于笼统。然而更加重要的是，提供消息的本地人的解释可能因其猎奇的特点而给研究者留下深刻印象。而且他们常常使用规范性的建构物而不是提供描述性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却正是重构实践的顺序所需要的。这样，与巴什拉一样，布尔迪厄在日常的实践知识与科学知识之间划了一道截然的界线。

布尔迪厄区分了三种主观主义的知识形式，它们都必须从认识论角度借助结构的指示器加以纠正。一种被布尔迪厄专门批评的主观主义形式是萨特的唯意志论。他批评萨特把自由意志当作对实践问题的探索方法的存在主义观念，因为它把行动者的决定从其社会语境中抽象出来。

第二种主观主义的形式是包括人种学方法论、现象学以及符号互动理论等在内的更大范围的对于人类互动行为的微观研究方法。布尔迪

---

[1] 这里指的是实践的参与者或行动者。——译者

[2] 布尔迪厄在社会学分析中接受客观主义步骤的原因不是像涂尔干一样认为行动者的解释是不可靠的或非理性的，而是因为行动者的解释是受实际利益指导的，而这种实际利益不同于指导社会科学家的那种理论兴趣。

厄与这些研究方法进行论争，后者的认识论立场是：科学概念必须从行动者的解释中建构出来(Winch 1958)。布尔迪厄认为，这些方法没有能够把面对面的互动模式以及社会建构的有意义的系统与社会组织中更大的等级模式与统治模式联系起来。建立在行动者解释基础上的这些微观的方法，忘记了行动者是在自己所处的、等级化地建构的社会空间中的特定位置出发来划分与建构自己对社会世界的理解的。由于用于建构现实的资源是不平等地分配的，所以不是所有的行动者都能够有平等的地位、以相同的方式理解并作用于世界。

最后，第三种强调个体作为分析单元的、研究行为问题的方法，是理性行动者理论(rational actor theory)，布尔迪厄认为它也是一种社会化水平之下的行动观(undersocialized view of action)。

这样，与主观主义的知识形式的认识论决裂(第一步的决裂)强调的是所有的人类行为都是处于决定性的结构(determining structure)中，这个结构不是日常的意识可以现成地获得的，而是必须通过社会科学家加以建构的。

与客观主义的决裂

如果客观知识需要纠正主观知识的局限，那么，要纠正客观知识的局限，第二步的认识论决裂就变得十分必要。这第二步的认识论的决裂沿着两个方向进行。首先是对于实践的发生与情境的特征作批判性的反思。他强调实践既建构着结构，同时又被结构所决定。他强调结构本身是通过行动者的日常实践被社会地建构的。这就引导他研究行动者实践的特征，并提出习性的概念，这个概念把行动者—符号表征(actor-symbolic representation)与结构因素综合在一起。

第二，与客观主义的决裂还要求批判地反思理论性实践的特殊性。在这里，布尔迪厄引入了对于社会学实践本身的反思视角，把它作为发展一般实践理论的必要步骤。实际上，对于理论性实践的认知基础与社会基础的批判性反思，是提供一种对于日常实践的适

当理解的前提条件。 如果缺乏这样一种反思的警惕，那么，社会科学家就会冒这样的风险：把自己的认知利益与社会利益投入实践行为的非理论性的研究工作中去。 他呼唤一种让社会科学家牢记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之间的裂隙的理论语言。 因此，布尔迪厄不仅关注研究的对象，而且也关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 他呼唤“参与的客观化”（participant objectivation）——一种对使关于社会世界的社会学观点成为可能的社会条件与认识论条件的批判性反思与经验性研究（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68；Wacquant 1989：33）。 布尔迪厄把这看作是他的社会学方法的根本特征，我们将在第十一章中对之作更加详细的考察。

布尔迪厄结合三种基本的客观知识形式——实证主义、结构主义与唯知主义（intellectualism）——讨论了这第二种认识论决裂的必要性。

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常常赋予以统计学规律形式存在的宏观结构以优先性，这种规律很难被参与其中的行动者觉察，但又必须被社会科学家建构。 然而，正是个体的行为建构、维持并最终改变着这些统计学的规律。 而且，行动者是依据他们对于社会世界的实践知识而不是依据其科学知识的见解行动的。 因为社会科学家通过客观主义的研究步骤加以识别的“社会现实”同时也是“知觉的对象”，因而行动者的知觉也必须被引入对于实践的综合解释框架（Bourdieu 1990c，130）。 研究者还需要反对统计学模式的“客观主义”，重新调用行动者的表征，并把它综合进分析中，以便建构一种“适当的实践科学”（Bourdieu 1977c）。 这意味着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既包含质的建构，也包含量的材料。 布尔迪厄认为，一种适当的科学解释需要对行动者的知觉与形式化地建构的结构的关系进行概念的调节。 正如我们在第五章中将会看到的，他的习性概念起的就是这种作用。

布尔迪厄批评僵化的结构主义方法，尤其是列维－斯特劳斯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因为他们把行为归结为纯粹的理论的、超时间的、逻

辑的模式的实施。布尔迪厄评论说，尽管客观的结构的确存在，但是个体的社会活动既促生着对于这些结构——无论是亲属关系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践性的把握(practical mastery)，也在这种把握中得到发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外在的结构并不是通过形式化的理性评估被理解的。行动者在没有外部观察者可以得到的完整表达的印象的情况下连续地采取行动。而且，行动者实践性地组织他们的行动，而不是寻求满足逻辑连贯的形式标准。行动者利用文化的与社会的资源不是为了逻辑的目的，而是为了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生存的实际目的。但是，客观主义的科学常常不考虑行动的这种实际定向。

换言之，对结构的客观主义解释不能说明结构的发生，而这在布尔迪厄看来恰恰是行为理论的主要目的。行动者的行动，是为了实现实践的目的，这个目的包含了社会与经济的利益和权力及其符号的表征。因此，实践对客观结构具有建构性，而对社会生活的僵化的客观主义解释所不能说明的正是这一点。

"唯智主义"(intellectualism)或"理论至上主义"(theoreticism)是真正的实践科学所反对的第三种客观主义形式。布尔迪厄认为，理论至上主义不仅不考虑行动者的实践知识，而且不考虑研究者的理论实践。他认为，当理论的解释用以替代行动者在行动中使用的实践的掌握或实践的可理解性(practical intelligibility)的时候，研究者就陷入了"唯智主义的谬误"，或被"唯智主义的假象"所蒙蔽。客观主义的科学忘记了客观主义的模式只不过是似乎纯客观地描述实践行为，并因此混淆了"现实的模式"(the model of the reality)与"模式的现实"(the reality of the model)(Bourdieu 1977c)。布尔迪厄指出，不加反思地使用合乎形式规范的模式的结果，是把理论的形式特征投入到日常实践的超出形式的世界之中。这样，它们就成为符号/象征统治的另外一种形式。布尔迪厄认为，由于社会科学家不能在对于社会世界的观念化中认识到决定他们自己的知识实践的历史与社会条件以及他们的研究对象的社会与历史条件，他们特别倾向于生产出客观主义的意识形态，因而

成为符号/象征暴力的生产者。他们应该发展出一种反思的社会学实践——布尔迪厄社会学的一个核心方面。我们将在第十一章中对此加以更加细致的讨论。

沿着这条思路，他最尖锐的批评指向列维－斯特劳斯的关于亲属关系交换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理论以及理性行为者理论。布尔迪厄对列维－斯特劳斯的批评是：列维－斯特劳斯把亲属群体的经验现实消解于社会理论家所建构的理论模式中。布尔迪厄认为，亲属关系选择遵循的不是抽象的规则，而是行动者维持或强化自己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的策略。

布尔迪厄批评马克思主义，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把关于阶级的理论模式或经验罗列——用他的话说是“纸上的阶级”（classes on paper）（Bourdieu 1987b：153）——当作好像是真正被动员起来的阶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常常从观察到的某种社会阶级的客观指标的同质性中推断出文化和社会方面真正一体化的社会阶级（Bourdieu 1987b：153）。简言之，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存在把“自在的阶级”当作“自为的阶级”的倾向。[1]

最后，布尔迪厄相信，“唯智主义的谬误”在理性行动者理论中最突出，布尔迪厄指责说，把有意识的、理性的谋划归之于行为，这种做法不过是理论家的认知姿态（cognitive posture）的投射而已。

这样，布尔迪厄（1977c：18）呼唤关注“对于朴素世界的学术重构与对于那个世界的天真经验间的距离”，而理论家却“如此经常地忘记这一距离。”不能解释研究者的理论知识、理论兴趣与被观察对象的实践知识、实践兴趣之间的裂隙，导致了与实际的现实混淆在一起的非反思性的概念。这样的概念成为它们不应有的符号权力类型的具体体现。布尔迪厄（1977c，38，202）反对一切在理论概念与实践现实之间

[1] 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概括的批评。布尔迪厄不承认一些使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范畴的研究者（比如，Przeworski 1977）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已经小心翼翼地避免了他所指责的倾向。我将在第七章中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确立直接联系的尝试。一种适当的社会科学必须建构出能够调节知识的理论类型与实践类型(它们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之间的关系的概念。

关系性方法

关系性思维也是布尔迪厄的作为科学的社会学观念的核心。他不间断地批判他所说的“实体主义”(substantialism)、“现实主义”(realism)和关于知识的“自发的”理论，认为它们是发展关于社会世界的真正的科学知识的主要障碍。对于布尔迪厄来说(1987f：3)，实体主义的社会现实观奉行的是这样一种认识论，这种认识论“只承认直接为日常经验直觉所把握的现实”。它关注的是“日常感知经验的现实，特别是个体感知经验的现实”。实体主义的思维赋予实体以高于关系的特权，因为它“把行动者身上的特征——年龄、性别、职业等——视作是独立于它们‘活动’于其中的关系的力量”(Bourdieu 1984a：22)。布尔迪厄在实证主义、现象学以及人文主义/存在主义的“主体哲学”中都发现了这种实体主义的思维，它们的共同特征是脱离个体或群体的社会历史语境来把它们的特征具体化。

布尔迪厄用“关系的”或“结构主义的”思维模式代替实体主义，他认为这种思维模式对所有科学思想而言都是根本性的。这种研究社会生活的方法“不是通过实体而是通过关系来识别现实”(同上)。“由于这种关系被日常感觉经验的现实所遮蔽”，所以它们是眼睛所“看不见的”。它们必须被科学建构为“相互外在的各种位置，并通过它们的彼此之间的相应距离来得到界定”。

关系性方法是结构语言学的首要原则。结构语言学把符号的意义定位于对比关系而不是定位于它自身。布尔迪厄(1968)认为，关系性方法是结构主义对社会科学的“主要贡献”。事实上，他把关系性思

维视作所有科学知识的基本原则。数学与物理学通过最形式化的表达阐明了这一点。[1]布尔迪厄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应当像现代几何学处理它的对象一样处理文化关系与社会关系。正如几何图形中的点与线是从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关系中而不是从它们各自的个别要素的内在特征中获得意义一样，社会生活的模式也必须这样加以建构。[2]个别的事实应该被联系到更大的一套关系中以便使个别的因素显现为——用巴什拉的话说——“可能性的一个特例”。在科学中，“真实的东西就是相互关联的东西”(the real is the relational)(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97)。

这样，对布尔迪厄来说，关系性方法与实证主义以及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是对立的。在当代社会学中，它与正在出现的网络分析的使用、而不是身份获得研究(status attainment research)中的回归方法(regression techniques)的关系更加紧密。

布尔迪厄把关系性方法视作与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知识形式进行必要的认识论决裂的基本工具。关系性思维把研究的对象从反映社会生活的实际利益的日常假设与日常知觉的语境中提取出来，并把它转化为科学知识的对象(Bourdieu, Chamboredon, Passeron 1991：253)。但是，对布尔迪厄而言，这种方法并不只是社会学中把个体和群体的特征转化为变量的那种惯常实践。关系性思维强调把变量构筑进有差异地与等级化地建构的“关系系统”中。他推荐的进行这种研究的一个简单技术，是对跨越各种特征的行动者群体进行跨—表格比较(cross-

[1] 布尔迪厄把卡西尔的《实体与功能：爱因斯坦的相对论》(Cassirer 1923)当作其关系思维理论的主要灵感资源。(参见 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97)。他同时注意到，社会心理分析学家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与社会学家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 1978)也都从卡西尔那里得到灵感来进行关系性研究。

关系性思维是语言学(萨皮尔与雅各布森)、人类学(列维－斯特劳斯)、历史学(迪梅齐)中的结构主义运动的一个关键性的方法论支点。它们都对布尔迪厄的思想产生了影响。而且华康德还观察到，社会学传统中的关系性分析模式可以追溯到涂尔干，特别是马克思(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16)。

[2] 参见布尔迪厄 1968 年早期的观点：关系性的推理模式借自自然科学并被应用于社会科学。

tabular comparison)(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230)。区分最大数量的行动者的特征栏(columns of properties)是为了辨认行动者当中的变化系统而选择的。

布尔迪厄对社会生活研究中的关系性方法的偏爱，使得他反对那种偏爱对应分析的线性模式化技术——一种结构统计程序，这种程序是关于区别分析与多维测定的一个图形变体。由所谓的“法国材料分析”学派(“French Data Analysis” school)，(Benzécri 1973；Lebard，Morineau and Warwick 1984)[1]发展出来的对应分析，是一种把材料矩阵(data matrix)的排与列之间的联系展示为空间中的点，以便点群(clusters of points)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能够得到强调并变得清晰的技术。对布尔迪厄来说，它是

> 数据分析中的相关性技术，在我看来，其哲学原理正好对应于社会世界的现实真相。这是一种根据关系进行“思维”的技术，我通过场域观所要做的也正是这个。(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96)

关系性方法为布尔迪厄处理文化、生活方式、阶级分析以及流行文化之类问题的实质性立场提供了基础。作为方法论的一个要点，布尔迪厄把文化实践当作围绕二元对抗而相互联系地建构的东西，比如高与低、雅与俗、纯粹的与不纯粹的、审美的与实用的等。一个系统中的每个单一的要素的价值是在与同一系统中其他的要素的关系中得到界定的。特定的文化实践的合法性是在与其他实践的对立中获得的。文化的合法化与文化的统治是依据对比性实践(contrastive practices)而不是依据特定的风格或观念进行思考的。

例如，在分析法国社会以阶级为基础的生活方式时，布尔迪厄就用

---

[1] 参见格里纳克(Greenacre 1984)写的带插图的精彩导言。

了这个方法。我们常常被告知：工人阶级的亚文化是“受制于必然性的”，而上层的亚文化则是“摆脱了必然性的”，而且，这个对立转化成了特定的生活方式与消费偏好。但是，在布尔迪厄看来——而且对他来说这是方法论的一个关节点——这些生活方式的特征不是每个阶级的内在特征，相反，它们只有在相互的关系中并通过相互对比的方法才获得分析的意义。这样，一种被统治的文化与被统治的阶级一样，总是在与统治文化的对比中得到界定的，反之亦然。布尔迪厄用这个方法批评流行的文化理论所声称的(流行文化的)脱离统治文化的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他认为这种声称是没有根据的。

虽然布尔迪厄的批评者少有提及，但布尔迪厄的关系性方法是与他关于社会生活基本特征的核心假设内在关联的。他建构的关系始终是竞争关系而不是合作关系，无意识的关系而不是有意识的关系，不平等的关系而不是平等的关系。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的社会生活图像是对抗性的对立、统治与误识的图像。因此，当布尔迪厄劝告他的社会科学家同行说要“相互关联地思考”(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228)的时候，他同时也在邀请他们与自己一样用冲突的视点看待社会世界。

布尔迪厄把关系性方法视作其社会学的政治使命观的核心。他指责实体主义的思维通过把个体与集体的差异归结为内在特征或本质而为歧视性实践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Bourdieu 1994：18)。通过强调个体与集体的特征是相对于在特定的社会与历史语境中的竞争性地位而定的，关系性思维把这类普遍化的要求相对化并且合法化了。

但是，布尔迪厄的关系性方法似乎预设了一个严格的成双成对的社会秩序。在这里，对立的实践总是持续地起作用并且永远是等级森严的。它往往轻视模仿的过程或合作的过程，后者对社会身份具有与区分过程一样的建构作用。布尔迪厄运用这种方法分析法国思想界以及卡比利亚的荣誉系统的时候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在应用于范围更

广的社会世界时，却需要得到检测。在这种更大型的社会世界中，竞争与中心化可能不是支配性的特征，而在阶级的亚文化中，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性与自主性(Lamont and Lareau 1988：158)。[1]

[1] 即使在法国，格里尼翁与帕斯隆——布尔迪厄的两位早期的合作者——的研究(Grignon and Passeron 1984)表明，布尔迪厄提供的整齐划一的关系性模式低估了法国工人阶级的文化实践独立于法国统治集团的文化实践的自主性程度。

第四章

布尔迪厄的关于符号权力的政治经济学

超越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布尔迪厄在其关于实践的普遍的和统一的科学中试图超越主观/客观的二元对立的方法之一，是将社会生活的符号方面与物质方面的关系重新理论化。在这里，他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判性的对话。通过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对照，布尔迪厄发展出了关于符号权力的政治经济学，这种政治经济学包含了关于符号利益的理论、关于作为资本的权力(power as capital)的理论，以及关于符号暴力与符号资本的理论。[1]这些不是边界清晰的理论性论证，而是相互交叉与渗透的引导性主题。它们吸收了各种思想的影响，特别是涂尔干、法国结构主义以及韦伯的宗教社会学。但是起点却是布尔迪厄在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接触到的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

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提到的，阿尔都塞(Althousser 1970)认为，文化实践与文化机构可以获得独立于经济的相对自主性——虽然“归根结底”而言，经济是决定性的。布尔迪厄同样也肯定了文化独立于经济与政治的相对自主性，虽然他避免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

[1] 对布尔迪厄思想的这一分析性的划分在某些方面遵循了布鲁贝克(Brubaker 1985)的区分。

筑的话语。布尔迪厄早期对社会生活中符号方面的关注，是在与阿尔都塞争论的语境中形成的，争论的焦点即是如何看待文化的相对自主性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他对文化过程与文化机构的“黑箱”的越来越深入的分析而不是简单地把它们与抽象的上层建筑理论联系起来，布尔迪厄超越了阿尔都塞。布尔迪厄最终形成了对基础结构与上层建筑关系的修正主义的研究方法，这体现在他提出了一种关于上层建筑相对于基础结构的自主性的调节观。[1]

本章将探讨布尔迪厄在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对话中发展出来的三个基本的理论观点，在每个观点中，他都既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又与之保持批判性的距离。

一种关于符号利益的社会学

布尔迪厄把自己区别于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步，是把经济利益的观点拓展到表面上看来是非经济的商品与服务。布尔迪厄认为，在强调经济结构在社会生活中的中心地位的时候，马克思主义通过把利益的观念严格限于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把符号的与政治的方面视作缺少它们自己的利益的，而重新肯定了古典的主观/客观的二元对立。这一二元对立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区分，而布尔迪厄则通过把经济利益的观念扩大到包括符号或非物质的方面（以及物质的方面）而超越了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区分。

正如我在第二章所述，布尔迪厄借鉴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指出，所有的行为都是与利益相关的，包括符号的追逐（symbolic pursuits）。他把经济计算的逻辑扩展到“所有的商品，物质的与符号的，它们都毫

[1] 在这方面，布尔迪厄的知识规划与雷蒙德·威廉斯（Williams 1963，1965）的观点有些相近，尽管威廉斯明显地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内部进行研究，而布尔迪厄则不然。

无例外地把自己表征为稀缺的，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结构中值得追逐的”（Bourdieu 1977c：178）。布尔迪厄要建构一种“关于实践的科学”，它能够把“所有的实践”都分析为“指向物质或象征利益的最大化”（Bourdieu 1980a：209）。他的研究规划是，要把所有传统上分为经济的（即与利益相关的、物质的）与非经济的（即非功利的、象征的）行为与对象形式综合起来。他写道：“关于狭义的经济实践的理论只是实践经济学的一般理论的一个特例”（Bourdieu 1977c：177）。这样，符号利益与物质利益一样，被看作是两种同样客观的利益形式。[1]

相应地，布尔迪厄把“行为”说成“策略”，以便强调人类行为的利益定向。策略是与“物质和符号利益的最大化”相联系的（Bourdieu 1990h：16）。作为策略的行为表达了这样的观念：个体的实践本质上与利益相关，行动者尝试从定位（situation）中获得利益。在讨论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婚姻模式的时候，布尔迪厄（1977c：36）写道：亲属关系是“指向物质的与象征的利益的满足，并通过参照一整套经济社会状况而组织的策略（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的产物”。但是，对于布尔迪厄来说，策略并不指对目标的有意识的、精心计算的追逐——如理性行动者理论家们所理解的（比如 Coleman 1990）。布尔迪厄反对关于行为的理性行动者理论模式，相反，他把行为视作在前反思的意识层次上得到模式化并获得利益定向的。

这个关于行为的利益解释的最有力的应用之一是布尔迪厄对知识分子作为客观性、超功利、纯洁性、创造性之代表的自我形象的攻击。布尔迪厄认为一切知识活动本质上都是逐利的，尽管它们具有符号的特征。

布尔迪厄同时也批判性地把这个观点应用于知识分子炫耀知识的文

[1] 布尔迪厄努力把一种正式的经济逻辑推广到所有的社会关系，这样的努力与主流社会学传统的观点相对立，后者认为不是所有的社会生活都可以还原为市场的关系（Caillé 1981；Nisbet 1966）。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个理论上的推进拥有一个熟悉的社会学的假设：从经济最大化的标准看来显得“非理性”的行为形式，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是遵循一种更深层的社会理性。布尔迪厄的实践经济与理性行动者理论在最近几年的回潮之间的紧密关系将在以后的章节中得到讨论。

化（highbrow culture）（Bourdieu 1992）与科学（Bourdieu 1975b），它们的合法性正好来自于这样一个信仰：较之物质的追求，它们代表人类各种活动中更加高级的、更有价值的形式。布尔迪厄研究的极大优点在于阐明了存在着一种文化的政治经济学，所有的文化生产——包括科学——都是指向报酬的，风格的偏好是通过与经济活动中一般的投资与获利观念相似的方式被选择或拒绝的。

布尔迪厄把经济利益与策略的语言应用于所有的文化与社会生活领域，这招致了尖锐的批判。有的批评家（Gartman 1991，Honneth 1986，Jenkins 1992，Joppke 1986，Miller and Banson 1987）指责说，他的理论把一切都归结为某种形式的经济决定论。阿兰·卡耶提出了或许是最受认可的批评：布尔迪厄的实践经济说到底在本质上还是经济决定论。卡耶（Carllé 1992：109—111）认为，布尔迪厄的所有研究都受到一个单一的整体性论点的指导，在这个论点中，“所有的社会实践都被还原为程度不同的受到调节的或隐蔽程度不同的物质利益的游戏”。他对布尔迪厄的批评可以概括为三点。首先，布尔迪厄没有尝试去区别社会生活中可以由有意识的计算解释的部分与不能够这样解释的部分，所有的行为均被还原为潜在的利益（不管是否有意识）；其次，物质利益是利益中最为基础的。虽然布尔迪厄批评经济还原主义，但是事实上他自己最终成为一个“经济决定”论者；[1]最后，虽然布尔迪厄尖锐地批判人文主义，反对任何关于人类本质的非历史的、普遍的观点，但是他事实上隐蔽地构筑了一种人类学，这种人类学把基本的人性假设为追逐利益与积累权力。

我将在本章以及下一章从各个方面评价对布尔迪厄的这些批评以及布尔迪厄的回应。我的观点是：许多布尔迪厄的批评者都没有充分看到他思想的复杂性。尽管如此，我还是发现了他的研究中一个成问题

[1] 然而，卡耶正确地注意到，布尔迪厄不能被定位在阿尔都塞的理论框架中。安萨尔（Ansart 1990）与华康德（Wacquant 1992）为布尔迪厄辩护，反对所谓布尔迪厄“最终”是决定论者的指责。

的、实用主义的定向。但是我发现这一点的方式不是布尔迪厄的批评者所强调的，也不是布尔迪厄本人承认的。我将首先检视他的利益概念，然后再介绍他的文化资本理论。

卡耶以及其他批评家关于布尔迪厄本质上是在实用主义的框架内进行研究的判断不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布尔迪厄一直是经济主义的激进批判者。他的研究北非农民社区的早期著作就严厉地反对对前资本主义的殖民社会的不发达与变迁所作的经济解析。在对卡比尔农民的研究中，他面对的问题是如何解释他所发现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农民对时间、金钱、财富、信用以及生产的态度、举止，与侵略性的资本主义经济所要求的态度与举止之间的“差异”（Bourdieu 1979：vii）。他的行为理论从一开始就是对经济主义的人类行为观的尖锐批评。[1]他的核心概念“习性”（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讨论这个概念）就是用来克服与反对各种形式的经济决定论。比如在《区隔》一书中，“习性”解释了为什么饮食趣味不是“直接取决于收入，而是取决于继承的生活方式”（Bourdieu 1984a：130）。

从这个研究经验中产生了两个基本的观念，它们长期指导着布尔迪厄对行为的思考。首先，行为不是对外在的决定性结构——不管它们是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或文化的——的机械的反应。习性、传统、风俗、信仰这些过去的文化或社会遗产，渗透到并塑造人们对于现在与未来的个体的或集体的反应。它们调节着外在的结构对行为产生的影响；[2]其次，他明确地反对关于行为的“经济人”观点。[3]他研究的阿尔及利亚农民并没有显示出以下类型的未来取向：该取向将允许进行手

[1] 布尔迪厄（同上）认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都有一种本质上是还原论的人类行为观，把人类行为看作某种本质上是对经济结构的反映的东西。在布尔迪厄看来，两者的优势是“客观主义的”，而缺少适当的能动性意识。

[2] 对行为的这个理论概括清楚地把布尔迪厄置于与所有形式的行为主义对立的立场上。他的习性概念挑战了那种认为行为对应于刺激一反映等式的理论。

[3] 布东（Boudon 1979，1980）是代表这种反对观点的另一个当代法国社会学领袖。他倡导关于行为的理性选择模式，这种模式使得行为者成为结构性的制约系统内部自由但功利性的选择的尺度。

段—目的的计算，以应对侵略性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挑战。他们以他们的传统的态度应对挑战。

在近期的著作中，布尔迪厄(1990c：106—119)强烈地反对对他的著作的实用主义批评，捍卫自己的研究。他捍卫自己的知识策略，认为它与韦伯的思想策略是一样的。韦伯“利用经济的模式，把唯物主义的批判扩展到宗教领域，并揭示宗教游戏的伟大倡导者的特定利益”(107)。布尔迪厄的实践经济的确可以被看作是对韦伯的观念性利益观的阐释与发展。但是，虽然韦伯把经济行为限于存在手段—目的计算的那些情况，布尔迪厄却在所有的行为类型中都看到了利益驱动的追逐。“所有的行为本质上都追逐自我利益”，对于这样的论断，布尔迪厄既没有考虑提供支持的证据，也没有考虑提供反对的证据。

我们应当批评性地质问：是否不同的行为类型在利益相关性的程度上是有所变化的？有些行为的形式是否可能比别的行为形式更加与利益相关，即：更加直接地回应生存的需要？而且，所有行为都是与利益相关的这个假定与布尔迪厄自称的唯物主义之间存在着不那么令人舒服的关系。由于在人类价值的等级中，布尔迪厄似乎愿意赋予生存的物质条件以优先性，所以他就有可能接受这样的观念：并不是所有类型的活动在为生物提供舒适方面都是同样有成果的。由于否定了利益相关的行为类型与非利益相关的行为类型之间的区别，他不再能够维护他可能愿意给予物质生活的那种优先性。在使用的时候把利益观念扩大到所有行为形式的理论后果之一，是在区别行为类型——这种行为似乎遵循布尔迪厄希望采用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假设——时失去了分析的力量。[1]

---

[1] 这个两难选择的一种解决方法，也是布尔迪厄偶尔使用的一种方法，是谈论特定的、比别的行为“更加功利性”的行为类型。例如，在科学领域，他发现可能存在“最为赤裸裸的功利性的、自我中心的对抗”，这种对抗可能会导致“伪造科学结果”以便在竞争中胜出(Bourdieu 1990c：111)。这样的例子似乎指出了这样一种行为，在这种行为中，对手段—目的关系的有意识计算是可能发生的。这种解决方法指向一个更加细微的对于行为类型的列举，但这样做却失去了分析性的力量。

布尔迪厄所说的利益定向的行为并没有采取有意识的、理性的计算形式；策略是心照不宣的、前反思的，而不是有意识的计划。但是，在这点上布尔迪厄是含糊的。有时，他承认有意识的策略计算，而有时又坚持利益计算的无意识特点。他没有在有意识的利益计算形式与无意识的利益计算形式之间作出前后一贯的区分。他明确反对关于行为的理性行动者模式，并付出极大的努力解释说，他所关注的行为类型超出了有意识控制的领域。他通常强调行动者们在追逐他们的既得利益时自己没有意识到的串通行为。而且，他声称：获得合法性与有效性的与利益相关的活动对于它的行动者来说其利益的方面就显得越发不那么明显：

> 最能获利的策略，常常是那些通过一种客观地适应客观结构的习性生产出来的、显得不那么可以计算而且带着最“纯真的”、诚实的假象的策略。（Bourdieu 1977c：214）

但是，这暗示布尔迪厄愿意承认有些行为形式的功利特点的有意识程度；而且这种有意识程度被假定为对于行为的成败具有一定的影响。在其他时候，布尔迪厄承认策略性的计算可能具有的充分有意识特征。他因而显得更加关注一个人在社会世界中发现的经验变化，而不是自己的理论框架。但是，布尔迪厄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澄清自己的立场。

与涂尔干一样，布尔迪厄假定：我们不能在社会学分析中实实在在地谈论个体的动机。所有行为形式都是利益定向的，这个观点就是古尔纳德（A. W. Gouldner 1970）所说的“领域假设”（domain assumption）。通过使用一种明显的关于人类行为的经济模式，布尔迪厄提出了“好像”假设（“as if” assumption），认为个体和群体的确试图（哪怕在无意识的水平上）做到（把自己的利益）最优化——这样做既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也是出于经济的考虑。在这个基础上，他可以对特定阶级在特定情境中将会如何行为作出一般性的预测。这种经济模式似

乎是有用的，比如在思考20世纪50年代后的美国上层中产阶级家庭为孩子作出的教育选择的时候就是这样。热衷于进入名牌私立中学乃至特殊的学前强化教育计划，包含着对于如何在未来一代进行最佳家庭投资的高度自觉的计算。同时，布尔迪厄不能提供足够的有说服力的经验证据以表明个体的确尝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使自己的行为最优化。而且，是否就不存在与行为者的客观利益相反的行为形式呢？布尔迪厄的学科领域假定使他的行为理论不适合于分析处理这种可能性。虽然布尔迪厄使用了“最大化”这样的术语，但是在许多例子中情况似乎依然是：“自利”看起来更加接近他脑子里思考的东西。但是他不能提供概念工具来分辨比其他实践不那么“自利”的实践。

批评者把利益理解为布尔迪厄的概念框架中独立的行为原则而误读了他的利益概念。布尔迪厄把个体的利益视作是由一个行动者在社会等级中的位置所决定的。但他把这些利益视作在一个心照不宣的水平上起作用的行动者所具体体现的倾向(embodied disposition)。布尔迪厄并不把利益视作是“目的定向”(goal orientation)。功利性的行为不是一种组织行为的手段—目的模式。相反，利益是“实践的”和“禀性化的”，并没有与实用主义框架相联系的目的定向。

布尔迪厄(1980c：33—35，1990c：106，109)谈论的是具体的利益而不是某种单一的自然利益或普遍利益。在一次谈话中，他指出：

> 利益根本不是人类学的不变体，而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性，一种只能通过历史分析、经验观察才能理解的历史建构。利益不能从某些虚构的、欧洲中心的“人”的概念中推导出来。(Wacquant 1989：41—42)

对布尔迪厄来说，利益的数量与争夺有价值的资源的机构化领域一样多。而且，利益实际上被界定为促使或驱使行为趋向重要结果的任何东西(Bourdieu 1987b：107)。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不是那些无关

紧要的东西，就都与利益相关。 利益是“促使”和“驱动”人以某种方式去行动的东西。 这相当于说每种行为都有它的存在理由(Bourdieu 1990h：290)。 但是，如果说存在各种各样的利益，那么，人们如何去判断哪种利益是更重要的?

在另外一个场合，布尔迪厄通过把利益联系于“功能”与“科学的解释”而捍卫自己对这个术语的使用方法：

> ……当我说有一种利益形式或功能形式存在于每个机构或实践中的时候，我只不过是在肯定充足理由律，任何“解释”活动都包含这样的规律……它是内在于科学观念的(1980c：18—19)。

这里，功利性的行为这个观念好像变成了一个更加世俗的诉求：所有的行为都可以被社会性地加以理解，所有的人类行为都有自己的理由、有自己适当的合理性。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可以问：为什么偏偏要使用“利益”这个词——因为这个词的语义相当程度上超出了这一更加世俗的论点? 答案存在于布尔迪厄的针对马克思主义与空谈家们的修辞策略。

布尔迪厄把自己对利益这个经济术语的使用解释为一种概念上的策略，意在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客观主义以及经济主义。 布尔迪厄指出，马克思主义者把文化归入上层建筑领域，从而为文化的唯心主义的(即非功利的)解释打开了方便之门。 通过辨认文化的与经济的利益，布尔迪厄希望根除马克思主义本身不经意地留下的残余的唯心主义。

如果布尔迪厄把自己的研究看作是与韦伯的研究相似的，把它看作是把一种充分的唯物主义带入文化研究，那么，他超越关于主观/客观的二元对立的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形式的声称不是有一点误导性么? 难道他的研究不应该被正确地特征化为一种彻底的唯物主义解释，这种解释尝试把所有显在的与隐含的唯心主义痕迹从对文化与社会生活的研究中彻底清除? 这样，在布尔迪厄的实践经济中存在某种反讽：虽然布

尔迪厄尖锐地批评马克思主义的还原主义的形式——因为它没有充分地注意社会生活的符号方面，但是他自己的行为观却提供了一种比他尖锐批评的还原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形式更加彻底的唯物主义的解释。

这个理论策略也意在攻击作为超功利的客观性与文化优越性的代表的知识分子的职业意识形态。布尔迪厄把所有知识分子实践都看作根本上是追逐利益的，尽管它们具有符号的特征。他承认，在一定程度上，他的研究恰好是受到他努力加以避免的那些影响的塑造，因为他“在相反的方向上使劲”，并通过一种“有些煽动性的方式反对知识分子的职业意识形态”，强调文化生产的“功利性的”特征（Bourdieu 1990c：106）。[1]布尔迪厄把利益的概念看作“一种决裂的武器”或与否定实用利益的知识世界保持批判性的距离的工具。在最近几年，他越来越多地使用幻觉（illusion）与里比多（libido）这样的术语以取代“利益”（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115—116）。这个术语上的变化可能代表他使自己与那些批评者对于他的著作的实用主义理解保持距离的努力。但是，通过使用“利益”和“策略”这样的术语，布尔迪厄（1987b：63）要人们注意那些可以从表面看来非经济的活动中积累起来的微妙的利益。设计这样的理论策略意在暴露布尔迪厄所认为的知识分子的最重要的、但又不被承认的利益，即：知识分子的“存在于超功利中的功利”。

这些对批评意见的回应尽管富有洞见，但是并没有安全消除由基本的定向所产生的疑问。问题并不完全是批评者通过狡猾地把经济主义的假设强加到布尔迪厄的著作上而“误读”了布尔迪厄——就像布尔迪厄与华康德认为的那样（1992：24）。至少，利益、策略、投资以及利润等术语含有实用主义的定向。以“自我利益”这个观念为例。虽然布尔迪厄拒绝接受这样的批评，即他通过一个普遍的利益概念进行研

[1] 在一次访谈中，他把自己的行为观解释为“故意的、临时性的还原主义”，暗示这不是一种基本姿态，而是一种为了攻击在知识分子、作家以及艺术家之间流行的“超功利性”这种专业意识形态的概念策略（Wacquant 1989：41）。

究，但是他的确谈到了礼物交换中的“自我利益法则”（Bourdieu 1990h：112）。虽然利益可能采用的形式与对什么礼物以及什么时候适合于交换的特定理解一样多，但是，认为任何行为都不能免于对于投入的利益的误识——这样的观点却暗含了某些类似普遍化假设的东西。而且，在一种为了获得对人类行为的充分社会化的解释而希求与所有主观主义残余进行决裂这样的社会学理论中找到自我利益的语言，这本身就是令人迷惑的。

权力作为资本

布尔迪厄把自己区别于马克思主义的第二种方法是把资本概念扩展到所有的权力形式——不管它们是物质的、文化的、社会的还是符号的。个体与群体凭藉各种文化的、社会的、符号的资源维持或改进其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当这些资源作为“社会权力关系”发挥作用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们作为有价值的资源变成争夺对象的时候，布尔迪厄（1989c：375）就把它们理论化为资本。[1]在未分化的传统社会中，家庭的祖传遗产不仅依靠它的土地、牲口以及生产工具，而且也依靠它的亲缘关系以及人际关系网络，这种亲缘关系与人际关系网络代表

> 一种承诺的遗产与信誉的债务，一种在连续几代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并提供了附加的力量来源的权利与责任资本，当发生打破常规的意外情况时，就可以求助这种力量。（Bourdieu 1977c：178）

[1] 布尔迪厄当然不是把资本的经济隐喻应用于塑造社会集体定向的非物质的经济资源的第一人。我们发现这个概念策略被其他人用于各种各样的语境与意图。在《卫斯里会派的故事：道德资本的重要性》（*The Wesleyan Story: The Importance of Moral Capital*）中，克拉克（B.Clark 1973）强调在社会与金融危机时期支撑一个小规模精英学校的规范性契约的重要性。但是布尔迪厄对于这个术语（即资本，译者）的使用不同于绝大多数其他使用者的地方，在于他强调权力维度并使这个经济隐喻成为他的整个社会分析理论框架的核心部分。

而在现代的分化的社会中，在劳动力市场中收入资源的获取依赖于以文凭为形式的文化资本以及以网络为形式的社会资本。在布尔迪厄看来，这些权力形式及其分配的不平等，说明了为什么平等竞争的（自由主义）模式不能适当地解释社会生活，这也说明马克思主义对于经济资本的关注，是建立在一个有局限的权力概念上的。

当布尔迪厄说“资本是积累的劳动”、“衡量各种形式的资本的普遍等价物是劳动时间（在最广泛的意义上）”（Bourdieu 1986a：241，253）的时候，他的资本概念接近于马克思的资本概念。的确，他的资本概念好像根植于某种劳动价值论。资本代表着“控制过去积累的劳动产品的权力……并因此控制使特定类型的商品生产成为可能的机制，控制一系列的收益与利润”的权力（Bourdieu 1991c：230）。劳动可以具体体现为各种形式，但是，布尔迪厄（1986a：243）主要谈论的是四种普遍的资本类型：经济资本（货币与财产）、文化资本（包括教育文凭在内的文化商品与服务）、社会资本（熟人与关系网络）、符号资本（合法性）。他的资本概念不同于马克思的资本概念，他并不区分资本主义所独有的工作类型。他把资本看作是以它们所体现的劳动量的差别为基础的权力关系。他的这个概念因而不能把资本主义的劳动形式与非资本主义的劳动形式加以区分。[1]

虽然布尔迪厄主要关注的是权力与统治，但是他的资本概念并不与马克思所理解的榨取剩余价值或原始积累动力的剥削理论相联系。但是，布尔迪厄超越马克思的一个关键性的贡献是发现了范围更广的构成权力资源的劳动类型（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宗教的、家庭的等，这里我们只能提及有限的几种），它们在一定条件下通过一定的比率可以相互转化。实际上，正是对个体与群体在什么条件下并以什么方式利用资本积累策略、投资策略以及各种形式的资本转化策略，以便维护或强化他们在社会秩序中的位置的研究，构成了布尔迪厄社会学研究的焦点。

[1] 卡尔霍恩（Calhoun 1993：67—69）也有相似的观察。

文化资本

在高度分化的社会中，文化资本是某种形式的权力资本，布尔迪厄通过把经济分析的逻辑扩展到表面上非经济的商品与服务而把它理论化了。他的文化资本概念包括了各种各样的资源，比如语词能力、一般的文化意识、审美偏好、关于教学体系的信息以及教育文凭等。[1]他的目的是想表明(在这个术语的最广泛的意义上)文化可以变成一种权力资源。[2]

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的概念最初出现于他对儿童的不同的学校学习成绩的研究——这些学生出生于社会起源虽然相似、但教育不同的家庭(Bourdieu 1986a：243，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160)。他把这个概念看作是与以下传统观念的决裂：把学术上的成功或失败归于自然的能力(比如是否天资聪明)。他发现，通过家庭继承的文化资本的熟练性与类型可以更好地解释在学校的成功。

在布尔迪厄(1986a)的分析中，文化资本以三种不同的状态存在：首先，它指一套培育而成的倾向，这种倾向被个体通过社会化而加以内化，并构成了欣赏与理解的框架。他认为，文化商品与物质商品的区别在于：一个人可以仅仅通过理解其意义就挪用(appropriate)或“消费”(consume)文化商品。这一点对于音乐、艺术品、科学公式以及流行文化作品都同样适用。这样，文化资本以一种身体化的状态存在。

以身体化形式存在的文化资本的积累开始于孩童时代。它要求有一种“教学法行动”(pedagogical action)：父母、其他家庭成员或聘用的专家为培养儿童对于文化差别的敏感性而投入时间。有教养的秉性或倾向的获得是以“远离经济的必然性”为前提的，因而可以把原来以

---

[1] 拉蒙和拉雷尔(Lamont and Lareau 1988：155—156)整理了布尔迪厄赋予他这个概念的种种用法。其中包括：非正式的学术标准、社会阶级特性、社会阶级地位的指标、社会选择机制、专门技术类型等。

[2] 较近以来，布尔迪厄指出，他称作文化资本的东西事实上应该被称为信息资本(informational capital)(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19)，在术语上的这个变化，使这个概念摆脱了批评者(Lamont and Lareau 1988)在它的早期使用中注意到的高级文化的含义。

阶级为基础的不平等转译为文化差异。继承而来的文化资本的投资，在学校中得到红利返还，奖励那些具有合股的文化资本的人而惩罚那些没有的人。布尔迪厄的一些最有洞察力的文化人类学观察表明了法国的学校教师如何奖励优美的语言风格(特别是在议论文与口语测试中)，这种实践倾向于偏爱那些带有大量文化资本的学生，而这些学生基本上是来自特权的家庭(Bourdieu 1989c：48—81)。

其次，文化资本是以一种涉及客体的客观化的形式存在的，比如书籍、艺术品、科学仪器，它们对我们提出了专门化的文化能力的要求。

第三，文化资本是以机构化的形式存在的，在此，布尔迪厄指的是教育文凭制度。布尔迪厄对高等教育系统的出现与发展以及它在发达社会中对社会地位获取所起的作用给予极大重视。扩展的高等教育已经创造出巨大的文凭市场，这个市场在今天的社会阶级结构的再生产方面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由于教育文凭对于在职业市场中获得理想的位置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父母为了孩子投资于好的教育以便他们在职业市场上“获利”就成为关键。这个投资的过程包含了经济资本向文化资本的转化，这是一个对富有的人来说可以更加方便地使用的策略。

布尔迪厄认为，正是客观化的和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形式向相对自主的市场的引人注目的转化发展，已经成为发达社会中塑造分层结构以及文化生产者的作用的独一无二的、最重要的发展步骤。他发现了一个历史趋势：文化资本正在变成越来越重要的新的社会分层的基础(Bourdieu and Boltanski 1977：33)。[1]客观化、机构化的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分配，对于布尔迪厄来说是现代社会中的不平等的关键方面之一。他

[1] 即使是在传统的法国资本家家庭中，布尔迪厄也发现了一个不断增长的趋势：依赖教育文凭控制在自己公司中的领导地位(Bourdieu and de Saint Martin 1978)。当然，持这种观点的不止布尔迪厄一人。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 1973，1988)坚信知识已经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并取代私有财产成为现代后工业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分层根源。加尔布雷斯(Galbraith 1971)把大公司的不断增强的权力与控制与专业技术而不是实际的占有联系在一起。更近一些的例子是新阶级的理论家们强调所谓的新阶级的知识基础(Gouldner 1979；Szelenyi and Martin 1988/1989)。布尔迪厄虽然强调现代社会中文化资本在权力和权威的分配中的重要性并把它看作一种竞争性的社会分化原则，但是这种原则依然从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财产原则。

认为文化市场与文凭市场的兴起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摆脱以庇护人为中介的传统统治形式的新的自主性(Bourdieu 1985d)。[1]文化相对于政治经济权力的自主性之生成的关键，是教育的机构化与教育的扩展。教育机构通过确立自己的合法化标准，通过吸收与训练自己的人员，即通过保证对于自己的再生产的控制权，而保证了相对于政治干预与经济制约的部分自主性。

我们应该把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与贝克尔(G. Becker 1964, 1976)的“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概念区别开来。与人力资本理论家们不同，布尔迪厄集中关注的是各种类型的资本的意义与用途的以阶级为基础的变化，他把分析的焦点从个体的或全球社会的生产力的恢复，转向文化投资对于社会阶级结构之维持的影响(Bourdieu 1986a: 243—244)。他更注重不能用金融术语加以量化的文化社会化与文化传递的细微方面。而且布尔迪厄的人类行为理论并不与理性行动者理论共享相同的人类学假设。在布尔迪厄那里，行动者追逐策略，但是并不是作为把有限的手段有意识地最大化以便获得自己需要的目的。他们的选择是更加心照不宣的、更加实践性与倾向性的，反映了累积的资本与相应的倾向——这种倾向产生于过去的经验、现在的机遇以及行动者活动于其中的场域的制约的相遇。

但是，布尔迪厄的确与人力资本理论或理性行动者理论共享关于所有的行为都与利益相关的基本假设。虽然布尔迪厄会强调说，行为的内容可能依据社会群体、社会以及历史时期的不同而变化，他还是坚持人类行为的不变方面(即所有行为都是功利性的。——译者)。而且，如同卡耶正确地指出的，尽管利益的类型是极为多样的，但是行为总是

[1] 布尔迪厄(1987b: 172)详细地说明了它不是一种人格化的、以早先的艺术家—庇护人关系为特征的统治形式，而是一种“通过市场这样非常普遍的机制实施的结构性统治”。在关于这个观点的早期表述中，布尔迪厄(1971c, 1971d)引用了许金(Schücking 1966)的著作，以及威廉斯(Williams 1963, 1965)的著作，来理解西方社会中艺术家和作家文化市场的历史发展。今天，布尔迪厄把以艺术家、作家社团与国家基金形式存在的新赞助方式的出现，当作是对文化生活的自主性的威胁加以引证(Bourdieu and Haacke 1994)。

指向获得权力与财富。在这个意义上，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的确与人力资本理论共享关键性的实用主义维度——尽管他自己对此加以否定。[1]

作为资本的文化

因此，布尔迪厄提出了一种关于各种资本形式及其可转化性的一般科学。但是，他对于各种资本形式之间的关系的论述方式却是非常复杂的。这种复杂性部分来自他思考资本的方式。在《实践的逻辑》(1990h：122)一书中，他认为资本是“社会物理能量”的一种，它可以以各种形式存在，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通过特定的兑换率相互转化。这种对资本的想象包含了对于权力的一种理论阐述，在这种理论中，没有一种资本/权力的形式被赋予优先性。他引述罗素的话说，在权力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存在、没有哪种方式是更加基本的或可以脱离其他方式加以研究的意义上，权力可以与能量进行类比(300)。这里包含了经验主义的与历史主义的定向——它显然存在于布尔迪厄的著作中，在这种定向中，只有通过研究才能决定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秩序中资本的核心形式及其相互关系。这个定向的结果之一是资本倾向于扩散，相应地也就导致了布尔迪厄的概念货币(conceptual currency)的贬值。这样，我们不仅发现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以及符号资本，也发现了家庭资本、宗教资本、政治资本、道德资本以及国家资本等等(仅举数例)。然而，随着对作为资本的权力形式的越来越精细的辨别，就出现了一种倾向，即发现权力无所不在，因而在一定意义上也就哪儿也不存在——而这恰恰是布尔迪厄本人所反对的权力的极度扩散。[2]

但是，在布尔迪厄著作的其他许多地方，布尔迪厄还是给予经济资

[1] 布尔迪厄评论说，除了一些共同的词汇以外，他实际上与人力资本理论家很少有共同之处(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118)。

[2] 事实上，布尔迪厄把自己的著作区别于福柯的恰恰在于这一点：他比福柯更认为权力集中于特定的机构背景(Wacquant 1993b)。

本以理论上的优先性。他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现了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历史性”对抗。正如我们在第六章中将会看到的，这种对抗在这些社会中作为权力关系的基本决定因素而起作用。虽然文化市场已经作为对于经济市场的严峻挑战出现，但是文化资本仍然被视作资本的“从属的”或“被支配的”形式。[1]文化市场与文化机构依然只有相对于经济市场与经济机构的相对的自主性。[2]依据布尔迪厄的看法，文化市场的重要发展并没有打破权力的天平，使之从大公司或国家转移到大学。在分析当代法国社会的阶级关系的时候，布尔迪厄注意到：

> 只有当经济的分层原理声称自己拥有真实的统治地位时，统治部门才成为统治部门。从长远的观点看，即使在相对自主的文化生产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特殊价值与市场价值之间的差异常常在时间的过程中消失——这个原理也同样具有支配性。（Bourdieu 1984a：583）

尽管具有一定的自主性，文化领域依然从属于经济。布尔迪厄（1986a：252）认为，“经济资本处于所有其他资本类型”——比如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以及象征资本——“的最根本处”，而且，这些非经济的资本事实上是“经济资本的转化与伪装形式。”说到底是经济资本使时间的投资——这种时间的投资是积累文化资本所必须的——成为可

[1] 闭合理论家虽然愿意把文化资源看作权力的形式，但是他们在如何比较文化资源与阶级资源方面发生了分化。当墨菲（Murphy 1988：79）在教育文凭中发现派生的而不是原初的排除形式的时候，他是站在布尔迪厄的一边的。然而，帕金（Parkin 1971，1979）却把教育文凭放在与经济资本同样重要的地位。

[2] 对于马丁和塞利尼（Martin and Szelenyi 1987）来说，（布尔迪厄指出的）文化资本的相对自主性代表一种值得欢迎的“对于经济还原主义的偏离而走向关于符号统治的普遍性理论”，但是这一步迈得不够大。他们评论说，布尔迪厄对阶级社会的分析依然没有给予符号系统以足够的自主性以解释自己的批评理论。他们虽然受到布尔迪厄的著作的启发，但是依然反对布尔迪厄用资本来隐喻文化。他们提出“符号控制”（symbolic mastery）说，把它作为更加适当的方式来标识那些把“原理的持有者”区分于“单纯的实践者”的文化实践，并因此指出了一种新的、并不总是从属于财政资本的统治类型。

能，并经此而使得文化资本的投资成为可能。经济结构决定性地塑造了文化的舞台，虽然布尔迪厄(1991c：230)很少认为这种因果关系是直接的。

布尔迪厄(1986a：254，1987b：131)还承认，文化资本并非像经济资本那样是一种稳定或普遍的货币。从文化资本的积累可以通过批评与怀疑而被削弱的意义上讲，文化资本更加不稳定，在其代际传递(家庭、个体)的过程中会遭遇比经济资本更高的风险。而且与股票不同的是，文化资本的制度化的价值(以文凭的形式存在)是不可能讨价还价的。这样，经济资本就更容易加以理性地管理，更容易被转化、积累与转移。虽然布尔迪厄批评马克思主义把文化归结为经济，并在自己的著作中抵制任何经济决定论的含义，但是，正如卡耶指责的那样，他还是作出了一些带有某种程度的经济主义含义的论断。[1]

各种资本如何相互转化也是一个问题。布尔迪厄对于权力关系的社会学研究的贡献之一，是有力地阐明了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但是，并不是在所有的方向上相互转化都是同样可能的。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的联系要超过它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联系。一般情况下，经济资本似乎更容易转化为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而不是相反。布尔迪厄承认，某些商品与服务可以通过经济资本而直接获得，但是其他的商品与服务则只有通过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才能获得——这是布尔迪厄的作品强调的一个要点(1986a:252)。这样，虽然文化与社会网络都是资本的形式，它们却并不能像金钱与财富那样独立。

文化作为资本的观念富有洞见地唤起对于文化倾向与文化资源在市场社会中的权力方面的关注。当然它也为比较研究提出了问题。正如前面提到的，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没有对资本主义社会与前资本主义社

[1] 在近来的陈述中，布尔迪厄(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限定了自己早先的论断(Bourdieu 1977c)——归根结底，经济是决定性的因素。今天，他更加愿意说，不同的场域之间的关系具有充分的历史偶然性，即使在今天经济的场域是最重要的。

会进行区别，他后来实际使用这个概念的方式暗示我们，他的文化资本概念或许更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而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文化资本只是以其“融合的”而不是以其“客观化”、“制度化”的形式出现，但是，在使用这个概念时这种“形式”的转化不仅表明布尔迪厄对于这个概念的使用的灵活的、策略性的态度，而且表明这个概念在应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时内在的无力。

即使在用于高度分化的社会时，这个概念也有局限性。 因为布尔迪厄是在一个特定的民族国家的高雅文化传统中发展出这个概念的，它似乎联系于一个关于高雅文化霸权的强有力的假设。 当这个概念被介绍到其他一些更加文化多元主义的国家的语境中时，它的某些修辞力量就大大地丧失了。 在文化资本意味着一个关于有价值的文化形式的高度共识的意义上，它作为通用货币发挥作用的能力在一个巨型的、高度分化的社会（比如美国）中可能就是有限的，在那里，高级文化并没有像在法国那样发挥支配性的作用（DiMaggio 1979；Lamont and Lareau 1988）。

而且，在这些市场关系已经极大地渗透到社会关系领域（如家庭这个原先由传统与社会等级支配的领域）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资本形式之间的可转化性是特别高的，而在一个具有强大的福利系统的市场社会中，可转化性可能就要小得多。 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缺少对于不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以及它们之间重要的结构差异的更加细致的分析。

文化市场这个隐喻的使用，在比较资本主义社会与前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在这种社会里，私有财产没有获得官方的承认）的时候也产生了混合的结果。 把社会分层的资源标识为资本的形式并没有很好地概括国家社会主义的特征，在这样的国家，首要的排除规则是党派成员资格而不是私有财产（Murphy 1988）。 关于社会闭合形式的一种更加普遍的理论语言对于不同社会之间的这种比较可能是更加适当的。

布尔迪厄关于文化资本的理论术语，虽然有别于用于人力资本的术

语，但也不能完全避免卡拉贝与哈尔西(Karabel and Halsey 1977：13)在批评人力资本理论时提出的深刻的重要论断：即，它

> 直接诉诸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观念，这种观念寓于它坚持的主张中：工人是资本的持有者(具体表现为他的技术与知识)，他具有投资的能力(投资于自身)，因此，通过一次冒失的理论跳跃，那个没有财产、既不控制其劳动的过程、也不控制劳动的产品的挣工资者，被转化成了一个资本家。[1]

在布尔迪厄的世界，所有的人都是寻求利润的资本持有者与投资者。

文化资本家的形象可能适合于媒体、艺术以及学术领域的某些专家，在这些领域，掌握有价值的文化资源的个体能够把这些资源转化为经济报酬。这个形象也适合于为自己的孩子寻求有价值的教育类型的中产阶级家庭。但是，这个资本的隐喻不太适合只有很少或根本没有资本可以投资的群体。布尔迪厄的框架似乎不太适合工人阶级或下层阶级。他用这个概念有力地辨认了统治阶级内部的阶层分化的根源，但是对于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则关注不多。

一种关于符号暴力与资本的理论

布尔迪厄把自己区别于马克思主义的第三种方式是强调符号形式与符号过程在社会不平等的生产中所起的作用。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低

[1] 人们可能会思考为什么文化资本的观念在美国社会学界如此迅速地被接受，特别是在教育的领域。一个可能的因素是美国教育的极度扩展，以及把教育看作一种投资的普遍观念。一个相关的观念是实用主义价值在专业社会学中的极度流行(Caillé 1993；Gouldner 1970：61—87)。

估了权力关系的符号方面的重要性(无论是在未分化的前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高度分化的后工业社会)。 实际上，布尔迪厄(1989c：555，1990h：122—134)相信，即使在发达社会中，统治的基本模式也已经从赤裸裸的暴力与体罚威胁，转向符号操纵的形式。 这个信念使得布尔迪厄有理由关注在维持当代社会的不平等时文化过程、文化生产者以及文化机构所起的作用。 既存在经济的权力，也存在文化的权力。

布尔迪厄思考符号权力的方式与他分析所有符号系统(无论是艺术、宗教、科学或语言)的方式紧密相关。 在一次对不同的理论传统的简要综述中，布尔迪厄(1977d)认为，符号系统同时发挥三种相关但又不相同的作用：认知、交往、社会分化。[1]

继承了萨皮尔—沃尔夫的语言理论传统、康德—洪堡—卡西尔的哲学传统，以及涂尔干的知识社会学，布尔迪厄把符号系统视作“具有结构功能的结构”(structuring structure)，即赋予社会世界以秩序与理解的工具。 在这个意义上，不同的知识模式，如语言、神话、艺术、宗教和科学，代表不同的理解世界的方式。 因此，它们实施一种认知的功能。

其次，符号系统同时也是“被结构的结构”(structured structure)，其内在的逻辑可以通过结构分析——这种方法是索绪尔为分析语言、列维－斯特劳斯为分析神话而发展起来的——加以把握。 符号系统是传递着一种文化的全体成员所分享的深层结构意义的“符码”。 因此，概念系统同时发挥着交流工具与知识工具的功能(Bourdieu 1971b：295)。 作为认知与交往工具，符号系统提供——正如涂尔干(Durkheim 1965)说的——“逻辑的”整合，这种整合是“道德”整合的一种必要条件。 符号系统因此实施一种交流与社会整合的功能。

第三，布尔迪厄强调得最多的是，符号系统不仅提供认知的与整合

[1] 布尔迪厄的“符号权力”(Bourdieu 1977d)一文最简明扼要地提出了这个命题，但是对于这个命题的最详细的阐述却见于“宗教场域的发生与结构”(1991b)、《教育、社会与文化中的再生产》(Bourdieu and Passeron 1977：4—68)。

的功能，而且作为统治工具发挥功能。占支配地位的符号系统为统治集团提供整合，为社会群体的排列提供区别与等级，同时还通过鼓励被统治者接受现存的社会区分等级而把社会的等级排列合法化（Bourdieu 1977d：114—115）。符号系统因此也发挥政治的功能。

这样，布尔迪厄综合了建构主义的与结构主义的观点，以提供一种可以将符号系统的认知、交流与政治方面整齐地加以综合的符号权力理论。这个理论产生于他对于符号再现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的关注——这个问题是60年代期间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与结构主义者争论的焦点。这个理论也表明布尔迪厄对统治性文化的集中关注。在他的著作中，除了声明被统治的文化反映着统治的结构（参见 Bourdieu and Passeron 1977：23），我们很难发现他对于被统治者的文化的同样多的关注。

在阐明了符号系统的这三个功能以后，布尔迪厄发展出了一种符号形式的社会学以及符号暴力与符号资本的理论，它们相互交叉渗透但是却仍然沿着相对不同的方向发展。我们将先分析他的符号形式社会学，然后再考察他的符号暴力与符号资本的理论。

符号形式的社会学

在形成自己的符号形式社会学的时候，布尔迪厄实质性地借鉴了法国结构主义及其语言学模式。首先，布尔迪厄借鉴索绪尔的理论，认为符号过程与符号系统的基本逻辑——从语言本身开始——是通过二元对立的方式确立差异与区别的逻辑。它是一个“差异与差异的偏离的逻辑”（Bourdieu 1991c：237）。[1]从这个角度看，符号系统是一个建立在包含与排除的基本逻辑上的分类系统。所有的符号系统都遵循这个基本的分类逻辑把各个因素划分组合进对立的种类，并因此通过排除与

[1] 雅各布森关于语音的二元逻辑的陈述（1956）的烙印在这里非常清楚。列维－斯特劳斯（1966）认为这也是人类大脑的基本操作模式。

包含的对抗逻辑产生出意义。这个符号系统的逻辑建筑了一系列的二元对立，比如稀有与常见、好与坏、高雅与低俗、内在与外在、男性与女性、精致与粗俗，它们作为潜在地制约着我们心理活动的“基本分类范式”而起作用。[1]正如布尔迪厄(1984a：468)指出的：

> 一个特定的社会形式中的所有行动者，都共享着一系列基本的知觉框架，这种知觉框架通过成对的对立的形容词——它们被普遍地用于区别与限定实践领域中大量的人与事物——开始其对象化活动。高雅(崇高、优雅、纯粹)与低俗(粗俗、低级、中庸)，精神与物质，优美(优雅、精致)与粗鲁(笨重、肥胖、粗野、野蛮)，轻盈(精细、生动、清晰、灵巧)与笨重(缓慢、粗大、愚钝、费力、笨拙)，自由与强迫，宽广与狭小等的对立，或者，在另外一个维度上，独特(稀有、与众不同、出类拔萃、绝无仅有、独一无二、新颖)与普遍(普通、陈腐、平庸、琐事、例行公事)，才华横溢(聪明)与愚蠢笨拙(晦涩、灰暗、平常)等的对立，是所有老生常谈的发源地，这种老生常谈所以被现成地接受，是因为在它们的后面存在着整个的社会秩序。

这些配对的对立被所有人所共享，在起源上是社会性的，它们被用以强化社会生活中的权力关系。它们是日常生活中的社会生活分类的建筑材料。这一套“包含在日常语言中的准编码化的对立”列阵，最终却是与一个更加基本的两极对立——统治与被统治的对立——联系在一起。这是所有的成双成对的对立的最终来源。

布尔迪厄的结构主义方法目的在于揭示社会生活中统治/被统治的

[1] “基本分类范式”这个术语来自涂尔干与莫斯(1963)，布尔迪厄把自己的符号形式理论看作是对涂尔干—莫斯的划分社会生活的基本认知结构的研究规划的系统化与精致化。正如我们在第七章将会看到的，布尔迪厄通过把“分类斗争”看作“阶级斗争”的表达而把涂尔干与莫斯加以综合。

“深层结构”。他要说明的是这种基本的两极对立的各种变体在差异极大的各种领域都可以发现。比如，“轻巧(light)与笨重(heavy)”的区别就是统治与被统治这个基本对立的变体。在法国的教育中，他发现轻巧与笨重的两极性被用以建构对于学术风格的评价：轻巧表明资产阶级的学术爱好，以区别于粗俗沉重的体力劳动者的学术风格。[1]在戏剧中，轻与重的对立被积极地用于把轻松休闲的资产阶级戏剧区别于粗俗的、“劳动的”、“扭曲的”戏剧。有时价值可以颠倒过来，即在某些知识分子看来，轻松是与不严肃、缺乏探索性的知识形式相关的，而沉重则与更加值得尊敬的、扎实的学院式的研究联系在一起(Bourdieu 1984a：469)。这一对立以及其他成双成对的对立，在不同的社会世界可以具有不同的意义。但尽管如此，它们仍然具有从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的逻辑同一性，并且都最终指向统治与被统治之间最基本的“永恒对立”。

结构主义的语言学与符号学集中关注类比转化与变换，由此一些重要的文化上的对立可在各种符号系统之间得到表达，这类分析方法关注概念系统的内在组织而忽视符号系统的来源问题。但是布尔迪厄追随涂尔干的路子，强调社会结构与认知结构的联系，他说“社会行动者在其关于社会世界的实践知识中贯彻实施的认知结构是内化的、‘具体化’的社会结构”(Bourdieu 1984a：468)。社会结构内化为个体与群体的认知结构，这些个体与群体用来划分社会世界的范畴正好就是社会秩序划分他们自己的那些范畴，就这样，个体与群体不知不觉地再生产了社会秩序。[2]

但是，与涂尔干不同，布尔迪厄不认为符号系统只是镜子般地反映社会现实，他并不尝试去确立特定的符号与特定的社会关系之间的一对

---

[1] 在第八章，我们将考察布尔迪厄(1989c：19—47)的某些经验发现，这些发现表明“才华横溢/严肃缜密”的二元对立构造了法国的学术评估。

[2] 布尔迪厄把这种内化的倾向系统称为“习性”，我们将在第五章对此加以探讨。

一的关系（就像特定价值与特定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 相反，他拥有结构主义者的反实证主义立场，认为通过认知过程确立的二元对立区分本质上是任意的，因为它们并不直接反映社会现实。 毋宁说，意义通过符号之间的对立特征而获得，虽然任何特定的符号与特定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 意义不是从符号本身的内在特征中得到的，而是来自它们的对立关系。 这为布尔迪厄的以下观点提供了认知的基础：任何社会秩序的统治性文化标准从根本上说是任意的。 布尔迪厄把这些标准指称为“文化的任意性”，以表明所有文化系统根本上说是人的建构，这种建构是历史的，是来自特定群体的活动与利益，它把群体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合法化（Bourdieu and Passeron 1977，丛书之一：《符号暴力理论的基础》）。 布尔迪厄反对任何关于超越社会影响的普遍价值、普遍知识与普遍信仰的主张。[1]

但是，如果说符号系统就其并不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意义上讲是任意的，那么，在布尔迪厄看来，从它们的社会后果方面来讲，却一点也不是任意的。 相反，这个符号区分的基本逻辑从社会上、政治上和文化上发挥着作用，其功能是把个体与群体之间不平等的、等级化的安排加以合法化。 布尔迪厄认为结构主义的对比关系逻辑不仅可以运用于语言（索绪尔）、神话（列维－斯特劳斯）与话语（福柯）等符号系统，而且可以运用于“社会关系，符号系统就是这些社会关系的程度不同地转化了的表达。”（Bourdieu 1983a：314）布尔迪厄经此把自己的方法区别于法国其他有代表性的结构主义者。 布尔迪厄的符号形式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关于符号系统的社会与政治作用的理论。

对布尔迪厄来说，结构主义符号学与涂尔干的“集体再现”概念所存在的问题，都带有一种含蓄的共识理论（theory of consensus）。 虽然布尔迪厄承认“特定的社会形式中的所有行动者都共享着一套基本的知

[1] 然而，布尔迪厄（1990c：181）也声称反对激进的文化相对主义，因为他坚信，社会群体及其相应的文化活动是不相称的，而是依据其实施权力的能力等级化地建构的。但是即使这样，他的研究的主要目标还是把统治集团的文化合法性的诉求“相对化”。

觉框架”（1984a：468），但是他强调对立逻辑在符号系统中的区分作用。布尔迪厄的基本观点是：符号区分的二元对立逻辑同时也决定我们理解社会世界的方式，它使得我们倾向于依据同一种两极逻辑来组织社会世界并因此而生产出社会区分与认知区分。这些认知区分通过制造二元对立的社会群体划分与逻辑群体划分、通过创造社会接纳与社会排除的形式，倾向于同时生产社会的与逻辑的分类。这些区分成为我们知觉社会世界，并赋予它有意义的秩序的分类透镜。正如“区分”的双重含义所表明的，这个基本的逻辑正好表明了符号暴力的特征：在制造概念区分的同时，制造社会区分。

这样，在被确立的社会群体是等级化地加以区分并得到合理化的这个意义上，符号再现的分类逻辑的社会功能具有政治的后果。二元的符号区分与社会区分相关联，而社会区分则把符号分类转化为社会等级的表达。心理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刻印在我们的认知与交往能力上的二元对立逻辑而获得，同时提供了在群体内外确立的社会区分的地图。这一个方面与另一个方面相关联：社会区分通过认知过程的两极化逻辑而被内化与构造。符号系统可以被视作是“词语分类”的形式，在这里，两极对立的认知逻辑与社会的排除与包含逻辑之间的联系得以确立（Schwartz　1981）。[1]符号分类的对立逻辑深刻地表明，群体内/群体外的关系可以在认知的范围内建立起来，它们与社会的与认知的区分相重合。[2]布尔迪厄认为，这是所有符号系统（不仅仅是那些存在于原始神话或宗教中的符号系统）的基本特征，它在哲学与科学——当代世俗化的心灵最不怀疑其存在——中也

[1] 布尔迪厄在近期的著作中强调的这个框架的一个应用，是群体形构过程中符号权力的作用。他辩称，群体身份乃至群体的存在本身，作为一种集合的实体（collective body），依赖于符号权力的实施。他写道：“符号权力，其形式是一种典型的制造群体的权力，是把群体——特别是通过特定的机构场所，这里的范式则是婚姻——加以具体化与定位的权力。它构成了使某种原先以隐秘状态存在的事物以客观化的、公共的、正规状态存在的权力”（Bourdieu 1987f：14）。

[2] 包含与排除过程的认知范围暗示了一个有潜在用途、但依然没有被发掘的社会排除理论的路径，参见 Murphy 1988。

同样起作用。[1]

布尔迪厄接受了结构主义关于社会生活的二元对立的“深层结构”说。但是，二元对立的符码是不是文化的基本构筑材料这一点依然不清楚，因为日常生活的实践并不总是标示着此类清晰的区分。比如，人们经常发现一个意义范畴“投影到”下一个意义范畴(Geertz 1974)，而且，通过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所再现的性别象征主义——布尔迪厄把它当作是社会生活的普遍现象——在实际的实践活动中既得到强化也受到质疑。性别化实践的这种多样性(multiplicity)本身，使性别成为一种受到质疑的身份，而对此，布尔迪厄的结构主义视角没有予以解释(McCall 1992)。

如果说布尔迪厄吸收了结构主义的符号理论以发展出自己的符号权力理论，那么，他依然在符号系统与社会结构的联系中而不是在符号系统本身之内来识别这种符号权力的来源。权力不是存在于语词或符号本身中，而是存在于人们对“语词的合法性的信仰以及对说出这个语词的人的信仰”。对于布尔迪厄来说，符号权力不是存在于理念的力量中，而是存在于它们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中。符号权力“是在实施这个权力的人与接受这个权力的人之间的特定关系中、并通过这种关系得到界定的，也就是说，是在生产并再生产信仰的场域的结构中得到界定的”(Bourdieu 1977d：117)。

符号暴力与资本

布尔迪厄把自己区分于马克思主义的第三种方式是通过强调“合法性的再现(representations of legitimacy)对于权力的实施与维持”的特殊作用(Bourdieu and Passeron 1977：5)。他强调，几乎在所有情况下，权力的实施都需要某种形式的正当性证明(9—10)。正是通过合法

[1] 布尔迪厄(1984：468—469，596)评论说，“独特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对立”——这个对立位于占统治地位的历史哲学的中心”——以“变形的方式”存在于政治学的“精英/大众”的对立之中。

化而进行统治的权力最受布尔迪厄的关注，他认为这种权力是阶级关系的黏合剂。当然，马克思赋予意识形态的正是这种作用，而布尔迪厄则把它视作符号系统的政治功能。但是，布尔迪厄强调的是习以为常的假定与实践在权力关系的建构与维持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如果说他的实践理论把利益的观念扩展到文化，那么，他的符号权力理论则通过声称所有的权力形式都需要合法性而把文化扩展到利益的领域。

布尔迪厄把意识形态或“符号暴力”理解为通过以伪装的、习以为常的形式再现经济与政治权力来强制性地推行理解与适应社会世界的方式的能力。符号系统“只有通过那些并不想知道他们臣属于符号权力甚至他们自己就在实施符号权力的人的合谋”才能实施符号权力(Bourdieu 1991c：164)。通过使用“符号暴力”一词，布尔迪厄强调的是被统治者如何把自己的被统治状况当作合法的(状态)加以接受(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167)。但是，符号权力是一种合法的权力，它既引出统治者的赞同也引出被统治者的赞同。

布尔迪厄(1987f：13)把符号权力理解为“创造世界的力量”(worldmaking power)，因为它包含把“关于社会世界及其分化的合法观点”强加于人的能力。由于符号权力把现存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合法化，所以它有助于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的代际间的再生产。在一个重要的段落中，布尔迪厄说：

> 任何一种实施符号暴力的权力，即任何一种设法把意义强加于人、并通过掩盖作为自己力量的基础的权力关系而把意义合法地强加于人的权力，都把自己特定的符号力量附加到那些权力关系上(Bourdieu and Passeron 1977：4)。

这样，对于布尔迪厄来说，符号权力把政治与经济的权力合法化，但又不能还原为政治或经济权力。这就是布尔迪厄的文化观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理论的区别。

在任何情况下，权力的实施都需要正当化与合法化，这种正当化与合法化创造出对于权力的根本任意性的“误识”（Bourdieu 1989c：377）。“误识”是布尔迪厄的一个关键术语，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错误意识”有关系，指的是对一整套实践中存在的政治经济利益的“否定”（denial）。[1]误识与布尔迪厄关于所有行为都与利益相关这个主张紧密相联系。隐藏在所有实践（特别是文化实践）中的自我—利益的逻辑被误识为是“超功利”的逻辑。符号实践使人们的注意力偏离实践的功利性特征并因此而有助于把它们描述为超功利的追求。这个错误知觉把这些实践合法化并因而有助于这些实践嵌于其中的社会秩序的再生产。当各种行为与资源变得与其潜在的物质利益脱钩并因此被误识为代表超功利的行为与资源形式的时候，这些行为与资源就获得了符号权力合法性。在未分化的前资本主义社会，情形几乎都是这样。在这样的社会中，物质生活——正如波拉尼观察到的（Dalton 1968，1944）——总是镶嵌在社会与文化的复杂网络中。布尔迪厄（1990h：118）在卡比利亚的田野调查中观察到：“即使是‘经济’资本，除非成功地通过能够使经济资本的真正效力变得无法识别的习惯而被误识，否则就不能发挥作用”。纯经济不能自主地表达自己，它必须被转化为符号形式。因而，既存在着经济的或物质的权力也存在着“符号权力”。那些能够把自我利益转化为超功利的并从中获益的个体或群体，就获得了布尔迪厄所谓的“符号资本”。符号资本是一种“不被承认的资本”，它把潜在的利益关系伪装为超功利的追求。[2]

布尔迪厄最先是在对卡比尔人的农民社会的早期研究中发展出他的符号资本概念的。在布尔迪厄所谓的“诚信经济”（good-faith econo-

[1] 在弗洛伊德的“否认（verneinung）”的意义上，布尔迪厄（1986a：107，298；1990h：242—243）把误识等同于否定，但是对于布尔迪厄来说，误识是通过“符号劳动”而不是弗洛伊德说的“心理过程”而产生的。

[2] 在《实践理论大纲》（1977c：183）中，布尔迪厄说：“符号资本是一种转化了的、因而是伪装了的物质的‘经济’资本形式。它只有在掩盖以下事实的情况下才能生产出效果，这个事实就是：它产生于资本的‘物质’形式，这种物质资本归根结底同时也是它的有效性的来源。”

my)中(Bourdieu 1990h：114)，商品流通的支配性形式通过礼物交换(包括物质的与符号的)而不是直接的市场交换而发生的。符号资本的重要性在于它表面上对经济资本的否定。符号资本是这样一种权力形式，它不被看作是权力而是被看作是对承认、依从、忠诚或其他服务的合法要求。[1]

布尔迪厄通过论证不仅所有行为都是利益相关的，而且许多行为只有当它们的利益被误识的时候才能成功地实施，把他的理论推向更加普遍的水平。他认为，大量的实践如果被识别为发源于对自我利益的追求，就将无法实施(Bourdieu 1986a：242—243)。比如，“礼物交换的实施的前提，是个体或群体对于客观的交换‘机制’的现实性的误识”(Bourdieu 1977c：5—6)。行为的发生与行为者追逐自我利益仿佛完全一致，因为在能够计算行为的统计学规律的“旁观式”社会学家看来，情形确实如此。行为者好像试图对自己隐瞒其行为的自利特征。布尔迪厄(1977c：6)写道：

> 每件事情的发生看起来好像是：行动者的实践，特别是他们对于时间的控制，都绝对地依据对于自己与他人隐瞒自己实践的真相的方式加以组织。为了阐明这个真相，人类学家与他的研究模式只不过用超时间的模式来替代本身只能在时间中并通过时间起作用的框架。

由于行动在一段时间中发生，并且大部分是在默认的、理所当然的水平上进行，行动者不能识别他们行动的客观后果，然而这种后果在社会科学家看来却不难认识。

布尔迪厄也把符号资本的概念用于分析高度分化的当代社会。虽

[1] 布尔迪厄关于这个概念的系统阐述，参见 Bourdieu 1972：227—243，1977c：171—183，1989c，以及 1990h：112—121。

然发达工业社会的经济已经极大地独立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但是它依然还是需要合法化。那种直言不讳的现实主义——“生意就是生意”（business is business）——如果不借助冠冕堂皇的正当性证明很难成功。实际上，与社会从原始的资本主义到发达的资本主义的转化相伴随的，是对于符号权力与符号资本的越来越强烈的依赖。早期靠剥削起家的企业界大亨的慈善举动也好，资本家家庭对特权化的高等教育形式不断增加的投资也好，都证实了这样一种努力：积累经济资本的同时积累符号资本。在应付税法与继承法的变化时，资本主义家庭今天更多地投资于高等教育以便把财富的代际转化合法化（Bourdieu and de Saint Martin 1978）。而且，私人经济利益集团的慈善性的捐赠行为，比如向美国的公共广播提供资金，进一步表明富人利益集团赋予其符号合法性的重要性。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人的收益一般说是与物质的积累形式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以慈善、科学、宗教、艺术为形式的符号追求，常常被认为是缺乏既得利益的。事实上，慈善和非营利部门的作用是通过把经济利益转化为符号承认的形式而把特定的经济利益合法化。布尔迪厄（1990h：133）认为非营利部门的扩展产生于“经济资本向象征资本的转化”，通过这样的转化，统治集团保护了公众舆论对于自己的活动的尊重。

这样，在布尔迪厄看来，符号资本代表了一种谈论权力关系通过符号形式而合法化的方式。它是一种“合法的积累”形式，“通过这种积累形式，统治阶级保证了一种‘信誉’资本（capital of ‘credit’），这种资本似乎与剥削的逻辑毫无关系”（Bourdieu 1977c：197）。与他对于统治群体与被统治群体的关系的分层研究紧密相关，布尔迪厄把符号资本理解为“高度发达的资本种类”，只要被统治阶层发现把承认与合法化给予统治阶层是合乎自己的利益的，那么，这种资本就从统治者那里扩展到了被统治者那里。这是一种“集体信仰”（collective belief），一种“信任资本”（capital of trust），它既来自社会尊重也来自物质财富。

符号资本像物质资本一样是可以积累的，在特定的条件与比率下它也可以与物质资本进行交换。在反思自己早期在阿尔及利亚的研究时，布尔迪厄(1980c：61)说："我想要研究符号现象的经济，研究文化商品的生产与流通的特定逻辑。"他的整个研究框架的这个部分建立在下列核心观念的基础上：符号资本与经济资本是不同的——虽然在一定的条件下按照一定的比率可以转化——权力形式，遵从自己特殊的动力学。这样，他的研究规划就由符号商品的生产与消费研究、符号利润获取研究、符号资本积累研究、符号资本与其他资本或权力形式的转化模式研究等所组成。

各种资本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本章前面曾经对此进行讨论)由于符号资本的概念而变得更加复杂。符号资本是通过成功地利用其他资本而获得的(Bourdieu 1990h：122)。它意味着其他资本形式的合法化的状态，就好像其他资本在获得掩盖其物质与利益基础的符号承认的时候，就获得了特定的符号效力。这将意味着不同的资本类型(比如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在不同的社会中能够具有自己特定的符号资本形式。如果是这样，那么这将指向重叠的权力方面。有时候，符号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关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最终无法把它们分开。布尔迪厄曾经在一个场合承认："社会资本与符号资本是如此广泛地交叉重叠，以至于最终无法把它们分开。"[1]那么，在什么意义上可以真正合适地把合法化当作另外一种权力形式加以思考，这种权力形式与经济权力、文化权力一样有资格被称为"资本"吗？

有些批评家，如卡耶，在布尔迪厄的所谓符号资本是"不被承认的资本"的理论中发现了符号资本最终不过是一种伪装的经济资本形式的证据。然而，这个结论低估了布尔迪厄思想的复杂性。布尔迪厄坚持认为：赤裸裸的暴力与物质压迫对于权力的成功实施是远远不够的。

[1] 讨论在群体授权给领导和群体代表的情形下的社会资本的时候，布尔迪厄(1986a：257)在一个注释中增补说："不言而喻，社会资本完全被知识的逻辑与承认的逻辑统治着，以至于它总是发挥着符号资本的作用。"

因此强调物质资源或体力的绝对重要性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它的有效调用需要合法性的话。 所以，虽然布尔迪厄在确立资本的等级中把经济资本视作最基本的，但是他同样强调符号权力对于成功地实施政治与经济权力的必要性。

符号劳动

人类行为的功利性方面如何被转化为超功利的意识形态？ 我在第二章已经提到，布尔迪厄借鉴了韦伯的宗教领袖社会学(sociology of religious leadership)来回答这个问题。 专家从事的“宗教劳动”(religious labor)创造了对于特定群体之存在的特定社会条件的理解。 布尔迪厄(1977c：171，1980a：191)通过指出符号劳动(symbolic labor)的作用，特别是通过对于符号生产者(即知识分子)的详细阐述，在更加普遍的层面上回答了这个问题。 符号劳动的作用是把功利性的社会关系(如亲属关系、邻里关系、工作关系)转化为选择关系，或者将剥削关系转化为合法关系。 符号劳动通过把利益关系转化为超利益的意义、把权力的武断关系转化为事物的自然秩序而生产出符号权力(Bourdieu 1990h：112)。 布尔迪厄认为符号劳动与经济劳动一样，对于社会生活的再生产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这样，社会学的任务是描述

> 支配不同的资本类型转化为符号资本的转化法则，特别是掩饰(dissimulation)与转形(transfiguration)的劳动(一句话，委婉化的劳动)。 这种劳动通过使他们客观地获得的暴力变得可以被识别和可以被错误识别，因此也就是通过把权力关系转化为符号权力——这种符号权力能够生产真实的效力而又没有任何明显的能量支出——而保证了权力关系的实质性转化(Bourdieu 1991c：170)。

布尔迪厄赋予文化生产者(如艺术家、作家、教师以及记者)在通过符号的劳动生产符号资本以将社会秩序合法化方面以关键性的作用。

布尔迪厄(1971d, 1985d)认为，唯物主义的与唯心主义的文化观念都忽视了专家社团在生产符号系统方面历史地逐渐获得的相对独立作用。文化生产者通过建构文化市场——他们自己则在这个场域中投资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在文化与阶级之间、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起中介作用。

这样，布尔迪厄通过提出一种知识分子理论——这种理论强调的是构成文化生产的那种专门的符号利益——既挑战了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又挑战了关于文化生活的唯心主义的观点。布尔迪厄赋予符号专门化(symbolic specialization)的活动场所及其代表以特殊的——虽然不是绝对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体现在：它们(他们)发展了一种材料，而阶级斗争的符号方面就是从中创造出来的。他把这些活动场所概念化为“力量的社会—文化市场”(social-cultural markets of force)，在这个市场中，专家们为了争夺界定权——什么东西可以被视作合法的表达模式——而展开斗争。

总之，布尔迪厄关于实践经济的总体理论尝试从关于人类生活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分歧中再次调用总体性的实践概念，把实践理解为本质上是功利性的、但同时是被误识的资本或权力形式。实际上，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研究规划是对于各种形式的符号资本之间的政治经济进行研究。他集中关注符号的生产者，这些人专门从事符号权力的创造。但是，正如我们在本书第十一章将会看到的，布尔迪厄也把自己的社会学看作与各种符号暴力形式进行斗争的工具。

第五章

习性：关于行为的文化理论

行为是如何被规范的？这是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研究规划的一个核心问题。行为如何合乎常规的统计学模式，但又不是遵循规则、规范或有意识的意图的结果？[1]有规则的行为模式如何在时间中发生同时又不是抽象的外部结构的产物，也不是主观意图的产物？我们如何能够既解释社会行为的可观察的规律性——只有对花时间与精力进行研究的社会科学家来说这些规律性才是可见的，又解释自由的、有目的的、合理的人类行为者——他们实践地履行自己的行为而没有充分意识到结构（的存在）或有意识地对结构进行反思——的经验现实？而且，如何把实践科学地模式化，同时又不把模式的形式特征投射到绝大多数日常生活实践的非形式化的、倾向性的（dispositional）动力学中？布尔迪厄力图发现一种科学的语言来解决这个理论悖论。两个核心概念使得布尔迪厄能够完成这个任务，这就是：场域与习性。本章将分析他的习性概念，解释其各个方面的维度。第六章则讨论他的场域概念。在第六章的结尾将简述把这两个概念综合在一起的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

布尔迪厄的习性概念对于许多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来说并不陌生，虽然远远谈不上透彻理解。即使在那些熟悉布尔迪厄著作的人中，相当多的不同意见恰恰存在于这样一个问题，即布尔迪厄的这个概念到底代表什么。[2]问

---

[1] 布尔迪厄(1990c：65)声称："可以说，所有我的思考都开始于这一点：我们的行为如何被规范又不是遵从规则的产物？"

[2] 这个观察不仅来自现在可以通过二手材料获得的大量解释与批评，而且来自对于一些"布尔迪厄专家"在一次研究布尔迪厄的会议(芝加哥社会心理研究中心，1989 年 3 月 31 日—4 月 2 日)上对这个概念的讨论的观察。

题的一部分是，这个概念载负了太多的理论内涵，以至于有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批评家(DiMaggio 1979：1464)把它描述为“布尔迪厄借以把客观的结构与个体的活动联系起来的理论万金油”。问题的另外一部分，正如布尔迪厄与华康德(1992)抱怨的，是许多批评者通过无意之中把主观/客观的二元对立的变体投射到布尔迪厄用以超越这个二元对立的概念，而系统地误读了布尔迪厄的理论意图。本章将辨析行为与结构的关系——习性的概念要研究的正是这个关系——的核心方面，我将简要地概述一些对于这个概念的发生发展具有塑造作用的知识影响，以及布尔迪厄对于这个概念的几种使用方法，我也将指出这个概念所导致的一些紧张、困难以及矛盾。

个体与社会的二元论

我们可以把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看作对西方知识传统中的一个老问题——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的探索思考，但是，布尔迪厄把自己的研究看作是对这个古典的二元对立的超越。布尔迪厄依赖的是传统社会学中的一个基本见解：社会现实既存在于个体之内、也存在于个体之外，既存在于心理中、也存在于事物中。布尔迪厄强调，在社会学研究中必须坚持社会现实的这种两重性。他对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进行的无情攻击，正是维护这个基本见解的努力。实际上，习性概念的目的在于表明：“社会化的实体（人们称为个体或个人）并非位于社会的对立面，它实际上是社会的存在形式之一。”(Bourdieu 1980 c：29)布尔迪厄的概念框架并不把个体与社会看作对立、分离、相互外在的存在类型，个体与社会是同一社会现实的两个方面，应该“相互关联地”得到建构。

习性强调的是个体的主体性与社会的客观性相互渗透的现实。在这方面，他与卢克曼与伯格(Luckman and Berger 1966)等社会建构理论

家相似。[1]像卢克曼与伯格一样，他对于行动者与结构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建筑在一个核心观念上：认为客观结构具有主观的结果，这与社会世界是由社会行动者组成的观点并不矛盾。

布尔迪厄尖锐地批判当代西方思想界延续的个体/社会的古典二元对立的机构化形式，这个二元对立的一半（即个体）被心理学（它经常垄断了对个体的研究）占据，另外一半（社会）则被经济学、政治学以及社会学（它们倾向于关注超越个体的结构）占据。在社会学中，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重新出现了对微观结构与过程的活跃的研究。赫伯特·H·布卢默（H·Blumer 1969）、阿隆·V·奇科里尔（Aaron V. Cicourel 1973）、哈罗德·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 1967）、埃尔温·戈夫曼（Erving Goffman 1967，1969，1971，1974，1981）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已经产生出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被笼统地归入符号互动理论与人种学方法论。近年来，重新产生的对于理性—行动者模式的兴趣也出现于雷蒙·布东（Boudon 1979），詹姆斯·S·科尔曼（Coleman 1990），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 1979，1985）这些前沿的理论家中，但是，在社会学的专业科学中，这些关注个体决策与互动的各个方面的微观研究，常常脱离先前的更加宏观的研究方法。[2]

对于布尔迪厄来说，这个问题已经不只是通过人为建构的学术知识边界使得人类经验的统一性变得支离破碎的问题，它同时是一个政治问题。布尔迪厄把个体/社会的二元论看作那种玷污科学事业的政治结果的携带者。这个二元对立把“个人主义的捍卫者（‘方法论个人主

[1] 伯格与卢克曼通过一个持续的辩证过程把个体与社会世界联系起来，这个辩证过程由三个同时发生的步骤组成：内在化、外在化以及客观化。虽然布尔迪厄在理论上并没有区别这三个步骤，但是他的确把自己的实践理论书写为“关于外在性的内在化与内在性的外在化的辩证的经验科学”（Bourdieu 1977c：72）。在《再生产》一书中，他把习性描述为“结构的产物，实践的生产者，结构的再生产者”。

[2] 这一学科的分叉已经引起专业方面与知识方面的关注。从专业方面说，所谓的微观—宏观的问题是作为1989年美国社会学学会的年会的一个统一主题；从知识角度说，这个主题在专业文献中产生了大量文章。参见 Alexander et al. 1987，Collins 1981b。

义’）与捍卫‘社会’的人（他们被称为‘极权主义者’）对立起来”（Honneth，Kocyba，Schwibs 1986：48）。换言之，布尔迪厄相信这个二元对立把根本的政治对抗——这种对抗把那些偏爱市场定向的公共政治的人与那些福利国家的倡导者对立起来——转译为虚假的科学语言。这个观点反映了布尔迪厄维护社会科学独立于所有科学外的影响的自主性渴望，但是它也表明了布尔迪厄自己的立场的模糊性。在法国，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二元对立被雷蒙·布东所采用，而他倡导“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他也把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风格以及他对于左派政治的支持定位于二元对立的“社会”方面。这样，布尔迪厄发现自己正好陷于他希望超越的自相矛盾中。

作为策略的行为

布尔迪厄不仅通过反对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来发展他的实践理论（如同我们在前面的章节已经看到的），而且也反对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在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中，社会科学家发展出深层结构规则的形式模式，并认为这种规则规约着亲属关系、社会仪式以及神话。[1]布尔迪厄采用“策略”的概念，通过强调结构主义框架中能动性的重要性使自己区别于僵化的结构主义决定论模式。

布尔迪厄是在应对人类学家所熟悉的田野调查的方法时首先采用这个理论语言的。他在研究阿尔及利亚的农民时，发现那里的农民的社会团结不是建立在编成法典的规则上，而是建立在情感与荣誉上。他解释说，在卡比尔人社会中，“社会规范存在于每个个体的意识中，而

[1] 在美国的结构—功能主义传统中，模式限定了一套规则以便在应对特定规范时起作用。

不是被看作是一种难以达到的理想或强制性的命令”。分歧与争执不是在法庭上得到裁决，而是通过“荣誉感或正义感加以解决，这种荣誉或正义感依据每个具体的案例而不是一种理性的和形式化的司法作出判决与惩罚”（Bourdieu 1965：22）。

虽然缺乏充分的证据证明规范行为的那些形式化的法规，但人类学家常常还是把行为阐释为好像是受规范或规则支配的；而布尔迪厄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却相当不同。他认为，行为的模式必须把时间作为一个基本因素包含进来。他主张：“为了把实践的真理归还给实践，我们必须把时间重新引入实践的理论表述中，后者是临时建构的，是通过其速率（tempo）内在地得到界定的。”（Bourdieu 1977 c：8）

在批判性地重审莫斯（Mauss 1967）与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 1969，1973）的经典性的礼物交换理论的时候，布尔迪厄认为对于礼物交换的恰当的理论化必须超越礼物的给予与接受是受互惠的形式化原则——在这种互惠原则中，礼物自动地要求回报——支配的观点，相反，礼物的给予与接受包含对礼物给予的速率的控制，以便回报的礼物不仅是不同的，而且是推迟的（deferred）。这样，行动者不是作为互惠原则的有意识的甚或无意的遵奉者，而是作为通过时间作出回应的策略者，参与礼物交换的社会互动。因而，行为是策略性的而不是对于规则或规范的遵从，因为，正如“行动者”这个标签暗示的，行动者在其日常实践中尝试沿着制约与机会的曲径运动，而这个曲径是他们通过过去的经验并在时间中不完全地把握到的。[1]布尔迪厄写道：“用‘策略’取代‘规则’，也就是重新引入时间，相应地引入时间的节奏、时间的定向、时间的不可逆性。”（1977c：9）相反，“科学有一种与实践时间不同的时间”。只有社会科学家，他们带着旁观者的视角以及要

[1] 这里似乎使用了与游戏的类比，布尔迪厄（1987b：80—81）的确依赖与游戏的类比，特别是在他的后期著作中。

在人类实践的差异性中发现模式化规律的知识分子习性，才会发现送礼—回礼的这种宏观结构。[1]这样，布尔迪厄把策略的语言注入了结构主义的模式，以作为引入能动性、区别日常生活的实践与它的形式化模式的方法。

如果策略概念要表明的是这样的观念：最好不要把行为理解为对于规则的被动屈从，那么，策略依然包含规范情境中的行为（Bourdieu 1977c：8）。布尔迪厄并不认为策略概念意味着特定的行为类型多少外在于规范的制约。相反，这个概念意在表示，即使在规范的情境中，行为也包含了不确定性，而且通过时间而发生的行为，使得行为的结果对于参与的行动者而言很少是清晰明白的。即使是最仪式化的行为方式，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允许策略的存在，因为行动者总是可以即兴表演（Bourdieu 1977c：9，15，106）。行动者是否遵循规范或遵循规定的仪式，取决于他们的利益。正如在前面章节指出的，布尔迪厄把所有的行为都看作是利益定向的。[2]

布尔迪厄关于策略的语言使得他的有些批评家误解了他（比如卡耶1981，1992）。他们把它视作正好是布尔迪厄所反对的实用主义定向的一个指示器。实际上，布尔迪厄用策略这个词不是指有意识的选择，或理性的计算（1987b：76，78，127）。卡比尔人使用策略不是基于有意识的理性计算，而是基于一种“荣誉感”，这种荣誉感指导着复杂的挑战、回应、拖延、侵略、报复、藐视等策略。荣誉感来源于通过实用的方式把特定情境中适当的或可能的东西加以内在化的一系列倾向。选择因而不是来自选择发生其中的客观情境，也不是来自超越的、控制

[1] 这样，布尔迪厄与古尔德纳（Gouldner 1973b）对于互惠性规范的结构—功能主义解释分道扬镳了。对于布尔迪厄来说，行动者采取策略通过礼物交换来强化其利益。社会科学家所观察到的规律性的整个模式是一种非有意的结果而不是对于潜在规范或法则的遵循。

[2] 对于布尔迪厄而言，这个理论的转化已经导致的结果，是把亲属关系当作策略而不是规范加以研究。他用“婚姻策略”的概念取代“亲属关系规则”的概念（Bourdieu 1990c：9，1990i：i），把注意力从只关注谱系学转向把更多的材料包括进来，比如年龄以及各种类型的财富差异。

社会生活的规则、规范、模式或强制，相反，它们来自带有模糊性与不确定性——而这种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则产生于在时间与空间进行的行动——的实践倾向（practical disposition）。[1]布尔迪厄用“实践知识”、“实践感”来描述行动的这种本质上非形式化的、实践的维度，它在结构主义的解释中是缺失的。行动者不是规则或规范的机械遵循者，而是“即席演奏家”（improviser），他们对于不同的环境所提供的机会与制约倾向性地作出反映。

习性概念的发展

这样，行动者是实践性的策略家这个观点通过习性概念与社会结构联系起来了。[2]布尔迪厄早期（1966）对于习性的界定是

> 持续的、可以转换的倾向系统，它把过去的经验综合起来，每时每刻都作为知觉、欣赏、行为的母体发挥作用，依靠对于各种框架的类比性的转换（这种转换能够解决相似地形成的问题），习性使千差万别的任务的完成成为可能（Bourdieu 1971c：83）。[3]

稍后（1980），更经常性地使用的“习性”定义是：

> 可持续的、可转换的倾向系统，倾向于使被结构的结构

[1] 这就把布尔迪厄对这个术语的使用区别于克罗齐耶对这个术语的使用（Crozier and Friedberg 1977）。他们说的策略似乎具体体现于情境所提供的机会与制约内部，而布尔迪厄同时强调过去的社会化的作用。

[2] 关于习性概念的最深入的讨论见布尔迪厄 1977c，第二与第四章，以及 Bourdieu 1990h：52—65。

[3] 在《1960 年的阿尔及利亚》（1979：vii）中，布尔迪厄把习性界定为“一种可持续、可转化的倾向系统，它作为结构化的、客观地统一的实践的发生基础而发挥作用”。

> (structured structures) 发挥具有结构能力的结构 (structuring structures) 的功能，也就是说，发挥产生与组织实践与表述的原理的作用，这些实践与表述在客观上能够与其结果相适应，但同时又不以有意识的目标谋划为前提，也不以掌握达到这些目标所必须的操作手段为前提(Bourdieu 1990h:53)。

布尔迪厄还使用“文化无意识” (cultural unconscious)、“塑造习惯的力量” (habit-forming force)、“心理习性” (mental habit)、“知觉、欣赏、行为的心理构架与操作构架”等术语来表述习性概念。[1]这个概念的范围逐渐变得越来越大，以表示行为的身体基础与认识基础，强调创造性的、但同时又是习惯性的行为方式。但是，(所有这些界定的)核心含义是一致的：一套深刻地内在化的、导致行为产生的主导倾向。它们指向一种实践的而不是话语的、前反思的而不是有意识的、身体化的同时是认识的、再生产的但又是创新的行为的理论。这种行为是特定的社会条件的结果，但同又可以转用到其他条件（意即产生于特定的社会条件但又可以在其他的社会条件中适用。——译者按）。

我在第二章中指出，布尔迪厄在卡比尔人中作的田野调查给他提出了个体行为与社会结构的关系问题。但是，习性概念的产生还与他处于20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法国知识圈时采用的知识策略有关。[2]布尔迪厄首先是在对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以及法国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的批评（这些结构主义者把行为仅仅视作结构的简单反映)中发展出习性概念与实践理论。[3]他的主要关切是引入能动性的观

---

[1] 虽然在最近的访谈中，布尔迪厄 (Bourdieu and Wacquant 1989) 清楚地把自己的行为概念以及自己对行为的理解区别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传统，但是在其早期的论文《一种艺术的方法》(Bourdieu, Boltanski et al. 1965: 23) 中，布尔迪厄曾经用“结构化的实践”来指称习性。

[2] 涂尔干与莫斯 (Bourdieu)都使用过习性的概念，虽然他们都没有系统地应用它，也没有把它提高到布尔迪厄所设想的解释高度(Bourdieu 1980c: 134)。

[3] 布尔迪厄(1992: 120—121)回忆往事的时候说，习性原先是计划用来反对所有关于行为的唯智主义的观点，特别是理性化的经济最大化模式以及实证主义的唯物主义模式。

念，但又不求助于萨特存在主义的唯意志论(Bourdieu 1987b：19)。

潘诺夫斯基(Panofsky)的开创性研究则为布尔迪厄的习性概念提供了关键的帮助。在60年代中期，布尔迪厄阅读与翻译了潘诺夫斯基的《哥特式建筑与经院主义》，此书是关于经院主义对建筑的影响的研究，它帮助布尔迪厄形成了对于习性概念的最早理论表达。在他翻译的潘氏著作法文版的前言(Bourdieu 1967a)中，我们发现布尔迪厄最早使用这个术语。布尔迪厄从潘氏的以下见解出发建筑自己的理论：经院主义代表一套隐在的文化假设以及外在的理论立场，这些心照不宣的“心理习惯”(mental habits)不只是由机构、实践以及社会关系转化而来，而且也发挥“塑造习性的力量”的作用——这种塑造习性的力量生产出思想与行为的框架。他借鉴了潘氏的“心理习惯”、“塑造习惯的力量”等概念，发展出这样的观点：习性是一种促使行为产生的、“具有结构能力的结构”(structuring structure)。早期的习性理论强调的是思想的模式或方式，或行为的认识能力。[1]正是潘氏的影响使布尔迪厄把学校当作文化的知识习性在其中得到发展的机构化语境加以思考。

早期对于习性的理论表述还带有法国结构主义的印记，因为布尔迪厄常常使用语言学的类比来表达这个概念。他借用索绪尔(Saussure 1974)的语言与言语的区别来说明：对于行为而言，习性是一种深刻地结构化了的文化语法。同时，他从习性的概念出发发展出一种与乔姆斯基(Chomsky 1965)的“发生语法”的概念相类似的“发生结构主义”(Bourdieu 1977c：22—30，1985b：13，1987b：19—24，1990h：30—41)。就像语法组织言语一样，习性的结构可以促生大量可能的实践。有时，布尔迪厄比较强调习性的这种主动性与创新能力。在分析前资本主义的阿尔及利亚农民以及他们与法国殖民主义强加的侵蚀性的金融

[1] 我们在1968年版的《社会学的工艺》(Bourdieu，Chamboredon，Passeron 1991)中发现了这种对于认识方面的强调，在这本书中，布尔迪厄谈到了为社会科学研究培育一种探索习性。

经济相遭遇的情况时，布尔迪厄(1979：4)强调农民的反应不是“纯粹机械性地、消极被动地被迫适应”新经济体系，相反，他们通过“创造性的再发明”来回应新的经济理性要求与他们的传统习惯之间的不谐调。

但是，与乔姆斯基的发生语法不同的是，习性的创新能力不是来自“普遍的心理”(universal mind)，而是来自“一种经验以及一种拥有(possession)与一种资本”(Bourdieu 1985b：13)。习性不是什么天生的能力，比如列维－斯特劳斯提出的大脑生理活动或乔姆斯基的心理主义的观点。它是“一种被结构的结构”，它来自家庭以及与自己相当的群体的、具有阶级特殊性的社会化经验(class-specific experiences of socialization)。

随着时间的推移，布尔迪厄的习性概念从对规范与认知方面的强调，转向了对于行为的倾向方面与实践方面的理解(Bourdieu 1980c：133)。着重点的这种转变——转向人类行为的倾向性与实践性特点，可以从术语的变化看出来。早期的术语“伦理”(ethic)让位于(时代社会民族等的)“精神气质”(ethos)，而“精神气质”又被“习性”概念吸收。较新的术语“倾向”暗示从语言学的类比向以社会化与身体语言为核心的观点的转变。

“倾向”是布尔迪厄的核心概念，因为它包含布尔迪厄通过习性观念所要表达的两个核心要素：结构与性格倾向。[1]习性来自早期的社会化经验，外在的结构在这种经验中被内化。结果，对于一个生活于分层社会世界中的特定群体而言，可能之物与不可能之物的参数与边界的内化了的倾向，就通过社会化而得到了发展。这样，习性一方面为行为设立了限制；另一方面，习性也发生出与早期社会化的结构特征对应

[1] 布尔迪厄(1977c：214)说，“倾向这个词看起来特别适合表达习性这个概念传达的东西——习性被界定为倾向系统。它首先表达的含义是一种组织化行为的结果，与结构意义接近；它也指一种存在方式，一种习惯性的状态(尤其是身体的状态)，特别是一种嗜好、爱好、秉性、倾向。”

的知觉、灵感以及实践。“被结构的结构”和“具有结构能力的结构”分别解释了习性的这两个核心的方面。下面，我将对习性的这两个方面进行更深入的考察。

“被结构的结构”和“具有结构能力的结构”

习性常常塑造个体行为。这样，现存的机会结构就得到了永久化。成功与失败的机会被内在化并转化为个人的志向或期望，它们反过来又在倾向于再生产生活机会的客观结构的行为中外在化。布尔迪厄理解这个过程时依据的是

> 循环的关系系统，这种循环关系把结构与实践整合起来，客观的结构倾向于生产结构化的主观倾向，而这种主观倾向又反过来倾向于再生产客观的结构(Bourdieu and Passeron 1977：203)。

这样，布尔迪厄观察到：个体和群体的灵感与实践，常常对应于其各自习性的型构条件(formative conditions)。行动者对人们在社会世界中的位置的“合理的”或“不合理的”判断来自习性。习性倾向于再生产与生产习性的条件相适应的行为、知觉以及态度。它是“转化为德行的必然性”(Bourdieu 1977c：77，95)。

在解释不平等的社会组织安排为什么对于统治者与被统治都显得可以理解的时候，布尔迪厄用习性概念强调社会化的以阶级为基础的特征。习性主要来自客观机会的无意识内化的结果——特别是在早期的儿童阶段，这种机会对同一阶级或社会地位的成员来说是相同的。与阶级亚文化的概念十分相似，习性导致一种特定的（人际）结合，这种组合受到早期经验的支配，而这种早期经验对于同一阶级的成员来说在统计学意义上是一样的(Bourdieu 1977c：79)。但是，习性是阶级处境的

产物，却不是它的原因。如果法国工人阶级中的青年人在教育迅速扩展的20世纪60年代好像并不期望能够接受高等教育——而且在布尔迪厄看来他们的确不曾这样期望，那是因为他们已经把有限的、原先为他们在学校教育中的成功而存在的机会内化了，并甘心于这样的有限机会。

习性因而是一种深层的结构性的文化母体（deep-structuring cultural matrix），它根据不同的阶级机会产生自我实现的预言能力。布尔迪厄对于不平等的教育机会的“文化的”解释不同于责备牺牲者的那种所谓贫困的文化观——这种文化观强调个体对于有限机会的适应而不是反常行为的文化根源。它表明阶级的结构劣势如何能够被内化为相对持久的倾向，这种倾向则能够通过社会化而在代际之间传递并产生自我挫败的行为（self-defeating action）。这就解决了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关于贫困的起源与持久循环的论争。

习性概念召唤我们把行为看作是由基本倾向产生的并受到基本倾向的制约，这种基本倾向首先通过早期的社会化而得以内化。布尔迪厄谈到了基本的社会存在条件如何被内化或“吸纳”为倾向。[1]所谓“基本的社会存在条件”是指这样的一些条件，它们从物质上、社会上、文化上决定了对于特定社会群体而言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它类似于韦伯的“生活机会”概念（life chances）。这些“客观的结构”内化为相应的倾向，正是这些倾向引导群体成员把它们经验为对自己的同类而言合理的或不合理的、可能的或不可能的、自然的或不可思议的。习性就是

> 内在化的、转化为倾向的必然性……它是由必然性构成的德性，它通过实施对应于产生它的条件的“选择”行为而把必然性转化为德性。（Bourdieu 1984a：170）

[1] 布尔迪厄提到了初级社会化中几个决定性的因素，比如“性别之间的劳动分工、家庭的目标、消费模式、父母—儿女关系”（1990h：54）。但是却没有提供对于他认为最重要的因素的详细分析。

习性通过引导个体“不假思索地服从秩序”而把“必然性”转化为“德性”（Bourdieu 1990h：54），通过提供对于存在的基本条件的实践性的、不假思索地接受的东西而把经济与社会的不平等合法化。[1]

布尔迪厄强调习性的集体基础，强调那些把相似的生活机会内化的个体享有相同的习性。他虽然承认生物性个体的社会化经验的独特性，但是他认为“‘个人风格’……不过是相对于时代的或阶级的风格的偏离，所以，它不仅通过一致性而且通过差异性回过头来与共同风格相关联”（Bourdieu 1977c：86）。对于布尔迪厄来说，集体的参照是极为重要的。习性提供了“没有指挥的合奏”图像，以强调无须有意识合作的“实践的规律性、同一性与整体性”（Bourdieu 1990h：59）。布尔迪厄写道：“相同社会群体的成员的实践——在分化的社会中则是相同的阶级——总是具有超出行动者所知或所愿的和谐性。

习性的倾向（the dispositions of habitus）代表一种非形式化的、实践性的知识，而不是推论的（discursive）或意识层次的知识形式。对于生活机会的这种实践性评价与非形式化的把握，是无意识发生的。布尔迪厄（1984a：466）写道：

> 习性的框架、分类的初级形式的特殊效力来源于这样的事实：它们在意识与语言的水平之下发挥功能，同时也超越了意志控制所能及的范围。

布尔迪厄强调的习性的方面之一，是志向和期望对于他所说的“可能之物的因果性”（causality of the probable）的适应。习性使志向依据客观可能性作出调节，它是一种“实践的”而不是有意识的调节。

---

[1] 女权主义者麦考尔（McCall 1992：848）在对布尔迪厄的深刻批评中指出：因为妇女在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中被要求在“男性的/公共的付酬的工作世界”与“女性的/个人的人口再生产世界”进行调节，她们不能经验到布尔迪厄的概念所假定的倾向与位置之间的不假思索的“适应”。

在布尔迪厄看来：

> 如果我们有规律地观察到科学地建构的客观的可能性与主观志向之间的适应，……这不是因为行动者有意识地使自己的志向适应对自己的成功机会的准确评价。

习性通过初级的社会化产生于

> 对于给定情境中的给定行为的成功可能性的实践性评价。这种给定情境中的给定行为使所有的智慧、格言、共识（“这不是给我们这样的人准备的”）积极地起作用（Bourdieu 1977c：77，重点号引者加）。

习性的倾向使行动者偏向于选择依据他们的资源与过去经验最可能成功的行为方式。习性依据预期的结果指定行为的方向。遗憾的是，布尔迪厄没有充分阐明内化过程如何被激活为外化过程。我们对实际起作用的激活机制所知甚少，也不知道是否某些的内化类型比别的更容易得到外化。

布尔迪厄强调早期社会化的分层方面（stratifying dimension）。习性传达着一种在分层的社会世界中的恰当感与不恰当感。布尔迪厄（1984a：471）说：

> 客观的限制变成了一种限制感，一种通过对于客观限制的经验而获得的对于客观限制的实践的参与，一种“恰在其位”的感觉，这种感觉引导人们把自己主动排除于与自己无缘的商品、人物以及地方等。

习性的这个社会的、分化的方面

> 可以在倾向的形式中看到，倾向是社会地位的标识，因此也是客观地位之间的社会距离的标识……相应地，它也是这个距离的提醒者，它提醒你应该作出什么样的行为，以便“保持距离”或者策略性地把握距离——无论是象征地把握还是实践地把握，以便缩小距离（统治者比被统治者更加容易做到这一点）、增加距离，或者只是保持距离（通过“不任性”、“不任其自然”等，总之，“不卑不亢”；或者从另一方面说，拒绝“满不在乎”与“自我标榜”，简言之，“知道自己的位置”并呆在应该呆的地方）（Bourdieu 1977c：82）。

这就把权力与其合法性的问题置于习性的功能与结构的核心。因为习性包含了个体在处于分层社会秩序中的特定位置时对于什么可能、什么不可能的无意识的“计算”。“与可能之物的关系就是与权力的关系”——布尔迪厄（1990h：4）如是说。

“必然性的德性”（virtue-of-necessity），这个习性的动力学强调不是所有的社会世界都平等地向每个人开放，也不是所有的行为路线对于每个人都具有平等的可能性；只有其中的某些是似乎可能的，其他则是不可思议的。布尔迪厄解释说：

> 行动者依据关于什么是可以得到的、什么是不可以的、什么是“我们的”、什么不是我们的等具体的索引来形成自己的志向，这个区别就像神圣的与世俗的区别一样基本，一样被根本地加以承认（1990h：64；重点号引者加）。

在布尔迪厄的习性概念下面可以看到涂尔干的神圣/世俗的二元对立，它对于布尔迪厄在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之间划定能动性的范围具有根本的意义。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发现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逻辑对布尔迪厄思想的影响。这使得布尔迪厄对习性的判断尽管不乏洞见，却由

于没能穷尽社会化经验的全部内容而过于绝对化。或许还存在一些灰色的领域，在这些地方，生活机会的不确定性也被内在化了，因而基本上不符合布尔迪厄习性概念所假设的二元对立的边界。

布尔迪厄认为，习性是非常抵制变化的，因为原初的社会化比之于后来的社会化经验更具有型构内在倾向的力量。在习性遭遇新的境遇时，固然有一个持续的适应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常常是非常缓慢的、倾向于完善而不是改变初始的倾向。[1]

而且某些类型的阶级习性显得比其他习性更加持久不变一些。在布尔迪厄的分析中，法国工人阶级的习性比中产阶级的习性更加不能适应后继的社会化的形式。法国的下层中产阶级家庭似乎比工人阶级家庭更有可能利用战后期间扩大教育的机会。这样，初始的社会化与后继的社会化之间的关系似乎因阶级而不同，虽然布尔迪厄在这点上并没有提供清晰的说明。

布尔迪厄对于行为的倾向性特征的阐述越来越强调其“身体化”的形式（“embodied” form）。客观结构的内化过程不仅是心理的过程，而且是身体的过程。对于一个阶级来讲，相同的成功或失败的机会，是在身体形式方面与认知倾向方面都是“浑然一体”的。它们通过身体的形式与风格（即姿势与步态）、也通过话语表达的形式表现出来。布尔迪厄（1985b：13）在亚里士多德的“hexis”观念——“身体化的、准姿势的倾向”（incorporated and quasi-postural disposition），后来“被经院主义转化为习性”——中，为他自己的习性概念找到了灵感来源。[2]布尔迪厄的一些早期的分析把文化倾向的身体化看作是习性的多少有点独立的方面。在他的《独身与农民的状况》（Célibat et condi-

[1] 布尔迪厄谈到“防御性的策略”，把它当作习性为了在那些与原初倾向相一致的领域活动而选择的一种方式。

[2] 但是，对于习性这个术语的原始意义存在一些争论。布东（Boudon 1986：309），这位布尔迪厄的尖锐的批评者声称：这个词的古典意义根本不是布尔迪厄所理解的那样。但是正如在前面指出的，布尔迪厄对概念的发展与应用而不是学院化的注释更感兴趣。对于布尔迪厄来说，这个概念带有大量含义，参见 Héran 1987；Rist 1984 关于习性概念的谱系学的讨论。

tion paysanne)（1962b)一文中，这个概念被用以辨认法国乡村农民的身体举止与他们对于自己的身体行为的态度与知觉之间的紧密关系。习性的身体方面与认知方面是既独立而又相关的。但是，不管是心理倾向还是生理倾向，都是完整地相关连的。习性的原则既是逻辑的又是价值论的，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正如后来对于习性概念的阐述所强调的那样。[1]

在《充满争论的社会学》(*Sociology in Question*)(1993d：86)中，布尔迪厄认为，“习性的原理既是逻辑的又是价值的，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两者不可分离。”习性的倾向代表行为方式的主导模式，这个主导模式贯穿人类行为的认知、规范与身体的方面。它们存在于语言、非词语的交往、趣味以及价值、知觉、推理模式等方面。

> 正是一种普遍的、可以转化的倾向，超越了直接习得的东西，把内在于学习过程的必然性加以系统、普遍的应用(Bourdieu 1984a：170)。

习性有能力通过相似的转换把自己基本的“发生框架”普遍化到所有的生活领域(Bourdieu 1990h：94)。布尔迪厄(1989c：387)提出了与书法的类比，书法体现了“风格的近似性”，尽管尝试的形式与使用的材料可能不同。习性的这个关键特征使得布尔迪厄能够辨认像家庭计划、衣着、运动的选择、饮食方式等如此不同的领域中的行为的类似风格。布尔迪厄说：

> 婚姻策略不能与继承策略、人口生殖策略以及教育策略等相分离，换言之，不能与一整套生物的、文化的、社会的再生产策略相

[1] 值得指出的是，hexis这个术语在《实践理论大纲》(1977c)中比在后来的《实践的逻辑》(1990h)中显得更加突出。

> 分离，每个群体都履行这套策略以便把世代继承的权力与特权传递给下一代(Bourdieu 1990h：160—161)。

在《区隔》(1984a)一书中，布尔迪厄探讨了习性如何对从审美趣味到生活方式的广大领域的阶级差异作出解释。在法国社会为了社会区隔而进行的斗争中，我们发现了与四种不同的阶级习性联系在一起的趣味与生活方式：知识分子的禁欲审美主义、中产阶级的矫饰、上层阶级的炫耀卖弄、工人阶级的朴实。布尔迪厄通过一系列生活方式方面的指标来追踪这四种倾向的表现。在第七章，我们将更加充分地讨论这些阶级习性。

布尔迪厄还通过习性的概念进行了从微观研究向宏观研究的引人入胜的转化，同时通过这个概念打通极为不同的人类活动领域。它的原创性在于暗示在不同的行为类型（身体的、认知的、道德的、情绪的等）下面可能存在潜在的联系或共同的印记。习性的作用范围很广："从最自发的动作、最微不足道的身体技巧"，到最抽象的理论分析(Bourdieu 1984a:466)。然而，这种引人入胜的理论上的通用性恰恰有时导致了这个概念的模糊性。

这个概念或许有点过于无所不包，以至于无法回答某些重要的研究难题。布尔迪厄反对在行为的认知、道德与身体方面进行区分。他的理想是辨认穿透所有这些方面的、代表深层结构的潜在把握模式(underlying master pattern)。但是，为了特定的研究目的，研究者感兴趣的恰恰是精确地理解这些方面中的哪一个方面是更具决定性的。说工人阶级青年因为害怕失败而不进入法国大学是一回事情，而说接受高等教育不属于他们的世界观或阶级文化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在前一种情况下，这些青年可能高度向往高等教育，但是预期自己会失败而放弃；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或许根本没有上大学的欲望、因此也没有这种期待。当布尔迪厄把习性理解为对存在的基本状况的实践性适应时，评价与期待在布尔迪厄那里是重合的，它们似乎并不内化为分离独

立的、可以区分的方面，因为布尔迪厄强调的是所有实践的共同的潜在一致性，它们来源于潜在的主导倾向。阶级的价值与阶级的期待确实经常一致，但不是总是一致。因此，对它们加以区别有时是重要的。[1]

布尔迪厄把内在化——经由外在机会结构的社会化——视作是显而易见的、不成问题的过程。依据定义，习性可靠地反映它最初从中形成的客观条件。习性

> 作为后天获得的发生性的构架体系，客观上适应着它从中得到建构的特定条件。……它产生所有与这些条件而不是别的条件相一致的思想、知觉、行为（Bourdieu 1977c：95。重点号引者加）。

如果个体或群体拥有不同于其初始社会化的客观条件所许可的志向，那么，这可能源自习性对于新的结构性条件的后继的适应，而不是因为习性的早期型构的不充分。布尔迪厄倾向于假设客观机会的内在化过程是完美顺利地发生的，但是我们缺少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个过程实际上是通过和谐一致的方式发生的。难道错误的计算与歪曲不是经常发生在早期的社会化经验中么？从认知心理学到统计研究，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表明这样的假设是有问题的。个体与群体经常误解与其同等的人的情感、思想与行为(O' Gorman 1986)。[2]

---

[1] 由卡尔(Kahl 1953)与奥布(Ogbu 1978，1990)所提供的关于机会感的不同分析视角中，可以发现这种区别。卡尔认为工人阶级价值与世界观限制了他们利用高等教育机会的眼光，而奥布则主张，下层人特别是黑人不热心追求高等学校的基础是出于他们对有限的成功机会的计算。

[2] 由于我辨别了布尔迪厄努力把个体的主观性和社会的客观性相联系的学术关切与伯格、卢克曼的社会建构研究方法之间的相似性，因此在这里指出其重要的区别或许是必要的。伯格与卢克曼把初级社会化的成功程度看作是成问题的，并把它联系于劳动分工与知识的分配：客观现实的内在化在具有更加复杂的不平等结构的社会中可能是更成功的。(Berger and Luckman 1966：164)。布尔迪厄同样对习性与劳动分工之间的相似关系进行理论化，但是却并没有对"反常的习性"(deviant habitus)的可能性进行理论阐述。另一方面，布尔迪厄对于习性概念的使用比之于伯格与卢克曼更加关注具有阶级特殊性的社会化现实。

布尔迪厄经常写到好像在希望与机会之间存在准确无误的相关性，虽然在别的时候他又承认它们永远不会是完全同步发生的。针对那些指责他过分机械地使用习性这个概念、告诫他把主观希望与客观机会的相关性普遍化将只会再生产社会结构的批评家，布尔迪厄为其对这个概念的灵活应用进行辩护(Bourdieu 1990h：63)。但是，如果布尔迪厄的理论意图是好的，那么，他写下的书面的理论表述有时却不能精确地传达他的主观希望。布尔迪厄的早期的著作写道：

> 如果下层中产阶级的与工人阶级的成员把现实看作其希望的对等物，这是因为，在这里，就像在别的地方一样，志向与要求是通过客观条件在形式与内容上得到界定的，这一条件排除了希望获得不能获得的东西的可能性(Bourdieu 1974c：33)。

志向与期望之间的系统区别将有助于进一步在理论上完善布尔迪厄的框架，同时，在研究中，也比较容易进行操作。习性是否首先涉及期望？或者它同时也包括志向？[1]布尔迪厄是在可以互换的意义上使用志向与期望这两个术语的。

如果说布尔迪厄的习性概念有助于描述这样的情境：期望适应客观的可能性，因而被统治阶级实际上参与了他们的被统治状况，那么，它也忽视了对于客观可能性的错误计算，这种错误计算也是群体与个体志向的一个共同特征。布尔迪厄没有充分关注志向与期望、期望与机会不能同步发生这种状况的范围到底多大。大量的例子表明，设想希望、计划、机会三者携手共进这样的过程是成问题的。20 世纪 60 年代，一部分美国黑人过于渴望获得高级职业——尽管存在的众多证据证明他们的职业机会仍然是有限的——正好提供了希望与机会发生错位的

[1] 当布尔迪厄(1984a)写到“必然性所塑造的德性”以表明期望是紧密地联系于客观可能性的时候，他似乎是在描述期望而不是志向。

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Hout and Garnier 1979；MacLeod 1995)。 如果布尔迪厄关于阶级关系的资本投资与资本转化策略的视角富有洞察力地阐明了上层阶级与中产阶级群体身份差异的动力学，那么习性的再生产方面则不能对个体对于外在现实的知觉的复杂性与模糊性给予同样深刻的阐述。 习性的概念无法把握对于不同的群体来说的希望、计划、机会之间变化不定的不一致性。

布尔迪厄实际上在讨论文凭的膨胀问题时，曾经涉及志向与机会之间的错位问题(1984a：143—168)。 他发现了由于扩展教育而没有相应地扩展劳动市场上的就业需求而造成的“志向与真实的可能性之间的结构性错位”。 这种结构性错位是“反机构的心理倾向” (anti-institutional cast of mind) 的来源，后者转化为工人的不满与青年反文化的形式。 他还谈到了“集体幻灭”，他说：它“在不寻常的斗争、反抗与逃避形式中找到了自己的表达”(144)，但是，他的分析没有论及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不满会采取这种形式而不是那种形式的条件。 而且，他还论证产生于“受挫的期待” 的“竞争的”斗争形式通过“结构的移置”与社会秩序的再生产相协调，从而继续重复他的为人熟知的再生产主题(164—165)。

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在志向与变化着的机会之间也可能发生一种结构性的迟延或“滞后效应”(Bourdieu 1977c：78—79)。[1]习性意味着行动者专心于现在，并依据以前的经验参与未来。[2]“滞后效应” 这个术语被布尔迪厄用于解释为什么阿尔及利亚农民没有迅速使自己的时间观与劳动观去适应新的经济理性价值。 它还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几年来工人阶级青年的教育机会的些许改善能够那么不被工人阶级的家庭知

[1] 这个术语来自物理学，指的是磁效应落后于其原因，即磁滞现象。

[2] 布尔迪厄对于习性如何对应于新的条件的理解与奥格本(Ogburn 1992)的文化滞后假说之间存在相似性。 布尔迪厄的习性理论并不与奥格本的“适应的文化”概念重合。 但是，奥格本提出了“适应性文化中的变化没有完全与物质文化中的变迁同步发生”的观念，而布尔迪厄则把习性理解为相对持久的倾向系统，当它遭逢非常不同于它原来产生于其中的条件的那种客观条件时，就会进入紧张。 他们两人的观点依然存在相似性。

觉(Bourdieu and Passeron 1979：附录)。他还用习性的观念来解释当代劳动市场上过度受教育与低度就业的动力学。教育急剧而大量地扩展，而战后劳动力市场却没有相应地发展，这导致了文凭的膨胀与贬值。早期那种受到真实的工作机会激励的对高等教育文凭的渴望，被教育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之间不断增长的“结构性错位”所挫败。布尔迪厄(1984a：144)把“对于工作的不断增长的不满”以及在60年代与70年代发展起来的“反机构的心理倾向”解释为“集体的幻灭”，这种幻灭“产生于志向与真实可能性之间的结构性错位”。[1]当习性所遭遇的客观结构非常不同于它产生于其中的结构的时候，出现的恰恰是变化的条件而不是再生产的条件。但是，历史的负重决定性地塑造我们对于这些情境的回应。

这并不意味着布尔迪厄把所有的行为都看作是受习性支配的。他发现，习性对于解释在规范性的法则隐藏不露的情境中的行为模式是最有用的(1977c：20)。在高度法规化、高度规范化的情境中，或者在威胁到至关重要的物质利益与政治利益的情境中，行为较少依赖于习性。高度仪式化的情境减少了(但不是排除)策略运用的机会与习性创新的机会，而不太仪式化的情境则增加策略运用的机会。在讨论卡比尔人的几种婚礼安排的时候，布尔迪厄(1990h：182)观察到，“利益关系”是如此重要，关系决裂的机会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行动者不敢完全依赖习性这首管弦乐曲的合乎规则的即兴演奏。

布尔迪厄也承认，习性“或许会在某些条件下被其他的原则取代，比如理性的、有意识的计算。这种情况当然是发生在危机的情境中，这种危机情境打破了习性对场域的直接的适应性”(1990c：108)。危机情境或经济利害关系十分重大的地方，可能会促使高度有意识的谋划

[1] 布尔迪厄(1984a：142)发现这种集体的欺骗最可能出现于那些不太熟悉教育过程的群体以及那些坚持文凭的传统价值的群体、特别是教育程度低的人中，这个问题不太可能发生在那些继承了文化资本的人身上，因为继承的文化资本包含了教育文凭的变化着的价值的信息。

方式的产生。但是，虽然布尔迪厄承认谋划有时候是有意识的，但他马上坚持说，习性的效力依然可以辨认。作为一般的法则，在物质利益关系重大或暴力威胁明显存在的地方，占据优势的权力把行为的过程让与习性是不大可能的，更可能的情况是，行为变得高度形式化，比如国家之间的外交(Bourdieu 1987b：96)。然而，布尔迪厄的主要研究兴趣还是在于去发现习性在几乎所有场合起作用的证据。布尔迪厄强调习性在塑造行为方面的作用，以至于常常使注意力偏离那些其他支配实践的原则起作用时的情境。他并不真正地、大量地考虑其他的行为组织模式。

习性不仅在缺少仪式与牢固确立的礼节的情境中，而且也在相对未分化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统治的主要模式通过直接的人际关系而不是非人格化的机构起作用——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Calhoun 1993)。这样，这个概念似乎特别适合于卡比尔人社会，在那里，权力是通过一种非正式的荣誉系统而不是通过正式的法律得到组织的。但是，布尔迪厄认为，这个概念也可以用于理解发达社会中人的行为。尽管有形式化的法规与规定，行动者仍然在他们的日常互动中采用了大量实践性的策略，这些策略更多地来自习性倾向而不是来自理性的选择或对规范的遵守。特别是运动，它可以是高度专业化的、规范化的，但也受整体倾向的支配(Bourdieu 1988f)。其他专业化的、需要训练有素的身体习性运动的活动还包括开车、演奏乐器、技巧性的体力劳动、跳舞等。而且，专业化的脑力劳动，比如写作、计算机操作、校对等，在达到熟能生巧的程度时能使人产生一种“游戏感”。即使是例行公事式的日常科学研究，也是由对于科学程序的实践性掌握制约的。但是，当布尔迪厄从阿尔及利亚农民社会转向现代法国的时候，这个概念在分析层面上是游移不定的。在传统的未分化社会，这个概念所触及的理论范围是更宽泛、更宏观的对于整个社会文化的再生产。在高度分化的社会，习性与阶级以及身份群体的亚文化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当场域概念(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个概念)在他对高度分化的社会的分

析中变得更加重要时，布尔迪厄似乎不公开地承认了习性概念在分析高度分化社会时的困难。

适应与区分是在习性概念中两个并列的能动性类型，但是它们之间的确切关系未能得到阐述。一方面，实践似乎是对生命机会的必然性的一种功能性的适应，这些实践倾向于再生产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习性又产生把行动者区别于其竞争对手的实践。在这里，布尔迪厄(1989c：9)把再生产的倾向与习性的“在与情境的关系中维持自主性”的倾向，以及由此带来的“维护不同的身份认同”的倾向联系在一起。这种能动性的类型是更加有相关性的，因为它出现于习性倾向与习性倾向在其中起作用的场域所提供的制约和机会结构的交叉处。但是，在布尔迪厄的分析中，适应依然是更常见的能动性类型。

作为文化实践与习惯的习性

在某种意义上，习性可以被理解为布尔迪厄建立作为实践的文化理论的尝试。事实上，他解释说，他选择习性这个深奥的术语的原因是“文化”这个术语有过分被决定的特征（overdetermined character）——无论是在学术上的使用还是在非专业上的使用都是这样。[1]布尔迪厄(1968：194)把文化理论化为比“共同符码”（比如在结构主义中）更复杂的东西，同时也是比意识形态观念体系、信仰体系、价值体系（比如在马克思主义中）更复杂的东西，它的复杂性也超过了曼海姆提出的总体性世界观。所有这些关于文化的图像，尽管理论起源不同，但是都缺少能动性的含义。习性这个术语尽管具有所有这些特征，但是它突出的是这样的基本观念：行为是由关于在社会世界中

[1] 布尔迪厄(1968：706)曾经观察到“‘文化’……可能是比习性更好的术语。但是，这个过分被决定的术语带有被误解的危险，而且不容易界定其有效性的条件”。这是布尔迪厄为早期一次关于习性的讨论做的注释。

如何运作的“实践感”控制的。文化是一种用以在社会世界中生存的实践工具。

但是，布尔迪厄的习性概念与斯威德勒（Swidler 1986）关于文化实践的“工具箱”概念也不同。虽然他们都强调文化的能动性与实践性甚于强调文化的规范、价值、目标或优先性，但是布尔迪厄较少唯意志论，他强调个体行为的群体性积淀。而且，布尔迪厄比斯威德勒更强调文化资源的权力方面，即文化资源建构社会等级体系的能力。

如果说在一个层面上，习性可以被解读为把文化理论化为实践的方式，那么，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它也把实践与习惯（habit）联系起来。布尔迪厄（1977c：218）解释说：他选择习性这个概念，是因为“希望放弃习惯这个概念具有的机械集合（mechanical assembly）或例行规程（performed programme）的通常含义”。他想强调习性的发生能力（1993d：87）。的确，布尔迪厄的概念，正如卡米克（Camic 1986）深刻指出的，可以被看作是恢复涂尔干、韦伯等古典理论家们赋予习惯概念的那种含义的尝试。

涂尔干，特别是韦伯，在理解能动性时都赋予习惯化的行为方式以重要意义。事实上，韦伯（Weber 1978：21，24—35）明确地把习惯化的行为理论化为一种纯粹的类型，并把它和传统主义联系起来。而且，他观察到，“大量的日常行为”都十分接近这种类型。19 世纪以及 20 世纪早期的这些社会理论家们通过习惯概念所理解的内容，非常不同于我们今天通常赋予这个词的含义：相对基本的、富有技巧地操作的、实质上自主的活动。卡米克指出：古典理论家常常在更加普遍的意义上应用这个词，用以分辨在明确的反思过程之外产生的行为形式。这个扩展了的习惯观念可以包括“人际互动的习惯，经济、政治与宗教习惯，家庭生活习惯，遵守规则与服从统治者的习惯，牺牲的习惯”等。在更一般的水平上，习惯是指一种“贯穿于生活所有领域的、持久的、普遍化的倾向，甚至是贯穿于人的整个一生的倾向”（Camic

1986：1046）。布尔迪厄的习性概念部分地代表一种恢复这个词的更宽泛的、古典意义的努力。[1]

[1] 卡米克的分析表明，这一扩展的习惯概念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被美国社会学所抛弃。在确立社会学独立于心理学的学科地位的努力中，对于习惯的非常狭义的界定被移送到心理学界并被心理学界采纳。布尔迪厄的习性概念还表明他拒绝接受当代社会学与心理学之间的知识劳动的机构化划分。

第六章

权力斗争的场域

“场域”是布尔迪厄社会学中的一个关键的空间隐喻。场域界定社会的背景结构，习性就是在这个背景结构中运作的。布尔迪厄把场域定义为：

> 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网络或图式。这些位置的存在、它们加诸于其占据者、行动者以及机构之上的决定作用都是通过其在各种权力（或资本）的分布结构中的现在的与潜在的情境客观地界定的，也是通过其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统治、从属、同一等）而得到界定的。（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97）

场域是指商品、服务、知识或社会地位以及竞争性位置的生产、流通与挪用的领域。行动者在为了积累、垄断不同的资本类型而展开的斗争中进行这种生产、流通与挪用。场域可以被视作是一个围绕特定的资本类型或资本组合而组织的结构化空间。[1]比如，布尔迪厄用“知识场域”指称符号的生产者，如艺术家、作家以及学术界，争夺符号资本的机构母体、组织母体以及市场母体。即使科学本身（自称是客观性的最高表达）也是在场域的框架中被生产的(Bourdieu 1975b)。布尔迪厄还把场域概念应用于对社会阶级的生活方式的研究(Bourdieu

[1] 布尔迪厄(1980c：138—142)指出，场域意指一个“某种类型的资本的特定分布结构”。

1984a)、高等教育机构的研究(Bourdieu 1988b, 1989c)、宗教研究(Bourdieu and de Saint Martin 1982)、文学研究(Bourdieu 1983a, 1988a)以及家庭政策的研究(Bourdieu 1990b)等。

在本章，我将从讨论布尔迪厄场域分析观点的起源与原理论的目的开始，然后，我将辨认布尔迪厄的场域及其相互关系理论所特有的几个结构特征，并思考“权力场域”。在布尔迪厄对当代社会的分析中，权力场域是最主要的分层力量。最后，我将表明，布尔迪厄如何把他的习性、资本、场域等概念联系起来以建构他的总体性实践科学。

场域概念的起源

在布尔迪厄的著作中，场域概念似乎比习性概念出现得更晚一些。布尔迪厄发展的场域分析方法代表着他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逐渐发生的变化。60年代，他在与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论争中发展出来的文化资本、习性、策略以及实践等概念，逐渐让位于对场域的越来越多的关注。虽然布尔迪厄早期的学术关注主要源于他的哲学训练、他对经典社会学著作的阅读以及他在阿尔及利亚的田野调查，但是，场域的概念则在新近的著作中得到了比较均衡的理论发展与经验运用。[1]这个概念来自60年代晚期布尔迪厄对艺术社会学的研究，以及对韦伯宗教社会学的解读(Bourdieu 1987b：33)。布尔迪厄(1971a, 1971c, 1985d, 1992：260)最先把这个概念运用于法国的知识界与艺术界的时候，是把它作为一种工具，以唤起人们对于支配这些文化世界的特定利益的关注。[2]

---

[1] 在两本论述在阿尔及利亚的田野调查工作的书中，布尔迪厄在《实践理论大纲》中极少提到“场域”这个概念(Bourdieu 1977c)，但是，在《实践的逻辑》[1980](Bourdieu 1990h)中，这个概念却起到了突出的分析作用。

[2] 对法国知识界而言，这个术语本身并不是新术语，因为它曾经被现象学家(Merleau-Ponty 1962：462)与存在主义者(Sartre 1960：87)使用过。

作为原理论的场域

像布尔迪厄的所有概念一样，场域概念反映了他的思想的原理论方面。布尔迪厄把场域视作一个“开放的概念”，用以修正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1]

首先，场域概念是对实证主义的修正。场域是以关系性的理论推论模式为基础的概念建构。布尔迪厄强调：“依据场域进行思考即是关系性地进行思考。”（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96）[2]各种各样的场域通过鼓励研究者探究塑造行为的潜在的、不可见的关系而不是常识性范畴所赋予的所谓“特征”，阐明了布尔迪厄的关系性逻辑。通过谈论场域而不是人口、机构、群体、组织，布尔迪厄想要关注的是塑造这些经验现实（人口、机构、群体或组织）的利益与斗争的潜在模式。实证主义的社会定位，比如“环境”、“语境”或甚至“社会背景”，均不足以充分表明社会生活的冲突特征。

其次，这个概念还是布尔迪厄批评阶级还原论与粗俗的唯物主义的武器。正如我们在第七章将要讨论的，布尔迪厄的确持有关于现代社会的阶级观，但是他认为阶级背景、环境、语境对于个体的影响从来不是直接的，这种影响总是以场域结构为中介。

第三，场域概念还用以反对对文化实践的唯心主义解释。场域分析要求关注塑造文化生产的社会斗争条件。即使似乎是中性的或象牙

---

[1] 的确，布尔迪厄认为，场域概念“提供了一系列的反复出现的质疑，这种质疑使我们得以免除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的理论真空与理论话语的真空”（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110）。对于布尔迪厄而言，“场域观念的主要的优点……是使我们能够超越一系列方法论上的与理论上的自相矛盾”（Wacquant 1989：41）。他引述的自相矛盾包括我们在第三章已经讨论过的那些。

[2] 布尔迪厄指出，场域应该被当作“唤醒记忆者”（*pense-bete*，a memory-jogger）来加以思考，以便提醒研究者“关系性地思考”（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228）。

塔中的文化实践，也是处于社会区分系统与知识区分系统中的。[1]在这三个方面，场域的概念体现了布尔迪厄社会学的原理论的规划。

超越市场与机构

显然，在指一种学院化的学科或实质性的研究领域的时候，布尔迪厄对场域这个术语的使用明显地不同于其更加普遍的使用。而且，虽然布尔迪厄交替地使用场域和市场这两个术语，但是，布尔迪厄的这个概念却并不完全等同于新古典主义的“市场”观念。相反，这个概念指的是力量的场域，在这里，市场上的资本分配反映着个体、群体以及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的等级体系。场域是比市场更有包容性的概念。作为一个空间的隐喻，它暗示着买方与卖方之间的等级以及交换关系，行动者之间在场域中的互动是由其在位置等级系统中的关系性定位塑造的。

场域分析关注个体与群体行为的机构化方面。它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布尔迪厄的机构分析方法。但是，布尔迪厄(1991d：19)认为，“场域”意象优先于机构意象，原因有两个：首先，他要强调社会生活的冲突特点，而机构的观念则暗示着共识；其次，他需要一个能够涵盖下面这样的社会世界的概念：在这里，存在着机构化程度不高、边界并没有明确确立的实践。[2]布尔迪厄分析的一些场域，比如教育，的确是由一连串的模式化活动组成的，这些模式化的活动以基本的社会功能为核心。但是，他的场域概念指向斗争的领域，而不是被认为是对于社

[1] 布尔迪厄(1991d：7)批评福柯的“象征结构主义”——就像索绪尔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一样，把对差异的研究局限于话语的领域而没有同时研究不同的意义得以产生的社会条件。

[2] 布尔迪厄(1991d：15)说，场域的核心特点之一就是它的机构化程度。他谈到了符码化的程度以表达这样的特点。文化生产的场域，特别是艺术家与作家场域，其符码化或机构化的程度就低于大学的场域，因为大学的准人比文学场更加严格地受到控制。

会生活而言关键的基本功能（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103）。他的分析框架超越了传统的功能主义的机构概念。[1]

由于在社会学中，对机构、机构化这些概念的使用非常混乱，因此，在布尔迪厄的概念语言中发现混用也就不奇怪。场域虽然可以指常常被看作机构的东西，比如法律场域，但不等于机构。场域在范围上可以是机构间的或跨机构的，它们可以是跨越于机构之上的，后者或许代表场域内部的位置（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232）。布尔迪厄并不把自己的注意力局限于特定的行动者或活动领域，比如在社会学的功能主义传统中被视作机构的家庭、宗教、教育、法律等，他也并不太多地关注被学术界的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们视作重要机构的政治单元。但是，正如鲍威尔和迪马吉奥（Powell and DiMaggio 1991：25—26）指出的，布尔迪厄的许多观念与新机构化理论的核心主题存在紧密的关系。[2]

如果说布尔迪厄已经指出他的概念与具有同感的关于社会世界的看法对立，那么他也同样把自己的概念看作不同于那种强调集权统治的观点。布尔迪厄的场域是斗争的场域而不是“总体化的机构”（戈夫曼）、“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阿尔都塞）或“规训秩序”（福柯）。[3]场域既是统治的场所也是抵抗的场所，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在一起。但是，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场域掌握着再生产的逻辑中的争

---

[1] 然而，布尔迪厄的确强调场域的阶级再生产功能。

[2] 有些批评家（比如 Lamont 1989：782）已经指出，布尔迪厄关于作为各种形式的资本投资者的行动者观念，缺乏更广泛的机构化的视角。这个批评似乎建立在他早期的实践理论表述、以及早期的对于文化资本对教育获得的影响的分析的基础上。但是，布尔迪厄长期坚持认为，实践产生于习性与机构之间的交叉处，尽管他对于结构的探索开始于70年代早期，这个时候正是他发展场域概念的时候。虽然布尔迪厄的确对某些机构化领域——比如国家——的关注不多，但是他的分析一直尝试着防止把个体、群体或机构还原为个人主义的能动性形式。

[3] 布尔迪厄的场域概念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的主要区别是，场域指的是一个斗争的舞台，在那里存在着对统治权力的抵抗（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102）。（当然，他也承认“在某些历史条件下”——即在统治权力能够有效地压制所有抵抗的时候——场域能发挥国家机器的功能。）

布尔迪厄认为自己的研究非常不同于福柯的统治理论的地方，在于福柯的统治理论没有像他的理论那样给抵抗留下余地（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167）。

斗；它们(场域)很少成为社会革命的场所。

布尔迪厄没有清晰地划定各种场域的边界。他声称“文学或艺术场的主要争夺焦点之一就是对场域的边界的界定”(Bourdieu 1987b：174)。布尔迪厄认为，确立各种场域之间的边界这种努力源于“实证主义的观点”，而不是源于对于社会世界的关系性”的观点，因为边界本身就是斗争的对象。这种场域观念反映了布尔迪厄的关系性逻辑：由于社会认同本质上是相互指涉的、对抗性的，所以他用场域的概念来界定塑造行为而不是划定行为的边界的尽可能多的可能因素。

场域分析的观点的优点之一是鼓励社会科学家不要机械地限定自己的研究对象。比如，最近的机构社会学的新定向，通过拒绝把“环境”从机构化的“内在”结构与过程中孤立出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充实了机构化的理论以及我们对于机构化的理解。实际上，迪马吉奥与鲍威尔(DiMaggio and Powell 1983)在呼唤人们重视、关注机构间性的纲领性陈述中，就明显地吸收了布尔迪厄的场域概念。

布尔迪厄用他的场域概念有效地表明了边界问题如何作为斗争的工具而发挥作用——特别是在他的知识分子分析中(参见本书第九章)。布尔迪厄对于边界问题的关注似乎在两个方面是有帮助的。首先，一个研究计划的范围的划定不能免于机构的与专业的压力，这种压力可以把研究引向某个方向而不是另外一个方向；其次，在研究中包含或排除特定的要素能够生产出限制客观性程度的符号效果。

但是，由于布尔迪厄拒绝确立场域的边界，场域这个概念也像资本概念一样有被滥用的倾向，它常常无限繁殖并因而导致贬值，[1]还出现了亚场域。而且，布尔迪厄一方面赋予场域的内在分析以优先性，同时他又强调(场域的)边界是斗争的领域，这两者之间存在难以解决的

[1] 布尔迪厄承认，场域的数量与利益的数量一样多，每个场域都有自己的幻象(illusio)(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117)。在他对生活方式的研究中，布尔迪厄(1984a：226)写道：存在“与风格可能性场域一样多的偏好场域”。

紧张关系。 最后，边界的问题指向布尔迪厄社会学——即社会学解释——中更深层的难以解决的问题。 如果边界本身是斗争的对象，那么，社会学家有什么希望能够用一种非偏袒的方式描述这种冲突？在通过提出社会冲突问题以努力批评实证主义并把相对主义提到认识论的优先地位的时候，布尔迪厄极大地限制了观察者获得对于社会世界的客观把握的机会。 事实上，这样的机会或许完全丧失。 这是布尔迪厄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而未解决的问题，也是他通过呼唤一种反思的社会学实践试图解决的问题。

场域的结构特征

布尔迪厄(1993d：72)谈到了作为所有场域的共同特征的结构特点的“不变法则”或者“普遍机制”。 首先，场域是为了控制有价值的资源而进行斗争的领域。 回顾一下第四章谈到的布尔迪厄(1989c：375)的观点：当资源成为斗争的对象并发挥“社会权力关系”作用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种资本的形式。 场域的斗争围绕着对于特定形式的资本的争夺，如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科学资本或宗教资本。 比如，文化资本就是知识分子场域的最主要财富，而经济资本则是商业世界的最主要财富。 科学家为了科学场域中的科学资本进行竞争。 因此，场域的形式与资本的形式一样多。

行动者也为界定什么是场域中最有价值的资源而进行斗争。 这一点在风格与知识急剧变化的文化场域尤其如此。 换言之，场域是争夺合法性的斗争领域，用布尔迪厄的话说，即争夺实施“符号暴力”的垄断性权力的领域。

布尔迪厄最富有震撼力的场域分析是对于艺术家、作家与教师的研究，在这方面，艺术风格与观念的差异被视作是争夺知识界承认的策略。 这些策略又极大地依赖于在各种文化领域可以获得的冲突工具与

冲突规则。[1]

其次，场域是由在资本的类型与数量的基础上形成的统治地位与被统治地位所组成的结构性空间。布尔迪厄反复强调场域中的位置是由不平等的资本分配而不是位置的占据者的贡献决定的。[2]场域被看作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个特定的要素（机构、组织、群体或个体）都是从其与别的要素的关系中获得自己的特点。[3]比如，布尔迪厄(1971c：161)写道：知识场域

> 不能被还原为孤立的行动者的集合体，或还原为各种简单并列的要素的聚合体，知识场域像一个磁场，由一个权力的轨迹体系组成。换言之，建构性的行动者或行动者系统，可以被描述为众多的力量，这些力量通过其存在、对抗或者组合，决定其在特定时代特定时刻的特定结构。反过来，每个行动者都通过其在场域中的特定位置得到界定，它的位置性特征(positional properties)就是从这个场域中获得的，因而不能被等同于内在特征。[4]

场域是一个“高度配对的”[5]关系性型构，其中每个位置的变化都会改变其他位置的边界。

---

[1] 墨菲(Murphy 1988)明显地借用了布尔迪厄的概念来分析帕金(Parkin 1979)的关于闭合理论的各种阐述；卡米克(Camic 1986)依赖布尔迪厄的概念，通过多种方式在他对经典的“习性”观念为什么在20世纪被驱除出美国社会学的现行术语表进行了场域分析；弗里茨·林格(Fritz Ringer 1992)借用布尔迪厄的概念对德国与法国的思想史进行了比较分析。

[2] 当布尔迪厄论证场域中的位置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行动者带入场域中的习性加以塑造的时候，这个强烈的结构主义假定有所放松。

[3] 这一点直接地反映了布尔迪厄的关系性的方法论原则，他从索绪尔的语言学中借用了这个原则。

[4] 布尔迪厄的场域观点与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 1951)的场域理论在好多方面相似。实际上，布尔迪厄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参照了勒温的理论。场域理论把个体行动者视作力量轨迹与场域中其他个体的力量轨迹撞击的产物，类似于台球中球体之间的撞击。

[5] 这个表述来自组织社会学，它表明组织系统中各种要素之间的紧密联系。在高度配对的系统中，部分的干扰会引发整个系统的反响，虽然布尔迪厄并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系统论者，但是在他的社会学中无疑有某些系统的概念，而场域就是其中之一。

场域中的斗争使处于统治地位的人与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相互对抗。争夺场域中的地位的斗争，使那些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实施资本分配与界定的有垄断性权力的人，与那些想要篡权的人相互对抗。总体而言，布尔迪厄认为这种斗争发生在场域中已经确立有利地位的行动者与新来者之间。前者倾向于采用保守的策略，而后者则选择颠覆的策略。借用了韦伯对牧师与先知之对抗的描述，布尔迪厄(1987d，1991b)把这种冲突描述为捍卫“正统”者与倡导“异端”者之间的冲突。对于布尔迪厄(1992：289)而言，这个基本的冲突结构不仅适用于宗教场域，也适用于所有的文化场域。正统与异端的冲突是

> 争夺对文化合法性的垄断权的斗争，也是争夺保留或授予这种圣职的权利的斗争，这种保留和授予是通过本质上对立的原则的名义进行的：创造者所诉诸的是个人权威，教师所诉诸的则是机构权威。(Bourdieu 1971c：178)

布尔迪厄在知识场域、特别是学术界中也看到了相似的对立：“文化的掌管者”(the curators of culture)与“文化的创造者”(the creators of culture)之间的对抗，前者是知识的合法化系统的再生产者，而后者是新知识系统的创造者。在对巴黎大学的研究中，布尔迪厄(1988b)发现了教师与研究者、教授与独立的知识分子之间的这种基本对抗。

布尔迪厄场域分析的一个核心是：两种相互对立的策略是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一种策略产生另外一种。正统通过在文化场域中运作的区隔逻辑产生着自己的异端。[1]挑战者迫使卫道士设置对自己的特权的

---

[1] 正统与异端之间的这种共生关系使我们想起曼海姆(Mannheim 1955)对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分析，这两种社会世界观虽然在对现存秩序的看法上是激进对抗的，但是却被锁定在相互批判的复杂框架中，各自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对方。

威廉斯与德默拉特(Williams and Demerath 1991)在对一个美国城市中的宗教与政治过程的研究中，分辨出一种相似的动力。他们表明民间宗教与教会和国家的分离这两个逻辑上不和谐的主题如何能够共存并且实际上在政治实践中各自使对方“成为可能”。

防卫，而这种防卫则成为颠覆的基础。

布尔迪厄实际上谈到了三种不同的场域策略类型：保守、继承、颠覆。保守的策略常常被那些在场域中占据支配地位、享受老资格的人所采用，继承的策略则尝试获得进入场域中的支配地位的准入权，它常常被那些新参加的成员采用；最后，颠覆的策略则被那些不那么企望从统治群体中获得什么的人采用。颠覆策略通过挑战统治者界定场域标准的合法性而采取了多少有些激进的决裂形式。[1]

第三，场域把特定的斗争形式加诸行动者。占据统治地位的既得利益者与处于被统治地位的挑战者，都首先接受了一个心照不宣的前提：斗争的场域是值得追逐的，这个游戏是值得玩的。布尔迪厄把场域的这个深层结构看作基本信念(doxa)，因为它代表倡导异端的人与维护正统的人之间的一种心照不宣的、对斗争利益的相互认可。[2]保守者与挑战者在维持场域本身的存在方面具有相同的利益——即使他们在如何控制场域方面存在尖锐对立。每个场域都预先设定并生产出特定的幻象(illusio)，布尔迪厄将之界定为对场域游戏的价值的相信与接受。[3]比如，在宗教社会学中，当代宗教实践的各种类型与流派发生了争论，但是各方——包括世俗化的倡导者——首先都假定宗教是值得谈论的。

进入一个场域，这要求心照不宣地接受游戏规则，它意味着特定的斗争形式是合法的、而别的形式则被排除。[4]这样，进入专业场域，就意味着把斗争限于被认为是合法的专业程序的形式与术语，而人身攻击

---

[1] 布尔迪厄把场域的结构与扑克牌游戏的结构进行了比较。在扑克牌游戏中，大堆的筹码反映了资本的不平等分配，这种分配既简要反映了先前斗争的结果，也指定了面向未来的策略(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98—99)。

[2] 基本信念(doxa)的观念与涂尔干的“集体意识”的概念相呼应。但是一个关键的区别是：基本信念是场域特有的，而不是整个社会的心照不宣的理解体系的表现。

[3] 正如我们在布尔迪厄的实践经济学中看到的，布尔迪厄的基本立场是：场域中的行动者是利益驱动的。他要强调的是，尽管行动者的地位不同，但是他们在接受他们所玩的游戏的规则方面是共谋。而且，他强调，这种对规则的接受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没有被意识到或被“误识”(Bourdieu 1991d：22，45)。

[4] 布尔迪厄常常强调，进入一个场域的人，就像是玩扑克牌的对手一样，虽然竞相打败自己的对手，却都追逐游戏的奖励并遵循相同的规则，在别的时候，布尔迪厄还强调关于规则的知识代表一种文化资本的形式，这种资本在相互对抗的派别之间是不平等地分配的。

与身体暴力则被当作非专业的斗争形式加以排除。[1]但是，挑战对立观点的客观性程度则是公平的游戏。

场域分析因而引导研究者关注这样一种分析，这种分析能够揭示对立观点之间的一体化逻辑，它鼓励研究者寻找特定领域中的冲突的根源，把它联系于更广泛的阶级与权力领域，并识别对立双方所共享的潜在假设。

为了使场域能够有效运作，在场域中活动的行动者必须具有适当的习性以便使他们能够并愿意在特定场域中投资。[2]新来者必须为初次入场付费，包括认识游戏的价值以及获得如何游戏的实践知识。[3]

场域的竞争逻辑及其基本信念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它们有助于创造对于权力关系的“错误认识”的条件，并因而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维持。当行动者不加质疑地接受关于报酬以及获得它们的方式的界定时，他们就错误地认识了社会世界的任意性特征。[4]参与场域竞争的一个非预期的后果是，虽然行动者对场域所赋予的报酬的合法性有异议，但仍然再生产着场域的结构。

第四，场域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通过其自己的内在发展机制加以构建的，并因而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对于外在环境的自主性。布尔迪厄谈论场域的“相对自主性”，以表达场域与外在因素之间既联系又独立的双重特征。[5]布尔迪厄使用相对自主性的语言——特别是在他早期论教

---

[1] 在写到司法场域的时候，布尔迪厄(1987c：831)说，“进入(场域)意味着心照不宣地接受场域的基本规则”，“参加游戏，同意玩游戏，接受冲突的解决方法，就是心照不宣地采纳了一种表达与讨论模式，这种模式隐含着对身体暴力与初级的符号暴力——比如人身攻击——的否认”。

[2] 在布尔迪厄的著作中一个重要但没有得到充分关注的研究课题，是辨认把个体吸引到特定场域中去的习性类型。更宽泛地说，在布尔迪厄的理论语言之外，问题表现为努力理解“性格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Gerth and Mills 1964)。

[3] 布尔迪厄认为，这些人往往是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因为他们没有充分地掌握游戏的规则。

[4] 这种情况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是，特定场域的旁观者对于场域中被争夺的利益与资本看得非常清楚。这促使布尔迪厄长期关注作为“旁观者”眼光的社会学见解的问题。但是一个人还必须具备知情人的知觉以便避免产生出对社会世界的客观主义的解释。

[5] 一般认为阿尔都塞持有关于文化活动独立于经济决定作用的相对自主性观念。在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把文化与文化机构仅仅看作潜在的经济基础的反映方面，布尔迪厄与阿尔都塞有共同处。但是，布尔迪厄自己对文化场域相对自主性的理解可能更多地受到韦伯而不是阿尔都塞的影响。

育的著作中——以论证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经过中介的，而传统的“文化”与“社会”范畴对于描述符号商品和符号程序在现代社会的权力的行使中所起的日益重要的和复杂的作用方面是不适当的。教育文凭的积累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符号资本的积累，不能用潜在的物质利益加以充分解释。虽然不同的资本形式在特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但是它们又不可相互化约。

文化是一种独特的权力形式，它像资本那样发挥作用，但是有自己特殊的实施法则。然而，文化的自主性又是相对的，因为它常常与经济资本或机构中的位置权力（positional power）进行交换。历史地看，布尔迪厄发现文化场域逐步地获得了发展，得到了独立于政治与经济场域的自主性。[1]这个自主发展的驱动力——在此布尔迪厄借用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来自专家团体的兴起，他们逐步能够发展、传播并控制自己的特定的阶层文化。这样，场域发展出了自己的特定的机构化的、专业化的利益，随之而产生的是重新译解、重新阐释外在要求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历史地、依据场域的类型而变化的。

比如，文学场域的相对自主性意味着这个文化领域通过两个对立的组织原则分为两极。一方面，存在一种趋向自主的倾向，在这里，同行的推崇与评论具有优先性。在极端的情况下，这就导致“为艺术而艺术”；另一方面，则存在偏离自主性的倾向，在这里，合法性与推崇是在场域之外，以诸如图书销量、公众形象、荣誉等形式寻求的（Bourdieu 1991d：12）。

布尔迪厄把场域的自主性与符号权力的概念联系起来。随着文化场域逐步从政治与经济的权力中解脱出来，获得自主性的发展，它们获得了符号权力，亦即把现存的社会安排加以合法化的能力（Bourdieu and

[1] 他写道：“艺术家或知识分子在文化场域中的位置是在与市场域以及文化场域内部国家官僚控制机构的对立中得到发展的。”

Passeron 1977：12）。结果，场域引诱人们赞同现存的社会安排，并在使行动者卷入场域自主性的意义上有助于这种社会安排的再生产。[1]

场域的相对自主性的原则导致一个基本方法论原则：赋予内在分析以优先性。布尔迪厄认为，外部的影响总是被转译为场域的内在逻辑，外部影响来源总是以场域的结构与动力作为中介（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105）。[2]例如，艺术家的阶级背景并不直接影响他的作品；相反，阶级的影响是与艺术家所处的场域的等级与冲突模式相互作用的。

在其对法国教育的分析中，布尔迪厄反复声称应该从对教育系统的内部分析开始（Bourdieu and Passeron 1977h；Bourdieu 1988a）。外部因素，如人口的扩展，总是被转译为教育场域的内在逻辑的术语。[3]矛盾对立是从场域的内在逻辑角度得到考察的。这样，布尔迪厄的著作至今为止虽然承认场域之间的矛盾对立，但是却不强调这点。

布尔迪厄赋予文化场域的内部分析以优先性，这反映出对他的思想的三个方面的影响：结构主义、布尔迪厄早期与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的论争、他的实质性的研究领域。结构主义的方法强调系统的内部结构而不是它们的起源或与外部因素的关系。内部分析所代表的是对阿尔都塞的强调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二元对立内部之文化的逻辑地位的方法论上的纠正，而不是诱导人们深入内部去研究文化机构的特定实践。这个方法论的原则似乎是对法国中学教育与高等教育系统——它们历史地获得了独立于外部因素的自主性——的适当回应。然而，尽

---

[1] 也就是说，当相互竞争的实践领域变得越来越分化并且独立于外来影响而越来越自主时，当它们能够把行动者限制在行动者自己的区分等级体系内时，它们就有助于社会秩序的再产生。涂尔干曾经指出：社会的分工实际上似是而非地导致了新的社会稳定的基础，与涂尔干的这个有机稳定悖论相似，布尔迪厄在相对自主的社会文化场域的分化与发展中，看到了新的社会化再生产的机制。

[2] 虽然布尔迪厄认为场域分析要求通过赋予场域的内在结构与动力以优先性来分析变迁，但他依然考虑到："发生在场域——比如文学场——内部的斗争，其结果，不管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结果，总是依赖于其与外部斗争之间能够维持的对应性。"（Bourdieu 1991d：33）

[3] 布尔迪厄从这样的立场引发出的一个方法论含义是反对回归分析，在这种还原分析中，统计学的区分可以在直接的或间接的结果中作出。对于布尔迪厄（1984c）而言，根本不存在直接的结果。任何事情都是有中介的。

管这样，布尔迪厄的著作还是常常过于关注对场域的内部分析而使我们无法了解场域如何与更广泛的结构模式发生联系。布尔迪厄对法国知识场域的分析深刻地阐明了知识分子的地位怎样受到争取知识承认的斗争的塑造；但是塑造它们的不仅仅是专业的竞争，布尔迪厄也承认这一点，但是常常不予重视以便突出他的方法论的要点。

布尔迪厄发现，“对应分析”的因素分析技术(factor analytical technique)(我们在第三章曾对此加以描述)与他对于场域概念的理论关注非常吻合。场域的概念与对应分析使他能够依据差异化的多个轴心来安置个体、群体、组织以及机构。这有助于表达社会世界的冲突的特征，防止脱离其对抗与亲近的关系来表现社会的等级。较之线性分析模式，场域分析则把注意力从个体与群体的特征转向塑造个体与群体行为的社会生活各种领域的斗争与动力学。布尔迪厄(1988b：17)反对单维度的尺度与累积的指标，这种尺度与指标通过个体与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来对他们进行定位，布尔迪厄偏爱的是多维度的分析，把它作为呼吁关注社会生活的冲突方面、反对客观主义的一种方法。

场域的同构性

布尔迪厄依据“结构与功能的同构性”来阐述相对自主的场域之间的关系，他把这种同构性描述为“差异中的相似”(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105—106)。在场域发展出同型的特征——诸如统治位置与被统治位置、排除策略与侵占策略、再生产机制与变迁机制等——的意义上，不同的场域具有同构性。而且，布尔迪厄强调，“每个这样的特征在某个特定的场域中采取的是特殊的形式”。比如在早期关于法国教育的著作中(Bourdieu and Passeron 1977：63—64，194—200)，他认为这种教育与中世纪的教会具有“结构与功能的”同构性：与教会一样，学校不仅传授知识与技巧，而且通过垄断自己的领导人的选择与训练来再

生产自身。而且，学校还通过把不平等的文化资本分配合法化，来实施另外一种把社会阶级关系加以再生产的潜在功能。在《区隔》(1984a)中，布尔迪厄描述了把巴黎剧场场景与统治阶级的分层联系起来的一种结构与功能的同构性，他写道："不同的巴黎剧场的观众的社会特征……是与作者的表演……作品以及戏院业务的特征完全一致的。"

布尔迪厄还依据与阶级结构中的对立结构对应的生活方式中的"对立结构"来描述同构性。文化上"优雅的"实践与"粗俗的"实践之间的对立，对应于社会空间中占有大量"文化资本"的阶级与很少具有这种资本的人的对立（Bourdieu 1984a：175—176）。在《国家精英》(1989c：373)中，布尔迪厄发现，在法国，权力场域与"精英的高等教育"机构之间有一种"结构上的同构性"。他发现，"就各自的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数量而言，法国的职业群体与法国学校的相对地位基本上是对应的"。在对司法场域的分析中，布尔迪厄(1987c：822)认为，在法律场域与社会阶级场域之间的"结构对应性"也可以在律师与他的委托人之间的关系中找到。律师在其职业等级中的地位对应于他的委托人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1]因此，在不同的场域中，个体与群体的位置的同构性意味着：那些在一个场域中处于被统治地位中的人常常在别的场域中也同样处于从属地位。最后，在策略方面也存在同构性。在社会关系中处于被统治地位的消费者常常购买由在生产场域中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生产的产品。这样，结构的同型性关系依据各种类型的文化生产者与消费者在各自的斗争场域中的相应位置而在他们之间获得(Bourdieu 1984c)。

对于布尔迪厄而言，场域分析不同于对消费者实践的市场分析。虽然布尔迪厄表面上像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家一样，也在自己的分析语言中使用经济学的比喻(Warner 1993：1051)，但是他的研究并不局限于理性选择框架。场域分析并不依据供求功能分析文化消费。文化趣

[1] 布尔迪厄(1987c：850)写道："那些在场域(例如社会福利法)中处于下等地位的人，倾向于为那些由社会下等分子组成的委托人服务，这些委托人因此又强化了自己的下等地位。"

味并不仅仅是由文化生产者加于不知情的消费者身上，它也不是产生于文化生产者对消费需求模式的直接回应的努力。场域分析指出，供求关系、艺术家与公众的关系以及文化生产场域与社会阶级场域的关系，通常以场域的结构与程序为中介。在文化生产场域中相互斗争的生产者以及他们的文化产品，更多地反映的是他们在这种斗争中的统治与被统治的相应位置，而不是反映消费者的需求。[1]而消费者则反过来依据他们在社会阶级斗争中的统治或被统治的地位来选择产品。这样，是"结构的同构性"而不是有意识的调整，在不同的生产者类型与消费者类型中依据其在各自斗争场域中的相应位置确立起来。布尔迪厄写道：

> 在文化生产场域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客观竞争的逻辑，不必经过有意识的对于适应的研究，就把不同类型的生产者导向为那些在权力场域内部占据(与自己)同构地位的消费者提供与他们的喜好相适应的产品。　(1984c：14)

布尔迪厄还相信：符号的同构性与场域之间的结构同构性是平行的。[2]文化场域中高/低、雅/俗、精/粗之间的基本语义对立，在功能上讲强化了相似的社会区分。他评论说：

> 在艺术世界中起作用的知觉与欣赏类型(比如隐晦/简明或容易、深奥/轻松、原创/陈腐等)是一些对立项，这些对立项几乎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而且——归根结底——是建立在"精英"与"大众"、"精英的"(或"高质量的")产品与"批量化"产品之间的社会对立之上的。　(Bourdieu 1980b：157)

---

[1] 可以表明这一点的一个美国的研究例子是彼得森(Peterson 1985)的研究，这项研究显示，文学生产更受出版业的约束因素而不是生产者—消费者的市场关系的制约。

[2] 符号对立中的同构性 (isomorphism in symbolic oppositions) 的"客观基础"是贯穿于不同场域的不同资本类型在数量与结构上的结构对立的同构性 (isomorphism in structural oppositions) (Bourdieu 1989c：384)。

布尔迪厄研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他观察到的在教育场域中起作用的高雅/低俗的对立，它同时产生出社会阶级场域中的“社会歧视”（Bourdieu 1989c：385）。教师对学生的作业的评价是依据对立的术语——例如轻盈/笨拙——把书写风格加以区别，这种对立的术语同时也在具有不同数量的文化资本的学生之间作出区别。

布尔迪厄有时也辨析场域内部的同构性。例如，他认为，在文化场域中存在着“生产场中的位置空间与依据其严格的象征内容、特别是它们的形式加以界定的作品的位置空间之间的……同构性”（Bourdieu 1988a：544）。场域与社会空间的概念在布尔迪厄的著作中常常相互交织、不加区分。在其他时候，场域又突然与亚场域相区别（Bourdieu 1991c：230）。总体而言，布尔迪厄是依据不同类型的资本的分配来思考场域位置的空间，而作品的空间则包括把作品加以区分的所有风格特征。

因此，布尔迪厄用同构性的语言来解释阶级关系在各种文化领域的影响（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106）。在一个场域中的斗争会在另外一个场域产生同构的（但不是直接的）影响。[1]布尔迪厄（1980b：147）写道：“通过同构性的逻辑，一个专门化的、相对自主的生产场域中的行动者的实践与作品必然是多元决定的（overdetermined），它们在内部的斗争中发挥的功能必然伴随外部的功能，这种外部的功能通过统治阶级各阶层之间的符号斗争，说到底是通过阶级之间的斗争传递到行动者的实践与作品上面。”文化场域中的斗争生产出文化的区分，这种区分同时也是社会区分。它们创造出集团内与集团外以及思想或风格的派别。对布尔迪厄来说，文化场域中“正统与异端”的区分与社会阶级场域中的“维持或颠覆象征秩序”的斗争具有同构性。文化场域中的斗争生产出“社会阶级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委婉形式”

[1] 布尔迪厄对场域内部斗争动力学的强调常常遮蔽其他可能发生的过程。比如，迪马吉奥与鲍威尔（DiMaggio and Powell 1991：67）在其对组织机构场域的研究中，就发现了模仿的程序、专业化的程序以及强制与竞争。然而，布尔迪厄事实上总是谈论竞争性的斗争，但同构性也可以通过竞争以外其他的机构化过程而产生。

(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106)。场域同构性强化了跨场域的冲突模式。总的结果是，共同的等级模式与冲突模式从一个场域到另外一个场域得到再生产。

这样，布尔迪厄就在场域之间区分出了不同种类的类似之处（analogies），某些指向一种潜在的社会再生产功能，其他的指向行动者的位置与策略中的同构的等级模式。[1]作为一个概念策略，布尔迪厄的场域之间的同构关系的观点直接批判的是场域之间关系的工具论观点。[2]它重申了在他的行为理论与习性概念中发现的核心主题：社会结构不是理性计算的结果，它们也不是相互作用和相互意识的模式。布尔迪厄认为，文化生产场域与社会阶级场域之间存在一种“客观的相互呼应”而不必依据对消费者需求的“有意识调适”来思考这种(呼应)关系。相反，“生产场域提供的产品与社会地生产的趣味之间的令人惊叹的对应性”，来自场域之间的“功能与结构的同构性”而不是工具性的设计。布尔迪厄(1984a：233—234)在讨论趣味的社会阶级基础的时候写道：

> 文化—商品生产场域的功能逻辑，加上决定文化生产场域的动力学的区别策略，导致了它们的运行结果——不管它们是时装设计还是小说——首先是在一个阶级的不同阶层之间，然后是在不同的阶级之间，偏向于有差别地发挥其作为区别方法的功能。文化生产者可能会整个地卷入其与别的生产者的斗争之中，相信只有特定

[1] 在布尔迪厄的功能与结构的同构性研究与莫顿的“功能性对等物”（functional equivalents）概念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他们两人都不倡导这样一种功能分析形式，这种分析形式假定一系列独立于系统生存的系统需要。相反，他们都关注能够“……促进一种功能性要求的因素的可能的变化范围”(Merton 1968：106)。与莫顿相似，布尔迪厄感兴趣的是不同环境中的对应位置的观念，但是对布尔迪厄而言，不同环境中的对应位置问题指向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阶级关系的结构是否得到再生产。阶级分化的形式可能变化，但是结构与功能的同构性意味着：形式的变化与潜在的阶级关系的结构连续性并不矛盾。

[2] 在他对文化生产场域及其与阶级结构的关系的分析中，布尔迪厄(1980b：147)把“艺术家在生产场域中的位置与其受众在阶级场域中的位置”的紧密关系的经验观察解释为“结构与功能的同构性”而不是“有意计算的产物”布尔迪厄(1991d：31)。提到的例外情况是最接近权力场域的文化生产部门，以及最接近商业化的文化生产部门。在这里，布尔迪厄承认有意识的策略谋划起了极大的作用。

> 的艺术利益是重要的，而在别的方面则完全是超功利的，而没有意识到它们对特定的观众(从长远的意义上)所实现的社会功能，根本没有停止对特定的阶级或阶层的期待作出回应。

因此，场域之间的联系就像场域内部的对抗一样，来自结构性的因素而不是行动者的意图。

这样，布尔迪厄的场域分析观点与他的阶级合法化概念紧密相关。场域自主性、中介以及同构性的概念与他的符号权力与符号暴力理论紧密联系。它建立在这样的观念上：社会阶级不平等的合法化不是有意识的意图的产物，而是来自不同场域的结构对应性。阶级的区分被转化为其他场域所特有的婉转形式。行动者不知不觉地通过在他们能够获得的一系列制约与机会中追求自己的策略而再生产或改变这些阶级的差别。当文化的生产者在自己的场域中追求自己特定的利益的时候，他们不知不觉地在社会阶级结构中生产出同构的结果。[1]至关重要的是，知识分子在这个过程中起核心作用。通过在文化场域中的竞争，知识分子有助于把统治的文化秩序合法化并再现这种阶级结构，在服务于自己的特定场域的利益的同时，知识分子也服务于阶级结构的利益。

尽管布尔迪厄指出不同场域之间的同构性是结构性的与功能性的，但是这种同构性并不意味着独立于行动者的实践的客观特征。实际上，最后，布尔迪厄仍然回到习性的概念以解释场域之间的同构性。正是因为习性，行动者才表现出跨领域的相似倾向。习性是“存在于不同领域的潜在的实践原则”（Bourdieu 1977c：83）。[2]这样，场域分析并不意味着把特定领域的功能与个体、群体的实践相分离的客观主

[1] 的确，布尔迪厄暗示，当这个过程不是直接的、有意识的目标的时候，它是最成功的。在对法国天主教主教的研究中，布尔迪厄把牧师与俗人之间的交往与互动方式的效果归于他们“习性的类似”而不是有意识的设计(Bourdieu and de Saint Martin 1982：43)。

[2] 习性以及相关的资本的构成有助于布尔迪厄解释行动者在场域中采取的方向感。它们有助于回答如下的问题：“行动者在他们的实践中是表现得谨慎还是大胆?”布尔迪厄(1991d：16)暗示，这种习性的定向模式有助于把行动者安置在跨越不同场域的相似位置。

义。正是习性的实践逻辑建立了跨场域的潜在联系。因此，习性是“在场域之间客观地确立的结构同构或转化关系的真实原则”（Bourdieu 1977c：83—84）。

布尔迪厄声称自己并不认为所有的场域以及它们的功能上的与结构上的同构性建构了一个整齐划一的社会体系。[1]虽然他强调场域参与（field participation）的基本信念方面，但是，他反对假定在社会水平上存在帕森斯式的那种共有的规范秩序。布尔迪厄认为，由于场域的自主性独立于经济、政治和阶级结构的程度从历史上看变化不定，所以我们不能确立一个把各种场域联系起来的普遍的分类系统。布尔迪厄虽然承认场域是斗争的领域，但是并不把它们植根于更深的超历史的过程，比如资本主义发展。

但是，布尔迪厄热心地把自己区别于帕森斯、阿尔都塞传统的宏大社会理论，同时却贬低了自己的思想与理论的系统性特征。随着场域获得自主性，它们发展出了我将在最后部分分析的系统性特征。而且，布尔迪厄的确提出了两种代表广泛历史趋势的一般理论：文化场域的不断增长的自主性以及经济场域的最终的决定性。此外，他只把场域分析应用于分化的社会，而并不应用于对于阿尔及利亚或法国农民的分析，他似乎也反对把这种分析应用于对阿尔及利亚式的社会的研究。

这加剧了场域与习性的复杂关系中存在的紧张。虽然布尔迪厄要辨认场域的“不变的法则”及其相互关系，但他还是抵制那种代表客观主义的理论诉求。他的理论策略最终求助于作为场域之间同构性联系的基本根源的习性。结果是，场域概念的独特性就成为问题了。

结构的同构性观念代表了布尔迪厄场域分析的重要方法论原则，它常常也代表场域分析的解释原则。布尔迪厄带着极大的多面性与想象力来使用这个原则。但是这个原则的理论力量并不像最初看来那么强。在什么方面的同构性？虽然布尔迪厄在他的理论中反对功能主义

---

[1] 布尔迪厄把自己的框架与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关于社会形式中各个部门的接合的观点进行对比，声称：“我的确相信，不存在场域之间的跨历史的关系法则，我们必须分别考察每个历史事例。”（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109）

的理论又保留了社会功能的观念，但是结构同构性的功能主义含义依然需要澄清。而且，如果我们姑且承认在跨场域的个体与群体之间存在结构的同构性，我们依然需要知道这种“客观的”联合或对抗得以获得的社会过程。我们将在第九章分析布尔迪厄(1991c：245)如何用这个观念解释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政治联盟的能力。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发现他们都处于被统治的位置——虽然是在不同的场域中。但是，同样可能的是，也还有不少处于同构性的场域位置的群体却没有形成联合。什么样的过程与资源有助于我们理解某些群体形成了策略性的联结而别的却没有？[1]遗憾的是，布尔迪厄的结构同构观念没有阐明这个重要的问题就止步不前了。实际上，它过于经常地作为一种分析模式而起作用，以至于有一种自足感。虽然结构的定位可能的确有助于解释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必须通过同一地位的群体的成员关系、网络联系以及共同的世界观等因素来寻求对于这种联系的进一步理解。此外，应该补充的还有关于集体动员的政治学。

权力的场域：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

权力场域 (the field of power) 是布尔迪厄著作中最重要的场域。他赋予这个概念两种不同但又交叉的用法：一方面，它发挥着类似于“元场域” (meta-field) 的功能，在所有的场域中起分化与斗争的组织原则的作用，这是这个概念的最基本的用法；另一方面，它也指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级。[2]

---

[1] 这个问题是重要的，因为布尔迪厄(1991d：18)评论说，场域之间的结构同构性是非常不同于在特定的行动者之间形成信息流动的网络的某种东西。

[2] 布尔迪厄选择“权力场域”这个术语而不是“占支配地位的阶级”、“统治阶级”或“精英”，以表明这个术语是一种关系性的建构物，而不是指某类特定的人口。(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76；Wacquant 1993b：20—21)。他把这种术语的选择看作是抵制“现实主义的概念”的工具，这种现实主义的概念“标明的是把持这种我们称为权力的有形现实的实际人口”(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229)。关于这个概念的第二种用法的讨论，参见第七章。

布尔迪厄把冲突看作所有社会生活的基本动力。处于社会组织核心的是争夺权力的斗争。布尔迪厄的一个核心观点是，斗争是通过争夺符号资源与物质资源进行的。而且，布尔迪厄的基本主张是，文化资源，比如教育文凭，已经作为一种资本发挥作用，因而已经变成现代社会中新的、独特的分化根源。的确，依据布尔迪厄(1989c：373—385)的看法，社会等级结构(布尔迪厄称之为“交叉结构”)的两个主要的竞争原则塑造着现代工业社会的权力斗争，它们是：经济资本（财富、收入、财产等）的分配与文化资本（文化、知识、教育文凭等）的分配。布尔迪厄称前者为“等级结构的占主导地位的原则”，后者为“等级结构的从属原则”。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这两种资本类型的根本对立，描绘出布尔迪厄的权力场域。[1]

在布尔迪厄的分析中，个体、群体、机构、家庭等常常利用经济资源或文化资源以维护或强化自己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以法国为例。布尔迪厄把出现于19世纪晚期的权力场域视作“艺术家”与“资本家”之间的对立（Bourdieu 1989c；Wacquant 1993b：22—23）。但是，对布尔迪厄(1984a：115，123)而言，这种基本对立塑造了所有发达社会中最主要的文化冲突、政治冲突与社会冲突。[2]

布尔迪厄的绝大多数著作是研究经济与文化资本的对抗所可能采取的各种形式的。个体与群体的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政治选择，乃至他们的所有实践，基本上都可以依据这两种资本类型的分配来加以理解。[3]

---

[1] 布尔迪厄(1992：229—230)把权力场域界定为“在社会地位之间获得的权力关系，这种关系保证了社会地位的占据者具有一定数量的社会权力，或者一定数量的资本，从而能够进入争夺权力垄断权的斗争，这种斗争的核心方面则是争夺对于合法的权力形式的定义。

[2] 实际上，他把权力场域视作“超历史”的结构，其出现要早于现代工业社会的兴起。在最一般的水平上，这个交叉结构代表了所有社会中发生于“世俗权力与精神权力”之间的“支配性的劳动的分工所造成的基本对立”。

[3] 布尔迪厄(1984a：124)的确注意到了地理位置等因素也可以在决定个体与群体在经济资本、特别是文化资本的分配方面起作用。那些靠近文化中心(比如巴黎或纽约)的人，具有比较容易现成获得的文化资本。从法国的情况看，布尔迪厄注意到了由于经济与文化资本的差异而导致的工程师与私人企业经理的对立，以及工业雇员与商业雇员的对立，这两种资本的差异来自这样的事实：工业雇员常常与巴黎地区的大公司交往，而商业雇员则在法国各省的小公司工作。

作为一般规律，布尔迪厄发现，这两种资本类型的结构差异越大，个体与群体就越可能在争夺统治权力的斗争中彼此对抗。

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基本对立也划分了其他围绕不同的资本形式与资本组合组织起来的斗争领域。布尔迪厄(1989c：381)认为，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交叉结构划分与排列了所有其他的斗争场域(比如经济、政府、大学、艺术、科学、宗教、知识分子)。图 1 表明布尔迪厄(1983a：319，1984a：128—129)如何描绘与阶级结构以及文学与艺术场域相关的权力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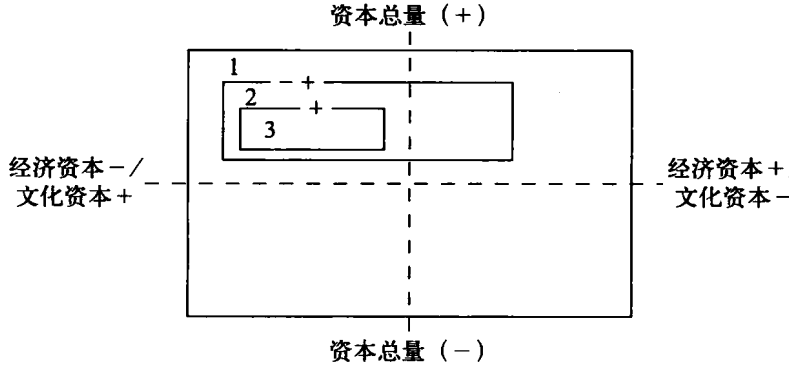

图 1

注释：

方框代表直角坐标系上的位置关系，坐标上的 Y 轴测量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总量，而 X 轴则测量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比例

关键词：

1. 社会空间或社会阶级场域
2. 权力场域
3. 艺术场域

EC = 经济资本

CC = 文化资本

在最一般的水平上，布尔迪厄把社会阶级场域(方框 1)描述为围绕资本的总量轴与类型轴构成的二维空间，垂直轴测量的是资本的总量而水平轴测量的是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相对数量。权力场域(方框 2)位于 X 轴(水平轴)的上方，即位于拥有最大量资本的社会空间，而它本身则又依据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两极而内在地分化。在权力场域

中，文学艺术场域(方框 3)处于相对接近文化权力的一极，方框 1 的左上角(这里的位置具有可观的资本总量，但是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是负比例关系)，因此，它占据的是权力场域中的“被统治的地位”，但在更大的社会阶级关系场域中又处于“统治地位”。 最后，文学艺术场域内部也通过经济/文化资本的对立而内在地分化为更加商业化的艺术形式与给同行消费的艺术(Bourdieu 1983a：320)。

各个场域就这样依据各自与权力场域中相互对抗的两极的相应的接近程度而分化。 一头是经济资本占中心的经济场域，另外一头是文化资本占中心的艺术场域。 政府场域与大学场域则占据一个居间的位置，前者更靠近经济场域而后者更靠近艺术场域。[1]布尔迪厄(1987c：851)发现，法律场域比艺术与科学场域更少自主性，因为它最接近政治场域。 这意味着，艺术与科学因为奖励专业与发展符号系统的缘故，而比法律较少依赖于经济与政治。 宗教场域接近艺术场域，因为它也是围绕争夺非经济的合法化的斗争而组织的；相反，新闻场域则更多地依赖于政府的与政治的圈子。[2]这样，文化场域依据它独立于政治的与经济的程度而变化。[3]布尔迪厄社会学的一个核心的目标是把文化活动

---

[1] 布尔迪厄直到最近才比较多地谈论他的国家概念。 在最近的著作中(Bourdieu 1989c：371—559，1993a；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111—115)，他认为随着官僚国家的兴起，出现了一种新的资本形式：“国家资本”(statist capital)，它是权力场域内部的争夺对象。 虽然早期的权力场域理论集中关注的是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但是布尔迪厄近来的思考把这种新的权力资源(国家资本)也包括了进来。 国家资本指的是统治所有场域以及在这些场域中流通的各种资本类型的权力形式。 在这种资本实施对于其他资本形式、特别是其兑换率的统治权力的意义上，它发挥的是某种“元资本”作用。 这种新的资本产生于各种不同场域，越来越集中于国家的趋势中。 布尔迪厄写道，“随之而来的是，国家的建构与权力场域的建构并肩而行，这个权力场域被理解为一个游戏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各种形式的资本的拥有者特别地为了争夺控制国家的权力——亦即争夺授予各种资本形式及其再生产(特别是通过学校教育系统)以权力的国家资本——而展开斗争。”(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114—115)

[2] 参见 Bourdieu 1996。 在布尔迪厄的理论术语中有时存在交叉重叠的情况，这种情况反映了(术语)在不同的语境中的使用。 比如，我们发现，有一次他阐述说，“‘政治场域’用以指称专门的政治机构与行动者(‘champ politique’)，而有时则也指政治与社会权力关系的全部场域(‘champ du pouvoir’)” (Bourdieu 1988a：545)，重点号引者加。

[3] 布尔迪厄把这种变化看作历史的、也是社会的。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社会中，文化场域相对于政治经济权力的相对自主性也变化。 他认为这种变化依赖于两个因素：(1)由统治阶级内部的各个阶层赋予艺术作品的价值；(2)“经济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Bourdieu 1983a：322)。

场域置于与权力场域的关系之中。[1]

每个场域都通过以下两极之间的“同构结构”而内在地分化：经济上占据统治地位而文化上占被统治地位的一极，与文化上占统治地位而经济上占被统治地位的一极（Bourdieu 1989c：383）。布尔迪厄对于社会世界的场域分析方法，就是要揭示这个结构在特定的斗争领域中所采取的形式。这是一种结构主义的分析：揭示所有社会与政治冲突的这个深层结构的转化形式。比如，即使是在经济场域内部，布尔迪厄(1989c：383；Bourdieu and Saint Martin 1978)也发现可以辨别以下两个群体之间的基本对立：(1)技术专家型的商业领袖，他们的训练、职业以及公司紧密地与公共机构有联系；(2)大家族公司的业主，他们主要在私人领域运作。前者是文化资本的继承者与学术资本的积累者，而后者则首先是经济资本的继承者。[2]

因而，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交叉结构既发挥着布尔迪厄场域分析的基石的作用，也发挥着社会分层研究的基础的作用。它既是场域之间也是场域内部的组织原则。正如我们将在第七章中看到的，它也发挥着社会阶级结构的组织原则的功能。

走向总体性实践科学：一项研究规划

在分析了布尔迪厄的场域、习性以及资本这三个基本概念以后，我现在要总结概括布尔迪厄一般实践理论的基本概念框架与方法论程序。如果说习性的倾向（the dispositions of habitus）是原初社会化的特殊阶级状况的产物，那么，它们所产生的行为却不是这个最初的阶级社会化

[1] 比如，布尔迪厄的《国家精英》分析了权力场域与大学之间的关系，他在1982年与莫尼克·德·圣马丁(Monique de Saint Martin)合作的对法国天主教主教的研究，把主教定位于与权力场域的关系中。

[2] 布尔迪厄指出，由于商业资产阶级正在不断地获得文化资本，所以这个传统的对立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削弱(Bourdieu and de Saint Martin 1978)。

的直接表达，也不是它所提供的资本形式的积累。不如说，行为是阶级倾向与特定场域的结构动力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当习性与被称为场域的斗争领域相遇的时候，实践就发生了；行为则反映着这个相遇的结构。这种关系是辩证的，包含着一个重要的时间维度。布尔迪厄的社会学分析因此既要求建构相关场域的结构，也要求建构行动者的阶级习性。在《区隔》(1984a：101)一书中，布尔迪厄提出了他的分析模式的简要公式：

[（习性）（资本）] ＋ 场域 ＝ 实践

布尔迪厄的完整的实践模式把行为理论化为习性、资本以及场域之间关系的结果。[1]他警告说，实践既不能被“还原为现存的条件，也不能被还原为产生习性的过去的条件……(而是产生于它们)之间的关系”(Bourdieu 1990h：56)。[2]实践不能还原为习性或场域，而是产生于由两者所代表的一套关系在某个时间点上确立的“相互关系”。在第八章，我们将在讨论布尔迪厄如何处理社会变迁问题的时候，批判地评价

---

[1] 这个公式清楚地表明布尔迪厄反对把实践归结为习性、资本或场域三者中任何一个的单独结果，而是它们的联合产生出实践。遗憾的是，这个公式更多的是把这三者混作一团而不是清晰地分辨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否习性与资本是相互作用的术语、而场域则是附加的？或者这个公式只是表明每个经验的研究都必须解释所有这三个因素？

在布尔迪厄的早期著作中，他的实践理论强调的基本上是习性，而当他发展出场域的概念以后，他的实践理论越来越对应于上述的公式。有一点从一开始就是清楚的：习性显然不是实践的单独根源，而是一种触发性、中介性的力量。实践不是简单地产生于习性而是产生于习性与客观的情景结构之间的互动。但是，当布尔迪厄(1977c：78)写道，“在实践中，正是习性……在实践的生产中并通过实践的生产实际地确立了这两个相关系统之间的联系”的时候，习性似乎是布尔迪厄所理解的驱动力。但是，只有到场域概念出现以后，习性与什么进行互动才产生出实践这个问题才得到充分的理论阐述。我们被告知，实践产生于习性与“客观事件”之间的“辩证关系”(82—83)。他还提出了“接合”概念来阐明习性在其中起作用以便生产出实践的条件。我们知道，与习性相遇的是“客观结构”、“关系系统”、“事件”、“事态”。但是只有到场域概念发展出来以后，我们才知道这些宏观现实的确切特征。有了场域的概念，我们越来越明显地看到布尔迪厄的主张：社会世界是由“多极”(polarities)所结构的。但是，恰恰是习性创造了不同场域之间的实践同构性。这样，虽然场域概念的发展为布尔迪厄关于宏观结构的思考提供了新的洞见，但是习性概念依然——虽然不再那么明显——是布尔迪厄理论大厦的中心支柱。

[2] 为了强调自己把实践理解为产生于习性与场域的相遇，布尔迪厄(1991d：20)着重指出：在他的模式中，实践不是机械地产生于行动者所拥有的各种形式的资本——后者正是他所批判的地位——获得研究传统的特征。但是，布尔迪厄(1991d：16—17)实际上在解释行动者在场域中采取的策略的时候，还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资本与习性的概念。

这种关系。

布尔迪厄（1984c：5—6，1987b：176；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104—105）指出了他对思想与艺术作品的研究的三个必要步骤：(1) 必须把特定的实践场域与更大的权力场域结合起来。这个步骤表明，社会分层与权力在布尔迪厄的社会学中具有居高临下的地位。以艺术家与作家的情况而言，我们发现，文学场域位于权力场域中、但却在权力场域内占据一个被统治的位置（Bourdieu 1983a）。而法律场域则相反，它更接近权力场域的统治极；(2) 应该辨识个体与群体在争夺艺术的合法化时所占据的对抗性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被研究的那个场域所特有的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形式是什么？相对于其他的资本形式，它们是如何分配的？这意味着分析场域中所有参与者的统治的与被统治的位置；(3) 分析行动者带入他们的相应位置的阶级习性以及他们在斗争场域中追随的社会轨迹。

这三个分析步骤，构成了布尔迪厄社会学的一般研究方法。对于实践的分析包括建构实践发生其中的场域以及行动者带入场域中的习性。下一章将考察布尔迪厄在自己的著作中三个实质性研究领域进行的场域分析：法国的社会阶级结构、法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以及法国的知识分子。

第七章

社会阶级与权力斗争

或许布尔迪厄对社会学实践的最大启示，是他对于微妙而强有力的社会差异形式的不同寻常的洞察力。我们在范围极为广泛的详细的人种学观察、人口统计表、文字文本、自传、访谈、问卷调查、人口普查报告等中都发现了这种才能。从专业的社会科学的标准看，布尔迪厄的研究风格属于异端，它把通常属于专业化研究的对象的那些方法和材料类型综合起来而缺少过渡。一段文学的或者哲学的引证与来自综合调查的百分比统计并列在一起，这正是典型的布尔迪厄的风格。在一位批评者看来(Collins 1989：460)，布尔迪厄的这种风格为他赢得了“世界上最成功的鸟瞰式研究者”的称号。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这种说法。在这一章我将尝试详细地描述布尔迪厄分层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核心特征。

布尔迪厄著作的一个核心的目的是展示文化与社会阶级如何相互关联。他认为文化实践是潜在的阶级差异的标志。这个观点使得他不同于那些强调文化生活的不确定性、偶然性与社会差异特征的当代许多后现代主义的声音，例如博德里亚(Baudrillard 1988a，1988b)。[1]但是，布尔迪厄计划阐述文化与社会阶级之间的这个联系又不把前者看作只是后者的一种附属现象。为了阐述这个主题，布尔迪厄重新形构了社会阶级的概念。阶级，就像资本、习性以及场域一样，是布尔迪厄社会

[1] 布尔迪厄(1984a：561)把自己在《区隔》中的观点与丹尼尔·贝尔(Bell 1976：33—84)较早时期关于不同的阶级文化在现代的后工业社会已经消失的主张对立起来。

学的核心概念。用他自己的话说，阶级是“一个普遍的解释原则”（Bourdieu 1984a：114）。[1]“原始的阶级处境”代表“所有可能的观点得以从中展开的点，同时也是这个原始的处境使得有些观点成为不可能”（Bourdieu and Passeron 1977：89）。但是，布尔迪厄把社会阶级加以理论化的方式却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部分的原因是他在使用这个术语时的范围、张力以及模糊不清。

本章意在阐明布尔迪厄如何思考社会阶级问题。我将从回顾被布尔迪厄看作在分层研究中具有关键意义的一些元社会学问题开始，这些问题集中于布尔迪厄所反对的客观主义的与单一的分层观。它们同时也涉及布尔迪厄所反对的本质主义的社会阶级观念，他喜欢的是关系性的研究方法。由于马克思主义一直是布尔迪厄重要的理论参照，所以，我将探讨布尔迪厄如何把自己的阶级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区别开来。布尔迪厄也实质性地借鉴了韦伯，我将先描述布尔迪厄如何修正了韦伯对阶级与身份群体（status）之间关系的理解，然后再概括布尔迪厄自己的作为多维度的、关系性的理论建构的阶级概念，他把这一阶级的概念清楚地区别于现实主义的社会阶级概念。然后，我将分析布尔迪厄在《区隔》（1984a）中对于当代法国社会的三阶级结构的描述，并特别关注他对于阶级内部各种阶层的分析。由于布尔迪厄认为每个社会阶级与阶级内部的阶层都有产生一套特定实践的特殊习性，所以我将呈现这些阶级习性中最重要的部分，并阐明布尔迪厄认为从这种习性中产生出来的不同的生活方式类型。最后，我将回到布尔迪厄对阶级冲突与阶级再生产——阶级关系的特征所在——的动力学的分析。

[1] 发达社会中社会阶级的存在与它们对于组织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对布尔迪厄来说是一个开始的预先推测，而不是有待证明的假设。布尔迪厄认为，关于社会阶级的分化是否存在以及有多大意义的争论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布尔迪厄的社会阶级原理论

指导布尔迪厄的研究的是两个关键的元社会学关切：超越社会生活的研究中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方法之间的基本对立，并用关于社会生活的关系性的概念取代实体主义的概念。布尔迪厄认为，关于社会阶级是否存在的论争是经过主观主义/客观主义之二元对立的扭曲的镜片过滤的。他写道：

> 社会阶级的问题是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对立的典型场所，这种对立把研究锁定在一系列虚构的非此即彼中（Bourdieu 1990h：289）。

布尔迪厄对社会分层的研究方法因此需要被理解为这样一种努力：超越社会阶级研究中各式各样的二元对立形式。同时，布尔迪厄也把社会阶级的概念看作是一个可以从中发现实体主义思维与本质主义意识形态的典型概念。这样，布尔迪厄提供了一个对阶级关系的替代性的关系性理解。

布尔迪厄认为社会世界是高度分化的。在这个世界中，个体与群体为了维持或强化自己在不平等地构建的社会空间中的相对地位而斗争。对他来说，社会不平等根植于资本类型的不平等分布的客观结构中。他因此反对他所谓的分层研究中的主观主义方法。在主观主义的标签下，布尔迪厄排出了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包括微观层次分析，诸如符号互动理论、人种志方法论、现象学，它们把社会分化看作是直接产生于微观互动的过程。这些理论之所以带有“主观主义的幻觉”，是因为它们没有能够认识到行动者把自己在等级化地结构的社会秩序中的处位特征（properties of their location）带入了每个情境与互动

中(Bourdieu 1984a：244)。[1]其次，布尔迪厄把那些将社会—阶级的存在与身份还原为个体的或集体的意识的研究方法包括在主观主义名下。第三，那种把阶级视作没有客观的社会现实根基的认知建构的观点也被布尔迪厄纳入主观主义。[2]

虽然布尔迪厄把社会区分的基础放在客观的结构中，他也反对对社会不平等的僵化的客观主义研究方法。在分层研究的客观主义的标签下，布尔迪厄列出了马克思主义、主流身份获取研究、网络分析以及所有其他的关于社会不平等的结构主义理论。这些极为不同的研究方法具有一个关键的共同特征：它们关注宏观水平的结构(常常以统计形式出现)，这种宏观结构对于参与其中的行动者来说很难发现，因而必须由社会科学家建构出来。[3]但是，布尔迪厄认为，行动者在他们对于社会世界的实践知识的基础上行动，而客观主义的研究方法却倾向于把行动者还原为对于巨型结构的简单反映。通过另外一种统计分析，布尔迪厄把自己的“结构主义的建构主义”方法表述为一种既包括行动者对于客观现实的知觉，又包含集体行动者的客观结构的方法。

在布尔迪厄单挑出来进行批评的统计研究方法中，结构主义的表现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理论。布尔迪厄批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关于社会阶级的经济主义的解释。[4]他尖锐地批评所有基本上依据一个

---

[1] 布尔迪厄(1984a：578—579)写道：“情境论——互动主义谬误的核心——使得正式确立并得到保证的各种地位之间的客观的、持久的关系结构(正是这种结构组织着每一次真实的互动)，被还原为瞬间的、局部的、流动的秩序(就像陌生人之间的偶然的相遇)，而且常常是虚假的秩序(就像在社会心理学的实验中)。相互作用的个体把自己所有的特征均带入到最偶然的互动中，而他们在社会结构(或者专门化的场域)中的相应位置支配着他们在互动中的地位。”参见 Bourdieu 1977a。在这部著作中，布尔迪厄精细阐述了“情境”与更大的结构性因素组成的“语境”之间的对立。

[2] 布尔迪厄把这个立场归入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他们反对挑战现存秩序合法性的任何形式的阶级分析。

[3] 布尔迪厄认为，喜欢通过阶级政治进行社会变革的政治左派倾向于采用这些方法的一种。他们把自己的社会科学家的作用看作是提供关于阶级结构的必要的经验材料，以便提高阶级意识以及为政治变迁作动员。

[4] 布尔迪厄对阿尔都塞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进行了批评，虽然他们把自己看作是反对早期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把文化仅仅看作是对潜在的经济关系的反映。

人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来对阶级进行理论分析的尝试(Bourdieu 1985e：723)。虽然布尔迪厄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是他相信一个人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只是塑造社会秩序的几种权力资源之一。追随韦伯的思考，布尔迪厄(1985e)认为社会空间是多维的，不能还原为一个单一的因果机制，比如经济。他主张：

> 社会阶级不是只依据一个人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界定的，而是依据与那个地位具有“正常”关系(即带有高度的统计学概率)的阶级习性界定的。(Bourdieu 1984a：372)

而且

> 对于阶级的界定而言，阶级的意识与阶级的存在一样重要，阶级的消费——不一定是奢侈的、符号性的——与阶级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一样重要(即使后者真的支配前者)(同上，483)。

符号的形式和社会的积累与分化形式也建构了社会阶级关系的重要方面。物质财富的占有或者缺乏不能解释发生于权力(包括经济权力)的行使与维持中的非经济的商品与资源的重要性。布尔迪厄批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忽视了阶级关系中的符号方面。应该有一种关于符号商品的政治经济学。[1]布尔迪厄把生活方式的指标、趣味、教育文凭、性别、年龄以及职业与收入都包括进他的阶级分析中，布尔迪厄的阶级是各种分层因素的综合物；就像整体大于它的部分之和一样，对于布尔迪厄而言，各种相关的分层因素的综合而不是任何单一的决定性因

[1] 布尔迪厄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批评带有两个局限。首先，它并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内部在阶级问题上的重大差异。与布尔迪厄一样，许多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强调阶级的符号以及客观的方面，强调其关系的方面，承认其历史偶然性(McCall 1992)。其次，布尔迪厄的批评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与韦伯的方法之间越来越突出的重合交叉，而布尔迪厄自己就是这种交叉的最好的例子。

素建构了社会阶级。[1]

布尔迪厄(1987f：3)进而指出，不管是主观主义的还是客观主义的方法，两者都带有关于社会阶级的本质上是“实体主义的”假定。他们假定，如果社会阶级存在，那么，它们只是在那里，等待着社会科学家去辨认与描述。而且，通过赋予阶级以内在的、普遍的属性——不管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两者都提供了关于阶级的“本质主义的”解释。但是，布尔迪厄认为，在现实中社会阶级不是简单地提出来的，而是一种通过争论什么是“关于社会世界及其划分的合法的观点”而建构的一种处于争夺之中的身份认同，通过尖锐批评实证主义，布尔迪厄声称，“在社会世界的现实中，就像在物质世界中一样，不存在整齐划一的边界，不存在绝对的断裂”。[2]只存在一种无限多样的可能性。集体的身份是通过物质资源与符号资源的动员而出现的。阶级的身份是通过“关系”建构的，因为它们反映了现存的阶级之间的对立的性质。实际上，正是这个为了争夺作为社会群体的阶级身份而进行的符号斗争的政治现实，被布尔迪厄界定为分层研究的适当的对象。

这导致布尔迪厄坚持在作为科学建构的社会阶级与作为真实地动员起来的社会群体的社会阶级之间进行清晰的区别。建构一个社会阶级结构的模式，产生的是对于“可能的阶级”的理论表述，而不是真实的社会群体。这样，客观主义的研究必须用主观主义的研究加以补充以便发现理论地建构的社会科学模型中的各个阶级是否确实对应于已被真正动员起来的社会群体。布尔迪厄的分层研究框架既包括对客观资源的测定，也包括对于各社会阶级的符号表征的测定。

---

[1] 布尔迪厄的多维度权力分析方法也与那些常常把社会差异还原为单一维度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分层研究不同。这种研究包括只考虑职业变化的流动性研究。这种研究也包括在不同资本形式的综合指标的基础上确立抽象的不平等社会等级体系的那种分层研究，例如华纳的研究(Warner and Lunt 1941)。布尔迪厄(1984a：125)希望通过强调几种不同的资本拥有形式的差异，以及为什么不同资本类型之间的“兑换率”是阶级斗争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来摆脱这类理论阐述。

[2] 他指出，最能够传达社会世界中不存在“整齐划一的边界”、“绝对的断裂”的观点的形象，乃是火焰的形象，这个形象是从巴什拉那里借用来的，“火焰的边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Bourdieu 1987f：13)。

如果说经济主义代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理论的一个重要的客观主义缺憾，那么，它关于阶级的边界的前提假定则代表了一种潜在的实体主义的假设。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是在阶级之间划出整齐划一的逻辑的与经验的边界，并依据个体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对个体进行分类归并。法国的普朗查斯(Poulantzas 1975)、博德洛、埃斯塔布莱、马莱默特(Baudelot, Establet and Malemort 1973)的研究，美国的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 1985)的研究，都是这类阶级分析的最好的例子。布尔迪厄尖锐地批评所有在阶级之间、阶级内部的各个部分之间进行边界划分的尝试。因为在布尔迪厄看来(1987b：64—65)，阶级的定义本身就是社会斗争的对象，阶级的边界也是斗争的对象，它不可能被社会科学家一劳永逸地把握。阶级的边界只有通过把个体动员为群体才能形成。

布尔迪厄还认为，社会边界的机构化程度依据阶级之间的冲突状况而变化。阶级边界的机构化依赖于特定的群体把自己的社会分化观强加于社会的相对符号权力。这就需要研究阶级斗争的符号维度，因为阶级的身份本身既是一个物质地建构的东西，也是一个知觉与概念性的东西。

布尔迪厄相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特别易于把阶级的理论建构混淆于真实的社会群体。他认为，“当马克思主义把现实假定为理论抽象的时候”，它犯了“理论上的谬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规划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常常“从可能性滑向现实性，从理论的阶级滑向实际的阶级”，并因此把“纸上的阶级”(classes on paper)或者“逻辑的阶级”(logical classes)混同于真实的、动员起来的阶级(Bourdieu 1987f：7)。[1]

然而，对布尔迪厄来说，如果说与财富的拥有与否相关的生存条件构成了阶级形成的必要条件，那么，它们决不代表阶级身份认同的充分

[1] 布尔迪厄(同上)写道：“通过把建构出来的、只作为纸上阶级存在的阶级等同于以动员起来的群体形式存在的、带有绝对的与关系性的自我意识的阶级，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混淆了逻辑的事物与事物的逻辑。”

条件。在这里，布尔迪厄参与了马克思主义内部关于什么样的条件最可能激发从“自在的阶级”向“自为的阶级”转化以便产生阶级政治的争论。[1]布尔迪厄认为，那些强调自在的阶级状况对于阶级形成的重要性的人，与那些强调自为的阶级的唯意志论的人，都简单地陷入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客观主义/主观主义的二元对立。布尔迪厄声称，马克思主义常常依据“要么是彻底决定论的，要么是彻底唯意志论的逻辑”来阐述这个(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转化(Bourdieu 1985e：726)。[2]决定论的观点把阶级的行为描述为是直接产生于客观生产关系中的潜在矛盾对抗，而唯意志论的观点则依据一种主观的“意识的争夺”(prise de conscience)——它通常是通过觉悟了的政党领袖诱发的——来辨认阶级行为。相反，布尔迪厄力图提供一种把阶级意识与阶级行为联系于潜在的生存条件同时又不陷入决定论或唯意志论的社会阶级理论。[3]

布尔迪厄认为，不管是决定论还是唯意志论，都不能解释生活机会及其符号表征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产生阶级的身份认同与阶级行为所需要的领袖的符号劳动。[4]“纸上的阶级”只有在符号的与政治的劳动赋予它以认同与动员的时候才可能成为“现实的阶级”。事实是，

---

[1] 布尔迪厄与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理论这个方面的论争，实际上是着重点的差异而不是根本性的差异。因为人们早就承认，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自在的阶级才能变成自为的阶级。参见吉登斯(Giddens 1973：29—30)对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社会阶级模式的表述。

布尔迪厄反复声称，真实的阶级不是“纸上的阶级”，这似乎并不表明与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上的决裂。马克思自己关于阶级的思想是在变化的。有些时候他把阶级理解为任何与生产工具具有相同关系的个体的组合，而不管他们是否具有阶级意识；而有些时候，他强调个体的组织只有在他们的共同利益把他们引向集体意识与行为的时候，才可以被称为阶级。布尔迪厄希望强调的就是阶级的这个方面。

[2] 为了突出这点，布尔迪厄不承认这个争论中存在的观点的多样性。布尔迪厄把决定论与唯意志论分为两极的做法似乎把“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参见 Gouldner 1980，1985)。但是，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包括一些像葛兰西(Gramsci 1971)那样的经典理论家，已经在这两个极端之间采取中间立场。

[3] 在依据行动者表征以及生活机会指标来理解阶级，并强调阶级意识与阶级动员需要符号的与组织的工作的努力中，布尔迪厄(1987f：6，8)指出了森特斯(Centers 1949)，阿尔布瓦克斯(Halbwachs 1959)，汤普森(Thompson 1963)的研究的相似性。

[4] 阶级的行为并不自动地产生于阶级的处境，布尔迪厄强调的这个观点显然与韦伯在阶级处境与阶级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所持的立场相似。韦伯(Weber 1978：929)写道，“从一种共同的阶级中产生联合或者社会行为，这决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因为无论生活机会多么不同，依据所有的经验可知，这个事实决不会产生‘阶级行为’(阶级成员的社会行为)”。

正是知识分子的符号劳动代表了发展阶级认同、产生阶级行为时的重要因素。直接对阶级组织负责的工会与政治党派领袖，以及产生官方化的科学与官僚阶层划分的社会科学家和国家官员，在产生阶级的社会身份中都起着关键作用(Bourdieu 1985e：727)。这样，对布尔迪厄而言，在他对阶级关系的理解中，知识分子起着核心的作用。

阶级与身份

布尔迪厄超越阶级分析中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二元对立的另外一个方法可以在他如何使用与修正韦伯的阶级与身份概念中发现。布尔迪厄(1984a：xiii)指出，他希望“重新思考韦伯在阶级与地位(Stand)之间进行的区分”。对韦伯来说，阶级的概念是一个统计学的建构，用以描述一个人在生活机会的分配中的市场处境，而身份群体(status group)的概念则相反，指的是以共同的生活方式为基础的真实的社会群体。韦伯在一个人的生活机会与身份群体成员资格之间发现了大量的交叉，但是这种交叉不是必然的。身份群体可能与阶级交叉，“但是”，韦伯(Weber 1978：932)指出，“身份荣誉并不必然与阶级处境联系在一起。相反，它通常与纯粹的财产权利处于尖锐的对立中”。从这个观点出发，布尔迪厄发展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主张：身份的功能是掩盖潜在的阶级利益。

在《阶级状况与阶级立场》这篇早期的文章中，布尔迪厄(1966)在“阶级状况”(class condition)与“阶级地位”(class position)之间进行了分析性的区分，他把阶级状况与基本的生存状况(韦伯的“阶级”)相联系，而把阶级地位(韦伯的“身份”)的特征描述为产生于阶级之间的对抗与团结的符号性的区分。“处境的特征”是针对基本的生存标准而言的生活机会，而“地位的特征”则产生于身份竞争的动力学，阶级地位(即身份差异)代表产生于表面上看来非物质性差异的那种阶级斗争

形式，而阶级处境(class situation)(即经济权力)则代表为阶级立场设定广泛参数的物质状况。

布尔迪厄指出，对韦伯来说，财富的拥有与否是阶级处境的基本决定因素，而身份群体却是通过他们能够与潜在的阶级处境保持的距离界定的。 也就是说，是通过与潜在的经济必然性的距离界定的。[1]布尔迪厄(1966：213)指出，我们不应该把韦伯的区分看作是把“两种真实的联合体类型”对立起来，而应该把它们看作是“名义上的联合体”，这种名义上的联合体

> 产生于选择强调经济的方面还是符号的方面，因为这两个方面在现实中总是共存的(通过依社会与阶级而变化的不同的比例)，共存的原因是符号的差异总是从属于它们所表达与改变的经济的差异。

这样，布尔迪厄(1980a：214)借用了韦伯的以“生活方式”为基础的身份群体的概念框架，但是认为它们不是“不同于阶级的另外一种群体类型，而是否定自己的统治阶级属性的统治阶级，或者说是升华了的因而也是合法化了的统治阶级”。 这样，阶级在日常生活中就采取了身份群体的外表。[2]

这一对社会阶级与身份之间关系的重新阐述，使得布尔迪厄能够把文化、趣味、生活方式指标等综合进一种社会—阶级的框架中。 它标志着布尔迪厄通过把文化阐述为社会阶级的一种建构性的特征以及通过

---

[1] 韦伯(Weber 1978：927)写道：“‘财富’与‘财富的缺乏’是……所有阶级处境的基本范畴。”布尔迪厄(1966)注意到，韦伯(1978：937)阐述了阶级与身份群体的差异：“我们或许可以简单地说，阶级是依据人们与商品的生产和占有的关系而得到划分的，而身份群体则是依据人们的商品消费原则——表现为特点的生活方式——而得到划分的。”

[2]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布尔迪厄关于经济资本与符号资本的关系的思想的复杂性。 这种关系既是积极的，也是消极的。 正如与阶级的地位相联系的身份差异既否定又标志着阶级状况一样，符号资本也是一种否定自己是经济资本的经济资本。

把身份辨认为错误意识的一个来源，而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拉开了距离。布尔迪厄提供了一种阶级符号化的身份模型，在这里，文化的差异被用作阶级差异的标志。阶级的差异表现为把个体与群体在社会荣誉的天平上进行排列、而不光是依据经济利益进行划分的身份差异。但是，它们因为通过强有力的关于个体才能、秉性、天赋品质的意识形态而得到了合法化，因而不被识别或者被错误识别。[1]

布尔迪厄对于阶级与身份的重新阐述是复杂的，而且并非没有模糊性与紧张。布尔迪厄承认这种关系本身就是依据社会阶级而变化的。[2]对于某些阶级而言，比如底层阶级，地位的特征（positional properties）可能直接反映由于极度有限的物质资源而导致的社会化。这里，阶级的地位与阶级的处境实际上是等同的。相反，对于中产阶级而言，地位的特征不那么直接地取决于阶级处境，因为他们的地位更多地来自阶级间的差异动力学，这种动力学对于经济上有优势的群体而言比较容易获得（Bourdieu 1966：205）。布尔迪厄因此认为，有限的物质生存状况对于经济上极度匮乏的阶级具有更大的约束性，而对于物质上优越的阶级而言，地位则显得更加重要。潜在的解释原则似乎是：符号的差异随着与必然性的距离的增长而提高。

最后，阶级/身份的差异还与另外一个差异——布尔迪厄有时把它称

---

[1] 参见加尔特曼（Gartman 1991）对布尔迪厄关于文化实践的阶级差异模式的新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式的批评。加尔特曼指责布尔迪厄通过把文化结合进对阶级的界定而在阶级与文化之间确立了一种“同义反复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而言，阶级基本上是由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决定的，而生产关系反过来又决定生活方式与文化（上层建筑）。加尔特曼进一步评论说，随着大众消费社会的出现，文化差异不再标志潜在的阶级差异。消费选择方面的差异，显示的不是个体身份差异或社会荣誉差异，而是收入差异。这些认识使得注意力偏离生产方面的阶级不平等，偏离社会荣誉的领域而转向收入竞争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起作用的是努力勤奋以及运气。

两套经验性的问题把布尔迪厄区分于加尔特曼的观点。首先，在社会阶级之间消费偏好中对大量实际经验差异存在着分歧。加尔特曼把这些差异最小化，而布尔迪厄则强调这些差异。其次，在消费者如何实际地知觉生活方式差异的问题上也存在分歧。加尔特曼认为这些差异是依据产生于竞争市场的收入差异的纯粹量化的术语被知觉的，而布尔迪厄把它们看作是通过非经济的身份差异被知觉的。

[2] 在1966年的文章中，布尔迪厄（205）承认他的结构方法的解析力“依据它所分析的社会阶级的地位，以及地位特征不能简化为状况特征的程度而会有相当大的变动”。

为阶级的“内在的”特征与“关系性的”特征的差异——相关联。[1]内在特征标志的是“物质生存状况，以及对于社会世界的原始经验状况”，而阶级—地位特征则是关系性的(Bourdieu 1987f：6)。在这里，布尔迪厄把阶级处境与阶级的内在特征联系在一起，它传达的是基本的“唯物主义的”阶级意象。但是，布尔迪厄同时也谈到了阶级地位的“关系性的”特征，这种特征的效力产生于与其他阶级相关的相对优势或劣势——是“高于其他阶级还是低于其他阶级或者处于它们之间”(同上)。[2]

这种“内在/关系性”的区分与布尔迪厄反复强调的要从社会学的分析中根除所有“实体主义”假设的要求之间存在紧张。内在的物质状况是否应该像所有地位的特征一样被关系性地加以解释呢？我们是否应该关系性地阐述阶级的地位以及阶级的处境呢？难道处境与地位之间的区别不是意味着关系性的逻辑只适用于后者而不适用于前者吗？如果关系性的逻辑也适应用于阶级处境，因而，即使是一个阶级的物质的生存状况也应该被看作是与其他阶级相比较而存在的，那么，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对于阶级地位的思考是更加关系性的与比较性的？

布尔迪厄的建构的社会阶级

如果社会阶级对布尔迪厄而言是基本的社会学的编组，那么，他对于这个术语的使用就制造了某些混乱。有时候他对于这个术语的使用明显地是马克思主义的，比如当它指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的时候；但更常见的是，布尔迪厄对这个词的使用更加接近韦伯的“市场状况”

[1] 这个差异出现在1966年的那篇文章《阶级状况与阶级地位》中，但是又再次出现在他近来关于社会阶级的论述“什么构成了一个阶级？”》中(1987f)。在布尔迪厄的《社会空间与群体发生》(1985e：724—725)中，行动者是通过他们在社会空间中的“相对地位”界定的，但是在社会空间中的阶级既有“内在的特征(他们的状况)，也有他们的关系性的特征(他们的地位)”。

[2] 在这篇文章中，他并没有阐明这种“关系性的”特征是否基本上是符号性的，或者是否也包括物质的方面。

(market situation)。在另外一些时候，布尔迪厄的“社会阶级”被当作一个宽泛的分类范畴。“阶级”有时指的是一个特定的群体，比如劳动者、老人、妇女等。此外，这个词有时候还是一个认知区分与社会区分的工具，它可以具有相当不同的含义，而布尔迪厄很少提供定义以便为读者澄清他的意图。

依据布尔迪厄的元社会学思考，他会提供什么样的关于阶级的替代性概念呢？布尔迪厄如何建构他的“理论的”阶级？与马克思和韦伯一样，布尔迪厄依据权力与特权来思考社会阶级。但是正如布鲁贝克(Brubaker 1985：761—762)敏锐地指出的，布尔迪厄的阶级概念不同于马克思，也不同于韦伯。布尔迪厄虽然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是他并不首先依据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来界定阶级。他的阶级概念也不代表韦伯的“市场状况”。他建构的阶级是依据“在社会空间中的相似地位”得到界定的，这种相似的地位提供了“相似的生存状况与制约因素”，因此创造了“相似的倾向”，这种倾向反过来又产生“相似的实践”(Bourdieu 1987f：6)。阶级是“具有相同习性的生物性个体”组成的群体(Bourdieu 1990h：59)。换言之，他把社会阶级界定为具有相似的生存状况与相应的倾向系统的个体的任何一种组合。他还把社会阶级的概念与符号的与社会的分类斗争联系起来，这种分类斗争争夺的是“对社会世界的合法再现的垄断权”(Bourdieu 1990c：180)。[1]

因此，布尔迪厄的关于阶级的理论阐述并不与资本主义特有的历史发展相联系——像马克思那样。虽然与韦伯的生活机会相似，但除了包括市场力量以外，阶级还包括倾向。社会阶级变成了一个对于所有具有相似的生活机会与倾向的社会群体而言的发生学术语。在这个方面，对于布尔迪厄而言，阶级类似于涂尔干所说的具有共同的

[1] 布尔迪厄把争夺符号分类的斗争看作是“阶级之间(不管是代与代之间、性别之间还是社会地位之间)每一种类型的斗争的”核心特征。

经验与集体表征的群体范畴（Durkheim 1965；Durkheim and Mauss 1963：81—88）。[1]

那么，对布尔迪厄而言，社会阶级的重要构成因素是什么？他依据各种资本的数量与结构以及它们在时间过程中如何变化来界定社会阶级地位。最基本的资本是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以及符号资本。虽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因社会的不同而不同，但是重要的因素似乎总是那些最直接地与基本的“物质生存状况”相关的因素（Bourdieu 1984a：106）。关于法国与美国，布尔迪厄明确地把经济资本排列在最重要的位置，然后是文化资本。但是这不见得是每个社会的情况（Bourdieu 1987f：3—4）。

布尔迪厄的阶级概念还考虑到其他的分层因素，比如性别、种族或者民族、居住地、年龄等。与经济因素一样，这些也是阶级的“不可分离的”特征。它们常常也是社会阶级的建构性因素，但是它们似乎不是基本的资本形式。在《区隔》（1984a：102—109）一书中，布尔迪厄把它们当作是“从属于”那些直接影响基本的物质生存状况的资本的。布尔迪厄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是复杂的，并可能导致误解以及引来合理的批评。

让我们看看他如何处理社会阶级与性别的关系。布尔迪厄（1984a：107—108）认为：

> 性别的特征不能独立于阶级的特征，就像柠檬的黄色不能独立于它的酸性一样。在本质上，一个阶级是根据它赋予两性、赋予两性的社会地建构的倾向的地位与价值而得到界定的。这一点解释了为什么实现女性特征的方式就与阶级和阶级内部的阶层数量一样多。无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表征上，两性之间的劳动分工在

[1] 在一次与布尔迪厄的学术访谈中，迪马吉奥（DiMaggio 1979：1470）注意到布尔迪厄思想中的涂尔干的分量。

> 不同的社会阶级中采取了极为不同的方式。所以，一个阶级或阶层的真实的本质是按性别或年龄的不同所进行的分配得以表达的，或者更有甚者，由于它的未来是至关重要的，所以，阶级或阶层的本质也是通过这种分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趋势界定的。

这里，布尔迪厄肯定性别作为社会阶级的一个建构因素的重要性。性别的特征不能“独立于”阶级，也不能把它界定为一个“本质的方面”。为了说明这一点，布尔迪厄(105，108)指出，一些特定的职业，比如医疗与社会服务，是高度女性化的，或者，在法国的学校中，虽然出身于同一个阶级，男性最可能研究科学而女性则最可能研究文学。

然而，性别创造的社会划分发生在阶级内部而不是阶级之间。事实上，布尔迪厄(107)阐述了“资本的数量与构成赋予其他因素(性别、年龄、居住地等)加诸实践之上的限定以特定的形式与价值”。

在后来的一篇论述社会阶级的文章中，当布尔迪厄(1987f：7)谈到在界定与理解社会世界的斗争中与阶级原则进行竞争的“种族的或者民族的”分层原则的时候，他继续了相同的思路。布尔迪厄的一些理论框架暗示性别可以成为一种资本的形式，并且本身就构成一个社会阶级。他偶尔把性别阶级(gender class)当成与社会阶级等价的东西(Bourdieu 1984a：468，1987f：15)。更经常的情况是，他认为性别可以作为一种能够创造性别阶级的分层机制。事实上，以性别、种族、宗教或民族性为基础的次级的社会分化，与阶级构成的“真实的潜在原则”(Bourdieu 1987f：7)竞争，并阻止以社会空间中的客观决定因素为基础的“可能的”阶级转化为真实的阶级。可能存在布尔迪厄愿意称为阶级的、真实的且已经动员起来的社会群体，即使它们根植于他所说的社会分化的“从属的”根源。但是，似乎只有当它们同时调动起经济与文化资本的时候，它们才成为阶级。性别作为从属的因素构成了“潜在的分化路径”之一，一旦它被调动起来，就能够“或深或浅、或长或短地分解(社会阶级)”(Bourdieu 1984a：107)。但是，尽管性别

是一种“潜在”的动员资源，却不大可能成为与社会阶级一样持久的、强有力的社会划分。[1]这样，性别、种族、年龄或宗教等从属的因素，虽然被包含在建构而成的阶级之中，但是对于阶级动员而言却显得不像物质因素那样具有潜力。

布尔迪厄(1984a：468)把性别当作“从属的”阶级建构因素，这似乎与他在自己著作的其他地方提出的性别是重要的社会划分的观点相冲突。实际上，这种性别是符号暴力的范例形式。这个观点出现于他早期的人类学著作中，并在近来关于性别统治的一篇文章(Bourdieu 1990e)中得到重申。这个观点提出了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以代表一种基本且普遍的社会组织原则，但是它并没有被综合进他关于阶级的分析中。事实上，在布尔迪厄著作的不同地方，性别似乎起着两种不同的作用，而它们之间的关系依然是不清楚的。一方面，当布尔迪厄在《区隔》一书中写到“基本的生存状况”的时候，他唤起的是一幅“远离必然性”的唯物主义意象，并把性别界定为在这个分层框架中的一个从属的可变因素。但是，在他的著作的其他地方，他把关于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的性别象征看作是所有的社会等级中的统治形式。这两种观点的相互关系如何，依然不太清楚。

这一复杂的论辩路径意味着布尔迪厄力图描绘出处于马克思主义赋予阶级的重要性与女权主义赋予性别的重要性之间的一个位置。[2]针对马克思主义，布尔迪厄通过坚持阶级的核心特征包括了像性别、种族、宗教、民族性那样的一些分层特征而为对阶级的多元理解辩护。但是，是否存在与客观的社会阶级同样重要的性别阶级——就像他的某些理论表述所暗示的？在这里存在模糊性。比较肯定的是，布尔迪厄承认性别能够建构出一种与社会阶级竞争的社会分化资源。但是，他关

[1] 布尔迪厄(同上)写道：“以从属的标准(比如性别、年龄等)为基础动员起来的群体，可能不像以物质生存的基本决定因素为基础动员起来的群体那样持久而深刻地团结在一起。”

[2] 虽然女权主义从来没有像马克思主义那样被布尔迪厄看作重要的理论资源。

于性别最终不能像社会阶级那样把动员起来的社会行动维持下去的主张，却表明了他与绝大多数女权主义者的差距。[1]

布尔迪厄的方法论更加加剧了他的立场的复杂性与模糊性。布尔迪厄更多的是依据全部变量而不是分离出个别变量进行精确的测定来推论的，他把阶级当作各种因素的结构聚合或结构整体加以思考，反对把其中的个体特征抽象出来作为关键性的指针。布尔迪厄的结构主义的与反实证主义的材料分析方法强调的是“整个的关系系统，这种系统构成了位于任何特定的相互关系中的特殊影响力与影响方式的真正原则”（Bourdieu 1984a：102—103，106—107）。这使得他能够批评那种更加传统的多变量的建模技术，这种技术试图测量各个独立的变量的相对重要性。他只是在建构而成的综合中肯定不同的资本类型的相对重要性，而从不肯定作为个别变量的相对重要性。而且，关于他所偏爱的统计模型多大程度上比别的模型更加适合于材料，他没有作出说明。

如果阶级是具有相似的客观机会倾向与主体倾向的个体的组合，它们如何被经验地得到再现？一个反复研究的发现不是表明在教育与职业上平等的个体常常在态度与行为方面极为不同么？布尔迪厄（1984a：106）承认这个难题，但是他更多地谴责社会学中普遍使用的方法：

> 社会阶级不是通过一种特征界定的……也不是通过各种特征的综合（性别、年龄、社会出身、种族背景……收入、教育水平等）界定的，甚至也不是通过从一种基本的特征（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开

[1] 参见麦考尔（McCall 1992）对布尔迪厄的性别观的深刻的女权主义批评。在批评布尔迪厄把性别贬低为相对于社会阶级的“从属的”社会分化以后，她阐述了对布尔迪厄的可能的“另一种解读”，这种解读可能把性别作为一种身体化的资本形式加以思考。而且，她在布尔迪厄关于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是所有社会秩序中基本的二元对立的主张中发现了一种强有力的“跨阶级的性别象征主义”（cross-class gender symbolism）。但是，她依然批评布尔迪厄“过于僵化而决定论地”界定这个性别的象征主义（同上，847）。麦考尔（851）认为，布尔迪厄把性别划分当作一种建构所有社会生活的“普遍的与自然的”范畴加以接受，而不是承认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是建构而成的、处于争夺之中的身份，也不承认个体可能经验到性别边界的模糊性。

> 始排列的一系列的特征界定的……而是通过所有相关的特征之间的关系结构界定的，这种结构把它的特殊的价值赋予这些特征中的每一个，赋予它们在实践中产生的效果。

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阶级指标可以作为阶级的充分条件，布尔迪厄还强调纯统计学分析的局限性。相反，阶级分析需要的是一种特殊的分析方法，它是一种

> 建构与观察的工作……把一系列在统计学以及社会学意义上相互关联的属性为特征的、（相对）同质的个体组合分离出来（Bourdieu 1984a：259）。

在努力把两个整体的要素系统加以集合的意义上，阶级分析包括“建构的工作”，这两个整体的要素系统是：外部的生存条件以及它们的相应的习性。布尔迪厄总体上依赖不同职业的成员的资源、活动以及态度方面的材料，但是，他也强调包括居住地、性别以及年龄等在内的“次级的属性”。

这样，对于布尔迪厄而言，社会阶级总是一个“建构而成的阶级”，它形成于统计学证据与人类学描述——常常由访谈、照片、广告摘录以及大众出版物加以补充——的想象性综合。布尔迪厄的“建构的工作”类似于布鲁贝克（Brubaker 1985：768）所说的韦伯—普鲁斯特方法”（Webero-Proustian Method）：它类似于一种理想类型的资本形构，这种形构带有被观察到的个体用以标示社会等级的方法与风格的精妙。《区隔》一书最好地阐明了布尔迪厄是如何使用这个方法的。在这本书中，布尔迪厄根据经济与文化资本、习性、生活方式的差异，提供了一幅将各阶级区分开来的当代法国阶级结构的图像。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他的这种描绘。

法国的社会阶级结构

布尔迪厄把社会阶级当作界定场域的各种资本形式的结构形构加以思考，正如第六章图 1 所描述的，社会阶级的场域是通过资本的数量与形式加以建构的，它“被理解为一系列实际地可以利用的资源与权力”（Bourdieu 1984a：114）。最重要的是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1]为了依据其最基本的生存状况建构最具有同构性的个体组合，布尔迪厄建构了一个三维的社会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三个最基本的维度分别是：资本的数量、资本的构成以及社会的轨迹。[1]在《区隔》一书中，布尔迪厄运用这个框架简要勾勒了关于当代法国的阶级结构观。

资本总量的差异划分了阶级之间的分化，就法国的情况而言，资本总量的差异界定着总体的三个层次分化结构，它包括统治阶级、中产阶级以及工人阶级。[3]对几乎每一种资本的实质性的拥有，使得统治阶级——布尔迪厄的著作集中研究的就是这个阶级——在分层的秩序中区别于其他的社会群体。从职业的范畴来看，布尔迪厄（1984a：128，1989c:379—383）所说的统治阶级包括自由职业者、大学教师、高级国家公务员、大企业的老板、高级管理人员、艺术家与作家。在阶级谱系的另一端，则是工人阶级，他们只拥有非常少的资本。布尔迪厄把各种类型与各种技术水平的手工劳动者（不管是在现代工业部门还是现

---

[1] 有时候，布尔迪厄（1986a）把“社会资本”也加入到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中，作为三种主要的资本形式之一。社会资本是“社会关系、社会荣誉以及社会尊重的资本”，它可以被转化为经济的、政治的以及社会的优势地位（Bourdieu 1984a：122）。但是构成布尔迪厄关于现代法国社会阶级结构模式的基础的却是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

[2] 关于这个理论的最简洁的阐述见布尔迪厄（1984a：114—132，1985e：723—724）。

[3] 布尔迪厄（1984a：345—346）在可以互换的意义上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这个术语指称统治阶级、用“小资产阶级”这个术语指称中产阶级。至于布尔迪厄是在复数的意义上还是单数的意义上使用统治阶级、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则取决于他是意在强调阶级内部的关系还是阶级之间的关系。

代农业部门）都归入工人阶级。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则有范围宽广的中产阶级，他们具有中等数量的资本积累。[1]

资本拥有的构成的差异则划分了阶级内部的各个部分。统治阶级通过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不平等的分配而在内部发生分化。[2]在这个分化的一极，可以发现这样的一些职业：作家、艺术家、大学教授，他们有丰富的文化资本但是经济资本却不那么丰富。而在另外的一极，则是大企业主与金融家，他们的经济财富与他们的文化资本不相称。而在这两极之间则可以发现私人与公共部门的自由职业者与高级管理人员。[3]在发达的工业化社会中，统治阶级的这三个组成部分为了获得有价值的资源与权力地位，同时也为了关于文化合法性的定义而展开斗争。[4]他们是权力场域中的主要的竞争者。

布尔迪厄（1984a：122—123，339—341）在中产阶级内部的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分配方面也发现了相同的“交叉结构”，比如，它使得小学教师与小商贩（例如店主与手艺人）相互对立，因为前者在文化资本方面相对富有而后者则拥有相对多的经济资本。[5]初级的企业主管、技术人员、文职人员、医生、媒体从业人员以及健康与服务职业则处于

---

[1] 虽然布尔迪厄并不试图在自己的研究中划分阶级的边界，但是，从他对于职业概念的运用中，我们发现他显然并不像有的人，比如图雷纳（Touraine 1973）那样觉察到一个新的、扩展了的、包含大量低水平白领职业的工人阶级的出现。布尔迪厄的分析表明，蓝领与白领工人之间的传统的划分依然跨越范围广泛的生活方式的指标。

[2] 布尔迪厄关于统治阶级这个理论的最全面的表述见《区隔》（114—115）。但是，在“文化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一文（Bourdieu 1973a）中，已经有这方面的早期表述，这个表述把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不平等的分配看作是统治阶级内部分化的主要根源。

[3] 布尔迪厄依据不同资本类型的构成进行的对于阶级内部的分化组合的理论表述与伦斯基（Lenski 1952，1954）对于身份差异的分析存在一定的类似。他们都关注社会分层的多方面特征，以及由资本的不同类型引起的态度与行为方面的不相称。但是，他们在阐明有价值的资源的不相称性时，所选择的方法存在差异。布尔迪厄拒绝使用一种综合指数作为社会阶级的标志，这反映了他的反实证主义的立场以及他阐明阶级内部细微分化的愿望。

[4] 统治阶级自身内部分化的观点当然不是始于布尔迪厄。曼海姆（Mannheim 1956：156）在1936年就指出，“现代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有双重的社会根源——一方面是资本的拥有者，另一方面是那些其惟一的资本就是他们接受的教育的个人。因此，虽然谈论有产阶级与受教育阶级是司空见惯的，但是，教育的因素与财富拥有因素在意识形态绝对不是一致的”。

[5] 在一个更加非总体化的分析水平上，同样的分化原则把艺术和手工艺人与其他各种小企业主加以分离。

这两极之间。布尔迪厄（1984a：354—371）特别关注这些中间阶层或“小资产阶级”，他把他们称为“新小资产阶级”。[1]布尔迪厄把这些新的职位的特征概括为文化资本密集型的、但是又相对地不规则的，集中于符号/象征的商品与服务的生产领域。它们许可“文化权利”的最大化，因为它们并不代表通过职业化与正规教育而确立的标准化的知识类型。它们已经成为“消费与享受艺术”的“新趣味的制造者”，它们包括

> 所有提供符号商品与符号服务的机构中的职业（销售、公关、营销、广告、时尚、装饰），这些职业包括健康与社会指导（婚姻指导、性治疗、营养学、择业指导、育儿咨询等）方面的所有工作……也包括所有文化生产与组织机构中的各种工作（青年领袖、首席演奏家、家庭教师、广播与电视的制作人与主持人、杂志社的记者等），这些职业在近年来得到了引人注目的发展（Bourdieu 1984a：359）。

近年来，随着技术发达社会的服务与传播业的发展，这些职业应运而生。它们是通过符号暴力、通过把统治阶级的文化强加于被统治群体而实施新统治模式的征兆。

在法国，布尔迪厄（357）发现新小资产阶级从两种不同社会出身的人中吸收新成员：（1）出身工人阶级的受过教育的个体，这些人并没有最富声望的教育文凭，也不能把自己的教育资本转化为稳定的、有声望的地位；（2）统治阶级出身的个体，他们同样没有获得有威望的教育文凭，但却能够通过把自己继承来的文化资本以及经济与社会资本转化为易于销售的符号商品与服务而避免社会地位的下降。

---

[1] 布尔迪厄（150，153）在可以互换的意义上使用“新资产阶级”与“新小资产阶级”的标签来标识这样一种准资产阶级的位置。

这些新职业为那些没有接受太多教育的统治阶级个体“以避免社会地位下降的令人羡慕的避难所”（358）。由于这些准资产阶级地位成了不同的阶级吸收新成员的共同场所（150），所以，阶级冲突就采取了为区分与模仿而展开的竞争性斗争的形式，这种区分与模仿建立在对于不同的生活方式的社会价值的感知的基础上。[1]

工人阶级的标志是资本总量最少。布尔迪厄通过工人阶级相对缺乏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与统治阶级和中产阶级相比而言——来界定工人阶级。他特别指出，工人阶级所面临的更大的经济制约限制了其文化资本积累的范围。在经济与文化资本方面的相对差异也可以在以下这些工人阶级职业中发现：熟练的、半熟练的、不熟练的手工工人与农民（114）。但是，布尔迪厄很少关注、分析工人阶级内部的差异，他的著作的重点集中在统治阶级。

对于各种资本形式的结构的关注，激发了布尔迪厄对于在社会学中常常被用作衡量社会阶级的标准的职业范畴的重要性的重新思考。布尔迪厄尖锐地批评以这种方式使用职业范畴，认为它们是“官僚的”而不是“科学的”范畴，因而事实上常常代表充满社会差异的分类编组。但是，由于它们是可以现成地使用的度量标准，所以，布尔迪厄自己也把职业的头衔作为其三维空间中的主要的地位指标加以使用。然而，布尔迪厄又通过它们所代表的潜在的资本数量与构成而在概念上解构了它们。这提供了一个关于位于多维的社会等级之中的行动者观，它比之于主流的地位获得研究中的行动者观要更加非总体性、更加多维。

遗憾的是，布尔迪厄的研究方法的阐释力没有达到许多社会学家所要求的经验上的精确程度。特别是社会资本是很少得到测定的。这样，布尔迪厄的著作急需搜集关于各种建构阶级地位的有价值的资源的

[1] 布尔迪厄对新小资产阶级的描绘非常不同于近来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解释（Baudelot, Establet, Malemort 1973；Poulantzas 1977），不同之处在于，布尔迪厄强调阶级结构中这个中间部分的社会的、文化的以及意识形态的差异性。

材料，急需通过结构的而不是经验主义的方法阐释像职业这样的现存资料，急需通过以下的方式呈现资料——该方式将更加适当地传达复杂的、对立的、不固定的特征。

布尔迪厄的模式的第三个方面关涉群体与个体的资本数量与构成如何随时间而变化。[1]资本的数量与构成的变化决定群体的集体未来。布尔迪厄认为，阶级的社会轨迹决定性地塑造着其成员的态度与实践。一个群体的社会流动性的机会是内化于习性中的另一种重要的客观结构。[2]

布尔迪厄（1984a：123）谈到了三种可能的社会轨迹：向上的运动，向下的运动以及维持原状。向上的或向下的运动将倾向于使人对自己的未来持乐观的或悲观的看法，一个阶级在数量上是上升还是下降将会塑造其对于未来的看法。布尔迪厄发现，法国的零售商和农民的悲观主义反映了其作为一个阶级的衰落，而上升的技术人员则解释了他们相对高的乐观主义的程度。习性非常清楚地反映出三种不同的运动类型：上升、衰落以及维持现状。

与社会学中主流的地位获得理论相比，布尔迪厄的多维阶级分析提供了一个更加完整的对于分层秩序中社会地位的结构解读。他认为，社会空间中的定位不能通过诸如父亲的职业声望或家庭收入等单方面的尺度来衡量。他要求我们关注可能塑造个体态度与行为的更大范围的社会背景因素，特别是文化资本的概念把握了父母收入尺度不能充分衡量的不平等的优势方面。我们已经开始看到一个由布尔迪厄的概念——这个概念提供了对于社会不平等的文化因素的新洞见——所激发的不断增长的研究领域（比如 DiMaggio and Mohr 1984；Lareau

[1] 这个维度最先是在布尔迪厄 1966 年的论文“阶级状况与阶级地位”中得到辨认的，但是只有到他 1974 年的论文“阶级的未来”（Avenir de classe）中才得到详细的阐述。这个概念贯穿于他后来的所有著作，特别是他的《区隔》中对于以阶级为基础的生活方式与消费模式的分析。

[2] 对于布尔迪厄而言，个体的轨迹总是产生于阶级的集体轨迹（Bourdieu 1984a：112）。

1989）。

分层的三个方面——资本的数量与构成以及社会轨迹——为布尔迪厄的当代社会中的阶级结构分析提供了总体框架。他认为，在所有三个方面都有相似的社会地位的个体同样也分享着相似的生存状况与阶级状况。在存在生存状况的相似性的地方，我们可以发现存在于所有形式的文化与社会实践中的相应的相似性；而在不存在生存状况的相似性的地方，实践中的不协调就会发生。我们将在下面看到布尔迪厄如何分辨阶级内部的重要差异。这种差异表现为在资本数量上相似，但在资本结构上存在差异，或表现为数量与结构上的相似性被社会轨迹中的差异所覆盖。

阶级、习性与趣味

对社会学家来说，特别感兴趣的是布尔迪厄如何把自己对于社会空间的理论阐述与他的场域概念、习性概念结合起来以便解释审美偏好、消费行为以及生活方式。布尔迪厄认为，由社会空间的三个维度所界定的社会阶级结构，已经内在化为特定的阶级习性。每种习性都体现了阶级的物质生存条件以及把自己与其他阶级的关系加以分类和排序的符号区分（比如高/低、贫/富等）。这样，个体带着自己的倾向进入各种各样的场域，这种倾向使得他们首先倾向于选择带有其阶级习性特征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是阶级关系的符号方面的实际表达。

在建构了三维的社会空间——布尔迪厄就是在这个空间中阐述社会的阶级关系——以后，布尔迪厄（1984a：208）接着认为，文化消费与生活方式的模式沿着一系列相似的轴线分布，这些轴线表明在社会阶级的场域与生活方式的空间之间，存在“结构的同源性”。通过“结构的同源性”这个术语，布尔迪厄更多依据“对立结构”（structures of

opposition），而不是特定的阶级与特定的消费特征之间的“对应”来思考阶级与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布尔迪厄并不认为特定的消费产品或实践对应于特定阶级的内在特征，他提供了自己的结构方法与关系性方法来研究阶级/文化关系。专业人士是否喜欢网球、曲棍球、橄榄球、拳击或者板球，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喜好表达着与其他阶级的喜好之间的系统对立。这样，无论是在运动、内部装修、穿着、饮食中，还是在休闲活动中，人们都能够发现把不同的阶级加以区分的系统对立。布尔迪厄的论述意在反对三种不同的观点：后现代的文化流动性观点、收入解释方法以及有意识的身份追求。

通过强调生活方式的差异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相关性，布尔迪厄使自己区别于绝大多数后现代的消费文化理论家，这些理论家声称急剧变化的生产、营销与消费模式已经导致身份符号的泛滥与激增，这些身份符号不再对应于具有持久性的社会阶级划分。例如，布尔迪厄把关注的重点离开波德里拉所追求的高度的普遍性，转而认为眼下的生活方式趣味的膨胀产生于一种结构性的生活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特定的阶级与阶层竞相把自己的特定趣味作为合法趣味强加于人。布尔迪厄强调，社会阶级通过广泛而变化不定的一系列消费实践把自己与别人加以区分。

如果说布尔迪厄在阶级与许多消费实践之间发现了一种清楚的联系，那么，他也把自己的方法区别于收入解释法。虽然他承认许多消费行为是与收入水平相关的，但是他坚持认为这种联系是由习性的倾向进行调节的。[1]他说道，“收入常常被赋予一种因果的有效性，只有当收入与收入所产生的习性相联系的时候，这种因果的有效性才实际存在”（1984a：375）。习性而非纯粹的美元数量在形成消费选择方面的首要性“在同样的收入与极不相同的消费方式相联系的时候，非常清楚

[1]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在布尔迪厄的著作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实践的文化调节。虽然布尔迪厄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但是他尖锐地批判对于实践（包括消费行为）的粗俗的经济主义解释。

地表现出来”。[1]或者，它也存在于

> 当社会地位的变化把习性投入新的状况，以至于其特定的效力得以被分离出来的时候，是趣味（对于必需品或者奢侈品的趣味）而不是高低不同的收入要求实践客观地适应这些资源(175)。

这样，布尔迪厄尖锐地批评关于消费行为的供需模式，这种模式把关于消费选择的解释限于关于购买力的解释。布尔迪厄评论说，行为者的选择出于趣味的原因而不是基于仔细的成本—收益分析，“真正的选择原则是趣味，是由必然性塑造的品性”（177）。趣味则产生于个体从他们对社会世界的富足或稀有的经验内化而来的根深蒂固的期待。

布尔迪厄还反对凡勃伦关于消费实践来自一种有意识的身份追求策略的观念(1979)。如果消费实践通过与社会阶级的区分相似的方式被社会地区分的话，那么，这种关系是通过习性而不是有意识的计算产生的。布尔迪厄(1984a：172—173)强调说：

> 一个特定行动者的所有实践与行为都是客观地在自身中得以平衡协调的，而不需要任何对连续性的精心追求；都是与同一阶级的其他成员和谐一致的，而不必任何有意识的协商。

这样，布尔迪厄反对以阶级为基础的关于个体行为的理性行动者的模式。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布尔迪厄阐释与特定的生活方式场域相互作用的阶级习性如何在法国产生以阶级为基础的消费实践的例子。

---

[1] 遗憾的是，布尔迪厄并没有通过来自他自己的研究或者其他的令人信服的经验支持，来充分说明自己的主张。

布尔迪厄(176)把资本的数量与构成方面的差异理论化为两个基本的组织原则，这两个组织原则把文化消费和生活方式与社会阶级状况联系在一起。[1]阶级状况方面的这些差异产生了不同的相互分化的阶级习性，而这种习性又反过来生产出生活方式的差异。[2]他们把统治阶级的寻求特异性的习性与工人阶级的受必然性制约的习性区分开来。资本总量的差异把那些以可观的经济与文化资本为前提的时间当作稀有的、更加值得追求的实践，以区别于那些现成地可以被那些资本有限的个体得到的普通的粗俗实践。具有大量资本的行动者享受着极为可观的自由，使他们免于由物质的匮乏以及谋生的需要所强加的实际的制约与临时性的紧急需要。那些资本匮乏的人发现很难免于谋生的现实要求，这种不同的“与必需品之间的距离”生产出不同的阶级习性，而后者反过来又产生不同的趣味系统。[3]由于习性生产出适应生存状况规律性的实践，因此，趣味变成了

> 对于分配的实践性把握，这种把握使我们能够直觉地了解什么东西可能（或不可能）降临于一个位于特定社会空间内的个体，以及是否适合于这个个体。它发挥着一种社会定向，一种“感觉到自己的位置”的作用，指导特定的社会空间中特定位置的占据者趋

---

[1] 虽然在《区隔》(114)一书中，布尔迪厄把三个社会分层维度界定为资本数量、资本构成以及社会轨迹，但是在他对法国的阶级结构与消费实践的分析中却并不均等地使用它们。如果说资本的总体数量的差异划分了三个主要阶级(统治阶级、中产阶级以及工人阶级)，那么，资本的构成方式以及在时间过程中的变化则只在统治阶级与中产阶级中发现。实际上，在他的分析中，布尔迪厄(171)在一定程度上完全忽视了第三维度并把自己的分析以简化的方式还原为前两个维度。他(339—365)对于资本的拥有在时间过程中的变化的探究在分析构成中产阶级的不同阶层的生活方式的细微差异的时候得到了详细的阐述。

[2] 布尔迪厄(172)写道：“因此，生活方式是习性的系统的产物，它们通过习性的框架在其相互关系中得到知觉，成为社会地限定(限定为‘杰出的’、‘粗俗的’等)的符号系统。”

[3] 在这里，布尔迪厄(54)在文化实践与经济需要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他假设在文化活动(至少是在它们是由合法的统治文化加以界定的意义上)发生以前，经济的需要必须首先被满足。布尔迪厄的这个主张是与他确立的对身份与主观倾向的唯物主义理解的方式相一致的。绝对占优势的群体更可能热衷于确立身份差异。而倾向“归根结底是由相关的社会结构的经济基础生产出来的”(Bourdieu 1977c：83)。

> 向适合于他们特性的社会地位、趋向有益于这个位置的占据者的实践与商品。考虑到其在社会空间中的分配及别的行动者所具有的关于商品与社会群体之间的对应的实践知识，它意味着对特定的实践与事物的社会意义与社会价值可能会是什么的实际的预期（Bourdieu 1984a：466—467）。

通过习性的作用，趣味

> 把需要转化为策略，把制约转化为偏好，而且不带任何机械决定地产生一系列构成生活方式的“选择”。……它是由必然性制造的品德，它通过引导“选择”——这种选择对应于客观状况并且是其产物——而持续地把必然性转化为品德。（Bourdieu 1984a：175）

随着与经济必需品的距离日益扩大，

> 生活方式越来越成为韦伯所说的“生活风格化”的产物，即一种系统的信奉，这种信奉引导并组织着多种多样的实践——对葡萄酒或奶酪，或者乡村度假住所的装饰的选择（55—56）。

这样，基本的生存状况的差异产生了“奢侈的趣味与必需品的趣味之间的一个基本对立”，也产生了其经济状况允许其追求身份差异的行动者与不能有这种奢侈的行动者之间的对立（183）。这个对立使得统治阶级的成员与工人阶级的成员（工业劳动者与农民）处于对立的地位。它还产生了两个相应的对立的阶级习性类型：对自由的趣味与对必需品的趣味。

对自由的趣味

由于统治阶级拥有大量资本，所以他们发展出了一种摆脱平凡的物质需要与日常生活中实际的紧急需要制约的“对自由的趣味”。这种“差别感”，就其“对于他人世界的远距离的、超越的倾向”而言，是以一种“审美倾向”为特征的(Bourdieu 1984a：376)。[1]它

> 设计出一种安逸与禁欲主义的综合，即一种自我制约的简朴、约束、节制，它们通过那种绝对杰出的表现、紧张中的松弛而得到肯定(176)[2]。

虽然这种审美倾向在艺术场域表现得最为充分，但是

> 在任何实践领域，对原始的需要与冲动加以纯化、完善化、崇高化的目的都可以为自己辩护，在任何领域，生活的风格化——即形式对于功能的优先性、方法对于事物的优先性——都能够生产出同样的效果(Bourdieu 1984a：5)。

这样，统治阶级的免于物质制约的自由使得他们能够把自然的功能风格化与形式化，以便把一种差异感投资于其中。在艺术中，审美倾向把一部作品的形式提升到内容之上，必须从智力出发加以理解的抽象

---

[1] 对于布尔迪厄(54)而言，审美倾向发展的结构性前提，是一种“以悬置与消除经济的需要、在主客观两方面远离实际的紧急需要为特征的”阶级状况。

[2] 戈夫曼(Goffman 1950—1951)把“制约”的性质指认为一种用以象征阶级身份的教化形式(a form of cultivation)。由于一种学科上训练有素的倾向(a disposition of discipline)需要时间加以发展，所以，对那些希望快速侵占这一社会区隔形式的人来说，它发挥的是“制约机制”的作用。

组织，而不是朴素的眼睛可以欣赏的再现的形象，成为艺术感的标志。相似地，统治阶级在衣着方面的趣味，也强调形式与风格而不仅仅是穿在身上使身体舒适。在饮食方面，充饥的世俗功能被形式化为一种受礼节与交际所规定的仪式。即使是对身体的呵护，通过被赋予身体的强壮、健康以及美观的精心确立的关注形式，也变得风格化了。

必需品的选择

统治阶级对自由的趣味是在与工人阶级对必需品的趣味的对立关系中得到界定的。工业劳动者与乡村农民只有很少的资本，必须直接且不断地面对谋生的实际需要与急迫性。但是，工人阶级却不把这种“被迫的、对必需品的选择”经验为一种剥夺，而是经验为一种偏爱——对于“必需品的趣味”。这种趣味把实体置于形式之上，把非正规置于正规之上，把感觉置于理性之上。这样，工人吃豆子不是因为他们买不起别的东西，而是“因为他们具有对于他们别无选择的东西的趣味”（Bourdieu 1984a：178）。他们对比较廉价的食物的选择被解释为他们认为这些食物更加实际。

值得指出的是，在这里，布尔迪厄认为他的主张十分不同于经济决定论。他认为，对于物质制约的经验被转化为了一种特殊的习性。[1] 工人阶级的消费行为并非直接由纯粹的物质匮乏决定。如果收入直接地决定消费选择，那么人们将会期待收入的重大增长，比如赢得彩票或做点小生意，以便从根本上改变工人的消费实践。布尔迪厄认为这并不合乎他的主张。他认为：

---

[1] 布尔迪厄的习性解释框架把他区别于各种唯物主义的关于文化与趣味的观点。戴维·哈勒（David Halle 1991）在对于唯物主义主题的一次有趣的改写中发现，工人阶级对风景画的喜欢具有唯物的基础，这个基础不是与布尔迪厄说的“必需品的文化”相关，而是与“房子和周边的物质环境”相关。

> 拥有百万资产本身并不能使一个人像百万富翁那样生活，暴发户常常花费很长的时间才知道，被他们看作是应受谴责的浪费挥霍，在其新的环境中不过是基本必需品的扩展(Bourdieu 1984a：374)。

而且

> 当对必需品的趣味在一定的意义上显得不合时宜的时候，当它在生产它的条件消失后继续存在的时候，对必需品的趣味的特殊效力——这种效力从来没有消失过——就显得特别明显。

统治阶级的自由趣味与工人阶级对必需品的趣味之间的对照被布尔迪厄相互联系地加以阐述。这些趣味并不只是反映两种不同的生存状况。相反，统治阶级的审美趣味是“在与其他倾向——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倾向——的关系中客观地与主观地得到界定的”(55)。布尔迪厄(56)评论道：

> 自由的趣味只能与必需品的趣味相比才能肯定自己是自由的趣味，必需品的趣味就这样被带入审美的水平并被界定为粗俗的趣味。

这样，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被用作统治阶级的一个反面的参照。

> 或许它们在审美倾向系统中的独特功能是用作为一个反面的参照点，所有的美学都是在与它们相比较、通过连续的否定(它们)来界定自己的(57)。

统治阶级对这种工人阶级趣味的态度是用判断自己趣味的方式，即

把它判断为一种摆脱了经济的必然性的选择，来判断工人阶级的趣味，他们所犯的错误被布尔迪厄称为一种“阶级种族主义”（class racism）——把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指责为一种无知、循规蹈矩的生活方式或者坏的选择，而不是一种适应潜在的物质必然性的生活方式。[1]这里，布尔迪厄回到了他对实体主义的批评。在生活方式的领域，他把实体主义的观念看作是这样的一种观念：把群体的偏好描述为自然倾向，即内在于群体的而不是产生于相互区隔的逻辑。

相反，统治阶级的生活方式则被用作工人阶级的“正面的”参照，实际上，它们实施的是符号权力。生活的风格化肯定了“对被支配的必需品行使的权力”（power over a dominated necessity），并因此

> 总是意味着对合法的优越性——优越于那些由于不能像统治阶级一样毫不在乎奢侈消费、因而仍然受到日常利益与紧急需要的制约——的维护(56)。

这两种阶级习性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统治关系。统治阶级的趣味是合法的，因为它们似乎是产生于卡里斯玛气质、知识以及才能的品质，而不是产生于与必需品之间的距离。虽然工人阶级的个体已经从他们有限的生存手段出发中把对必需品的趣味内化，他们也承认统治阶级的自由趣味的优越性。当被问及他们对高雅的艺术形式的观点时，工人阶级个体的回答是“这不是为我们准备的”或“我真希望我对它们了解得更多”（Bourdieu，Boltanski al et. 1965）。布尔迪厄强调，学校教育在灌输这种对统治阶级趣味标准的承认方面起到了核心的作用。

因此，阶级身份是对立性的。独特性与必然性这两种习性是辩证

---

[1] 布尔迪厄(178)指责说，统治阶级的趣味观“有意无意地……把必需品的趣味自然化……通过把它与其经济与社会的存在理由加以分离而把它转化为一种自然倾向”。

关联的，就像一个人在与他人的对比中发现自己的身份一样。布尔迪厄把习性看作不仅是潜在的生存条件的反映，而且也是个体和群体在阶级等级中的相对地位的反映。倾向同时反映了阶级的状态和在阶级等级中的相对地位(Bourdieu 1984a：246)。布尔迪厄对于文化实践与生活方式的研究分析了大量的例子，在这些例子中，他发现了这种双重对立的证据。例如，关于语言的使用，他发现这种对立存在于

> 大众的坦率直言与高度修饰的资产阶级语言之间，对栩栩如生的修辞效果的表现主义式的追求与控制的选择和虚假的简朴之间(176)。

同样的对立

> 也存在于身体语言中，这里，焦虑、仓促、做鬼脸、打手势与矜持、不紧不慢（照尼采的说法就是“高贵的缓慢姿态、缓慢眼神”）对立，与象征高贵的控制与镇定自若对立(177)。

布尔迪厄认为普通大众在习性方面具有同源性，这种同源性来自事物的必然性、文化资本的缺乏并因而受到支配性文化的统治。由于他们与必需品之间没有距离，没有文化资本，所以法国的工人阶级得以避免争夺差异性的令人反感的斗争。这一法国工人阶级的形象提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它们都指向布尔迪厄著作中的难点：是否可能有存在于统治阶级之外的、真正属于工人阶级的文化形式？在布尔迪厄的工人阶级习性概念不曾解释的意识与实践中是否存在重要的分化根源？工人阶级趣味的“被迫无奈的必然性”是否是一种充分“相关性的”理论阐述，或者它是否暗示一种更深的工人阶级的经验本质？我将简要地谈论这几个问题。

布尔迪厄认为，所有的被统治群体都毫无例外地与统治文化相联

系。被统治的群体“总是臣服于支配性文化的任意统治”（Bourdieu and Passeron 1977：23）。布尔迪厄声称不存在本真的、没有沾染统治文化印记的普通大众的阶级文化；相反，认为存在“大众文化”，[1]这本身不过是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创造，好像这种文化是自主的文化形式的真正代表。

> 民粹主义从来只不过是一种颠倒的种族中心主义而已。如果对于工业工人阶级与农民的描述几乎总是在悲天悯人与千禧年颂歌之间摇摆的话，那么，这是因为它们根本忽略了（文化）与阶级状况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正是关于这种阶级状况的完整界定的一个部分；同时也是因为阐述与自己正在描述（不一定能够感受它）的状况的实际关系，比把自己与它的关系置入描述之中要困难得多（Bourdieu 1984a：374）。

问题产生于知识分子把自己与工人阶级的认同关系或对工人阶级的支持——这种认同关系是通过选择的习性而不是必然性的习性确立的——与工人阶级的状况本身混淆了。[2]那些庆贺大众文化的知识分子没有解释自己与工人阶级在习性方面的差异，对布尔迪厄而言，大众文化的问题是一个知识分子的问题。

布尔迪厄发现统治文化通过下面的方式对工人阶级实行统治：工人阶级用便宜货来替代奢侈消费品，而且缺乏文化资本。他观察到，工人阶级生活方式的特征既体现在“缺乏奢侈消费品，比如威士忌或油画、香槟或音乐会、乘船旅游或艺术展览、鱼子酱或古董”，也体现为

---

[1] Popular culture，这个词指的是被统治阶级的文化，与法兰克福学派意义上的作为文化工业的“大众文化”不同。

[2] 布尔迪厄(372)写道：“所有时代所有地方的民粹派(narodniki)，由于认同其对象到了把自己与工人阶级的状况的关系混淆为工人阶级与自己的状况的地步……以至于其所提出的对于工人阶级状况的解释在统计学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解释不是产生于工人阶级与自己的状况的关系。”

拥有大量替代这些珍稀商品的便宜货，用“冒泡的白酒”替代香槟，用仿皮替代真皮，用复制品替代真品油画(386)。

因为他们缺乏推动发达社会中新的运作模式与交流模式的文化资本形式，所以

普通的工人受到他们为之服务而不是加以使用的机器与工具的统治，受到那些拥有合法的，即理论上统治他们的工具的人的统治(387)。

特别是在文化实践中，布尔迪厄(394)把法国的工人阶级家庭看作是彻底的受统治者。[1]他悲观地得出这样的结论：

不存在集体抵制任何强加的后果的现实机会，这种强加的后果要么是导向扶持那些打上了占统治地位的分类学印记的特征（“黑的是美丽的”策略），要么导向创造新的、受到积极评价的特征。这样，被统治者只有两个选择：忠实于自我与群体（总是易于再度产生羞愧感），或认同支配性的理想的个人努力，这个理想正好是在集体的意义上重新获得对于社会认同的控制的雄心的反面（当美国的女权主义者倡导“自然的外观”的时候，这个集体造反所追求的就是对于社会认同的控制）(384)。

但是，尽管如此，法国的工人阶级还是在一些经过选择的文化实践，即在对身体、饮食、语言的态度中发现了一定程度的摆脱统治阶级标准的自主性。布尔迪厄(同上)主张，“大众对强壮的体力的维

[1] 布尔迪厄观察到，即使是在政治舞台上，也就是工会运动中的斗争“可能提供真正的反—文化原理（principle of counter-culture）”的地方，工人阶级事实上也默许“文化统治的结果”(395)。

护”——这种强壮体力是“男子气概的一个重要方面”——或许是“被统治阶级的自主性的最后避难所”。正是这种“生产他们自己的伟男子表征与社会世界表征的能力”，代表了“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的自我肯定的最自主的形式之一”。

布尔迪厄不是从统治阶级的规范看待体力的强健并因此把它们判断为本质上是倒退的或性别歧视的。他在这里要求我们把它们看作是工人阶级状况的表达，这种表达依赖于一种劳动力，“文化再生产的法则和劳动力市场的法规更多地——较之其他任何阶级——把这种劳动力简化为纯粹的肌肉力量”。工人阶级“只有在其劳动力方面是富有的”，因此作为一个阶级，“除非脱离其劳动，否则工人阶级只能依靠其战斗力方面——这种战斗力依赖于其成员的体力与勇气，依赖于其成员，即其意识与团结，或者换言之，其对于自己的团结的意识——来对抗其他阶级”。体格的强壮是资本的一种形式，对于这种资本形式，工人阶级可以实施某种垄断性的权力。事实上，这是工人阶级政治力量的社会基础。

在饮食方面，布尔迪厄(179)写道：“饮食的艺术是工人阶级明确地挑战合法的生活艺术的少数几个领域之一。”与统治阶级的节制风格相反，法国的工人阶级维持一种“快乐主义的伦理”，也许流行语“快活人”(bon vivant)是其最好的表达。这种风格把放任与快乐联系在一起。相似地，在言谈中，人们在对“缩略语、简称以及隐喻”的高度语境化的使用中发现了“效力与活力”，这种缩略语、简称与隐喻的使用“摆脱了”上层阶级所使用的“准书面语言的审查与制约”。

布尔迪厄(376)在工人阶级对必需品的趣味中不仅发现了对必然性的适应，同时也发现了一种防御策略，一种抵制中产阶级的自负与统治阶级的显赫的策略：

> 服从于必然性使得工人阶级倾向于实用的、功能主义的“审美”，而拒绝形式化的玩意儿以及为艺术而艺术的那套无用的东

西，这同时也是所有日常生存选择的原则与一种反抗远离日常生活的专门化审美意图的生活艺术的原则。

在别的场合(394—395)，布尔迪厄写到，工人阶级的自主性是

一种现实主义的(但不是听天由命的)享乐主义，一种好怀疑的(但不是愤世嫉俗的)唯物主义，它既构成了一种适应生存状况的形式，也构成了一种对于这种生存状况的捍卫。

这样，布尔迪厄(380)在“一致性原则（principle of conformity）”中发现了一种工人阶级的自主性的尺度，它是“大众趣味的惟一明确的规范”。它通过“她以为她是谁？”“这不是为我们这类人准备的”等诸如此类的“诉诸秩序”（calls to order）来表达自己。这个规范的目的是

鼓励“合理的”选择，这种合理的选择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由客观状况所强加的，而这种客观状况也包含对通过认同其他的群体来确立自己身份的野心的警告，换言之，它是对阶级团结的需要的一个提示(380—381)。[1]

但是，布尔迪厄认为，工人阶级实践的这些免于统治阶级标准的部分自主性的领域很难建构出一种能够形成独特的、集体的社会与文化身份的资源。而且，由于大众教育的文化社会化的结果，

工人阶级中最具有政治意识的那部分人在语言与文化上依然广

[1] 这使得布尔迪厄承认“工人阶级对于他们已经得到（特别是通过电视）的合法文化产品不感兴趣，这不仅是缺乏能力与不熟悉的结果”（同上），这也是社会遵从、社会闭合规范的一种表达，这种遵从与闭合规范抵制“凸显自我的要求”。

> 泛地从属于处于统治地位的规范与价值，并因此容易受到权威强制效果的深刻影响。每个文化权威的掌握者都可以实施这种权威强制，即使是在政治中(396)。

布尔迪厄强调被统治的群体如何不知不觉地遵循统治阶级设立的规范。这无疑开启了工人与统治阶级标准之间的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但是，它却很难穷尽我们对于西方民主国家的被统治群体的历史经验的理解。即使是最没有权势的群体也能够偶尔扰乱统治系统。比如，投票就允许被统治的群体决定统治阶级中的哪个部分将拥有最大的影响公众的力量。而且，当在统治阶级的内部存在分歧甚至尖锐对立的时候，被统治的群体就有机会去抵制统治阶级的控制(Domhoff 1983:2)。布尔迪厄对于被统治群体能够制约统治群体行为的情境没有予以充分的关注。

布尔迪厄对统治阶级的关注常常使他看不到工人阶级内部存在的内在分化。在对法国工人阶级内部实践的综合调查中，克洛德·格里尼翁和克里斯蒂安·格里尼翁(Claude Grignon and Christiane Grignon 1980：550)得出结论说，如果我们考虑到居住、职业、家庭结构以及出身等因素，那么谈论一种整齐划一的大众趣味或者整齐划一的法国大众阶级的生活方式就是“不可思议的”。布尔迪厄在《区隔》中对法国工人阶级生活方式与趣味的处理，没有充分关注城市工人与农民的基本差异。最显著的差异是农民抵制食品中的批量销售的能力，因为他们有高度的自足性(Claude Grignon and Christiane Grignon 1980：538)。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由农村妇女提供的食物储备方面的家务劳动(537)。相反，城市工人的饮食实践更多地受制于收入(545)。而且，农民生活的手工的与体力的性质——这一点在许多方面通过现代化而似是而非地被强化了——也反映在农民的趣味中并常常动摇占统治地位的生活方式的敏感性(543)。此外，差异也发生在城市工人中，特别是在那些农民出身、常常还保持着农民生活方式重要方面的工人，与那些城

市出身的工人之间(552)。布尔迪厄在《区隔》中对法国工人阶级生活方式的解释掩盖了这些差异。与细致地解剖内在于统治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的差异相反，布尔迪厄没有充分关注这种分化的存在及其对法国工人阶级意识的冲击。[1]对习性的强调所意味着的恰恰是一种相反的分析倾向，即寻找超越各种实践差异的潜在一致性的倾向。但是更多地强调布尔迪厄关于实践产生于习性与场域之间的互动的观念，能够潜在地解释工人阶级内部实践的差异性。

文化资本这个核心概念似乎没有普遍的适用性。它实际上并不适用于工人阶级——除了说他们没有文化资本以外。这个概念似乎建立在统治文化的经验与实践的基础上，而且当它被用于社会环境之外的时候，或许引入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当我们需要通过“缺乏”文化资本来谈论工人阶级的时候，这种需要本身就表明了这一点。这种观点反映的是统治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看法(Grignon and Passeron 1985)。布尔迪厄(1984a：387)依据内在化的文化资本的缺乏来看待工人阶级的被统治地位，这种缺乏意味着“普通的工人是受他们为之服务而不是加以利用的机器与工具的统治的，受那些掌握统治他们的合法的、即理论的手段的人的统治”。在布尔迪厄看来，这种“剥夺”，似乎是把工人阶级与社会世界的潜在的社会关系联系了起来。[2]

克洛德·格里尼翁与克里斯蒂安·格里尼翁(Grignon and Grignon 1980：551)认为，一种更加细致的对于工人阶级内部不同阶层的分析，揭示出不同的资源类型，这种不同的资源类型可以被策略性加以利用，并因此被看作是资本的形式。比如，工艺传统与技能训练有助于建构常常被称为“劳动贵族”(labor aristocracy)的阶层，这种工艺传统与技能训练显然内在地分化了法国的工人阶级。虽然在某些方面这种“职

[1] 曼(Mann 1970：33)主张，工人发展出了一种“双重意识”，这种双重意识对应于他们分裂的存在，在这种分裂的存在中，“控制与金钱、工作与不工作被分离开来了”。

[2] 这反映了布尔迪厄(1984a：387)在实践知识与理论知识之间发现的基本的分化，这种分化则被转化为社会差异。

业文化”可以赋予统治性的文化秩序以合法性，但是它也可以——而且经常——在与老板的斗争中被用作集体资本。在这方面，它并不简单地反映统治关系(Bourdieu 1984a：551)。虽然布尔迪厄并不否定被统治的群体在反对统治群体的斗争中可以调动某些资源，但是他的理论的绝对主导方面却是意在表明这种能力是多么的有限。

绝大多数这方面的批评集中指向《区隔》一书，这本书不是对工人阶级文化的最早的与最重要的研究著作。相反，《区隔》指向对统治阶级的美学的批判，特别是批判把这种美学加以专门阐述的知识分子。布尔迪厄的《区隔》的批判力量在于揭露塑造趣味与生活方式的“区隔策略”，特别是统治阶级与中产阶级中的“区隔策略”。这是一种“暴露”统治的符号权力的努力。但是，布尔迪厄强调，阶级是通过关系建构的，“必然性的文化”发挥的是统治阶级审美的否定性参照的功能。然而，布尔迪厄对工人阶级生活方式受到必然性力量驱动这种观点的强调，导致了对大众趣味的阿尔布瓦克斯式的观点，即把这种趣味当作是“无趣味的趣味”——因为这种生活方式高度受制于初级需要(Claude Grignon and Christiane Grignon 1980：551)。虽然布尔迪厄在他关于统治阶级文化的定义中反对所有的全称命题，无论是生物的、物理的还是精神的，[1]但是他的分析却依然包含一个未经言明的假设，即文化的实践只有在初级需要得到满足以后才变得可能。这意味着一系列普遍的初级需要必须在文化实践得以发生之前被满足。这样的一种观点体现的是文化与自然的经典对立，因而我们觉得十分奇怪的是，布尔迪厄这位希望超越思想史上所有二元对立的思想家，却会有意无意地依赖这种二元对立。从布尔迪厄经常否定各种形式的实体主义、包括那些把内在特征归于社会群体的实体主义的态度判断，令人怀疑布尔迪厄会接受法国工人阶级的形象是一种完全不受正统文化侵染的“高贵野

[1] 当布尔迪厄谈到统治阶级文化的任意性特征的时候就包含这样的含义(参见Bourdieu and Passeron 1977：8)。

蛮人”（noble savage）的形象。但是，奇怪的是，布尔迪厄对所有可觉察的、可能带有不想要的社会与意识形态包袱的概念上的二元对立形式的高度警惕，却没有能够防止这个二元对立。

矫饰与良好愿望

布尔迪厄(1984a：339)写到了资产阶级习性与小资产阶级习性的对立，把它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的悠闲自在的精神气质，对世界以及自我充满自信……与小产阶级的矫饰拘谨的精神气质的对立”。布尔迪厄更经常地把小资产阶级的习性概括为“禁欲的、严格的、拘泥的，精于各种形式的算计”(331)。这些都是“紧张”和“矫饰”的习性，它传达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一种模棱两可的阶级根性：既希望避免与工人阶级认同，但是又缺乏必要资源去培育它所模仿的统治阶级的生活方式。[1]作为向上爬的欲望的反映，小资产阶级展示的是“节俭、进取、算计，以及与对财产的持久焦虑联系在一起的占有欲”，而资产阶级展示的是“铺张夸耀、大把花钱、慷慨大度”(330)。

与工人阶级不同，小资产阶级进入了区隔的游戏，但是既没有资本又没有相应的习性来充分欣赏统治阶级的生活方式。它力图模仿统治阶级设立的标准，但是，在统治阶级的审美在文化世界展示其从容与熟练的地方，它“竭尽全力显示独特身份”的努力恰恰泄露了一种尴尬的做作与矫情(58)。它陷于自己的向上爬的雄心与实际的可能性的对立中，因此，它生产出来的那种实践由于“雄心与可能性之间的不谐调而被认为是做作的”(176)。

在与高雅文化的关系中，小资产阶级的习性被布尔迪厄看作是一种

[1] 小资产阶级习性的最彻底的体现是在布尔迪厄所说的“干实事的小资产阶级”(executant petite bourgeoisie)身上，它包括下层管理人员、办公室工作人员，特别是小学教师。

“文化上的良好愿望”，它标志着对高雅文化的一种“一视同仁的崇尚”，这种崇尚导致

> 密切关注(是否与统治阶级的文化保持)一致性，这种关注导致小资产阶级急切地追随权威与行为的典范，对确信无疑的、被证明为优越的产品(比如经典作品与获奖作品)作出选择(331)。

而且，小资产阶级喜欢

> 所有的漂亮别致的事物与实践的廉价替代品——浮木与绘图的粗面皮革，藤与酒椰，“艺术”手工艺品和艺术摄影。

通过这种方式，小资产阶级显示出暴露“承认（acknowledgement）与知识（knowledge）之间的鸿沟”的一组倾向(323)。布尔迪厄写道，小资产阶级

> 并不知道如何把文化游戏当做一种游戏来玩，他们过于严肃地对待文化，以至于不能做到漫不经心、有距离地进入这种游戏，而这种漫不经心与距离感正是真正熟悉游戏的表现（339）。
>
> 这种习性在语言的使用中通过过分的矫正也表现出来：过分的警惕、生怕出错、对于自己或别人的语法错误大做文章（331）。

在伦理学领域，人们发现一种对于行为规范的几乎是不知足的渴望，这种规范把整个生活纳入僵硬的纪律约束之下。在政治学领域，人们发现了“必恭必敬的唯命是从或小心谨慎的改良主义”。

有些批评家(比如 Hoffman 1986)指责布尔迪厄对法国中产阶级作了贬义的解释。布尔迪厄只是简单地记录了中产阶级“矫饰”的生活方式，还是同时谴责了这种生活方式？显然，他的某些理论阐述是很

难讨人喜欢的。但是，这些理论阐述需要在布尔迪厄讨论问题的框架中加以解读。中产阶级的矫饰是从统治阶级的文化标准来看的，它反映了处于两个阶级夹缝中暧昧的状况——中产阶级试图从这种状况中逃脱出来，也反映了中产阶级力图进入的那个秩序。布尔迪厄的标签不是用来表示中产阶级的内在特征的，而是用来传达中间立场的无可救药的暧昧性的。因此，更加有成果的做法应该是问问是否存在在更大程度上摆脱了布尔迪厄所说的统治阶级趣味印记的中产阶级文化形式？例如，穆里奥(Mouriaux 1980)就认为，法国的小资产阶级有自己恰当的文化与独特的生活方式，这种文化与生活方式实际上对工人阶级与统治阶级的文化与生活方式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并不把中产阶级还原为对统治阶级的依赖关系。

贵族的禁欲主义与资产阶级的享乐主义

在统治阶级与中产阶级内部，布尔迪厄划分出了与不同的阶层相对应的亚习性类型。资本构成的差异使得经济资本相对富足的阶层产生出了与文化资本相对富足的阶层不同的消费行为模式与生活方式。在统治阶级内部，那些经济资本相对富足的人对艺术消费采取一种“安逸与便利的享乐主义的审美”，这种审美是“以大剧院或印象派的绘画为象征”的(Bourdieu 1984a：176)。相反，那些文化资本相对富足而经济资本相对贫乏的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的统治阶层，则反对统治阶层的“卖弄与资产阶级的矫饰趣味”，采取一种“禁欲的”审美，这种审美导致他们“支持所有以纯粹性与纯净化为名义的艺术革命”(同上)。这些对立的倾向系统在经济与文化资本最不对称的地方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一对立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教师与老板之间，在他们中间，这种不对称性“非常清晰，完全与人类学意义上的两种‘文化’之间的断裂吻合。”(283)教师的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是最不对称的，他们特别

“倾向于在所有领域中的禁欲消费”（185）。 例如在休闲的领域，布尔迪厄(219)做了丰富多彩的观察：

> 教师的贵族禁欲主义在登山运动中得到了极端突出的表现。登山运动比之在预定的道路上散步（使人想起海德格尔）或骑自行车旅游，花费更少，却最能够通过同时掌握自己的身体与别人无法企及的自然的感觉而表现出差异、距离、升华、精神的提升。

与这类习性形成明显对比的是：

> 医生与现代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他们有物质的与文化的工具可以进入最具特权的活动）的以健康为导向的享乐主义。 与粗俗的大众不同，这种享乐主义体现在乘坐游艇、大海游泳、跨国滑雪或水下钓鱼等活动中。

它也与老板形成对比，这些老板

> 期待着通过打高尔夫球以及与高尔夫联系在一起的贵族式的礼仪、特定的英语语汇以及巨大的、排外的空间而显得与众不同，连带获得外在的收益，比如社会资本的积累。[1]

在文化领域，教师的禁欲的贵族作派导致他们参与“严肃的甚至艰难的文化实践”，比如参观博物馆。 相反，享乐主义的专业人士的审

---

[1] 如果把布尔迪厄用于法国的许多生活方式的指标用于其他民族，那么，有些民族文化差异就会显得非常突出。 “英语词汇”显然已经与美国经理阶层的午后高尔夫比赛无关。 在美国，在高尔夫、橡皮球戏与保龄球之间的选择无疑显示了重要的社会差异，而在法国，从收集的材料看，情况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然而布尔迪厄的总体主张却没有受到民族差异以及时间过程中发生的变化的影响。 需要研究的是：不管这些(民族的)差异可能是什么，跨阶级的系统差异仍然存在。

美则把他们导向更加昂贵的、显赫的活动，比如“参观古董交易，画廊以及音乐厅”(286)。

这样，在统治阶级内部，我们发现与他们相应的经济与文化资本构成对应的两种对立的习性类型：贵族的禁欲主义(或偏好严肃与纯粹的习性)与偏好奢侈、修饰以及夸耀的享乐主义趣味。这种习性的差异是根植于潜在的物质生存状况的。但是——这是布尔迪厄的主要观点——这些物质的差异被经验为、再现为文化的差异。在布尔迪厄看来，正是这种从物质生存状况向符号差异的实际转化代表了文化的社会功能。

流动效应

资本构成与社会轨迹的变化也对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模式本身加以区分。布尔迪厄(339)认为，对小资产阶级习性的更加精细的分析表明：

> 这个倾向系统采取的方式之多不亚于在社会结构中获得中间地位、停留于中间地位以及超越中间地位的方式。这也表明这个地位本身可能是静止的、正在上升或下降的。

布尔迪厄(346，351)赋予两个标准的小资产阶级习性的变体以特别的关注：一个是对于自己在现代世界的未来机会的“乐观的进步主义”，另外一个是信奉“最朴素、最传统的价值”的“悲观的、回归的保守主义”。[1]前者常常存在于那些比较年轻、投资于教育文凭、社会出身比较低微、正在向上进入迅猛发展的新文化密集型职业部门的人身上。[2]后者则常常存在于手艺人与小店主中，在法国，他们的数量与一

[1] 在布尔迪厄的分析中，几个不同的因素有助于这两种小资产阶级习性类型的分化，但是它们常常聚合为不同的集合体。

[2] 布尔迪厄观察到，在法国，处于这种情况的女性占据相当大的比例。

般生活标准正在下降，他们缺乏可以转化为更有价值的资本——比如高等教育文凭——所需要的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

新的小资产阶级常常是后现代消费文化的承载者，这种后现代消费文化迎合并鼓励一种对生活方式本身的特殊兴趣。中产阶级习性的这个变体由精心设计的、在生活的所有领域寻求风格化效果的快乐主义构成。正是在这个特定的中产阶级阶层中，我们发现了精心制作生活方式的最大努力，并通过对所有人际关系、体验以及消费品方面新的、最时髦东西的追逐，使生活方式成为一种生活的规划。

阶级冲突与社会再生产

接下来我们考察布尔迪厄如何理解发达社会中分层过程的动力学。他把竞争看作所有社会生活的基本动力，个体、家庭以及群体为了维持或改善自己在一个分层的社会秩序中的相对市场地位而进行斗争。竞争发生于：(1)竞争有价值的资本形式，(2)竞争关于何为合法资本的定义。我将首先考察布尔迪厄对资本类型争夺的理解，然后再考察他的作为分层斗争的阶级斗争观。[1]

资本再生产策略

布尔迪厄依据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寻求社会再生产策略的行动者来思考阶级斗争。这种再生产的策略为的是维持或改善他们在分层的社会中的地位。这些策略包括投资各种类型的资本以维持或加强在场域中的地位(Bourdieu 1984a：125—168)。具体地说，为什么文化资本富

[1] 关于布尔迪厄的冲突观、再生产观以及变迁观的其他的思考，参见本书第八章。

足的阶级阶层，比如中学教师、大学教授，大量地投资于孩子的教育以及一般的文化能力的提高；相反，那些经济资本富足的阶级、阶层，比如工商业界的老板，则轻视对孩子的教育与文化的投资，而偏爱直接地把经济财富转移给孩子。[1]经济上、文化上都很富足的自由职业者，比如律师与医生，主要投资于教育，特别是那些提供关系、荣誉以及尊重等社会资本——这些社会资本对他们的职业生涯有用——的文化活动(120—122)。这样，再生产策略极大地依赖于资本的数量以及构成。

再生产的策略还依赖于“再生产手段(继承法以及习惯、劳动力市场、教育系统等)的状况”(125)。布尔迪厄对“再转换策略”(reconversion strategies)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在这种再转换策略中，社会群体通过交换货币以便维持或改善自己在阶级结构中的相对地位来重新安排他们的资本拥有结构。[2]布尔迪厄认为，对个体与群体如何以及通过什么样的兑换率把自己的一种资本类型转化为另外一种资本类型的研究，为理解阶级关系的特征提供了重要的见解(Bourdieu 1980c：57)。再转化策略的必要性来自于经济的变化、官僚机构的发展以及(对布尔迪厄来说是最重要的)文化市场的发展。他认为，特别是教育文凭的市场，通过为上层阶级与中产阶级内部的身份差异提供至关重要的资源，而成为工业社会的新的重要的分层根源(Bourdieu and Boltanski 1977)。[3]布尔迪厄认为，经济、政治以及法律的变化已经促使上层阶级的继承实践发生转变：从财产的直接继承依赖于经济特权的文化传递：投资于教育赋予了上层阶级的子弟以通过进入更加强大、回报率更高的机构的职位而利用家庭特权与财富的机会。教育文凭作为通货进入最重要的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增长的重要性，也使得高等教育成为对中产阶级极富吸引

[1] 然而，布尔迪厄(120)观察到，私人企业的上层经理阶层不仅喜欢投资孩子经济的未来，也喜欢投资于孩子文化的未来。

[2] 特别参见布尔迪厄在《区隔》(125—168)中的讨论。

[3] 这里，布尔迪厄加入了“文凭社会”理论，这种理论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Collins 1979；Miller 1976)。

力的投资。[1]布尔迪厄把这些变化描述为从再生产的“家庭”模式转向再生产的“学校”模式，在后一种模式中，教育系统在调节阶级再生产过程中取代了家庭(Wacquant 1993b：27，32)。

布尔迪厄(1984a：131)采用阶级再生产与(资本)再转化策略的分析语汇把自己的研究方法区别于主流的社会流动研究。通过依据社会阶级的资本数量构成以及贯穿于场域的社会轨迹来把阶级加以理论化使得布尔迪厄能够把注意力转向阶级等级的多元构成因素，这些因素不能通过累加的线性模式或者单维的流动标准加以把握。布尔迪厄(1980c：57，1984a：125)的模式强调不同类型资本的不同形构，以及为什么阶级斗争中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不同类型的资本之间的“兑换率”。

布尔迪厄把社会流动看作资本的投资与转化策略，这样的观点把“纵向的”运动与“横向的”运动加以区分。前者指的是在同一场域中向上或向下的运动，而后者指的则是跨场域的运动(Bourdieu 1984a：131)。场域内的纵向运动(比如从小学教师到大学教授)包括同一种类型的资本的积累，而场域之间的横向运动则要求资本的再转化，比如当一个店主投资于孩子的高等教育而不是简单地把家庭商店传递给他们的时候就是这样。

布尔迪厄关于社会分化的著作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阶级状况的变化中阶级地位在等级体制中的延续性。他认为，职业的流动并不必然意味着阶级的流动，阶级的群体可以通过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准而保持在社会等级体制中的相对地位而改善自己的状况。布尔迪厄认为这种情况发生在这样的场合：资本积累的策略发生在重要性正在衰落的场域，或者再转化的策略穿越了地位相当的场域。在法国，从小地主到地位较低的公务员的职业流动，或者从小手艺人到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职业流动，表明职业的变化与社会阶级结构的再生产并不吻合。

---

[1] 法国统治阶级的再生产策略的第二个主要变化是从技术训练(比如工程学)，转向管理与公共行政(Bourdieu 1989c：386)。

布尔迪厄强有力地证明了：从早期的资本主义类型向当代的工业或后工业社会变化，已经导致社会阶级结构的再生产而不是社会阶级结构的转化。虽然布尔迪厄(1973a)承认可能会发生一种有限的与“受到控制的流动”，以便为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提供精英统治的合法性证明，但是在一些西方国家(包括法国)，职业流动研究中的总体发现却表明，布尔迪厄低估了事实上发生的社会流动的数量(参见 Bénéton 1975, Boudon 1974, Goldthorpe 1980, Hout and Garnier 1979)。[1]流动研究表明，在社会分层结构的两极，的确像布尔迪厄预言的那样流动性极小。但是大量的流动研究也表明，相当多的流动，特别是小范围的流动，存在于阶级结构的中间部分。而且，布尔迪厄自己的某些材料也表明，在法国，职业的流动比他的分析所承认的要多。[2]

布尔迪厄通过揭露职业身份分类的经验性方法的实质，挑战了他所研究的发达社会中存在巨大的社会流动的主题。他指出了这样的例子：职业头衔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相对阶级地位的真正变化。他也指出了这样的例子：从父亲到儿子的代际职业传递事实上代表了一种阶级地位的衰落，像农业这样的经济部门表明的正是这样的情况。关于流动性方面的资料，布尔迪厄总体上非常看不起。事实上他也不把他的再生产理论建立在这些材料上。[3]而且，代际之间的身份改善的内容不管是什么，都可以依据布尔迪厄在一个阶级的个体成员的状况与该阶级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的区分(我们在本章前面部分对此已有介绍)加以解

---

[1] 贝内东(Bénéton 1975)使用维持闲居生活所需的资料的统计作为规范参照，表明代际之间的职业再生产的比率下降到接近 40%—50%。布尔迪厄关于阶级结构再生产的主张意味着这个比率应该高得多。

[2] 《区隔》一书中第 121 页上的图 9 表明，统治阶级的每个主要部分中保持自己的统治阶级地位不变的人不超过五分之二。

[3] 布尔迪厄的早期关于法国社会结构的再生产的主张部分地根据教育机会方面的材料，而不是根据职业流动方面的材料。他认为，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教育机会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以阶级为基础的，变化很慢，尽管高等教育的扩展已经进行了好几年。布尔迪厄早期的再生产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再生产与流动是社会结构中的对立过程(Bourdieu 1973a；Bourdieu and Passeron 1977, 1979)。在他的较近的著作中，布尔迪厄(1984a)似乎更愿意承认在阶级结构的广大的中间部分，可以存在相当程度的代际流动，虽然他仍然认为法国的阶级结构未被触动。

释。 他一直认为，虽然所有阶级的一般生存状况(阶级处境)已经发生变化，但是似乎没有一个群体真实改善自己在分层秩序中的相对地位(阶级地位)。 就生活水准(阶级处境)而言，每个群体都得到了改善，但是社会等级(阶级地位)依然如故。 因此，对布尔迪厄(1984a：185，Bourdieu and Passeron 1979：79—80)而言，阶级处境的变化与阶级地位的再生产并不吻合。 通过使用“权力场域”、“社会差异系统”、“阶级再生产的策略”、场域之间的“结构对应”等概念术语，布尔迪厄(1989c：191—196)希望把经验材料的范围扩展到流动研究中最常见的标准职业与教育指标之外。 这使得布尔迪厄能够集中关注统治阶级与法国高等教育中的精英部分的关系，强调这种关系在塑造代际权力传递中的巨大影响。

否定不加批判地使用流动表上的职业范畴，并建议应该审慎对待变化中的职业头衔的社会学意义是一回事，而提供关于社会结构的变化看起来可能是什么样子的经验研究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这方面布尔迪厄做得不够(我将在第八章讨论布尔迪厄关于社会变迁的思考的不足)。如果阶级再生产的模式从家庭的阶级再生产模式转向了学校的阶级再生产模式——如布尔迪厄主张的那样，那么，这个主张似乎应该找到涵盖教育、职业机会以及收入回报的一系列材料的支持。 布尔迪厄的再生产主张在许多此类当下能够得到的材料中找到了部分的支持，但是还没有达到他的主张所要求的程度。

作为文化冲突的阶级冲突

布尔迪厄把后工业社会的阶级冲突的本质分析为这样一种冲突：它越来越多地采取投资文化与符号区隔的形式。 如果父母为孩子投资好的教育，这是为了提高孩子在职业市场上的“稀缺价值”。 布尔迪厄在法国教育中发现了大量的阶级冲突的证据，我们在第八章会分析这种冲突。

在更加普遍的意义上，布尔迪厄认为社会阶级倾向于对能赋予他们

以身份群体的外表的符号区隔进行投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身份群体在布尔迪厄看来是伪装的社会阶级。他把这个现象与新的消费者导向的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

> 这种新经济的功能对需要与意见的生产的依赖不亚于对商品生产的依赖，并因此创造了一个根据其消费能力、“生活水准”、生活方式以及生产能力来判断人的社会世界。（Bourdieu 1984a：310）

在更近的著述中，在对社会—阶级关系的分析中，布尔迪厄越来越强调争夺表述和界定社会世界的权力、争夺有价值的物质资源的斗争动力学。[1]在布尔迪厄看来，阶级斗争在于争夺有价值的资源或者争夺进入场域中的权力地位。什么是有价值的资源、如何理解一个人在场域中的地位，这本身就是争夺的对象。布尔迪厄（1987b：164）指出：“分类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个基本方面。”[2]

布尔迪厄关于社会阶级分化模式的最有洞察力的阐释见他的《区隔》一书。在这本书中，他探索了符号区隔实践——从饮食衣着等日常世俗生活的偏好到更加精致的审美趣味的展示——如何体现了一种潜在的包含与排除的逻辑。布尔迪厄（1984a：56）把生活方式的差异看作“或许是阶级之间最强有力的屏障”。趣味意味着厌恶。符号的区隔同时是概念的区隔与社会的区隔。我们的实际的日常偏好是围绕一些重要的概念分类的框架组织的，比如高/低、杰出/平庸、独特/普通、重要/不重要等。这些重要的概念分类框架同时是用以把个体与群体在分层秩序中加以等级排列的社会分类框架。这样，作为分类斗争的阶

---

[1] 这一点代表了布尔迪厄的著作中重点的转移而不是方向的变化。即使是他的早期论文“阶级状况与阶级地位”（1966），虽然强调的是阶级状况与阶级地位的分析性区分，但还是有一部分是关于阶级关系的符号方面的重要性的。

[2] “分类斗争”的英文为“classification struggle”，“class”既有“阶级”的意思也有“类型”的意思，“classification”既有分类的意思也有阶级分化的意思。——译者

级斗争包含我们对这些重要的概念分类框架的各种实际使用，它们在社会秩序中强加了一种“位置感”，并因此发挥其包含与排除的社会闭合功能。布尔迪厄写道：

> 分类原则——它必然既是逻辑的又是社会学的——是在社会群体之间的斗争目的的内部、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发挥功能的。分类原则通过产生概念而产生社会群体，包括产生这种原则的群体以及由这种原则产生出来以便加以控制的群体。在对社会世界的意义这一问题的斗争中至关重要的是控制分类框架和分类系统的能力，这种框架与系统是群体再现的基础，因此也是群体的动员与解动员(demobilization)的基础（479）。

布尔迪厄要求我们关注职业头衔的争夺，他认为职业头衔是这个分类斗争的一种特别隐蔽的表达。个体与群体尝试通过选择最有可能提高社会承认度的标签与头衔来强化自己的职业知名度与社会荣誉。布尔迪厄举的例子是“自称为工程师的技术员”或“理疗师——他们用这个新的头衔把自己区别于单纯的按摩师，使自己更加接近于医生”(481)。

布尔迪厄的下述主张(1987b：92)表达了他对阶级关系的分类方面的强调：贯穿他全部著作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发展出一种“群体发生理论”：群体是如何产生的？他们是如何再生产的？（Bourdieu 1985e：741)在布尔迪厄看来，集体存在的可能性既依赖于共同的生活机会，也依赖于他们的符号再现。然而，他强调，正是争夺符号再现的斗争塑造了群体是否能够发展出一种重要的社会身份(Bourdieu 1987b：92—93)。群体的力量极大地依赖于个体围绕某个名义而组织起来的能力，为了这个名义，他们能够获得某些官方的承认(Bourdieu 1984a：480—481)。[1]

[1] 这普遍性的观点的富有成果的应用见波兰斯基对法国“干部”的研究((Boltanski 1987)。

布尔迪厄强调，只有在构成群体身份的符号发挥作用的情况下，群体才能成为现实的存在。

阶级的权力是一种命名权力。群体中间的分类斗争的中心是使用群体名义与分类，并把它们强化为一种官方的与合法的名义与分类的能力。[1]命名的公开权力与法律权力的最终资源被国家所掌握，国家握有“对合法的符号暴力的垄断性权力”（Bourdieu 1987b：163）。布尔迪厄关于这种国家权力所给出的例子是官方职业分类与职业法规的确立，这种职业分类与职业法规赋予职业角色以正面的或负面的地位身份。布尔迪厄要求关注老板与工会之间为争夺职业头衔而进行的斗争（Bourdieu and Boltanski 1981）。他还指出了教育文凭的符号效应。与贵族头衔一样，教育文凭是把资格传递给（文凭的）拥有者的制度化的符号资本。

群体形成的过程需要符号权力的授权以及群体认同的建立。必须有这样的代理人，他们具备使自己成为合法的发言人并代表阶级的能力。在近来的研究中，布尔迪厄(1984b)已经表现出对于作为集体的、动员起来的实体的阶级的兴趣，并特别研究了阶级成员授权给代言人的过程。[2]他的目的是使社会学的分析不仅指向权威的代言人的特定利益，而且指向他们获得群体代表的托管权的过程。布尔迪厄(1985e：739)坚持主张，群体的起源与存在，不仅产生于群体代言人的自身利益，或产生于群体领袖与追随者之间的联系，而且产生于符号代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被委托的代表从群体那里接受形成群体的权力”。简言之，他指出了社会阶级的权威领袖的机构化过程的重要性。[3]布尔

---

[1] 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关于分类权力的研究是戴维·卡伦(David Karen 1990)对美国精英学校入学政策与入学过程的研究。卡伦注意到，黑人与妇女在20世纪60与70年代的政治动员为这些群体在精英学院入学提供了特定的范畴类型，并因此提高了进入精英学校的入学机会。相反，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申请者由于在这同一时期没有进行政治动员，所以没有得到特殊考虑。

[2] 但是，布尔迪厄还没有研究集体组织或社会运动的其他方面。

[3] 布尔迪厄写道：“工人阶级通过被授予代表权的团体而存在——这个代表团体赋予工人阶级具有实质性的言论与有形的存在，工人阶级也存在于这个全权代表团设法强化的工人阶级自身存在的信仰中。工人阶级既通过工人阶级的单纯的存在，也通过工人阶级的代表，在客观地把同一‘纸上阶级’成员组合为一个可能群体的亲近性的基础上，强化自己的存在。”

迪厄特别感兴趣的是卡里斯玛领袖的动力学。

布尔迪厄对命名权力与授权权力的研究兴趣表明，他把阶级行为的可能性与符号权力的积累联系在一起。阶级的动员并不自动地遵循生活机会的差异，这些差异同样也需要在符号方面得到表达。正是通过专门化的代理人的符号劳动，阶级的身份以及阶级的行为才变得可能。这个分析的一个重要含义是：它赋予知识分子在阶级斗争行为中以核心意义。[1]我将在专门探讨布尔迪厄的知识分子理论的第九章介绍布尔迪厄思想的这个方面。

布尔迪厄强调现代社会生活中阶级冲突的重要性，但是，在布尔迪厄的著作中，阶级冲突在很大程度上通过竞争市场上的个体与群体投资者(特别是家庭)的形式出现。这个观点极富洞见地要求人们关注市场竞争在当代社会绝大多数领域中的无所不在的影响。但是布尔迪厄很少谈论阶级斗争的集体形式看上去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几乎不能获得对作为有效的组织机构的社会阶级的具体感觉。布尔迪厄的大多数调查研究注意的是与个体与家庭相联系的身份区隔形式。例如，当他思考有组织的劳工的时候，他强调的是作为集体动员的必要条件的群体身份的符号代表与领袖利益的重要性。这类分析常常把集体的冲突归结为不同机构的领袖之间的一种竞争。当布尔迪厄富有洞察力地表明政党与工会的领袖如何能够变成热衷于在一个相对自主的欺诈世界里争夺显赫地位的时候，他们所代表的群体则退入了后台。

而且，布尔迪厄很少关注冲突的实际过程。他的分析极大地局限于各种形式的资本分配，他认定这种分配是个体和群体之间冲突的结果。如果对冲突的实际过程、特别是组织化活动给予更多的关注，这将是很有帮助的。例如，对于老板与工会之间的合同谈判的个案研究

---

[1] 布尔迪厄对于阶级行为的必要条件的分析类似韦伯的分析(Weber 1978：929)。韦伯写道："产生于一个阶级的成员的集体行为的'社会行动'与可能的联合的程度，是与一般的文化条件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与一种知识分子类型联系在一起的。"(重点号引者加)

揭示了一系列限制或者释放各方的领导人在其相对自主的、由领袖组成的世界中争夺地位的能动性的条件。

对个体竞争作为现代分层社会中的冲突的前提形式的关注，肯定抓住了现代社会分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这种关注也许极大地反映了布尔迪厄自己的职业环境以及他对研究领域的选择。教育与高雅文化是最重要的个体竞争与区分的例子。这些受到布尔迪厄偏爱的实质性研究领域，可能过分地塑造了布尔迪厄的阶级冲突观。虽然个体对教育文凭的竞争在战后时期无疑扩展了自己的范围，但是我们依然不清楚是否只剩下了一种游戏——个体的流动性。如果布尔迪厄更多地关注工厂或者国家，那么他或许会更多地强调阶级斗争的集体的与组织的方面。与此相关的是，如果他的经验研究已经包括了对那些争夺定义与分类框架的斗争的确改变了分层秩序的情况的个案研究，那么，他或许已经以不同的形式发展了自己的理论。最后，从更加广泛的历史视野看，布尔迪厄对社会冲突的描述——把它描述为几乎是绝对的市场竞争——在一个发生过法国大革命的国家似乎有一点奇怪。[1]

这样，对布尔迪厄而言，发达社会的阶级斗争常常遵循市场竞争的逻辑，而不是集体动员的方式，阶级斗争是一种“综合性的斗争”与“再生产的斗争”（Bourdieu 1984a：165）。布尔迪厄把发达社会中的社会生活动力学理解为结构变换的动力学而不是结构改革的动力学，是市场竞争的动力学而不是集体组织的动力学，是再生产的动力学而不是革命的动力学。

[1] 在布尔迪厄的一些言论中含有这样的意思：集体的斗争与动员将会是一个可欲的、替代没有终止的、通过个体竞争进行的再生产的选择。但是这个替代选择对于被统治阶级而言显得过于捉摸不定。

第八章

教育、文化与社会不平等

教育在布尔迪厄的研究中占有核心地位。他关注在现代分层社会中阶级、文化以及权力的紧密联系，这种关注最终导致他去研究教育机构、文化在社会分层中的核心作用。在论述他的核心主题——文化在社会分层中的重要性的时候，他把教育系统视作当代社会中控制社会阶层与社会特权地位的主要机构。学校为生产、消费以及各种形式的文化资本的积累提供了基本的机构性的背景。在布尔迪厄看来更加重要的是，学校反复灌输占统治地位的分类系统，符号权力就是通过这种分类系统而得到表达的。[1]而且，学校还是知识分子符号工作的主要机构场所。

布尔迪厄在他的法兰西学院就职演说(1982)中解释说，教育领域以及知识分子的研究之所以在他的研究工作中占据了“根本地位”，是因为一些无意识的思想范畴塑造了人们理解现代世界的主要模式，而教育与知识分子的研究则正好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些无意识的思想范畴。因此，布尔迪厄认为，教育社会学就不是什么社会学的一个分科，而是符号权力社会学的基础。[2]实际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除了他的人类学研究以外，布尔迪厄对法国社会的所有研究事实上都与法国教育的某些方面存在着联系。[3]

---

[1] 布尔迪厄(1967b)写道：“在一个分化的社会中，学校系统是这样的场所：在这里所生产的思想体系，不过是‘原始的分类形式’的表面看来更加复杂的对应物而已。”

[2] 布尔迪厄指出：“教育社会学是知识社会学与权力社会学、更不用说权力哲学社会学中的重要一章。”(Bourdieu 1989c：13)

[3] 实际上，布尔迪厄的五部著作都是关于法国教育的(Bourdieu 1988b，1989c；Bourdieu and Passeron 1977，1979；Bourdieu，Passeron and de Saint Martin 1992)。此外，《社会科学研究会刊》的几个专号也是关于教育的。

布尔迪厄是第一个批评二战以后流行的扩大教育机会以缩小社会不平等的公共政策的社会学家之一。虽然在最近四十年里，所有西方国家的教育水平都已有了极大的改善，但是在财富、收入、身份地位方面的惊人不平等依然如故。布尔迪厄认为，通过允许世代相袭的文化差异塑造学术成就与职业获取，教育实际上有助于不平等的社会系统的维持。布尔迪厄论述法国教育的最早著作之一《继承人》(Bourdieu and Passeron 1979)用大量的资料表明，尽管教育的扩展已经进行多年，但是中上层阶级出身的学生在法国大学中继续占据着压倒性多数。在此后的著作中，布尔迪厄坚持不懈地强调法国教育的社会不平等特征。

正如我在本书的开始指出的，激励布尔迪厄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特权、权力的不平等为什么代代相传而没有得到公开抵抗、甚至没有人意识到这点？他认为，通过研究文化资源——特别是教育文凭、教育选择机制以及认知分类——如何能够被个体与群体用以长久维持他们的特权与权力地位，可以找到问题的答案。布尔迪厄认为，教育系统比家庭、教会以及公司，更应该对现代社会的不平等的传递负责。这样，社会学家的使命就是“测定教育体系对社会阶级之间的权力关系和符号关系结构的再生产所起的作用”(Bourdieu 1973a：71)。

在《再生产》(Bourdieu and Passeron 1977:177—219)一书中，布尔迪厄认为教育体系起着三个核心作用。首先，是“保存、灌输、神化”一种文化遗产的作用，这是它的“最基本”的、“内在”的功能。学校教育提供的不仅仅是技术知识与技巧的传播，而且是把人们社会化，以适应特定的文化传统。与天主教教会相似，学校是“一个专门发明出来维护、传播、灌输一个社会的文化规范的机构”(Bourdieu 1971c：178)。它实施的是文化再生产的功能。

当这个功能与传统的教学法结合时，教育系统就发挥了第二种功能，即再生产不平等的社会—阶级关系的所谓“外在”功能。它强化而不是重新分配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分布。它同时还发挥一种社会再生产的作用。教育体系的第三种功能是所谓“合法化”，通过把它传播

的文化遗产神圣化，教育体系使人们的注意力偏离其社会再生产功能并有助于对其社会再生产功能的误识。

布尔迪厄是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早期的也是主要的缔造者。这种理论使许多人发现，尽管存在形式上的英才教育实践，但教育机构实际上能够强化而不是削弱社会不平等。但是，与别的再生产理论家不同的是，他并不认为教育直接由国家、经济或社会阶级控制。与功能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不同，他认为教育系统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的特点是“相对自主性”而不是直接对应性。[1]布尔迪厄的特殊贡献在于，他表明学校既不是中性的，也不是仅仅反映更大的权力关系，而是在维持与强化这种关系时扮演复杂而间接的中介作用。最后，布尔迪厄是最早考察学校内部的筛选和教学过程、学校文化以及跟踪结构（tracking structure）是如何实际地起这种作用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家之一。

由于布尔迪厄早期论教育的著作已经广为人知，所以本章考察的主要是他新近的贡献，特别是《学术人》（1988b）与《国家精英》（1989c）的贡献。布尔迪厄早期论教育的著作集中关注的是学生文化、文化资本的传递、教学法以及学术筛选程序；而他近来的著作则刻画了法国教育场域及其与权力场域的关系。虽然对于这个机构分化观的简单描述已经存在于他早期的著作中（参见 *Current Research* 1972），但是它们在后来出版的论述大学与大学教授的著述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首先，我们将考察布尔迪厄如何把法国的教育定位在与权力场域的关系中（正如我们在第六章已经看到的，这与布尔迪厄勾勒的研究方法论的步骤是一致的）。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基本对立创造了法国高度分层化的高等教育系统。接着，我将思考布尔迪厄如何用文化资本与

[1] 布尔迪厄并不像史密斯（Smith 1974）那样把现代的大学看作是完全屈从于私人经济利益或公共政治利益，也不提倡一种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对应论”——就像马克思主义者鲍尔斯和金蒂斯（Bowles and Gintis 1976）在美国作的研究，或博德洛和埃斯塔布莱（Baudelot and Establet 1973）在法国作的研究。布尔迪厄也反对非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功能观念（比如 Clark 1962），并不认为在劳动力市场需求与教育供给之间存在紧密的适应。

习性的概念来解释个体是如何分布于整个教育系统的。布尔迪厄同时也关注教学过程，我们将观察他如何把教学过程看作是传播文化资本与习性的影响，以便解释教育的成就。本章还将考察布尔迪厄对于教育机构的看法，他把教育机构看作是把社会的区分微妙地转化为学术评估的强有力的分类系统，然后我们再看看他对于法国高层教育社会化经验的分析，他把法国高等教育看作为塑造精英的力量，这些精英的权威具有准神圣的性质。我还将思考布尔迪厄如何把法国的教育系统看作是相对独立于阶级结构、国家、经济的东西，分析布尔迪厄如何通过他的以阶级为基础的资本投资策略的视角看待教育的扩展，因为对布尔迪厄著作的多数批评认为他对于社会变迁与社会转型的忽视源于他对于教育的分析。最后，我将评价他在这个重要领域的思考。

教育与权力场域

在第六章，我曾谈到，布尔迪厄认为，社会等级制度的两种主要竞争性的原则塑造着现代工业社会中的权力斗争：经济资本（财富、收入、财产）的分配——布尔迪厄称之为“占支配地位的等级制原则”；文化资本（知识、文化、文凭等）的分配——布尔迪厄称之为“从属性的等级制原则”。对于这两种资本的实质性拥有区分了统治阶级与别的社会群体。但是，统治阶级又通过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分配而产生了内部分化。这两种对于权力的对立的诉求同样也内在地区分了法国高等教育。法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学科、教授、学生——由于资本总量的差异以及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相对数量的不同而产生两极分化。《国家精英》与《学术人》提供了布尔迪厄所描绘的法国高等教育机构通过关于竞争性的等级制的两个原则而内部分化的详细的社会地图。

布尔迪厄观察到，教育机构的类型与声望对于后来的职业的影响与

学习时间的长短一样大。他的著作的一个主要主题是，法国教育机构的发展留下了社会与学术两个方面的轨迹。[1]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与法国的大学并行的后预科专业学校(post-secondary professional school)的重点高校(grandes écoles)。[2]重点高校位于法国高等教育的顶端，它们在学术上比大学更加挑剔，它们为政府与商界的领袖准备毕业生，为它们的毕业生提供有价值的、有助于发展学生的职业前程的校友网络。在法国，与此大致对应的是最具特权地位的法学院、医学院与研究生院。在法国，虽然进入大学所需要的不过是高中文凭，但是进入学术上具有特权地位的重点高校却要求紧张而专业化的后预科准备(通常是两年)，以便通过竞争激烈的入学考试。这样，重点高校代表精英教育的机构化形式；然而，布尔迪厄的著作却阐明了大学与重点高校之间尖锐的身份差异既是学术的，更是社会的，因为这些专业学校选择的学生大部分来自统治阶级。

布尔迪厄对于法国高等教育的社会地分割的特征的最全面研究见他的《国家精英》。在这部著作中，布尔迪厄(1989c：185—264)收集了大量的、多方面的关于重点高校的材料，这个材料收集的规划开始于1967年，由布尔迪厄与其他的合作者进行，特别是莫尼克·德·圣马丁。这本书用资料表明了法国84个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的社会出身，并提供了对21所重点高校的更具深度的社会与学术背景的分析，探索了其中15所重点高校的文化实践、政治态度以及宗教。材料显示的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总量的差异揭示了两个主要的机构轨迹。[3]在一个极

---

[1] 对于发展轨迹的社会后果的研究现在已经在美国教育社会学中得到牢固的确立(Oakes 1985)。卡拉贝(Karabel 1972)、布林特和卡拉贝(Brint and Karabel 1989)、库克森和佩塞尔(1985)、多文蒂(1994)等人对于社区大学与预科学校的前沿性的研究表明，学校的类型以及学习的课程决定性地塑造着职业结果。布尔迪厄是最早强调这点的社会学家之一。他的论述或许在法国比在美国更具有激进性。因为在法国，国家中央化、标准化的教育系统原先被认为是为了缩小地区与社会差异而设置的。

[2] 除了大学与重点高校，法国的高等教育包括范围广阔的职业与技术学校，它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要求高中文凭，并从中下层阶级与工人阶级中招收大部分学生。

[3] 这些结果产生于对以学生的社会出身为基础的对应分析(Bourdieu 1989c：199)。

端，我们可以发现像国家行政学院(Ecole Nationale d'Administration)、高等商业研究学院(the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Commerciales)、高等师范学院、(巴黎)综合工科学校(the Ecole Polytechnique)这样的顶尖学校，它们的毕业生可以选择范围极为广泛的，位于政府、商业以及教育界顶端的各种职业可能性，它们的学生主要来自统治阶级；在另外一个极端，则可以发现大学的科学院与文学院，以及各种其他的学校，它们提供的是专门化的技术与职业训练，吸收的学生相对不具有精英的社会背景。[1]这样，在法国，就存在一个分成两个部分的高等教育系统，它们是通过与权力场域的关系而分化的。布尔迪厄认为(1972：17)：

> 高等教育的二元结构——在这个结构中，重点高校与一般学院相对——的功能，是为了把统治阶级的成员与其他阶级、特别是中产阶级的成员区分开。

资本构成方面的差异进一步把 21 所顶尖的学校区分为对立的两极：像(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塞夫勒高等女子师范学院(the 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de Jeunes Filles de Sèvres)、圣－克劳德师范学院(the Ecole Normale de Saint-Cloud)等代表科学的与知识的一极，因为它们吸收的学生都出自相同的社会背景，也就是与这些学校为毕业生准备(即从事教学的、艺术的和科学的职业)的相同的环境。在这样的学校中，出色的学术成就或者学术资本的积累，是给这些机构与它们的学生排列名次的首要原则。相反，像国家行政学院、巴黎政治科学学院(the Institut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de Paris)、高等商业研究学院等学校则代表行政的与经济的一极，因为这些学校既从商界与国家机构招收学生，

[1] 从对 84 所教育机构的对应分析中显示的第二个分化轴，是把“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区分开来。与私人的企业与商业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商业学院、艺术学院以及建筑学院，收取学费并提供相当严格的训练，但是在学术上却不像免费的公立工程学院、农学院、师范学院、研究院——这些学院为公共部门的职业准备学生——那样挑剔(Bourdieu 1989c：213)。

同时也把它们的学生纳入商业界与国家机构的高层。这些机构都不仅依据学术上的优劣进行排名，同时也依据“学术成就以外的统治等级”进行排名。也就是说，依据“它们在经济资本等级中的地位以及它们所指向的位置的权力”进行排名(1972：18)。因此，这两类精英教育路线倾向于为统治阶级中的不同部分服务：在文化资本上相对富有的部分与在经济资本上相对富有的部分。[1]

在大学学院，布尔迪厄也发现了相似的社会地分化的结构。[2]他辨认出了一个相似的两极结构，“一极是学术上占据统治地位而社会上处于从属地位的教员，另一极是学术上处于从属地位但在世俗方面处于统治地位的教员”(1988b：54)。[3]在研究20世纪60年代后期巴黎大学学院的终身教授的比例时，他发现，他们的社会轮廓是依据两极结构变化的。粗略地说，自然科学、艺术与社会科学、法学、医学的教授相应地位于文化权力、经济权力以及政治权力等不同极之间的连续体中。依据社会背景以及一系列显示其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参与程度的指标而界定的统治阶级的代表，随着从科学到医学的移动而不断增加。[4]经济上富有的那部分统治阶级出身的教授常常是在法学院与医学院，而不是人文学院与科学院。[4]举例来说，法学院特别是医学院的教授，比艺术

---

[1] 21所学院的对应分析中另外一个区分因素把那些为行政部门提供“一般性”准备的学院，与那些为高度专业化的职业提供“技术”训练的学院区分开来(Bourdieu 1989c：216)。第三个对于15所最精英的学院的分析也揭示了一个相似的模式。行政职业导向的学院，比如国家行政学院、巴黎政治科学院以及高等商业研究学院更有可能从巴黎资产阶级中招收学生——这些人有预科学校的文学背景，并且上的是权威性的私立学校；而技术职业导向的学院，比如电力学院(Ecole Centrale)、矿产学院(Ecole des Mines)、国家农学院(Institut National Agronomique)等，则更多地从中产阶级以及在预科学校主修科学的人中招收学生。

[2] 这个分析见《学术人》(1988b：38—40，271—275)，本书的基础是对来自巴黎地区法学院、医学院、社会科学学院与自然科学学院的405个终身教员的随机抽样调查。在这个调查中，布尔迪厄发现，“大学场域的结构反映着权力场域的结构，它自己的选择活动与教导有助于那个结构的再生产”(40—41)。

[3] 布尔迪厄写道：“大学场域是依据两个对立的等级化原则组织的：一个是对应于祖传的资本以及实际拥有的政治经济资本的社会等级，与此对立的是特定的、纯文化的等级，对应于科学权威或知识荣誉的资本。”(Bourdieu 1988b，48)

[4] 指标包括：父亲的职业、参加的预科以及高等教育机构，在法国的《名人词典》以及《社交年鉴》中的排名、奖状、在各种政府与大学行政部门的任职。

[5] 布尔迪厄(1988 b：38)写道：“依据与统治阶级的不同部分同样的原理，不同学院的教授处于经济和政治权力极以及文化声望极之间。”

或科学方面的教授更可能生活在社会地位显赫的巴黎近郊地区(44)。这样，科学、文学为一方，法律、医学为另一方，一个非常清楚的界线就可以划分出来。[1]如果我们依据区分统治阶级不同部分的那个原则的基本特征来看法国的大学世界，那么它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两个阵营。

布尔迪厄发现，这些结构在整个 20 世纪 70 年代与 80 年代仍然非常稳固。 如果说 1968 年 5 月迎来了法国大学的改革，大学之门更加敞开了，那么，这也使得统治阶级逃离这些大学。[2]随着顶尖的学校与低等学校的差距不断加大，进入高等学校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 今天，顶尖的学校比以前更加倾向于从统治阶级中招收学生(Bourdieu 1989c：271)。 而且，提供管理、广告、新闻、商务等方面的训练的专业化职业学校的迅速发展与扩展，吸引了带有可观的祖传经济资本的学生(278)。 布尔迪厄把这些学校看作是为那些进不了最挑剔的重点高校、又不愿意进入不那么显赫的大学的人们准备的避难所。

这样，布尔迪厄指出了法国高等教育中两个同时发展的趋势之间的基本悖论：在高等教育方面选择的增加，提供了比以前更多的教育机会，但是同时也强化了高等教育系统内部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分层。

布尔迪厄还观察到法国高等教育中权力从知识极向行政与经济极的转移。 在今天的法国，在争夺最合法的、最有权威的高等教育形式的界定权的斗争中，国家行政学院已经取代高等师范学院的地位。 实际上，国家行政学院已经自命为整个法国重点高校场域的标准(282)。 布尔迪厄认为，这个转移是与知识职业(教学与研究)的传统权威的衰落平行出现的，后者正越来越被不断增强的、与国家行政当局、商业界以及政治党派领袖、媒体(特别是电视)的最高地位联系的特权遮掩得暗淡无光。

---

[1] 布尔迪厄(1989b：376—377)把社会学学科定位在更加接近“法律以及从世俗角度占据统治地位的学科”的位置，而不是接近科学学科的位置。 社会学是一个符号生产的场域，它通过“两个极度对立的逻辑，即政治场域的逻辑与科学场域的逻辑”被划分。社会学中的科学逻辑要求交流应该建立在科学标准的基础上，但是社会学也是被政治场域的逻辑所渗透，在政治场域中，交流是由“它的支持者的社会力量”塑造的。

[2] 这里指的是统治阶级逃离一般的大学，而把目标锁定在重点高校。 ——译者

布尔迪厄挖苦说，这个转移产生了一种关于知识实践的技术官僚观，这种观念促使了以萨特为代表的著名的法国自主知识分子传统的衰落，并且有助于布尔迪厄为之感到痛心的阿隆式的“知识分子新闻记者”的兴起。

习性、文化资本与选择过程

为了表明个体如何分布于这个分层化的教育系统，布尔迪厄求助于习性与文化资本的概念。正如我们在第五章已经指出的，紧密联系于阶级亚文化的习性是指一套相对持久、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关于一个人的成功机会以及社会如何运作的观念，这种观念对一个社会阶级或身份群体的成员而言是共同的。这些观念——更准确地说是倾向——引导个体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行动以便再生产流行的生活机会结构与身份差异结构。这个概念使布尔迪厄能够强调教育的选择是倾向性的而不是有意识的、理性计算的。

在布尔迪厄关于教育的著作中，一个重要的主题是强调学术的选择是通过以阶级为基础的自我选择塑造的。布尔迪厄指出，无论是留在学校还是退学，选择什么课程，都依赖于学生对于自己所属的社会阶级的那些人在学术上成功的可能性的实际预期。布尔迪厄相信，一般情况下，在主体希望与客观机会之间存在高度的对应。一个孩子对于教育与职业的雄心与期待是父母与其他相关群体的教育经验与文化生活的产物，这是一种结构地决定的产物。[1]工人阶级的青年并不期望高水平的教育成就是由于他们顺从那些为没有多少文化资本的人而存在的有限的求学成功机会。[2]相反，中上层阶级的青年把自己的社会优越性内化

[1] 这个观点类似于美国的身份获得研究中被广泛接受的观点，该观点强调学生对于教育成就的期待的重要性(Sewell, Hauser and Portes 1969)。布尔迪厄用习性的概念强调期待如何产生于早期的阶级社会化。

[2] 参见奥布(Ogbu 1978, 1990)对于美国黑人较低的学校期待的相似讨论。

为对于学术成功的期待，并留在学校。这样，布尔迪厄深刻地表明了教育的选择如何事实上通过自我选择而发生。

布尔迪厄对于学生通过包含了客观可能性与主观期待之间高度正面对应的习性进行自我选择的分析富有洞察力，但并不十分有说服力。大量的例子表明，主观期待与客观机会之间的对应论是成问题的。二战以后，美国黑人对高等教育有很高的期待，尽管很多证据证明他们从事专业职务的机会不多。这正好是表明希望与真正的机会之间的错位的最好例子(Hout and Morgan 1975；MacLeod 1987；Michelson 1990；Ogbu 1978，1990)。[1]即使是布尔迪厄自己对于中产阶级参加战后法国高等教育扩招的解释也暗示着(期待与客观机会之间的)这种对应现象在特定的环境中对于某些群体比对其他群体而言更可能产生。虽然布尔迪厄对于“可能性的因果关系”的阐述可能有助于描述那些中断了自己的教育的工人阶级的青年，以及那些把自己的大学学位的获得视作理所当然的上层阶级的青年，但是它却不怎么能够解释为什么中产阶级的家庭开始投资于教育文凭市场，而传统上他们在这个市场中成功的机会并不大。早期社会化功能的心照不宣的、实际的实施(习性的概念对此把握得极为准确)，突然让位给更加有意识的、理性的阶级再转化策略，这种策略表达了一种高度未来取向的关于阶级行为的观点。

阶级习性以外，文化资本方面的阶级差异也影响教育成就。文化的知识与风格作为社会不平等的载体而起作用。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指出的，布尔迪厄发现把文化——特别是以教育文凭形式存在的文化——当作一种特殊的资本类型，即学术资本加以思考是十分有用的。这种学术资本可以通过时间、精力、金钱获得，然后与高地位、高收入的职业加以交换。他的文化资本概念涵盖各种资源，包括语言表达能力、总体文化意识、关于学校系统的知识以及教育文凭。布尔迪厄指

[1] 参见 Rosenbaum 1976。他提供了一个相似的断裂的证据，在这种断裂中，学生错误知觉了预科学校的轨迹的后果。同时参见 Karabel 1972 关于社区大学轨迹的错误知觉的讨论。

出了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分配。社会阶级在教育成就与文化消费模式上差异很大。布尔迪厄发现学生的学术行为与父母的文化背景紧密相关。父母把自己的文化遗产传递给子女。比如，法国的多数高等教育的学位都被教授的子女获取，很少被农民或工人家庭的子女获得。[1]因此，布尔迪厄认为，阶级差异既通过希望与期待，也通过文化的风格与知识而转化为不同的教育行为与成就。

布尔迪厄还关注高等教育系统如何再生产着而不是重新分配不平等的文化资本分配。这导致他去研究课程、教学法以及评估的结构特征，以便解释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他认为，正规的学校教育通过赋予某些文化遗产以特权而贬低另外一些文化遗产来维持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即使是迟迟才出现的对于大学教育的揭露，也没有充分补偿下层与中层阶级的青年在文化资本方面的最初的不利条件。布尔迪厄发现法国的学校强调统治阶级所珍爱的知识形式、文化理念以及风格。他认为，直到最近还支配人们能否进入大学以及精英职业学校的人文科学研究的传统课程，并不提供职业市场上最大多数的部门所需要的技术技巧。[2]人文科学对于那些缺少经济保证的人比较缺少吸引力，因为他们的经济状况促使他们寻求技术性的职业。而且这个学习计划还作为选择方式发挥作用，人文科学方面的学术成就要求总体文化意识和一种精致的语言风格。这样，课程的内容与风格有利于那些拥有“资产阶级语言”的、“在教育上有利可图的语言资本”的人：它倾向于“抽象、形式主义、唯智主义和委婉的节制”，这反映了一种主要存在于统治阶级中的文学的与文化的倾向。这种受到社会好评、学术界尊重的语言风格与“工人阶级语言的率真或表现主义正好相反，后者倾向于从具体

[1] 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已经激发了对于不平等的教育获取的文化维度的研究。Apple 1982, Apple and Weis 1985, Cookson and Persell 1985, DiMaggio 1982, DiMaggio and Mohr 1984, Lamont and Lareau 1988, Lareau 1989, Robinson and Garnier 1985, 这些只是其中一些值得一提的例子。

[2] 从布尔迪厄于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开始研究法国教育以来，法国公立中学中高层次学校的教学内容已经改为数学与科学，但其教学形式化的而非实践性的定向却很难对下层阶级有什么吸引力。

的例子到例子，从图像化的说明到寓言”（Bourdieu and Passeron 1977：116）。它还进一步区别于中—下层阶级的语言特征，因为后者“不够准确，语法控制的痕迹过多”，表现出“急于参照学术上正确的合法规范”（134）。[1]由于强调口语的以及书面的语词，法国学校对于雄辩的演说传统的偏爱就十分有助于保证那些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本的人的特权。布尔迪厄进行了有趣的人类学观察：即使法国大学中那些传统的物质机构——演讲厅、圆形剧场而不是小型的学术会议室或甚至图书馆——也证实了口语的卓越地位（Bourdieu and Passeron 1977：120）。正式的演讲提高了教授作为合法的文化商品传递者的角色。

法国传统的教学法强调对文学语言风格的精妙的掌握，这种教学法特别有利于具有丰富的祖传文化资本的人。由于不能提供适合那些没有文化资本的、具有语言缺陷的人的当代的课程体系，传统的教学法通过整齐划一地要求“所有自己的学生应该拥有统治阶级不曾给予的东西”——即对于只能在统治阶级的家庭中获得的语言与文化的实践性的、非正式的掌握——而实现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功能（128）。[2]风格与内容一样成为文化的特权得以强化，文化的劣势则未被关注。[3]

经典的口头考试与文章写作考试，像传统的教育方式一样，有利于那些文化资本最富裕的人。这些考试常常既测试对主题的把握也测试语言的表达能力。例如，布尔迪厄对于教师资格评判委员会[4]的报告的分析发现了那些通过口头的与书面的修辞而使自己超出其他人的候选人明显受到偏爱。这些国家级考试代表法国教育系统内的最高成就，象征民主的、世俗的、国家控制的教育对于教会、宗教以及社会阶级的

---

[1] 布尔迪厄关于产生于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化的不同语言风格塑造着学术行为的观点，与巴西尔·伯恩斯坦的研究（Basil Bernstein 1971—1975）不乏相似之处，布尔迪厄曾经帮助把它介绍到法国。

[2] 被学校标志为“有教养的”、“杰出的”那种文化与语言风格事实上指的是一种“特定的获取模式”，它“只有在那些其文化为学院化的文化的家庭中才是可能的”（Bourdieu and de Saint Martin 1974：354）。

[3] 布尔迪厄对于传统教学法的严厉批判反映了法国相比于其他国家的教育体系的特殊性，后者更侧重商业、科学指导以及补偿性计划（compensatory programs）。

[4] 这是一种通向法国公立中学与大学教师职业的竞争非常激烈的国家级考试。

胜利。虽然它们宣传民主平等与择优录取的理想，但是，布尔迪厄有力地证明了事实上它们偏爱有文化优势的人。

布尔迪厄著作的另一个主题是教育通过复杂的方式调节着阶级背景的影响。他系统地把教育的筛选过程与社会——阶级的结构联系起来，但又不把这种关系归结为简单的阶级决定关系。社会——阶级的背景是经过诸多因素组成的复杂系统过滤的，这些因素以不同的方式在学校教育的不同水平上相互作用。比如，布尔迪厄解释说，在较低层次的学校中，社会阶级背景与学校表现之间存在紧密的相互联系，而在较高层次的学校中，这种联系可能会慢慢削弱甚至可能消失，其根源是阶级背景与学术的选择性之间互动的方式：与阶级对应的不同的学校表现，在较高层次的学校教育中将显得不那么明显，因为幸存的下层阶级的学生代表了经过高度选择的亚群体(Bourdieu and Passeron 1977)。

布尔迪厄对于大学生的语言测试结果的分析阐明了教育系统如何把学生原先的教育机会程度与文化资本数量转译为似乎只关乎学术的特征(Bourdieu, Passeron, and de Saint Martin 1965；Bourdieu and Passeron 1977：74—89)。文化资本与“选择程度”是用以解释测试结果的核心概念。统治阶级出身的学生在所有类型的词汇考试——从学术概念的界定到含有更一般的文化背景的测试——中都得高分。通过从父母那里(这些父母通常接受过大学教育)继承最受社会肯定的文化活动形式，这些文化的继承人得以靠学术表现赚取文化资本。

调节的过程对于那些学术上取得成功的下层阶级学生来说显得特别明显，这些学生比那些上层阶级的学生更严重地依赖学校以获得文化资本。少数下层阶级学生在考试(包括学术概念的解释)中获得了与上层阶级学生一样高的分数，因为这些下层阶级的学生自己代表了一个高度精选的学术群体。下层阶级的幸存者依靠特殊的聪明才智、个人努力以及不寻常的家庭与社会环境，获得以学校教育为基础的文化资本，弥补了他们原先文化资本的缺乏。但是，这些下层阶级的学生在那些要求具备广泛文化知识的考试中就不能获得同样高的分数，原因是他们缺

乏上层阶级同学的背景。虽然学术上成功了，但是下层阶级的学生由于其文化风格的过分“学究化”而带着他们原先文化匮乏的印记。

同时，大量中产阶级的学生成绩很低，因为他们代表一个不那么精选的学术群体，也因为他们来自这样的阶级环境：在这里，高等教育的主要投资只是在近来才开始。这样，学生的表现与成就可以被看作是期待、文化资本、选择程度等因素复杂互动的结果。

这样，布尔迪厄的研究方法确立了教育过程与社会分层之间的结构性联系。宏观水平的社会阶级不平等模式与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分配，被联系于微观水平的教学法、成绩评估以及教学课程的过程。

作为社会分类的学术分类

布尔迪厄(1989c：19—98)认为，争夺经济与文化资本的斗争不仅从社会层面区分了法国高等教育机构，而且也构造与区分了法国人的精神。教育系统逐渐渗透了一个被广泛使用的认知分类系统，而这个分类系统则强化着社会差异。对于布尔迪厄而言，这是它的最阴险的功能。布尔迪厄从涂尔干与莫斯(Durkeim and Mause 1963)那里借用了这个基本主题，认为在机构化的结构与这些结构在个体中反复灌输的认知倾向之间存在一个基本的、但是又没有被认识到的联系。布尔迪厄不是把这个阐述限于“原始人的”社会与神话世界，而是把它应用于他自己的环境——现代法国学界。

在对竞争激烈的国家统一考试中胜出的预科学校候选人所作的一项研究中，布尔迪厄(1989c：19—47)发现，这些候选人为了在各种学科中获胜而用来把知识品质加以特征化的那些范畴，对应于候选人认为自己所有或考官认为他们所有的那些品质。学生与主考官一样更可能把在文学、语言以及哲学与数学方面的成功归于内在的禀赋，而勤奋工作与学习则更可能被用以解释在地理与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功。事实上，

布尔迪厄(31)发现了一整套两极对立，比如杰出的/迟钝的、天赋的/被激励的、卓越的/粗俗的、有教养的/学院化的、创造性的/一般化的、精致的/粗糙的、雄辩的/笨拙的。学生与教师都用这些两极对立来区分各个学科中的成就。这些两极对立指出了学术成就的两个潜在的理想类型：评价最高的类型引出的是关于个人才能的卡里斯玛品质的图像，而其他类型则指向通过艰苦的工作与果断的决定而获得的成功。然而，布尔迪厄(33)还发现，不同学科的不同的成功典型是与不同的社会出身以及继承的文化遗产的数量相平行的。文学、语言、哲学以及数学专业的学生更可能来自较高的社会阶级，他们依据个人才能对成功作出的表征，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在祖传的文化资本方面的更大优势。这样，法国学术界的成功代表本身就委婉地表达着社会阶级的差异。这些两极对立的“学术分类形式”，发挥的是类似涂尔干与莫斯说的“原始分类形式”的功能，因为它们代表机构化的结构(比如学科与轨迹)的结合，这些结构处于与社会阶级结构同源的关系中(49)。学术精英不过是贵族的一种形式而已。它根植于关于个体的“自然的”权利观与才能观，后者把祖传的文化遗产方面的优势遮掩起来了。

布尔迪厄通过论证认知极(cognitive polarities)与法国教育中机构轨迹的等级制平行，并因此反映了在争夺经济与文化资本的斗争中确立的不平等，扩展了这类分析。例如，招收拥有较多资本的学生的学校与招收拥有较少资本的学生的学校的区分，已经成为我们熟知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区分的机构化基础，或者说成为把高级经理阶层区别于中等经理阶层、把工程师区别于技术员的研究性任务与应用性任务的区分的基础。而且，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的对立已经成为纯知识、纯科学、纯文化取向与应用知识、应用科学、应用文化取向的概念区分的机构化基础。布尔迪厄(1984a：387)写道：

> 教育系统作为机构化的分类者，本身就是客观化的等级划分系统，它通过转化了的方式再生产着社会世界的等级制，并通过对应

> 于社会阶层及其分化的“水平”而分裂为各种专业与学科，这些专业与学科反映着社会的无限分化，比如理论与实践的对立、概念与技巧的对立，把社会的等级划分转化为学术的等级划分（虽然带着表面的中立性），并确立着一种等级，它不被经验为纯技术的等级（因而这种等级是不公正的、片面的），而是被经验为整体性的等级，是以自然为基础的，所以社会价值逐渐被等同于“个人的”价值，学术的尊贵被等同于社会的尊贵。

因此，布尔迪厄认为，教育机构作为一种“庞大的认知机器”而发挥作用，在技术中立性的外表下面，强加一种基本的知识分类，这种知识分类认可现存的社会阶级分化（1989c：51—81）。[1]这个过程在一个习以为常的水平上被误识。实际上，它只能在习以为常的水平上发挥作用，因为关于这个“潜在功能”的广泛意识将使整个系统失效。社会的与个人的伤害，比如：“你只不过是一个工人的儿子”、“你真粗鲁”这些在学术文化中被认为不能接受的评价，仍然可以委婉地通过“误识的形式”表达为学术的判断：“正确是正确，但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缺乏风格”、“一般化的作品”（Bourdieu 1989c：61）。学校的分类功能是通过其合法化的功能得到支持的。学校“通过把社会差异建构为学术差异而把它神圣化”（Bourdieu and Passeron 1977）。由于行动者相信这些分类是学术的分类，因此他们就把它们当作合法性的标签，而没有充分意识到其社会后果。通过社会化，它们已经被具体化为行动者不加反思地实际使用的实践工具。但是，这些学术判断依然是认可并再生产社会阶级差异的社会判断。

---

[1] 布尔迪厄这里的主张与迈耶（Meyer 1970，1977）关于学校的“特许效应”（chartering effects）的讨论有些交叉重合，后者强调的是教育通过界定与传递在更大的社会中的权利、责任、角色，而对社会结构造成的机构化冲击。他们两个人都吸收了涂尔干的思想以形成自己相应的观点，但是布尔迪厄比迈耶更加强调机构化的教育过程对更大的社会产生的认识的与社会的分层效应。

作为精英塑造与神圣化的技术训练

布尔迪厄认为，由学术上非常挑剔的重点高校提供的专业训练不仅传输技术知识与技巧，而且更加重要地，传输一种身份文化。[1]他尖锐地批评技术的和功能的教育观，这一批判明显吸收了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以强调精英学校教育的仪式与符号方面。事实上，当布尔迪厄(1989c：164)写道，“学校事实上是涂尔干意义上的一种宗教的例子”的时候，他在现代的世俗教育系统与宗教之间进行了明显的类比。通过这句话，布尔迪厄的意思是法国的重点高校分离出了一种社会精英，并赋予那些精选出来的人以“通常只赋予神圣存在的所有特性”。这些学校为法国社会中的权力地位创造了一种世俗的僧侣阶层——布尔迪厄称之为“国家精英”。这种身份文化把内在的、机构化的轨迹系统——在较早的时候，对它的研究是通过创造一种精英的重点高校与所有其他的后预科教育机构之间的“神圣/世俗”的对立而进行的——合法化。通过仪式与庆典的紧张而精细的社会化过程，这些世俗的与技术的学校事实上划分出了一种权力精英并把它神圣化。它们创造了一种新的、世俗的宗教秩序，这种宗教秩序充满了准神圣的性质，并体现了现代法国技术官僚领袖的特征。[2]

布尔迪厄(101—181)通过考察预备班(class préparatoires)(它代表通向重点高校的法国预科学校教育的高度竞争性的轨迹)中的社会化经验，用资料表明法国精英教育的这个“神圣化”方面。[3]布尔迪厄把法

[1] 他的观点与柯林斯(Randall Collins 1979)的观点相似，后者与布尔迪厄一样从韦伯关于教育在社会中的作用的讨论中吸收了很多见解。

[2] 布尔迪厄对于涂尔干宗教社会学语汇的援用是容易引起争议的，如果我们回忆一下法国大革命的最重要的遗产之一是创造了自由的、公共的和世俗的教育机构，在其中，宗教不再发挥核心的作用，那么，这种援用的重要性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3] 布尔迪厄把自己的观察建立在来自问卷调查、与学生以及教师的会谈的大量资料基础上，同时也研究了预科班大量毕业生的书面履历证书。

国的预备班看作与英国公立学校的寄宿学校以及美国的预科学校相似的“总体性机构”。[1]预备班中的社会化相当于“巨大的神圣化仪式”。生理以及心理的锻炼灌输着一种自我控制以便控制他人的禁欲文化，所有活动都是为了培养一种尊贵的卡里斯玛性质而设计的。学生经历着一种受到高度控制的社会与知识生活，这种生活巩固着社会的同质性，一种共同的文化，一种共同的权利感，一种共同的文化资本。

但是，对布尔迪厄来说，甚至比对日常生活的受控制的组织安排更为重要的，是塑造受驯服的知识习性的教学法。为竞争性的考试进行的长期准备、教科书而不是原著的使用(即使是在人文科学中)、大量成套的问题以及常规的训练、紧张的节奏、竞争的氛围，创造了一种对于文化与知识研究工作的工具性的、实用的、鼠目寸光的态度。这种实用的定向不是滋养能够激励研究的批判性精神，而是促使学生把自己的兴趣限制在有助于考试的东西上面。布尔迪厄观察到，虽然这对于国家与经济界的专门管理人员来说可能会有用，但是它却并不能巩固对于更加探索性的知识研究的兴趣，这种知识研究对于训练教师与研究人员是非常重要的。似是而非的是，那些被精选出来的、学术上优秀的学生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最不可能激发对于以自身为目的的研究的兴趣或对知识发展的兴趣的学术机构中。重点高校给予学生一种竞争的文化但是却不是鼓励批判精神的文化。

教育场域的相对自主性

布尔迪厄著作的另一个核心主题是：教育机构不是社会中更具决定

[1] “总体性机构”(total institutions)这个术语来自戈夫曼(Goffman 1961)。布尔迪厄对于社会化经验的分析分辨出了许多机制，这种机制与库克森和佩塞尔(Cookson and Persell 1985)在他们对于美国精英寄宿学校的研究中描述的机制相同。但是，布尔迪厄强调法国预备班的同化经验而库克森和佩塞尔则更加关注寄宿学校中各种形式的偏离与越轨。

性的机构的简单附属物。正如我在第六章中指出的，布尔迪厄论述过文化场域独立于外在利益的“相对自主性”。他用相对自主性的概念来阐述教育系统、经济以及社会阶级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Bourdieu and Passeron 1977：177—178）。正是通过相对自主性的逻辑，布尔迪厄认为教育系统能够实施自己的“外在的社会守恒功能”。

教育系统的相对自主性指的是明显偏离劳动市场的需求或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发展独特的身份文化以及自己的机构化与专业化利益的能力。布尔迪厄强调，教育系统通过自己的自我再生产能力与自己在保护学术资本的价值方面投入的利益而获得相对独立于外部机构的自主性。借鉴涂尔干的思想，布尔迪厄把教育系统从自己内部吸收新领袖的能力，看作是教育系统不同寻常的历史连续性与稳定性的原因，这一点更加类似于教会而不是企业或国家（Bourdieu and Passeron 1977：195—198）。[1]教育对于招收新生、训练以及人格培养方面的实质性垄断保证了教育系统能够使自己的规划与活动适应自我维持的特殊需要。比如，传统法国大学中人文主义文化传统的代际传递，与由工业化促动的当代社会对于实用知识的关切是矛盾的。这无疑是受教育的法国男女反资本主义情绪的重要根源之一。它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法国的学术界强烈反对国家计划制订者一再试图调整课程安排使之更接近商业实用需要的做法。内部生产的知识体系与职业化、机构化利益的结合形成了教育系统相对独立于国家控制与社团压力的自主性的基础。

除了关于教育—社会关系的技术—功能观和工具主义的阶级统治观外，布尔迪厄关于教育系统拥有相对自主地位的观点提供了另一种可供选择的可能性。[2]通过关注机构化的自我生存倾向、内部的劳动力市场

---

[1] 布尔迪厄参照了涂尔干的不怎么著名、但或许是最重要的教育社会学著作《教育思想的演变》（Durkheim 1977）。

[2] 克拉克的《培育专家社会》（Clark 1962）是技术功能观的一个经典代表，而史密斯的《谁统治大学？》（Smith 1974）则提出了关于阶级统治的工具论观点，鲍尔斯和根蒂斯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Bowles and Gintis 1976）提供了一种关于阶级与学校关系的结构观，这个观点同样几乎不承认独立于阶级利益的机构的自主性。

以及精英教育的意识形态的机构化基础，布尔迪厄正确地指出了教育系统对外部要求的调节。

然而，相对自主性这个术语可以用以强调两个完全相反的倾向，这个特点既反映了它的灵活性，也反映了它的模糊性。这个术语可以指一个更深层次的被误识的关系与功能。布尔迪厄在讨论教育与阶级结构的关系的时候，曾经论述过(教育系统的)依赖性方面。“相对自主性”把握的是社会不平等在教育方面的传送的被误识维度：形式上的机会平等以及择优奖励使得通过文化资本进行的微妙的特权传递成为可能。比如，《再生产》一书强调的是社会结构与学校之间的紧密的、但被误识的关系。在此书中，学校的录取、表现以及轨迹都被阐述为是极大地依赖于阶级的——即使是通过间接的方式。虽然已经有许多尝试力图证明社会阶级的再生产通过各种文化的与机构的中介而发生，但是社会的再生产过程好像照常进行而没有太大的困难。学校教育似乎保证了特权者的成功以及不幸者的失败。上层阶级的社会地位下移的危险(在此书中)只是简单地提及而没有得到研究，而下层阶级青年社会地位上升的可能性被认为是微乎其微的。

但是，“相对自主性”既意味着自主性也意味着依附性。这个术语强调的是(教育)系统抵制外部要求的能力。当布尔迪厄讨论法国的教师抵制国家技术官僚企图使法国的预科教育与高等教育现代化并使之变得贴近商业与高科技的需要的时候，他利用的就是该术语(即自主性)的这方面的含义(Bourdieu, Boltanski, Maldidier 1971)。布尔迪厄在这里准确地把握住了这样的观点：(教育的)机构化的与职业化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根据自己的主张转化外部制约的能力(这个观点在人力资源理论与多数激进理论中是没有的)。但是，这个着重点是变化不定的，取决于布尔迪厄是在讨论教育与社会结构的关系，还是在讨论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以及国家的关系。

此外，在布尔迪厄的分析中，独立于劳动力市场的自主性程度还依据教育的类型与劳动力市场的类型而变化。比如，较之文科教育项目

与白领职业的关系，职业教育与技术熟练的体力劳动市场中的职业进入和工作表现的关系就显得更加紧密，而且，在布尔迪厄的分析中，较之职业教育或文科项目，重点高校与精英职业位置之间存在更加“适应”的关系。这类变化并没有能够通过相对自主性的语言得到很好的把握。

虽然相对自主性的观点很好地把握住了法国教育的重要的历史发展，但是，它却不太能够解释变化本身。当布尔迪厄谈论传统的法国预科与大学教育对经典的强调、对课程改革(要求它更加适应工业化的知识与技术需要)的抵制作用的时候，自主性的观点最为有效。但是，在过去三十年中，法国预科教育中数学与现代外语的重要性的提高以及职业教育的发展，意味着教育规划与现代技术需要之间的联系不断增强。但是，相对自主性的观点却不能对这种变化作出适当的描述。

这个术语的使用并没有使布尔迪厄能够说清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教育机构能够获得自主性、获得自主性的程度、自主性的限度以及它会如何发生变化。但是，如果我们想要获得对于分层的教育系统与分层的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更加丰富的理解，那么，这些问题就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术语给了布尔迪厄概念上的机动性，但是其重大的代价是缺乏经验的精确性。

布尔迪厄提到教育系统的相对自主性，以说明其破坏政府制定的改革的能力，他认为，政策目标与实际结果间的关系是经过不同的机构利益与专业利益调节的。这个观点并不新颖，但是常常得不到批判的教育理论的赞赏。不管怎么说，教师、学校行政人员以及国家管理阶层的利益在一定的条件下、在某些问题上可能高度一致，比如为了提高学生的补助金而扩大国家资源、建设辅助的科学设施、加强对于人文科学的指导等。[1]布尔迪厄并没有研究这些个案。对教育机构与国家机构

[1] 例如，多尔蒂(Dougherty 1994)指出，社区大学的领导发现自己的机构化利益受惠于那些也有利于商业与政府利益的政策。

之间的关系作出全面的评价，这还需要对这些状况作出评价。 而且，这还需要对教育改革的政治进行研究，这种研究将考察行动者、机构以及受到争议的目标。

对相对自主性的强调使得布尔迪厄很少谈论学校教育与国家、有组织的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 但是，教育计划和政策制定与其说是由相对自主的教师和教授实施的，还不如说是由政府官员实施的。 而且有组织的劳工与教师联盟可以作为重要的压力集团(pressure group)起作用。 即使在法国，商业利益也不是完全与大学绝缘的，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学校)课程向着面向科学与面向商业的研究所作的调整，就说明了这点(Isamberg-Jamati and Segré 1971)。 在强调文化机构的自主性的时候，布尔迪厄的分析倾向于低估这些非教育的因素的重要性。

既然布尔迪厄把教育场域的自主性看作是程度的问题而不是要么有要么没有的情形，那么，他对于法国的研究就适用于跨国的比较。 特定国家的特殊性可能要求对模式作某些修正。 比如美国的大学就受到经济利益的深刻制约，比如研究基金、学生注册以及校友关系等。 重要的政治势力常常影响研究基金的分配、资格的授予，有时还影响到教师的观点表达。 至少在美国，与布尔迪厄依照法国的情形发展出来的框架比较，在学术场域与经济、政治场域之间存在更多的互动，更少的自主性。

教育、再生产与变迁

在这个结论部分，我将考察布尔迪厄对于教育与社会变迁的看法以及他对于这个重要问题的思考所受到的批评。

教育的扩展：阶级再生产策略

在第七章，我已经指出布尔迪厄依据个人与家庭(他们竞相维护或

强化自己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的资本投资策略来分析当代社会的阶级结构的动力学。布尔迪厄(Bourdieu and Boltanski 1977：198)依据社会阶级的“再生产策略”——通过这种再生产，中产阶级与统治阶级群体力图“通过守护或增加自己的资本来有意或无意地维护或改进自己在阶级关系结构中的地位”——来分析法国教育系统在战后的扩展。个体与群体通过维护、强化或转化其资本的库存量来保护或者发展自己在社会等级体系中的地位。

为了维护或改进自己在分层次序中的地位，不同的阶级追求不同类型的教育投资策略。中产阶级群体(比如店主)在二战以后开始投资高等教育以便在越来越需要正式资格证明的职业市场获得经济保证。由于传统上他们的文化资本少，所以这些群体开始投资扩展的大学。由于受到传统上对人文科学的强调以及那些对祖传文化资本不足的学生不利的讲授形式的阻挠，这些中产阶级群体要求课程与教学应该面向获取实用的知识与技能以适应日益专业化的职业市场。

第二种类型的策略是知识分子精英追求的策略，这些精英在传统上就投资于教育，因此已经拥有相当数量的文化资本。统治阶级中的这个部分已经保证了法国一代又一代的教授、作家、艺术家的再生产。作为法国人文主义传统中的主要职业，这些文化精英群体努力保护其文化资本使之免于贬值。他们抵制屈从于劳动力市场不断变化的技术需要的学术要求，这些富有的文化资本家强烈地捍卫自主的艺术律令的价值，反对强调大学课程的职业取向的改革措施，为大学的绝对自主性辩护。他们还把自己的子女定位在重点高校，特别是具有名声显赫的、十分挑剔的、为预科学校与大学准备教师的高等师范学校。

统治阶级中的其他部分追求不同的策略以便维护自己的权力与特权地位。面对平等的民主理想以及新的行政与法律约束，简单地继承经济财富与权力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那些经济资本雄厚但是文化资本却中等的大企业领袖，已经为了自己的孩子把自己的经济资本“转化”为以学位形式存在的文化资本，借此对家庭公司的衰落作出回应。这

些学位使得他们能够轻易地、但不是合法地进入法国大公司的最高管理阶层地位（Bourdieu 1989c：371—481；Bourdieu and de Saint Martin 1978）。另一方面，那些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都非常富有的人，比如医生与律师，已经强化了自己的文化资本的积累以便成功地获得最高的企业职位和保护自己的职业地位，提防成功的中产阶级新贵进入。这两个特权阶层都统治着权威的职业学校，比如（巴黎）综合工科学校、国家行政学院，这些学校的毕业生直接进入政府机构与大公司的最高领导位置。[1]

布尔迪厄对于不同阶级群体的变化不定的、有时还相互冲突的教育投资策略的分析，阐明了在教育中至关重要的东西并非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他敏锐地指出，对于学术文凭的要求的提高不只代表了对劳动力市场上更高的技术要求的回应，相反，布尔迪厄把战后高等教育的扩展与各社会阶级的文化和经济资本的变化，与对权力与特权地位的争夺联系起来。[2]他的分析还表明，发展教育精英领导制的最大得益者不是资本家（如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而是文化资本最雄厚的人，即专家。

布尔迪厄的变化理论

许多批评家都认为，在早期著作中，特别是在《再生产》一书中，布尔迪厄对法国教育的社会再生产的过分强调，使得他不能充分预期社会危机与社会变迁的情境。[3]

困难似乎是来自布尔迪厄在解释社会行为时，给他的习性概念所赋予的核心作用。批评家们指责说，尽管布尔迪厄声称在他的结构主义分析中纳入了能动性，但是，习性（观念）依然包藏着一种不可避免的结

[1] 正如布尔迪厄（1988b）观察到的，高等师范学院的精英地位已经动摇，而国家行政学院则逐渐上升成为法国重点高校等级中新的顶点。

[2] 在布尔迪厄的教育扩展观与柯林斯（Collins 1971）的身份群体冲突解释模式之间存在明显的类似，他们都从韦伯那里获得灵感。

[3] 参见 Berger 1986；Collins 1981a；Connell 1983；DiMaggio 1979；Gartman 1991；Giroux 1983；Jenkins 1982，1992；Joppke 1986；Prost 1970；Sewell 1992；Sulkunen 1982；Swartz 1977；Swartz 1981。

构决定论，说到底，习性不能解释创新与变迁，因为它把行为还原为它在倾向中所内化的资本类型的利益，并且只能产生出与这些利益对应的实践。

布尔迪厄强烈地反对这些批评，指责说这些批评建立在对于他的全部作品的肤浅而片面的认识的基础上，并低估了习性的“创造性的”一面。事实上，这些批评无非是那些捍卫关于“创造”的职业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的“敌意的反应——如果不是精神错乱的话”。他还指出，习性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概念，包括对于变化问题的开放性（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132—137）。[1]只是近来布尔迪厄才承认，他的某些理论表述可能导致人们把他理解为一个“超级的决定论者”（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132）。[2]

我个人的观点是，习性代表实践与结构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概念，而不是一种在结构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建构。[3]由于习性的作用一般在时间过程中发生而且跨越多种情境，而这些情境在结构状态方面可以不同于塑造习性的那些情境，因此就为变化与修正留下空间。[4]但是，正如布尔迪厄（例如 Bourdieu 1989c：9）承认并在他的著作的许多地方有力地主张的，结构永久化的倾向已经被植入他的社会化行为模式中。习性倾向于再生产那些与生产习性的条件相一致的行为（Bourdieu 1977c：95）。例如，布尔迪厄（1990h：60—61）这样谈到习性生产的“躲避策略”：“通过拒斥能够质疑自己积累的信息而使自己免于危机与严峻的挑战”；或者，通过倾向于“偏爱可能强化习性的那些经验”以“避免

[1] 华康德（1992）强调，布尔迪厄的框架具有容纳变化理论的开放性，即使布尔迪厄自己没有系统地阐释这样一种变化理论。

[2] 布尔迪厄（同上，136）写道：“我能够理解这样的误解：就倾向本身是社会地决定的而言，人们可以说我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超级的决定论者。的确，既解释地位的效果、又解释倾向的效果的分析，可以被看作是难以克服地具有决定论色彩的。”

[3] 我在这里加入了其他一些批评者的行列（Harker 1984，1990；Miller and Branson 1987；Schiltz 1982；Sulkunen 1982；Thapan 1988；Wacquant 1992），他们也把习性看作是一个调节的概念。

[4] 其他一些批评者（Calhoun 1993；Powell and DiMaggio 1991）也看到，对于变化与修正而言，习性既包含决定的方向度，也包含可能性的方向度。

把自己暴露于这样的信息”来避免危机。被植入习性这个概念的再生产倾向的确是非常强烈的。[1]而且，从技术上讲，这些批评者在下列意义上是正确的：习性本身不能解释变化。然而，在布尔迪厄的完整的理论模式中，实践是从习性与场域的互动中产生的。如同我们在第六章中看到的那样，布尔迪厄的行为理论如果不把场域观念包括进来就是不完整的，因为场域能够把自己的特定逻辑强加于习性倾向。只有当习性在与最初生产它的条件相似的条件中起作用的时候，结构的再生产才可能发生(Bourdieu 1990h：63)。的确，当布尔迪厄(1974a：5)理解习性与场域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时候，三种不同类型的情况都可能发生。在机会、限制与习性倾向得以最初内在化的情境非常相似的那些情境中，习性将会倾向于生产其与现存结构对应的实践，其结果则是社会的再生产；而在场域的机会与限制逐渐变化的情境中，习性倾向于适应调节——尽管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对应”。当布尔迪厄谈到习性的“滞后现象”的时候，他想到的就是这种情境。虽然习性是一种调节性的机制，但是它总是依据过去的经验处理当前的情境。当传统的策略在与新的现象发生关系而被使用的时候，变化就发生了。[2]当新的情境与形成习性的情境之间的不适应比较轻微的时候，只会发生结构的缓慢修正。在布尔迪厄的分析中，这种适应过程的速度似乎依据在场域中的定位以及资本的数量与结构而发生变化。比如在20世纪50、60年代，法国的中产阶级家庭比工人阶级家庭更快地利用了正在增长的高等教育机会。但是在(机会与限制的)不适应非常突出的地方，迅速的变化就随之发生。在机会结构发生尖锐而迅速的变化的地方，习性的期待就会被挫败，并创造出社会危机的潜在因素。布尔迪厄写道，在危机的情境中

---

[1] 事实上，当布尔迪厄写道，“资本包含一种维护自身存在的倾向”与“再生产的倾向”的时候，他(1986a：241)不但在习性概念中，而且在其资本概念中看到了趋向于再生产的倾向。

[2] 参见萨林斯(Sahlins 1981)提供的关于传统社会中的此类变迁的特别惊人的例子。

> 客观机会与主观期待之间相互再生产的辩证法就会破坏，样样事情都在表明：相对于主观期待的客观机会的突然的变化可能会破坏统治阶级原先对于主导目标的心照不宣的接受，以便能够创造或强加一种真正的集体行为的目标(Bourdieu and Passeron 1979：97)。

在这第三种情境中，再生产让位于顺从或者颠覆。

这样，布尔迪厄的整个行为理论使得我们能够思考这样的情境：现存的机会不再对应于来自原先社会化的期望。这样的情境促使习性产生非适应性的行为方式。变化的根源深植于习性与结构之间在不能相互适应的情况下发生的碰撞中。对于习性与场域之间错位关系的思考更多地是通过结构的滞后或者不完全的同步性、而不是通过结构的对立矛盾(这种对立矛盾将产生变迁)而进行的(Bourdieu and Boltanski 1981：96)。在布尔迪厄的著作中存在不连续性与调整，而不是矛盾对立与革命。

1968 年 5 月：一个结构的历史

布尔迪厄在《学术人》一书中着手处理社会变迁这个重要的问题并对它进行了迄今最为充分的阐述。在这本书中，布尔迪厄计划阐述法国 1968 年 5 月危机的“结构的历史”。正如社会再生产的逻辑意味着机会与期待之间的紧密联盟，社会危机最可能发生在期望与实际的回报严重错位的地方。布尔迪厄把 1968 年 5 月看作是遭到挫败的期望的戏剧性展开，这种挫败感来自于教育文凭在法国社会中逐渐发挥的核心作用。

在法国，教育文凭体系的急剧扩展造成了三个领域中期望与报酬之间的错位：教师职业、学生计划(student plans)、体力劳动。布尔迪厄论证说，在 20 世纪 60 年代(教育迅速扩展的年代)以前，法国高等教育系统的特征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高度和谐，因为两者都拥有可观的文化资本并代表高度精选的社会群体。这是一个拥有共同习性的世界。然

而教育的扩展在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和谐，对于教师与学生双方来说都造成了期望与报酬之间的鸿沟。在大学中，传统的教师职业系统(一个以合作与长期的准备为基础的地位—责任体系)由于青年教师队伍的扩展而被颠覆，而这些青年教师带着对于迅速进入数量非常有限的较高职位的强烈期望。教师们发现他们自己面对数量不断增长的不那么精选的中产阶级学生，他们并不拥有教师传统上觉得理所当然应该有的文化背景；而中产阶级的学生则反过来发现许多大学教学的人文或学术方向没有给他们提供多少在紧张的职业市场竞争中需要的实际技能。毕业生数量剧增，大学的学位贬值——他们原本以为学位可以保证自己获得高地位的职业。而且，法国的大学不能推行选择机制或“冷却”(cooling off)机制，以便调整学生的期望值使之适应好的职业机会有限这个现实。最后，体力劳动者非常失望地发现他们通过职业训练而提高了技术，却正好赶上劳动力市场对于体力技术的需求下降的时期。布尔迪厄认为，这些不同的期望危机的结合是导致1968年5月事件的潜在因素。

布尔迪厄对法国1968年5月事件的分析需要对其他国家的语境进行仔细的比较调查。比如，它可能不能很好地推广到美国。与法国的学生运动不同，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并不是由职业机会方面“突如其来的挫败”促成的。相反，这个时期职业机会正在增长。

还值得指出的是，布尔迪厄对于1968年5月大学场域的分析根本没有提及社会运动与5月事件的组织方面。[1]他也没有看到可能的国际影响因素，比如越南战争和其他国家的学生暴乱所具有的潜在的动员力量。虽然布尔迪厄承认战后经济的更大范围的变化有助于形成导致1968年社会危机的条件，但是这些经济因素并没有直接

[1] 参见图雷纳(Touraine 1968)从社会运动角度对法国1968年5月事件的讨论。

包含在他的分析中。 他的分析重点以及他的方法论要点是，外部因素如何通过内部的文化场域（比如法国的大学）的逻辑而被改变与调节。

由于布尔迪厄的场域分析方法认为一旦场域获得自主性，它就会依据自己的内在逻辑来转化外部影响，所以分析的优先性被赋予了场域的内在结构与动力。 对于布尔迪厄来说，1968 年 5 月事件最重要的特征存在于法国大学系统的内部。 而且，布尔迪厄把法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危机定位在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内部，而这个部门恰恰是法国高等教育在战后扩展最剧烈的部分，也是学术的选择性最低、与劳动力市场的联系最弱的部分。 在那些名额有限制、录取高度精选、毕业以后保证能够有好职业的领域，1968 年 5 月事件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 这种情况在重点高校就表现得特别明显，尤其是（巴黎）综合工科学校与国家行政学院。 但是，这个强烈的对比悖论性地表明，教育扩展政策和纯粹的学生人数以及教员人数的增长，与这场危机的关系或许比布尔迪厄的分析所承认的要更加紧密。 布尔迪厄注意到，重点高校也有教员招聘与晋升的岗位流动制度。 但是，这个制度由于机构并没有扩展而得以度过危机。 而且，这些精英学校与法国劳动力市场的精英部门存在紧密联系。 这样，不同类型的法国教育机构与法国政治经济之间的结构性联系就成为解释它们在 1968 年 5 月事件中的不同经历的关键。 布尔迪厄承认这些外部因素与内在因素之间的联系的重要性，这使得他对于内在因素的集中关注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

作为理解变化的一个理论框架，布尔迪厄关于习性与场域脱节的观念留下了一些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 首先，在布尔迪厄的框架中，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导致机会的急剧下降——特别是在习性的倾向稳固地强化了机会，以至于把机会加以再生产的情况下。 其次，我们也不清楚在什么情况下，受挫的期望会走向顺从或造反这两种极为不同的反应？由于我们或许会发现受挫的期望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所有的历史时期，那么，到底是什么构成了决裂的关键？ 在这里，布尔迪厄的社会行为

理论易于受到关于社会危机的“相对贫困”理论的批评。[1]布尔迪厄(1979：77—79，1984a：143—147)把20世纪70年代中层法国白领工人的反机构的态度与行为的表达归因于受教育者的期望的受挫。但是，在什么条件下，受挫的期望会导致自我谴责而不是动乱？导致其中一种而不是另外一种情况发生的条件恰恰是需要进一步分析的。需要思考的关键性的问题是：作为一个组织化的单位而行动的群体的资源与能力的总值，其对立面的组织化程度(Tilly 1978)。国家机构、大学行政部门以及组织化的利益群体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布尔迪厄对于群体组织化的能力与实践几乎没有说什么。但是，这些对于研究社会中的秩序与失序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除关于期望与客观机会之间的观念错位外，在布尔迪厄的著作中还有其他的因素，表明变化的潜在资源：外部事件对场域的侵入、场域的参与者的绝对数量的增加、不同场域之间危机的不均衡发展与接合、资本类型的增加、暴露场域、基本信念的社会斗争——这种基本信念需要行动者的新的符号统治形式与新的再生产策略。[2]它们出现在布尔迪厄著作的不同地方，但是还没有被综合进一个关于社会变迁的总体理论中。

[1] 古尔的《人们为什么要造反？》(Gurr 1970)是关于社会动荡的相对贫困理论的代表作。参见斯科普(Skocpol 1979)对关于社会危机的相对贫困理论的简要评述。

[2] 比如，布尔迪厄(1989c：482—486)讨论了权力场域中的一般结构转化对于文化生产的影响。但是这些转化没有得到理论化，而是被归为大公司的经济集中化与官僚化方面的变化。

第九章

知识分子与知识场域

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在布尔迪厄的著作中占据了一个核心位置，但这一点却一直没有受到十分的关注——尽管人们对布尔迪厄的兴趣正在迅速增长。 布尔迪厄对于知识分子的理解来自他的一般实践观、符号资本、文化资本的动力学理论以及文化生产场域理论、现代社会分层秩序理论。 事实上，一种隐含的——有时则是非常明显的——知识分子实践观与这些理论和经验兴趣中的每一种都牵连在一起。 为了达到对布尔迪厄的社会学规划的更丰富的理解，在这一章，我将首先考察布尔迪厄对知识分子利益的关注如何与他的整个社会科学工程的核心主题，特别是他的符号权力与符号暴力理论相互作用；然后我将考察布尔迪厄如何把知识分子的定义问题当作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对象，他如何在社会阶级的结构中定位知识分子，以及——从布尔迪厄关于知识场域的核心概念的角度看——知识分子如何通过其对文化生产场域的参与而被分层化。 我还将考察布尔迪厄对政治中的知识分子的看法，看看他如何把知识分子的政治作用理解为基本上是模糊的，介绍他迄今为止对于知识分子的全面研究，他对于巴黎大学教授的研究。 本章主要探讨布尔迪厄对现有知识分子的实践与机构的批判性分析，第十章将分析他关于知识分子角色的规范性的观点，即他相信知识分子(特别是社会学家)在现代社会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知识分子的重要性

从知识分子的理论角度审视布尔迪厄的理论为什么是有用的，至少有三个重要的理由。首先，布尔迪厄在其中生活与写作的这个国家，是一个超越与批判知识分子——他们积极投入国家的政治生活——的理念特别强大的国家。从左拉与德雷福斯的支持者[1]开始，作家、艺术家以及教师在法国的政治生活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政治作用。萨特可能是这个民族传统的最典型的例子。在这个传统中，“文人成为占据领导地位的政治人物，因为他们说话带有权威性，尽管他们事实上没有在政府中担任职务”（Huszar 1960：8）。结果是，知识分子的角色既成为模仿的对象，也成为批判反思的对象。事实上，一个引导潮流的思想家而不关心知识分子，这在法国是不可思议的。布尔迪厄当然也不例外。

其次，知识分子是布尔迪厄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在布尔迪厄的研究中有相当一部分探讨知识生产的场域问题。[2]布尔迪厄（1993d：132）明确指出，他意欲“对知识生产的社会学作出贡献”。而且，他还承认，对知识分子的研究从属于他对“整个统治地位系统”的最初研究规划，虽然他还没有完成对于它们的系统研究（Wacquant 1993b：20）。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知识分子主题是布尔迪厄的知识与政治规划的核心部分。布尔迪厄认为，对知识分子的研究对于理解现代社会的分层、政治冲突、不平等的延续等特征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我们可

---

[1] 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法国军官，犹太人，1894 年因被军事法庭以叛国罪（被指控向德国出售军事机密）而判处终身监禁，从而激发要求释放他的政治风波。在支持德雷福斯的广大知识分子中包括著名作家左拉。——译者

[2] 布尔迪厄关于知识分子研究的著作，包括：Bourdieu 1971c，1975b，1980b，1983a，1984a，1985d，1988b，1991a，1991b，1991d，1993c。

以看到，这个基本关切是布尔迪厄的符号权力与符号暴力理论的核心。[1]正如我在前面几章中指出的，布尔迪厄的符号权力理论认为，阶级关系是通过符号斗争进行调节的，阶级关系的一个关键方面是为了使关于社会世界的特定的定义与分类合法化而进行的斗争。这个争夺符号权力的斗争包括命名能力与分类能力，实际上就是创建社会群体的能力(Bourdieu 1985e：731—735，1988a：23)。它需要进行符号性的劳动，而这种劳动正好是知识分子的工作。知识分子作为符号生产者，[2]从战略上讲，处在塑造阶级关系的特性的位置上。[3]

布尔迪厄赋予符号生产者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也引发了严重的争议。在权力的运作需要合法性与误识的意义上，知识分子可以在阶级关系中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但是在许多场合，权力也可以通过赤裸裸的暴力而不是默许(tacit consent)来实施(Mann 1973)。为了阐明权力关系的符号方面的问题，布尔迪厄的符号权力理论可能会低估非专家们在特定的情景下，发展恰当地理解权力关系的真正特征的能力。如果情形真的是这样，那么，布尔迪厄赋予专门化的符号生产者的核心作用就显得不怎么有说服力。

虽然今天的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较之以前更加依赖于教育文凭，但也必须注意，不能把未经证明的重要性赋予知识分子角色。事实上，

---

[1] 加纳姆(Garnham 1986)也指出了知识分子理论在布尔迪厄著作中的中心地位。

[2] 布尔迪厄(1990c：146)写道，“文化生产者有一种特殊的权力，即呈现事物并使人们相信这些事物的真正具有符号/特征的权力，以一种清晰的、客观化的方式显示多少是混乱的、模糊的、粗糙的甚至是无法理论化的关于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的经验，并因此使这些经验变成实存的权力。”

[3] 虽然布尔迪厄(1990c：27)自己说直到最近才接触葛兰西的著作，但是，关于知识分子在发展群体认同的作用方面，布尔迪厄与葛兰西的观点相似。葛兰西(Gramsci 1971：334)写道：“如果不把自己组织起来(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大众就不能区分自己，不能变成凭自己的资格而存在的独立存在。而如果没有知识分子，即没有组织者与领导者，换言之，没有理论—实践关系(这种关系是具体地通过‘专门’对观念进行理论阐释与哲学阐释的那些人而辨认出来的)中的理论方面，就没有组织化的行为。”

就图雷纳(Touraine 1973)社会研究的行为方法来说，知识分子也是主要角色，因为文化领域通过他的“历史性”概念而得到了强调。那些创造并操纵社会符号的人为了争夺文化发展方向而进行的斗争在他对“社会的自我生产”的分析中占有核心地位。但是图雷纳研究的焦点是社会运动中的行动者，而布尔迪厄则更集中于对知识分子的结构定位的描述。

我们对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强调得过头了。统治精英可以选择不理睬那些受教育程度很高的顾问与经理，这种情况在美国就经常发生（Wood 1993）。布尔迪厄有效地挑战了知识分子的作为业已确立的秩序的局外人的自我形象，但是他没有走得那么远，去挑战知识分子自己假设的自我重要性。[1]

定义问题

布尔迪厄（1987b：171，1988b：269，1990c：143）的知识分子研究的方法从一开始就提出了谁是知识分子的问题，即知识分子社会学的研究样本应该如何界定。对布尔迪厄（1988b：256—270）来说，谁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特有的特征，这本身就是文化场域内的争夺对象。界定谁是知识分子与谁有权威来进行这样的界定是紧密联系的。[2]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必然成为这个斗争本身。[3]布尔迪厄强调说，社会学家的任务“不是把自己当作法官的法官，当作判定谁有权利做法官的法官。他只是指出这种权利本身就是争夺的对象，而他分析的正是这种斗争的逻辑”（269）。研究者必须把场域当作一个整体加以把握，而不是站在一个惟一的制高点上进行居高临下的判断。因此，对布尔迪厄来说，界定知识分子的问题以及这个界定如何变化的问题，本

[1] 这个批判性的观察可能更好地反映了美国而不是法国的语境。与美国相比，法国的著名知识分子在国家政策的制订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而且在法国，受过高等教育的文职人员享有更大的权力。

[2] 布尔迪厄（1988b：269）说：“知识分子的定义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特别是知识分子的著作的定义问题，是无法与下面这个问题分离的：允许哪些人参与对知识分子的界定。位于文化生产场域中心的真正争夺对象……事实上就是判断文化生产事务的权利的分配。”

[3] 布尔迪厄（256—270）通过《阅读杂志》（*Lire*）（一本关于法国文化生活的评论性杂志）于 1981 年进行的对于法国著名知识分子的调查来阐明这一点。列维－斯特劳斯、雷蒙·阿隆、米歇尔·福柯以及西蒙·德·波伏娃在 40 个著名知识分子中名列前茅。而布尔迪厄自己则列于这个名单的末尾。他发现，无论是被抽样的答问者，还是他们的回答，都过于集中于一个专门的文化生产者群体，即与大众传媒关系特别紧密的人。这个抽样是由媒体的曝光率而不是知识生产的性质而决定的。

质上是知识分子场域如何被建构的问题。知识分子社会学事实上就是文化场域的社会学。

这就使布尔迪厄的研究不同于那些开始于先在的知识分子定义（它来自特定时期的理想化的知识分子概念）的研究。比如席尔斯（Shils 1972：3）把知识分子的特征界定为“具有对于神圣之物的非同寻常的敏感性，对于宇宙本质与统治社会的法则的非同寻常的反思能力”、[1]“对于神圣之物的极度敏感”、“对社会世界的本质的非同寻常的反思能力”，这些观念基本上表达了今天关于庞大的文化生产者阵营（从艺术家、作家、教授到律师、工程师、管理者以及国家官员）的特征的看法，它暴露出的危险性是：在某种假定的存在条件的基础上进行概括工作。[2]布尔迪厄的知识分子场域的视角也并非一定认为政治的和社会的异见构成了一个普遍的知识分子特征（Nettl 1969）。[3]这也会损害对这个主题的处理，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把可能性的范围缩小了。

在提出对研究对象的最初界定可能会导致研究的走向偏颇方面，布尔迪厄并不是孤立的。我们不再能够假定知识分子有共同的政治或社会责任，或展示出特定的认知倾向（Brint 1984），也不能假定他们有非常一致的、作为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Gagnon 1987：5）。对于这一批判意识，布尔迪厄还补充说，“知识分子”的标签本身就是符号资本的一种形式，它的价值与对它的拥有本身就是斗争的对象。[4]

布尔迪厄的经验主义的研究首先集中于作家、艺术家以及学术人——人文知识分子，而不是法律、医学与技术知识分子（工程师、技

---

[1] 科塞（Coser 1965：viii）提供了另一个规范性的定义，把知识分子界定为“永远不满足于事物的本来样子的人”、“为理念而活着的人”。

[2] 当席尔斯（Shils 1972：154）观察到“在不同的社会中，知识分子阶层在构成与结构上都是不同的……他们关于知识分子行为与角色的信念也是不同的”时，他是站在一个坚实的历史与社会学的基础上的。

[3] 事实上，许多受到过高等教育的人，包括那些从事传统的人文工作的人，都曾经支持现状。

布林特（Brint 1984，1994）近来论述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政治态度的著作对下列普遍主张进行了质疑：作为整体的知识分子倾向于与现状作斗争。

[4] 例如，雅各比（Jacoby 1987）对于美国文化中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的哀悼，就代表了关于“美国学术界对于政治左派应该做些什么”的斗争内部的一种立场。

术员、经理等)。他实际上把自己的主要研究范围限于那些拥有大量文化资本的人，即属于统治集团的人。但是他的理论工作的目的还是提供对于所有投资于文化市场的各种类型的文化生产者的理解。这就使得布尔迪厄涉及的理论与经验的范围要远远超过传统上与“知识分子”这个词相关的东西。这种研究抵制把从部分个体中选择出来的特征普遍化，吁请对每个历史背景的特定性加以研究。

虽然布尔迪厄是从场域的观点看问题，但是，布尔迪厄同时也倡导一种特定的批判的知识分子类型。这类知识分子包含了关于知识分子应该如何的强烈的规范性观点。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用科学武装起来的知识分子——应该是权力的批评者而不是奴仆。这个理想与他的认识论诉求——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场域斗争而不是某一特定立场的倡导——存在紧张关系。我将在下一章中更详细地考察这个规范性陈述。

知识分子与社会分层秩序

布尔迪厄用来研究知识分子的分析策略开始于他对于权力场域的分析。他首先通过与权力场域的关系来定位文化生产的各种场域，比如文学场域(Bourdieu 1983a)、学术场域(Bourdieu 1988b)，然后是辨别各种类型的符号生产者在其相应的文化生产场域中的结构位置(*Current Research* 1972：39)。

正如我在第七章中所评论的，布尔迪厄是根据统治阶级在各种有价值的资源的总量上的优势将统治阶级区别于被统治阶级的。但是这个统治阶级又通过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分配被内在地加以区分(Bourdieu 1973a)。富有的文化资本家，如律师、高级工程师、教授，与企业所有者竞争地位，后者对于权力的诉求不是建立在文化资本上而是建立在经济资本上。对于布尔迪厄来说，由于知识分子是文化资本家，他们的资本形式是从属于经济资本的，因此布尔迪厄把他们定为统

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1]因此，布尔迪厄认为，根据其阶级定位，知识分子就处于一个矛盾的地位——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他们属于统治阶级，这是因为他们拥有大量的文化资本并因而拥有权力与权威，这种权力来自于他们提供或取消社会秩序的合法性的能力。但是，与拥有政治或经济权力的人相比，他们又处于被统治地位。归根结底，正如主流的思想史通常假设的那样，文化资本对经济资本的自主性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Caute 1964)。

布尔迪厄的这一关于知识分子的观念——知识分子处于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地位——其意义首先表现为与知识分子中的普遍存在的自我意识有所不同。这种自我意识(特别是在法国)把知识分子视作处于与统治阶级敌对的位置。在法国，自左拉与德雷福斯事件以后，做一个知识分子普遍地意味着与政治上的左倾相联系，与工人阶级政党或劳工组织相联系。布尔迪厄的理论挑战了这个自我概念，认为知识分子的批判姿态首先是来自其特殊的职业利益与特殊的权威类型，而不是什么与工人阶级的团结。事实上，这是知识分子与被统治群体的模糊而变化不定的联盟的基础。

尽管知识分子在权力斗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布尔迪厄认为他们并不构成一个社会阶级——虽然某些文化资源可以提供相对自主的、有竞争力的、与经济资本与政治权力对抗的场所。而且布尔迪厄认为，由于知识分子参与了要求具有不同资本构成的不同的场域，也由于知识分子在特定场域中的分层而产生高度分化。布尔迪厄在方法论上建议我们依据知识分子在知识场域内部的区分策略来研究知识分子的信念与行为。知识场域是知识分子的社会—阶级定位与其观念、职业意识形态以及政治行为之间的关键性的调节舞台。这种观点使布尔迪厄对知识分子的定位不同于新

[1] 布尔迪厄写道："符号商品的生产与传播者，其最基本的特征来自这样的事实：他们构成了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部分。"但是在《区隔》出版以后，他越来越倾向于把知识分子界定为"处于权力场域中的被支配的一极"，而不是"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部分"。与这个修辞上的变化相伴随的，是他越来越多地使用"社会空间"而不是社会结构这样的语言，这或许反映了作为布尔迪厄主要知识参照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衰落(参见 Bourdieu 1984a：260—267，283—295，315—317；1989c：373—385，482—486；1990c：140—149)。

阶级理论家，特别是古尔德纳(Gouldner 1979)，后者在受过高等教育的那部分劳动者身上发现了新阶级的萌芽。[1]尽管如此，布尔迪厄依然——特别是通过文化资本的概念——对新阶级理论的最新发展作出了贡献(Collins 1979, 1981a; Cookson and Persell 1985; Eyerman, Svensson and Soderqvist 1987; Featherstone 1987; Martin and Szelenyi 1987; Szelenyi and Martin 1988/1989)。[2]布尔迪厄注意到，新近的经济变化对知识分子的角色已经产生重大影响。向服务经济——在这种经济中，技术发达的、大型的官僚机构对劳动力需求的比例大大提高——的转化已经在文化生产的条件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布尔迪厄在职业结构的这个重大变化中发现了传统中独立的文化生产者(比如萨特)的衰落，以及技术官僚型知识分子(比如国家行政学院的毕业生)的权力的增强。

知识分子的习性

正如我在第七章中注意到的，对于布尔迪厄来说，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二元对立被转译为生活机会——它产生出社会阶级习性的差异——的基本差异。特别是作为资本的文化的出现以及相对自主的文化市场的发展，建构了与资产阶级的“世俗享乐主义”习性针锋相对的知识分子的“贵族苦行主义的习性”。贵族苦行主义的习性“指向最

[1] 古尔德纳看到了人文知识分子与技术知识分子依据共同的身份认同与文化(“批判性的话语文化”)联合形成一个独特的社会阶级的可能性。他们的共同身份和文化是由他们的高等教育经历和他们与生产资料的共同关系形成的。相反，布尔迪厄强调的是文化场域的内部分化机制，这种分化使得各种职业的知识分子成为一个阶级共同体的可能性很小。在此，布尔迪厄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即认为知识分子不能成为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而是被迫在资本家与劳工这两个主要的阶级之间进行选择，这是著名的葛兰西的立场(Gramsci 1971)。葛兰西认为，尽管在形成阶级关系时知识分子是有策略的行动者，但是，知识分子作为总体，既没有共同的机构性的基础，也没有一套能够使他们构成一个单独社会阶级的共同利益。

[2] 布尔迪厄(1984a: 12—13)认为，围绕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的争论本身必须被定位于一个发生这种争论的竞争性场域中。把左的或右的政治立场赋予知识分子，最有可能反映理论家本人在这个场域中的位置。但是，布尔迪厄实际上没有使新阶级的论争服从于场域分析。

少花费、最简朴的休闲活动以及严肃的，甚至有时是苛刻的文化实践，它与奢华的趣味相对立”（Bourdieu 1984a：286）。特别是在教师与公共部门的行政官员的特征中，布尔迪厄发现，贵族苦行主义的习性来自他们力图使“自己能够从文化资本与闲暇时间中获得的利益最大化，同时使自己的经济支出降到最低”（287）。特别是教师：

> 几乎没有与他们趣味相匹配的手段，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这种不一致迫使他们走向禁欲的审美主义（“艺术家”的生活方式——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拥有的东西——的一个更加严厉的变种）。

禁欲的审美主义不是一种内在的特征，而是更侧重知识的职业的一种关系性特征，因为它产生于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的冲突，即位于当代社会权力斗争中心的两种分类原则之间的冲突。

知识分子作为文化场域中的生产者

布尔迪厄著作中的核心主题之一是：知识分子的态度与行为不能简化为阶级立场，但也不是独立于社会结构的。布尔迪厄（1972：33）指出：“所有的知识分子首先都是通过以下事实得到界定的：他们在知识的场域中占据决定性的地位。”正如我们在第六章注意到的，布尔迪厄所说的知识场域，是指特定的机构和市场的策源地，在其中，艺术家、作家、研究者以及学者们竞争有价值的资源以便获得对其文学艺术创造以及学术或科学研究工作的合法性的承认。[1]知识场域首先是争夺谁拥

[1] 罗斯（Ross 1987，1991）借助于对各种知识市场中的投资状况的研究对法国当代知识界进行了分析。他把自己的分析的基础部分地建立在受到布尔迪厄影响的德布雷（Debray 1981）的研究上，林格（Ringer 1992：4—5）也采用了布尔迪厄的知识场域的概念来对法国与德国的学术史家与社会科学家之间的思想文化进行比较分析。

有界定什么是文化生产的合法形式的权力的场所。布尔迪厄关注知识场域内部的各种位置而不是知识分子个体或特定职业群体。知识分子密切注视那些对抗性地建构的位置，反思处于被争夺状态的文化资本与符号资本的各种类型的不平等分配(Bourdieu 1983a：213)。一般而言，他认为这种对抗发生在业已确立权威的知识分子与他们的挑战者之间。前者倾向于采取保守的策略——捍卫“正统”，而后者则采用颠覆的策略——发展“异端”。[1]

布尔迪厄(1987d)对于正统与异端的对立的分析，来自韦伯(Weber 1978：399—634)的牧师与预言家的区分。牧师与预言家

> 为文化合法性的垄断权而斗争，为以本质上相互对立的两套原则的名义拒绝或授予神化的权利而斗争：创造者所呼唤的个人权威以及牧师所偏爱的机构化权威(Bourdieu 1971c：178)。

布尔迪厄(1988b)在当代法国的知识生活中也发现了类似的斗争：“文化的监护者”与“文化的创造者”之间的斗争，再生产并传播知识的合法形式的人与发明新的知识形式的人之间的斗争，教师与研究人员之间的斗争，教授与独立的知识分子之间的斗争。

场域分析为布尔迪厄提供了对文化市场与现代知识分子兴起的结构性阐释。[2]场域分析指出，随着专门化的文化生产者团体的出现，也出现了与之并行的一个文化领域，在这个领域中，符号商品的生产、流通

---

[1] 霍夫施塔特(Hofstadter 1963：430—431)在“牧师”与“先锋派”之间，把统治价值合法化的人与质疑统治价值的人之间，辨认出了相似的差异。

[2] 布尔迪厄(1992：75—200)虽然对19世纪晚期法国现代文学场域的出现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但是，他并没有更广泛、普遍地描述西方国家相对自主的知识场域的历史发展。但尽管如此，布尔迪厄(1971c，1971d)还是注意到了西方世界中相对自主的知识场域的历史发展中的几个重要因素：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关的劳动分工、工业革命与浪漫主义对它的反动、有助于创造大规模符号商品消费市场的大众教育的扩展、不受宗教与政治控制的大量传播与消费机构(沙龙、出版社、剧院等)的出现，而最重要的则是符号生产的专家群体的出现。参见夏尔运用布尔迪厄的框架对于法国知识场域的历史发展的研究(Charle 1987，1990)。

与消费变得越来越独立于经济、政治、宗教。布尔迪厄的基本假设是，随着文化场域获得自主性，行动者所采取的知识立场越来越变成由行动者在这些场域内部所占据的位置的一个功能。[1]

如果知识场域是由等级层次明确的位置所结构的，那么它也是由“追求差别的动力法则”支配的。在知识分子中，存在着尖锐的为突出个人特异性而进行的斗争，这是因为在知识分子的生活中，“存在就是区分，即占据一个独特的位置”（Bourdieu 1983a：338）。[2]这个斗争包含了形成知识分子利益的职业利益。图书合同、评论、引用、获奖、专业机构中的领导地位、学术地位以及通向终身职位的艰苦道路，所有这一切对于一个人在知识界的地位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且，知识分子的利益是行动者为维护或强化自己在场域中的位置所采用的策略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利益同时也是“政治”利益。[3]在布尔迪厄看来：

> 那些似乎只是为科学进步作出贡献的理论、方法以及概念，同时也总是“政治”花招（“political” maneuvers），是尝试确立、强化或颠覆符号统治的业已确立的关系结构的政治花招（1971c，121）。

理论、方法与概念因而是争夺知识承认的斗争武器，对它们的选择，不管是否有意识，都是受制于“对差别的追求”。[4]这样，知识分

---

[1] 布尔迪厄（1971d：166）认为，文化场域的结构特征是具有历史偶然性的。他写道，“是历史的与社会的条件使得一种知识场域的出现成为可能”，“同时也界定着对于这个场域状况的研究的有效性限度”。

[2] 另外一个导致知识场域紧张竞争的因素是：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者。

[3] 布尔迪厄（1971c：179—180）写道：“冲突（无论是真正的冲突还是人为制造的冲突）的最终根源——它沿知识场域的权力线（lines of force）划分知识场域，并毫无疑问构成文化变迁的最决定性的因素——必须被找出，至少我们要找出这种冲突的最终根源，决定那些参与冲突的人的地位的客观因素，也要找出他们为自己以及他人参与这种冲突所给出的理由。”

[4] 布尔迪厄写道：“知识的、艺术的和科学的立场同时也总是下述游戏中无意识的或准意识的策略，在这个游戏中，至关重要的是赢得文化的合法性或（用另外一个术语）对于符号商品的合法的生产、再生产和操纵的垄断以及相关的合法权力。”（118）

子是以把自己在文化场域中的影响最大化为目的的策略家。[1]知识分子与社会阶级的关系因而是受到知识场域的策略调节的。

分化的世界：知识分子的内部分化

知识分子不但没有成为一个高度一体化的阶级，而且在争夺符号合法化的斗争中产生极度分化，他们是通过他们所投资的文化市场的类型分化的，也根据他们的文化资本的数量与类型而分化为不同的阶层。在任何知识场域中，我们都可以辨别支配性的与被支配性的位置、保守者与先锋派、寻求再生产策略的人与寻求颠覆策略的人等。布尔迪厄(1983a：333)辨别了文化生产者的两种基本对立：第一种对立区别了文化市场的类型，第二种对立则阐明了这些市场中的一个市场内部的合法化斗争。

布尔迪厄(1971d：54—100，1983a：319—320，1985d)阐明了以下两类不同的文化生产场域之间知识分子分化的最基本的根源：(1)有限的文化生产场域及其为了自己的再生产而对教育系统的依赖；(2)“大量受众”(mass-audience)的生产场域。有限的文化生产场域是高度专门化的文化市场，参与者为了争夺“什么是最合法的文化形式”的标准而斗争，其努力的目标指向同行的认可(Bourdieu 1971d：55，62)。这些专门化的文化市场常常围绕相对独立于经济和政治资本的符号资本的专门形式而得到结构。它们是抵抗商业或政治标准的“纯科学”或“为艺术而艺术”的市场(Bourdieu 1992：202—220)。

相反，布尔迪厄认为不那么专业化的符号生产场域则更多地指向商业成功和大众趣味等外在的标准。它们生产的是可以迅速地或现成地转化为经济资本的东西。这使得那些更加擅长于把他们的作品卖给统治阶级的文化生产者与那些不擅长此道的文化生产者相互竞争。在为

[1] 布尔迪厄进而还主张，文化生产场域中最倾向于采取先锋派的最冒险立场的那些个体，是一些具有足够的经济资本而能够“远离必需品”，从而可以藐视物质关切的人(1991d：40)。

知识的合法性进行的斗争中，有限生产场域代表支配性的位置，而大量受众的生产场域则代表被支配的位置。[1]知识的类型与这一结构划分的轮廓是基本平衡的。

知识分子分化的另外一个根源发生在有限制的生产场域本身内部。在那里，布尔迪厄发现，在那些占据了机构的位置并试图在符号领域保存与再生产现存秩序的人与通过提出新的符号资本形式挑战这个秩序的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击。在他对作家、艺术家的分析中，这种斗争发生在新旧两个阵营之间，发生在已经占据文化权威地位的人——他们在文化场域中拥有重要的地位财富——与力图进入场域并从中崛起的挑战者之间的斗争。布尔迪厄暗示这种斗争常常发生在代际之间，因为年龄常常把文化法则的代表与那些正在寻求改变这些法则的合法标准的那些人分离开来。

虽然布尔迪厄承认大量受众在当代社会中的不断增长的重要性，但是，他仍然认为，确立最合法的文化形式的还是那些受限制的文化生产场域，而且，首先是维护这些文化形式并把它们神圣化的大学。[2]他争论说：

> 学院声称具有授予当代创造性人物以圣职的垄断权。它借助于一种综合了传统与创新的法理而在权威性方面有助于知识场域的组织（179）。

而且，

---

[1] 在文学或艺术场域中，布尔迪厄（1983a：321）发现这种斗争体现在下面的三个群体中：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集团有更紧密的联系的群体；从事“资产阶级艺术”的群体；而不是那种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群体。

[2] 布尔迪厄（1971c：179）坚持认为：“每个知识分子都把对于文化神圣化（或合法性）的要求带入与其他知识分子的关系中，这种要求依赖于他在知识场域中占据的位置，而且特别依赖于他与大学的关系。大学作为最后的手段，其所给予的是货真价实的神圣化标志。”

> 大学声称拥有传播过去的被圣化的作品——被它当作“经典”——的垄断权，以及通过授予学位以及其他东西，把与这些经典作品最一致的文化消费者加以合法化与神圣化的垄断权。

这样，布尔迪厄认为知识场域依赖于教育系统，因为后者具有对合法文化加以圣化、维护、传播以及再生产的功能。[1]

但是，知识分子与教育系统之间也存在紧张关系。布尔迪厄(1971d:74—75)认为，知识场域内部的紧张根源之一是圣化功能与知识生产之间的时滞。无止境的寻求差别的冲动促使知识场域持续地生产出竞争性的知识形式。知识的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促进了创新。但是，生产者为了自己的新文化形式的合法化而进行的努力被教育系统——它在赋予新文化形式以合法性方面总是表现出惰性与迟钝——的圣化权力所挫败。这种紧张解释了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如记者与媒体从业人员等——对于教育系统的既爱又恨的矛盾态度。[2]这些边缘化的知识分子虽然急于宣布学院知识过于“书生气”，但他们还是乐于看到自己的观点能够被知识圈承认为合法的。这证明了教育系统把统治文化加以合法化的权力。这也证明了教育系统所确立的统治关系即使对于那些处于知识场域边缘的人也是有效的。布尔迪厄观察到：

> 对于学术权威的攻击有一些是来自那些位于大学体系边缘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倾向于挑战大学的合法性，因此也证明了他们充分承认大学的裁判权，他们之所以攻击大学，是因为自己没有被大学的权威承认(Bourdieu 1971c：179)。

---

[1] 布尔迪厄认为，知识分子社会学应该与教育社会学相联系，特别是与对教育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的分析相联系。

[2] 布尔迪厄写道：“这种矛盾的态度特别广泛地散布于地位比较低的知识分子中间，散布在记者、普及工作者、有争议的艺术家、电台与电视台的制作人等中间，许多观点与学位模式起源于这些知识分子与早先的教育以及教育法规的联系。”(Bourdieu 1971c：188)

这些知识分子寻求得到他们与之斗争的机构的承认，从而自相矛盾地强化了大学的合法性。

布尔迪厄(1963)尖锐地批判大众文化以及那些强调广告电视对于社会与文化趣味的影响力的大众传媒理论家。布尔迪厄指责他们低估了学校教育与社会阶级对于塑造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的持续的影响作用。然而问题依然处于争论之中。有些批评家(如 Garnham 1993)则指责布尔迪厄低估了从学校到校外的大众文化形式的文化影响——特别是电视——的变化。布尔迪厄赋予学院及其专门的文化市场在塑造阶级之间的符号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在今天的法国以及其他国家是否依然还那样重要，这一点还不清楚。电子媒体在美国和英国的作用或许大于在法国的作用，虽然德布雷(Debray 1981)的著作强调，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巴黎的知识环境似乎已经变得更加面向传媒。在近来的著作中，布尔迪厄(1996)也强调大众传媒市场在知识界产生的越来越消极的影响。

另外一条内部分化的线路建立在与权力场域的相对趋近性上。这种对立发生在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专家、技术人员与独立的知识分子——常常存在于人文科学领域，他们利用相对于政治场域的独立性对权力持批判态度——之间。在艺术场域的内部，布尔迪厄发现这种两极对立发生在生产“资产阶级艺术”的艺术家与先锋派之间。

最后，布尔迪厄(1971d：119，1972：35)主张，知识分子之间的冲突在知识场域中持相近立场的知识分子之间更加紧张。支配场域活动的“寻求差别的法则”可解释这一点。参与竞争性文化市场要求采用把自己区别于其他任何人的策略。在知识分子的分层机制中，布尔迪厄最强调的正是这种“寻求差别”的策略：没完没了地谋求更好的与更独特的地位。[1]

---

[1] 布尔迪厄对于法国知识分子的几个关键性的分化轴的辨析需要与其他国家的背景进行比较。比如，内部分化的公共/私人轴在其他地方就更加显著。在私人领域内，进一步的分化可能出现在惟利是图的人与倾向于做一些志愿活动与社区服务的人之间。与此相似，在公共领域内部，进一步的分化则可能出现在更多地接触商业、更加支持商业的部门与更加关心提供社会服务的部门之间。

知识分子的基本信念

如果说在文化场域中争夺合法性的斗争造成了知识分子之间正统观念与反正统观念的对立，那么这些对立却是通过一种潜在的、对值得争论与斗争的东西的共识构成的(Bourdieu 1971d：96)。正如我们在第六章中已经指出的，布尔迪厄把这种正统与异端的共同基础称为基本信念(doxa)。[1]与涂尔干的文化无意识概念相似，[2]这个词指的是在特定的时空中塑造知识分子思想的范畴与假设，而且一般是参与者的意识所不能把握的范畴与假设。[3]布尔迪厄(1971d：96)认为，教育系统在为统治阶级中的不同部分、特别是知识分子确立基本信念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他(1971c：185)指出：

> 在一个文化的传播受学校垄断的社会中，把习得的文化作品(同时包括行为与思想)加以整合的那种潜在的相似性是受教育机构发布的原则支配的。[4]

布尔迪厄关于具有广泛渗透性的知识分子的基本信念的观念，可能反映了二战以后法国的文化与知识分子共识的时代，这个时代业已消

---

[1] 布尔迪厄(1971c：182—183)写道："一个特定年龄的有教养的人，对他们所争论的话题可能有不同的观点，但是他们至少都同意就某些话题进行争论。把一个思想家联系于一个时代并加以定位的东西，首先是迫使他思考的问题的类型与主题的类型。"

[2] 古尔德纳(Gouldner 1970)的"基本结构"(infrastructure)概念虽然与布尔迪厄的"基本信念"不完全相同，但是却有基本的相似点。

[3] 布尔迪厄(1967b：116)建议，"各种倾向与学说之间的公开冲突常常使参与者认识不到他们预先设定的共谋性，而旁观者则对这种共谋性看得非常清楚，分歧内部的共识建构了一定时期知识场域的客观整体性。"

布尔迪厄的观点的一个生动说明可以在林格(Ringer 1992：7)对德国学术界的研究中发现。这个研究表明："正统的"多数与"现代主义的"少数实际上共享着许多关于他们的文化遗产的假设。墨菲(Murphy 1988)对帕金(Parkin 1979)关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攻击的分析是另外一个例子。虽然帕金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共同反对许多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但是他们潜在的相似性依然可以在帕金的著作中发现，因为这是用来攻击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的学术界占据的显赫地位的一种知识策略。

[4] 在讨论哲学的情况时，布尔迪厄(1983a：314)指出："学术惯例……首先可能是学校指南(一种隐在的参照)……比别的任何东西都更加有助于建构一代知识人的'共识'。"

失。 虽然情形或许是：某些隐藏的基本信念在每个时代都存在，但是这个概念所冒的风险是遮蔽了或许存在于不同的时代与不同的民族背景中的文化整体性的程度不同的变化。 西方知识界的分裂——一个后现代主义的主题——意味着一个比布尔迪厄的概念所预期的知识界更加分化的知识界的出现。

知识场域与阶级关系的再生产

虽然知识分子的态度与行为不能还原为社会阶级的立场，但是，布尔迪厄认为，知识分子在符号生产场域中的定位再生产着分层的秩序。知识分子场域有助于掩盖社会阶级关系，因而也强化了这种关系。[1]即便是专家所认为的知识场域的“终极基础”，也表现为其与社会阶级结构的关系(Bourdieu 1971d：126)。 但是，布尔迪厄是在结构的而不是工具的意义上理解这种社会阶级的再生产功能的。 即使只是通过追逐自己作为专家在文化生产中的特殊利益，知识分子同样也把阶级的文化加以合法化。 知识分子的实践几乎绝对是由阶层区分的逻辑加以组织的，布尔迪厄(1984a)把这个逻辑描述为由其“与物质必然性的距离”界定的社会实践。 玩知识的游戏意味着一个人必须超越基本的经济必需品的要求。 这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需要有一种能够摆脱日常生活的顾虑以便与观念打交道的知识分子习性；二是需要有必不可少的、作为参与知识场域竞争的能力的形式的文化资本。 这两个条件都提供了摆脱物质需要的自由。 这样，它就作为一种社会封闭(social closure)机制而起作用——通过排除那些缺乏竞争所必须的时间、精力、资源的人们。 知识场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服务于社会阶级结构的再生产的。

对布尔迪厄而言，知识场域的概念把知识分子的符号性工作与那些它既为之服务、也加以反映的结构条件联系起来。 通过这种方式，布

[1] 布尔迪厄(1983a：337)写道：“内部斗争从来不是外部斗争的直接反映，但是内部斗争的结果却依赖于它们与外部斗争(阶级之间的斗争或统治阶级内部不同部分之间的斗争)之间可能存在的对应性，依赖于这个或那个群体从这种斗争中得到的强化。”

尔迪厄把自己的概念看作对唯心主义的(如 Caute 1964；Eisenstadt 1973)与唯物主义的(如 Brym 1987；Wright 1985)知识分子理论的双重超越，它们要么强调观念的力量，要么强调政治经济利益在排除他人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1]

知识分子与政治

大多数知识分子社会学(特别是那些受到马克思主义启发的知识分子社会学)最终关心的是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政治作用。从马克思本人开始，马克思主义者尝试把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和行为与他们在社会阶级结构中的位置联系起来。这个努力并没有完全成功。马克思主义者争论说，知识分子由于具有获得有价值的资源的特权，所以一般是站在资本家的一边以便捍卫自己的优势。但是，马克思与恩格斯(1978：481)也认为，“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他们将在反对资本家的斗争中加入无产阶级的队伍。但是，什么东西会造成这种提升阶级意识的行为？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的著作都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如埃里克·奥林·赖特(Wright 1985)——认为，知识分子是接受高等教育的工人，他们占据着一种“矛盾的阶级位置”。在经济上，他们位于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而在意识形态上，他们则位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位置。这导致知识分子的矛盾的政治态度与政治行为，因为知识分子在支持资本家或者支持无产阶级之间摇摆。

而在另外一个极端，在非马克思主义者当中，许多人认为知识分子

[1] 罗斯(Ross 1987)也采取了相似的观点，他质疑构成绝大多数关于知识分子讨论的那种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二元对立的恰当性。他通过“知识市场”的概念进行研究，在知识市场上，知识分子为投资于文化资本而发现或创造机会。

的行为和态度与知识分子的社会起源及阶级地位没有任何关系。比如科特(Caute 1964：17，19)认为：

> 对共产主义的社会学研究虽然在分析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行为时非常重要，但对知识分子研究而言，用途却非常有限。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行为依然是一种个人心理、个人选择、个人诚信行为。

曼海姆(Mannheim 1955)的经典知识分子理论把知识分子看作由于其流动性而“相对无阶级”(relatively classless)的，只是这种立场的另外一种表述。

布尔迪厄对那种把知识分子理想化为超越社会地位的“创造者”的观点持尖锐的批判态度。但是，如果说布尔迪厄比科特与曼海姆更加接近马克思主义，那么，他还是认为，(知识分子)在阶级结构中的位置与政治行为之间的联系是通过对文化场域的参与行为调节的。他把直接从阶级定位中剥离出政治的做法称为“短路”，因为这样做忽视了阶级斗争中的符号方面，而布尔迪厄希望阐明的正是这个方面。[1]

知识分子社会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识别出是什么使得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人在政治上倾向左派，而另外一些人则相反。对于知识分子的左倾的解释已经很多，比如观念(Eisenstadt 1987)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的向上流动被堵死表示不满(Schumpeter 1975：152—153)、批判性亚文化中的成员身份(Hollander 1987)、政治资源与交流网络(Brym 1987)等。[2]我们将看到布尔迪厄的解释，不能简单地归入这些框架中的任何一个。

---

[1] 布尔迪厄(1988a：544)在分析文化场域的时候，批评吕西安·戈德曼的受到马克思主义启发的文学理论犯了“短路”的错误，即把文学作品直接还原为社会集团的世界观或利益，依据布尔迪厄的假定，这种世界观或利益是通过类似于中介的艺术行为得到表达的。

[2] 加尼翁(Gagnon 1987)提供了自由民主国家中各种关于知识分子及其政治参与的流行理论的很好评述。

布尔迪厄(1985e)把许多知识分子支持被统治阶级的意向，解释为他们在权力场域中的被统治地位。布尔迪厄关于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的关系理论意味着：在文化资本上投资越多、两种资本之间越不相称，那么，这样的知识分子个体就越可能反对现存秩序。[1]法国的情况确实是这样，在(19、20 世纪的)世纪之交的法国，一个特别重要的政治市场是随着有组织的劳工、政治党派以及接纳到这些党派中的知识分子的相当团结一致的左翼反对派联盟而发展起来的(Debray 1981，Ory 1986，Ross 1991)。法国的知识分子，正如我们知道的，倾向于投左派的票(Bourdieu 1984a：438)。[2]这样的推理路径使得布尔迪厄能够解释为什么法国的学校教师与大学教授特别支持左派。他认为，中学教师可能比其他受高等教育的教授更加倾向于激进主义，尤其是当他来自工人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时候。他们在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的不一致是最严重的。他们没有与自己的趣味相称的(经济)手段，而其在精英知识界的造诣又不足以进入资产阶级圈子——这需要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以及文化资本。[3]

除对海德格尔的研究之外，布尔迪厄没有太多地研究那些政治上公开持右翼立场的知识分子(Bourdieu 1991f)。但是，他概括了三类具有不同起源、政治上保守的知识分子(Bourdieu 1992：385—390)。第一

---

[1] 当布尔迪厄写道“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越少拥有特殊资本的知识分子就越难以抵挡权力的诱惑”的时候，他似乎还认为，文化资本越少的知识分子就越支持现存的社会等级(Bourdieu 1983a：322)。

[2] 在大多数的西欧国家也可以发现这种基本的模式。利普塞特(Lipset 1991)认为，美国的情况尤其如此。历史地看，在美国，知识分子与统治机构及其精英的疏远程度更甚于西欧国家的情形。但是，布林特(Brint 1984，1991)提供证据表明，无论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人持有什么样的政治左派倾向，他们几乎不能理解新保守派所惧怕的“对抗性文化”的意义。但是，不同的国家存在着重要的差异。布尔迪厄的资本不对称的框架需要得到法国之外的国家的经验检验。

[3] 布尔迪厄(1984a：287—291)说：“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或者更精确地说是文凭形式的教育资本)之间的不一致无疑是他们倾向于反对社会秩序的(思想)基础之一，这种社会秩序并不充分承认他们的优点，因为它承认的是其他的分类原则，而不是教育系统曾经用于对他们进行区分的原则。这种精英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贵族的)造反在它与忠诚、拒绝和不可能性，或者对于不可能性的拒绝——这些都是与小资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起源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与纯粹的经济制约联系在一起，这使他们很难完全成为资产阶级——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得到强化。”

类是产生于“权力场域中的统治地位”、但是又在统治机构或统治机构中的精英分子与知识机构两者之间培育战略性地位的人，他们对统治机构与知识机构都持批判态度。布尔迪厄认为阿隆与熊彼特是这类知识分子的代表；第二类是高级公务员，布尔迪厄称之为“国家精英”。他们借助于通过法国高等教育中的精英地位以及国家机构中的位置获得的合法性，把自己视作超越劳动者与资本家特殊利益的中性技术人员；第三类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布尔迪厄(1987b：60；1992：40，110—111)从韦伯那里借用的概念。这些人是第一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的出身根植于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中的从属形式，并发现自己在知识场域中也处于从属位置。由于与更具特权地位的文化继承人的生活方式无缘，这些第一代的知识分子成为反学院主义的主要根源。

布尔迪厄的资本不对称理论对解释法国的教师为什么在传统上一直被定位于政治上的左翼似乎是有用的。作为对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现存秩序的一种解释，它与封闭流动性框架交叉，但是又综合进了关于知识分子作为文化市场中的投资者而不是批判性亚文化中的成员的观念。虽然作为一种一般的研究方案，人们或许发现重要的跨民族差异，但是它值得进一步探索。而且，它应该与对组织此类政治倾向的实际组织基础和交流网络的思考相互补充。

通过强调其矛盾模糊性，布尔迪厄加深了我们对法国知识分子中的左翼政治的这种结构性倾向的理解。虽然他注意到(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联盟的基础可能是“与被统治阶级之间感觉上的或真实的团结一致”(Bourdieu 1984a：316)，但是，他把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联盟看成是脆弱的，因为这种联盟建立在结构上相似的阶级统治地位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对阶级压迫的共同经验，即习性的相同基础上(Bourdieu 1985e：737，1987b：174)。[1]因此，知识分子关于与被剥夺公民权

[1] 布尔迪厄(1984a：372)对那些力图通过参与观察来认同工人阶级状况的左翼社会科学家的努力不以为然。

的群体之间的团结友爱的表白，反映了“一种结构性的不诚实”（Bourdieu 1984c）。[1]

布尔迪厄发现，在那些处于知识场域最低位置的人中，这种模糊性尤其突出。他指出，那些以“人民”、“大众文化”的名义言说的人，通常是地位最低的知识分子（1987b：179—180）。这些人来自第一代知识分子，比起他们的同行，他们只有比较少的文化资本，并与知识分子生活方式的某些方面无缘（181）。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是双重的被统治者：在统治阶级的被统治部分中也是处于从属的地位。布尔迪厄认为，这些“无产阶级知识分子”（60）常常在社会运动中扮演反机构与暴力的危险角色，倾向于革命运动并“把反智主义引入其中”（1988b：178）。[2]我们可以在让尼娜·韦尔德斯－勒鲁（Jeannine Verdès-Leroux 1981）对法国共产党的精彩研究中找到例子。她发现第一批从低微的社会地位进入知识界的人构成了多列士（Maurica Thorez）时代共产党中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3]与法国共产党联系紧密的知识分子具有让知识的生产屈从于党的认可的漫长历史。

布尔迪厄也批评为了自己在文化与政治市场上的投资利益而侵夺更广泛的集体利益的知识分子习性。布尔迪厄认为知识分子的对抗性的政治立场的根源，与其说在于他们所代表的更大群体，还不如说在于知

---

[1] 布尔迪厄（1991d：32—33）引用汤姆·沃尔夫（Tom Wolfe）的《激烈派的时髦》（*Radical Chic*）作为美国语境中知识分子与弱势群体之间联盟的不稳定与不诚实性的生动例子。

[2] 布尔迪厄特别严厉地批判那些带有反智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这反映了他对于把经过选择的大众文化描述为摆脱了统治性的思想文化污染的自主性文化的批评。

[3] 布尔迪厄（1991d：33）近来把“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征概括为认同被统治阶级的政治事业、并尝试颠覆现存秩序的人，这样的概括不仅依据知识分子与被统治者在结构上相似的被统治位置，而且依据“条件的相同或至少是类似”。在这里，我们观察到布尔迪厄关于这类知识分子政治的思考中的变化与紧张。这些知识分子似乎既与被统治者拥有相似的状况，又拥有与他们相似的地位。而在早期的分析中，布尔迪厄似乎认为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之间的政治联盟是不稳定的，这首先是因为他们的共同点只限于地位（position）上的类似而没有相同的状况（condition）。现在他似乎认为存在一个他觉得不但具有共同的地位而且具有共同状况的知识分子群体。但是，在布尔迪厄看来，这个共同的习性并不能保证他希望知识分子采取的那种政治参与类型。实际上，它进一步证明了布尔迪厄关于知识分子在自己的学术场域以外发挥真正进步的政治作用方面的深刻的悲观主义。

识分子自己争夺政治与知识承认的斗争场域。[1]他认为知识分子的错误的政治意识在于不加批判地把自己的场域利益等同于他们所代表的集体利益。布尔迪厄(1985a)特别关注符号“代表团”的动力学(the dynamics of symbolic “delegation”)，在这个“代表团”中，一个集体的利益通过其知识分子领袖的场域利益而得到折射。

但是，人们或许会问：是否所有声称与外界群体具有某种形式的真诚团结关系的知识分子行为，都不过是在竞争中采用的姿态？知识分子试图代表的不同群体所提出的具体要求是否存在差异？要求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代表的资本家与工人，是否对知识分子提出相似的要求、施加相似的制约？布尔迪厄对知识场域的决定作用的强调常常导致对知识分子行为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来自于他们所代表的群体的特殊性——不够注意。

布尔迪厄之所以认为阶级地位的同质性产生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联盟的观点是脆弱的，还因为：与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对抗的知识分子的贵族审美主义习性，同样也蔑视“大众的”唯物主义(popular materialism)。以文化资本的名义对抗经济资本的斗争使得以面包黄油为基础的政治策略难以得到知识分子的充分赞同。正是知识分子在理想主义、唯灵论(spiritualism)、唯智主义(intellectualism)等方面的投资使得他们难以支持只关心赚钱的政治策略。[2]这样，文化资本以及与文化资本的积累相关的基本的心理倾向，似乎使得高层的文化生产者与经济上被统治的群体之间的跨阶级联盟难以实现。

布尔迪厄进一步指出，文化生产者对抗现存秩序的倾向还源于他们想用文化市场替代经济市场的控制，而不是出自寻求文化机会的真正平

---

[1] 布尔迪厄关于知识分子追求自己利益的观念当然并不新颖。熊彼特(Schumpeter 1975：154)注意到，知识分子可能发展出与职业和立场相关的利益，这种利益可能与他们所代表的群体的利益冲突。

[2] 布尔迪厄(1984a：316)写道：“知识分子在否定大众唯物主义的时候，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精神荣誉的至高无上，这种精神至上主义已经包含在他们对‘资产阶级’的物质主义艺术的否定中。”

等的政治欲望。这有助于布尔迪厄(1987b：61，62)解释为什么有些法国的知识分子本来应该有一般意义上的进步的政治态度，但一旦这种政治进入大学或文化政策时就变得非常保守。他们可以既支持大私有公司的国有化，但同时又反对把传统的人文科学课程现代化。因此，布尔迪厄认为，知识分子的政治具有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斗争的标记。知识分子的政治承诺的范围限于在权力斗争中不断增长的市场份额。这样，它倾向于再生产知识分子发展文化理想的观念意欲与之斗争的那种社会秩序。

最后，布尔迪厄指出，受到过高度教育的工人在政治态度与政治行为上摇摆不定的另外一个根源，是知识分子的生产条件的变化。他注意到在法国发生的这样的现象：发挥自我雇佣(self-employed)的手工艺匠或企业家作用的知识分子在数量上明显减少，他们不断地被大型官僚机构作为领薪水的受雇者加以吸纳。在这些大型企业中，他们不再能够控制其知识生产的工具(Bourdieu 1984a)。这个分析与“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化”这个熟悉的主题相呼应。布尔迪厄认为，知识分子生产条件的这个变化，在大量的文化生产者当中往往会产生对知识分子的生产资料的这种新关系的矛盾态度。一方面，这个变化提高了反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机会，这些“新的文化中间人”(new cultural intermediaries)可能支持对业已确立的文化与社会等级提出批判与挑战，因为他们自己就作为领薪水的受雇者在生产机构中处于被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他感到这个转化常常“促使知识生产者的出现更直接地屈从于经济与政治的需要”(152)。他在新出现的私营企业与公共行政机构对应用性社会研究的需求中发现了“新型的文化生产者”的诞生，这种新型生产者的知识规划与风格不断地受到市场与官僚机构的取舍标准的制约。他指出，这些新的领薪研究者(newwage earner of research)更加关心“官僚的可靠性”规范(the norms of “bureaucratic reliability”)，而不是作为大学的相对自主性所提供的“与权威保持批判性距离”这一准则的卫护者而行动。而且，他们的知识产品带有“批量生产的标准化规范”

的印记，而不是书本、科学论文的印记，或传统上那些独立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卡里斯玛品质(Bourdieu 1988b：123—125，1989c：484)。在布尔迪厄(Bourdieu and Boltanski 1977)看来，正是在权力场域中的这种摇摆不定的定位“强化了意识与政治实践的模棱两可，以及在‘参与’与‘退出’之间的犹豫不决”——布尔迪厄在领薪水的知识分子中发现了这种模棱两可与犹豫不决。[1]

教授、政治与 1968 年 5 月

为了阐明布尔迪厄的核心主题——文化场域调节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与政治行为，我们回到《学术人》(Bourdieu 1988b)这部布尔迪厄研究知识分子政治的机构基础的最详细著作。这一研究提供了对于 1968 年 5 月事件中巴黎大学教授的政治分化的场域分析。[2]《学术人》一书表明，权力场域内部的结构分化如何内在地使得法国学院知识分子产生分化，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的对立如何折射到法国学术界内部。而且，布尔迪厄认为，这些知识分子的利益不只是以阶级为基础的，实际上最直接的、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利益可能根本就不是阶级利益，而是学术场域自身的利益。布尔迪厄提出了下列基本主张：

---

[1] 布尔迪厄关于知识分子政治上的模棱两可的根源的观点，表面上与赖特(Wright 1985)的知识分子的矛盾的阶级定位理论相似。与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相比，它们都描绘了知识分子与社会阶级之间更加复杂的图景。但是，它们之间也存在基本的区别：赖特是根据知识分子在社会生产关系内部的位置来思考其社会阶级的定位，而布尔迪厄则依据市场定位来思考这个问题。而且，赖特的解释是单线因果论的，矛盾的阶级地位可以自足地解释政治定位，非阶级的影响则被忽视；而对于布尔迪厄来说，在相对自主的文化场域中的位置可以是政治定向的一个根源，而且可能存在大量资本的类型不同、规模不同、重要性不同的文化场域，知识分子在这些场域中投资他们的文化资源。这使得布尔迪厄能够研究具有潜在的塑造知识分子政治行为的能力的更大范围的文化与机构状况。

[2] 这一研究的基础是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巴黎的高等教育机构中两组终身教授。首先，对来自医学院、法学院、艺术学院以及社会科学院的 405 名终身教师进行分层抽样，其次，从构成艺术与社会科学领域重要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师中选择了 170 名终身教师。在关于社会与教育背景、教师与行政职位、对各种政府委员会的参与、荣誉头衔与地位、政治参与的方式(比如在政治请愿书上签名)等方面，收集了来自公共记录的给人深刻印象的信息(参见 Bourdieu 1988b：39—40，227—242，271)。

> 不是像通常所想的那样，政治立场决定人们对于学术事物的态度，而是他们在学术场域中的位置决定他们在一般政治问题以及学术问题上采取的立场(xvii—xviii)。

这个主张似乎暗示，布尔迪厄在政治态度与政治行为上是用场域的还原主义取代阶级的还原主义。当然，在《学术人》一书中，布尔迪厄对场域位置对学术政治的影响的强调的确暗示着这一点。但是，在他对于文学场域的分析(1991d：7)中，他似乎又反对这种场域位置的还原主义。他认为，立场与其说是单纯地受到位置的调节，还不如说更多地受到策略的调节，因为区分的策略可以带有自己的自主性。但是策略与位置以及它们的建构性的资本构成之间的确切关系，尚需理论上的进一步分辨。它似乎随着场域类型的变化而变化。

采用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以及政治经济权力之间的对应分析法，布尔迪厄(1988b)表明，法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学院、学科以及教授都是沿着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对立轴——这种对立正是权力场域的特征——而进行分化的。他认为，教师与学生的社会形象依据学校的类型而变化。法学院与医学院的师生更接近经济与政治权力这一极，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以及艺术学院的师生则更接近文化权力一极。这种分析揭示了学院与统治阶级之间的两种不同的关系：服务于政治经济权力的知识以及以知识自身为目的的知识。

在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也存在相似的对立与分化。首先，存在一种学术权力(academic power)，这种权力指的是对于大学中的教学训练、筛选以及提升等机构化机制的控制程度。[1]此外，还存在科学权力(scientific power)与知识名望(intellectual renown)：前者是在科学团体内部控制研究资源与威望的程度，后者指更大的受教育公众对其出版物

[1] 这个概念在含义上接近柯林斯(Collins 1979)的“位置特征”(positional property)，后者指的是利用在一个机构中占据的位置而对于那个机构中有价值的资源流动的控制程度。

的承认程度。 这样，教授就依据其主要投资的文化市场而加以分化。那些积累学术资本的教授常常大量地集中于巴黎大学文理学院。 他们一般从事传统的哲学、法国文学学科以及其他经典学科的研究。 在法国学术界的这个部分，对于机构中的位置与象征资本的争夺极大地从属于对合法文化的维护、神化以及传播，从属于实施这些文化功能的机构的再生产。 教授通过积累以行政与荣誉地位形式存在的资本来争夺学术权力。 他们发表演讲、出版教科书、编写词典与百科全书，这些东西的价值首先是在学术市场上得到评价的(Bourdieu 1988b：98)。 这里是学术人居住的地方：在现存知识类型的分类中的专业教师，以及把特定的文化形式神圣化为合法的文化以便传授给未来一代的教师。 通向学术权力的理想的一典型的道路开始于从高等师范学院毕业，然后是获得助教资格、完成博士论文、获得巴黎大学文理学院的教席。

相反，积累知识或科学资本的教授常常集中在法兰西学院、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以及新近的社会—科学学科，比如语言学与社会学。[1]他们在知识场域与科学场域中投资，在这里积累符号资本——以被同行承认其科学贡献的形式或以在更大的教育团体中的威望的形式存在。 如果说学术场域中的知识生产主要打算在课堂中消费，那么，在科学场域，知识生产就发生于实验室与研究中心，准备让同行在专门化的出版物中加以评论。 在知识场域，知识生产注定要影响更大的受教育的公众，特别是媒体的观点，同时也受到同行在专业的出版物中的评论。 尽管有些法国教授主要定向于知识场域而另外一些主要定向于科学场域，但他们与投资于教育机构的再生产的学术人都是对立的。

布尔迪厄还发现，在每个学院的内部进行的斗争还使那些更加倾向于学术权力的积累的教授与那些更加倾向于知识或科学资本的积累的教授相互对立。 简言之，布尔迪厄对法国学术界的场域分析把人们熟知

[1] 如今布尔迪厄自己也进入了法兰西学院，但是，这里的材料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收集的，那个时候他正在高等研究实践学院(1975年改名为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

的教学与研究的紧张关系定位于对立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的更宽泛的机构框架中。[1]它也可以被看作是布尔迪厄对地位/专长之间对立(这种对立构成了官僚机构中两种不同的对于权威的诉求)的看法。[2]布尔迪厄认为，学术界的权力斗争使那些通过控制有价值的机构资源而拥有地位权力(positional power)的人，与那些把权力诉求建立在新的有价值的知识形式上的人相互对抗。[3]

另外一个内部分化的路线是年龄；它使得年轻的一代对抗那些有更多时间积累了各种形式的学术、科学与知识权力的年老一代。在第三个水平上，布尔迪厄区别了以研究为导向的(在特定的学科中非常专业化的)教授与那些具有大量的学术权力、但同时也享受很大的知识荣誉的教授。这种分化的根源使得一小群积累了大量学术与知识权力的大学"官员"，与那些严格的知识团体中的专家(他们的权威更多地来自专业领域内部的同行的评论而不是机构中的位置或公共名声)相对立(Bourdieu 1988b：81)。一个高等师范学院毕业生的身份对学术权力的积累、特别是"官员"身份的获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布尔迪厄(87)写道：

> ……高等师范学院的关系网络所代表的社会资本，当它通过持续的交换及时地得以维持的时候，就是跨学科的凝聚力的惟一基础。这解释了为什么每当某人必须获得或保持大学的权力地位(这种权力地位超越了局限于学科范围的狭隘的局部封地)以及像法兰西学院所提供的那种特权地位的时候，这种关系网络就发挥了关键

[1] 布尔迪厄的分析与古尔德纳(Gouldner 1957)关于"地方的"与"全球的"经典的理想类型相呼应。但是，布尔迪厄(1988b：13)批评古尔德纳的类型是"准—科学的"，因为他认为，古尔德纳的理想类型关注的是人们熟知的大学中的教授类型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在使这些类型成为可能的机构组织的潜在母胎。

[2] 批评家，比如古尔德纳(Gouldner 1954：22—23)、帕森斯(Parsons 1947：58—60)，早就注意到，这两种官僚机构的权威形式在韦伯的对官僚机构的分析中是合在一起的，但是后来被分开并得到了更深入的研究。

[3] 塞莱尼与马丁(Szelenyi and Martin 1988/1989)对近年来东欧与前苏联的权力斗争的分析，就揭示了这样一种基本对立。

性的作用……是高师学生这个事实对拥有社会权力发挥着多种影响。

这样的对立使得大学的行政官员与专家发生对抗。这样，我们发现巴黎大学文理学院中的一些教授拥有巨大的知识声誉，同时统治着整个学科、控制着学科中的教师地位与研究地位的获取。而在对立的一极，我们发现了相对于传统的法国大学课程而言属于边缘性学科，比如经济学、社会心理学中的专家(109)。[1]

依据他们的社会出身与习性，布尔迪厄发现巴黎大学的教授依据部门分割的大学地图而不均匀地分布。他写道：

不同科系的教授依据与统治阶级中的不同部分相同的原理，分布于两极之间：一个是经济和政治权力极，另外一个是文化权威极(38)。

出身于统治阶级中经济富裕阶层的教授常常更多地从业于法律与医学，而不是科学与人文科学。那些具有相对多的科学资本或知识声誉的人也常常来自较高的社会阶层，特别是资产阶级。所继承的特权保证使得他们拥有自信，能自由地去选择在科学研究领域或在机构化程度最低的文化部门进行更具风险的文化投资。

相反，那些在学术界占据优势地位但符号资本(不管是在科学或在知识场域)不多的教授，则常常来自中低层阶级。特别是，他们常常来自小学教师家庭，其中比较少的部分则来自中学教师家庭，特别是巴黎

[1] 尽管布尔迪厄在法兰西学院享有地位，但是他并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官员”(有时候他被加上这样的标签)。在法国的大学中，布尔迪厄对于社会学学科中的任命的影响力从来不能与布东相比。在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他与图雷纳以及年鉴学派历史学家争夺资源与任命权的斗争(经常是失败)带有传奇色彩，进入法兰西学院给他带来了大量的符号资本，但是也使他无缘于大学或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中任何重要的职位权力。正如在第一章中已经讨论的，布尔迪厄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学术权力世界的“局外人”，看作一个科学专家。

以外的各省(78—79，83—84)。这里是“文化贵族”(cultural aristocracy)的心脏地带，那些出身于正派家庭、其家庭的上一代已经为下一代进行教育投资的人就分布在这里。他们的向上的社会流动以及他们的意识形态效忠应该归功于教育系统。这些人是世俗的“献身修道院生活的人”(secular “oblates”)，与他们的宗教同行们一样，他们

> 倾向于认为如果没有学校，就没有拯救——特别是当他们成为文化再生产机构的高级牧师的时候。这些文化再生产机构通过赋予他们以圣职，而把他们对于其他文化世界的积极主动的、首先是消极被动的无知也神圣化了。

他们之入选学术精英以及被排除于大学以外的特权世界之外，是应得的，但也是神奇般的幸运，这创造了“傲慢与不适之间的奇特的混合”。结果，正是在这些“幸存者”(survivors)中间，我们可以发现对于学术精英统治的坚定的、毫不动摇的支持，以及对于抵抗外界干扰的学术体制的坚定捍卫。[1]

布尔迪厄的场域分析表明：巴黎大学的教授们在1968年的学生运动中采取的政治立场差不多正好对应于他们在对法国大学系统作出区分的知识权力、象征权力、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轴中的位置(125—127)。[2]基本上把自己的精力全部献给了教学而几乎不投资于学术市场的教授们最痛恨学生运动，因为学生所呼吁的重大改革威胁到他们的货币的贬值；但是投资于更大的文化生产市场或集中精力于学术研究的人则比较拥护学生运动。

---

[1] 布尔迪厄写道：幸存者“献身于他们选择的学术机构，原因是机构选择他们，反过来也一样，一种完全有条件的支持则具有某种关于它的绝对的、无条件的东西”(100—101)。

[2] 布尔迪厄(xvii)观察到，“在立场的空间与立场的持有者在文化生产场域中的位置之间几乎存在完全的对应……而学术场域中的分布，紧密地对应于政治地位的分布、商会联盟的分布甚至在1968年5月事件中采取的立场的分布”。

与经济权力极有较密切关系的法律系与医学院的教授常常反对学生运动，而艺术与科学学院的许多教授则公开拥护学生运动。 而且，在医学院内部，布尔迪厄(61)发现，医学研究人员常常是政治上的左派，而临床实践者(尤其是外科医生)则常常是政治上的右派；这些政治倾向在5月事件中得到了具体体现。 在更普遍的情况下，布尔迪厄还发现，在那些均为政治上的积极分子的教授中间，自然科学方面的教授比艺术与社会科学的教授更倾向于左派。 这个研究似乎暗示：那些离权力场域中经济一极最远的教授，那些进行科学研究、投资于新的知识形式的教授，比传播维持现存社会秩序的文化遗产的人，更倾向于质疑现存的秩序。 正如我们将会在下一章看到的，这个政治定向对应于布尔迪厄对现代社会中科学知识分子的看法。

布尔迪厄对他的教授同事们的知识态度和知识行为以及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的批判是严肃的，但是他的批判是与知识分子的职业观念相伴的——这种观念认为，社会科学可能实践一种自我批判的与进步的政治。 在下一章，我们将考察布尔迪厄对现代社会秩序中的社会科学家的看法。

第十章

科学知识分子与政治

在法国，谁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已经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与激烈的争论(Ory and Sirinelli 1986)。布尔迪厄的场域分析的观点在分析知识分子的身份以及知识分子应当做什么方面被证明是有用的。如第九章所提到的布尔迪厄对于知识分子的普遍定义持批判的态度，因为他把关于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视作是具有历史偶然性的，即不可分割地与相对自主的文化场域的发展相联系。他的场域分析观点强调所有的定义都既是历史的，又是政治的，是从符号生产者之间为争夺合法性而进行的斗争中产生的。但是，虽然他认为社会学的任务是分析斗争的场域，而不是在这些场域——包括关于谁是知识分子的斗争场域——中占位，但是他还是持有关于知识分子使命的规范性定义。[1]这就导致了一个悖论以及布尔迪厄思想中的没有解决的紧张。这种紧张反映了他作为政治上有所承诺的社会科学家在战后法国的位置。[2]

在本章，我将分析布尔迪厄对于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科学家的思考

---

[1] 华康德认为，布尔迪厄的知识分子分析“揭示了游戏的整体性，这个游戏既产生知识分子的特定利益，也产生每个(游戏的)参与者关于他人的利益的片面观点”(Bourdieu and Wacquant 1989：679)。这与我的观点不同。我认为，布尔迪厄的研究中潜在地存在着强烈的规范方面。价值定向与客观性并不是相互排除的，特别是在反思性地进行研究的时候。提供对于现存的知识分子立场的合理客观的场域分析，同时对于特定的立场持有规范性的承诺，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在《学术人》中，布尔迪厄显然不是对于他描述的学术场域中的每种立场都持有相同的价值评价。虽然我同意布尔迪厄的《学术人》一书中的知识分子研究基本上没有因为自己的参与而扭曲了研究的客观性的观点，但是他的价值定向也是非常清楚的。

[2] 佩尔斯(Pels 1995)非常准确地把握了布尔迪厄关于知识分子思考的这个规范性的方面。

中的规范性的方面。 是什么潜在的价值激发了布尔迪厄关于社会科学家的知识分子使命的思考？ 知识分子应该捍卫的是什么价值？ 他们应该与政治保持什么关系？ 我将通过介绍布尔迪厄如何把社会学理论化为一种科学、它带有什么样的后果，来讨论这些问题。 然后，我会分析考察布尔迪厄所推崇的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家在现代世界中的角色是什么；知识分子的知识使命与政治使命如何结合。 本章的结尾将简要地看看布尔迪厄本人的政治参与。

在政治与象牙塔之间

所有现代知识分子面临的一个典型的悖论是：他们是应当参与“社会与政治运动，还是应该退出这种运动以便只对他们所写的东西负责？”（Huszar 1960：214）可以把对于这个问题的大量答案概括为两个极端：（1）以本达（J. Benda 1927）为代表的“古典派的”立场是：“文职人员”不应该背叛其对于永恒而超越的真理的使命，去从事解释具有历史局限性的因果关系以及具有政治偶然性的真理；[1]（2）萨特的“总体性知识分子”形象，这种知识分子在所有当代重要事务中坚持公众的立场。 布尔迪厄（1989a：102）认为，这两者都表达了所有知识分子生活的基本而不变的特点，即自主性的意志。 基于历史环境的不同，对于知识分子的自由的攻击要么表现为退出威胁知识分子自主性的外在参与，要么表现为参与另外一种旨在增强这种自主性的外部参与。 布尔迪厄首先希望加以巩固的就是对于知识分子自由的这种渴望。

因此，布尔迪厄是知识分子自由的坚决捍卫者。 批判性的研究是一种在历史上获得的价值，它只有通过争取摆脱了经济与政治强制的自

[1] 本达在后来的岁月中拥护政治上更加投入的知识分子角色而改变了自己的立场。

由，知识分子的生活才能够得到保持与强化。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在当代，科学是这种批判性研究的最高表达。但是，布尔迪厄还相信，只有通过使科学实践摆脱政治的污染，才能获得具有政治效果的科学实践。他认为这个策略指出了一条超越“纯粹文化与参与”之间的古典对立的道路(99)。但是，对布尔迪厄而言，这个策略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即：由于他还强调科学研究的功利的、政治的特征，那么，他如何能够期望社会科学家能以一种超功利的方式卷入政治？[1]

如同我们在第九章讨论过的那样，布尔迪厄把现代知识分子视作特殊的、出现于19世纪晚期、20世纪早期的符号生产者的历史类型，左拉代表了通过“以自己的学科自主性为基础的权威”进入政治理想的知识分子的典型(Bourdieu 1989a：101，1992：185—189，461—472)。知识分子具有双重性格，因为他们必须满足两个条件：(1)“他们必须从属于一个在知识上自主的场域，这个场域独立于宗教的、政治的、经济的以及其他的权力，他们必须尊重知识场域的特定规则”；(2)“他们必须把他们自己的特定知识领域中的专业活动与权威用于专业知识领域之外的政治活动”(Bourdieu 1989a：99，103)。为了表明布尔迪厄如何看待这个悖论：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独立，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参与，这是如何可能的？我必须转向他对于科学的理解来寻求答案。

科学万岁

虽然自从库恩的具有广泛影响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一书出版，并且从科学社会学中发展出一种强烈的批判传统以来，科学的自主

[1] 布尔迪厄在“走向普遍性的法团主义”(The Corporatism of the Universal 1989a)一文中最详细地阐述了知识分子应该如何与政治联系。我下面的讨论主题原则上(但不是绝对地)引自这篇文章。其他可以表明布尔迪厄对社会科学家在政治中的作用的思考的文献包括：Bourdieu 1975b，1981，1986c，1987e，1988b，1988c，1988e，1988g，1989a，1989b，1990d，1990g，1991e；Bourdieu，Casanova，and Simon 1975。

性已经受到尖锐的攻击(Bloor 1976；Latour and Woolgar 1979；Woolgar 1988)，但是，布尔迪厄依然把科学视作社会学的模范。他以“真正的科学的理论与实践”(Bourdieu 1988g：782)的语言来铸造自己超越所有主客观对立形式的策略。他对于流行的社会学的尖锐批判以及对于反思社会学的呼唤，都是以“真正的科学场域”的名义进行的(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176)。即使是在对于作为一种带着与其他文化场域类似的利益、冲突、等级的知识场域的科学的批判中(Bourdieu 1975b)，布尔迪厄也区分出“虚假的”或“官方的”科学与“真正的”科学。[1]有关“客观性”与“法则”的参照在他的著作中处处可见。

对于布尔迪厄而言，这不是什么新的变化，他早期的方法论著作《社会学的工艺》[1968](Bourdieu，Chamboredon，and Passeron 1991)强调为社会学的科学实践奠定坚实的认识论基础的必要性。但是，布尔迪厄关于科学的确切本质的言论远远没有关于科学的社会效果的言论来得多。正像他对于文化理论的兴趣远远不及对于文化的社会作用的兴趣一样，他对于科学理论的兴趣也远远不及对于科学的社会作用的兴趣。他对于科学的理论阐述有一些模糊，而且他对于科学的理论化的方式与他为批判的社会科学家设想的政治实践类型是对应的。

一方面，布尔迪厄继承涂尔干的传统，坚持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连续性，实际上，为了使社会学区别于常识性的推理以及思辨性的社会理论，《社会学的工艺》(20)有力地重申了“社会学是一门与其他科学一样的科学”的观点。另一方面，他又尖锐地批判实证主义与经验主义。他同意巴什拉的观点，强调科学理性的历史的、建构的、论战的特点。科学是经验的，但不是实证的。他认为，证据不是现成地存在于那里等待人们去发现。社会科学的知识是为了对抗不言而喻的

[1] 但是，布尔迪厄对于那些通过把科学归结为政治而把科学完全相对化的批评家[如布卢尔(Bloor)、拉图尔(Latour)和伍尔加(Woolgar)]的批判甚至更加激烈(Bourdieu 1990a：299)。

对于社会世界的知识而被有意识地建构的(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235)。对布尔迪厄而言，科学的进步依赖于对习以为常的关于权力关系世界的批判性的见解，而不是事实的积累。

而且，布尔迪厄(1975b；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176)还认为，科学是一个为了知识的合法性而斗争的场域。他实际上赞成科学发明的竞争逻辑。[1]在“科学的论战逻辑”中，相互竞争的场域之间为了科学承认而进行的斗争，把自我利益的追求转化为新科学知识的发展。布尔迪厄(1989b：384)对科学的共识观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把“有规则的斗争空间”而不是共识视作科学发明的核心条件。[2]布尔迪厄喜欢的是自己所说的“关于批判地承认可通约性与不可通约性的有效论争”，他写道：“真正的科学场域是这样一个空间，在其中，研究者在分歧的基础上达成一致，也在解决这个分歧的方法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其他任何方面达成一致。”(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176)[3]

而且，布尔迪厄对于符号权力与符号暴力的强调意味着：对于“社会”事实的研究不同于对于“自然”事实的研究。社会学的知识本质上是历史的与政治的，而不是自然的。理论的前提来自研究者在知识场域中的位置以及知识学科的理论边界。布尔迪厄(1975b)承认，社会科学永远不可能达到自然科学那样的独立于外部力量的自主性

---

[1] 他认为，“当科学的理性铭刻在以行动工具与思想工具(这些工具能够规范它们自己的使用)为目标的各种策略之间的竞争之中，铭刻在这个场域的功能所生产和假定的持续的倾向之中，而不是铭刻在关于实践理性的伦理规范或关于科学方法论的技术规则之中的时候，科学理性才真正实现自己。”(Bourdieu and Wacquant：1992：189)

[2] 虽然莫顿(Merton，1973)也指出了科学世界中竞争的重要性，但是，布尔迪厄依然批评莫顿对统治科学实践的规范性结构的强调。布尔迪厄(1990a：298)认为，莫顿对科学家自己信奉的官方规范批判不够。布尔迪厄(1975b)把科学场域看作一个市场而不是道德的共同体，在这里，各种所谓的规范立场都被看作是科学场域中的斗争策略。对布尔迪厄而言(1990a：300)，是物质的与符号的奖励结构，而不是规范性的理想，更具决定性地塑造着科学的行为。

但是，布尔迪厄还谈到了“规范化的竞争”，这种竞争是在科学的自主实践中得到机构化的，以至于某些斗争的形式(物理的暴力、非科学的方法的使用)是被禁止的。这样，尽管布尔迪厄批评莫顿，但他自己的知识分子市场论在另外的层面上又与莫顿的分析再次聚合。

[3] 几页之后，布尔迪厄通过以下的宣言结束他对于科学的共识观批评：“如果别的什么也没有，那就让我们至少拥有冲突吧。”

程度。[1]但是，自然科学的模型依然存在于他的思维中。我们看到布尔迪厄综合并试图超越两种极其对立的社会学观念：经验主义/实证主义与建构主义。这显示了他思想中的紧张关系，因为显然，布尔迪厄如何把社会科学中的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联系起来尚不清楚。

在更加一般的意义上说，这个紧张反映了布尔迪厄对于西方启蒙主义的理性传统的矛盾态度。他坚持认为，在启蒙主义的理性中，既存在历史的特征，也存在普遍的特征。[2]一方面，他反对“理性存在于心灵或语言的结构中，而不是特定类型的历史条件、特定的社会交谈结构、非暴力的交往中”（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189）的观点，坚持对于科学理性的激进的历史化的观点。他反对把这种超越的可能性等同于植根于心灵或者语言中的一种普遍属性。[3]把他的观点与哈贝马斯的观点相对照，布尔迪厄说：“理性本身具有一种历史，它不是上帝给予的、已经铭刻在我们的心灵或语言中的东西。”（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189）他不是像哈贝马斯（Habermas 1970，1979）一样坚持一种超历史的、普遍的交往结构，而是与解构主义者如德里达一样坚持绝大多数科学范畴的历史偶然性与相对性。

另一方面，布尔迪厄拥护启蒙传统，认为即使理性是历史的，它还是具有生产超越其历史局限的知识形式的能力。他谈到了一种被称为“科学”的理解模式、发现模式以及交往模式的“普遍”价值，这种话语的模式遵循特定的举证规则与逻辑规则，这种规则使得一个集体机构能够识别更好的阐述而又不通过引入权力（与一个人的财产拥有权、政治以及社会地位相关）的方式使这个过程有失公正。这样，科学理性的实践就使一种有价值的交往模式成为可能。布尔迪厄相信，这种模式

---

[1] 在布尔迪厄的论文“科学场域的特殊性”（1975b）中，他认为社会科学永远不可能达到自然科学，比如生物学或物理学那样的自主性程度，因为“争夺科学权威的内在斗争”在社会科学中与社会阶级之间在政治领域的“外在斗争”纠结在一起，这种外在斗争争夺的是“生产、强加以及灌输社会世界的合法再现的权力”。

[2] 因此，布尔迪厄明显不同于福柯。福柯是启蒙传统的一个主要批判者。

[3] 这也把布尔迪厄与乔姆斯基（Chomsky 1965）关于天生的语言/知识能力的观点区分开来。

在其他的文化实践类型中是比较难以获得的。[1]在这个意义上，它是规范性的。但是，理性被视作一个“场域的特征”而不是内在于心灵或语言的，这种场域特征作为文化实践的自成体系的领域而出现，并逐渐获得了独立于政治、经济或宗教权力的自主性。简言之，科学理性的超越性是一种历史地出现的特征。

我们可以把布尔迪厄的立场视作一种既反对福柯和德里达这样的解构主义者，又反对哈贝马斯的定位策略。相对于后结构主义者，布尔迪厄坚持启蒙的理论传统，认为这个传统提供了一种知识的形式，这种形式是自我指涉的，可以具有某种程度的超越性。他避免那种极端的相对主义观点，即把科学描述为与宗教等同的替代性知识形式(如 Feyerabend 1978)。与哈贝马斯相比，布尔迪厄把对超越理性的吁求联系于知识场域中与利益相关的立场。为了与哈贝马斯区别，布尔迪厄(1989a：104)提出了“普遍性的政治(politics of the universal)或理性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 of Reason)，以促进一种社会地建构的、有利于普遍性的生产的交流形式”，而不是“普遍的语用学”。[2]布尔迪厄想把这种理想的科学交往模式机构化，在这种交往模式中，“竞争……惟有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即通过更好的证明、推理与阐述并因此促进理性与真理，否则就不能取得胜利”。[3]

---

[1] 在其理想的形式中，科学交往不同于政治交往的地方在于：科学中的论争、问题以及解决的重要性是建立在科学标准上的，这个标准即：“证明与程序在多大程度上符合逻辑连贯性的原则并与可以观察到的证据吻合。”(Bourdieu 1989b：376)

[2] 在这里，布尔迪厄与哈贝马斯的不同之处只是强调的重点不同。哈贝马斯以一种形式化的术语提出自己的理想，而布尔迪厄(1989a)则强调最可能巩固这个理想化的人类交往类型的社会学条件。

[3] 在布尔迪厄的科学交往观念与古尔德纳(Gouldner 1985：30)的“批判的话语文化(culture of critical discourse)”观之间存在惊人的相似。古尔德纳把批判的话语文化界定为“关于任何人、任何事情的任何肯定都必须接受批判，如果遇到挑战，那么，任何肯定都不能通过援用某人的权威来加以捍卫。它禁止参照言说者在社会中的地位(或依赖他个人的性格)来证明或驳斥他的陈述。批判的话语文化是知识分子的特殊意识形态，它本质上是关于话语应该如何得以实施的一种意识形态”。

古尔德纳和布尔迪厄都提出了一种批判的、自我反思的、忽略言说者的社会区分的理性话语模式。他们之间的一个基本的区别是，古尔德纳把批判的话语文化视为受过高等教育者中的一个新阶级的构形，而布尔迪厄则把科学的理性主义局限在一个更狭隘的专业领域。

简言之，布尔迪厄不是提出一种普遍的理性或笛卡尔式的“我思”的理性主体，而是认为存在着一种与普遍的理性或理性主体相似的历史可能性的发展，它是一个值得追求的东西，应该竭尽全力促进这种可能性的发展。布尔迪厄把人类的理性视作历史的可能性——它不是天生的，而是必须通过与社会决定的世界的不停斗争一点一点地获得的，用它取代内在于人类本性的自由选择的主体概念。布尔迪厄的立场因而是自相矛盾的：既坚持历史的理性观，又坚持规范的、普遍化的理性观。[1]

布尔迪厄对于科学与社会科学在现代世界中的作用的理解还包含着道德/伦理的方面。他拥护启蒙的信念：不断提高的对于社会生活的理性意识强化着人类自由的可能性。[2]布尔迪厄相信，通过提高对决定一个人的行为的条件的意识，一个人不仅可以获得由于未知领域的缩小所带来的快乐，而且可以获得一个机动性的边界，在这个边界中，一个人可以更加清楚地辨别什么是可能改变的、什么是不可能改变的(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198—199)。通过揭示我们建构社会生活的原则的任意特征，我们可以获得某种程度的、通过能够赋予人类以更大的自由空间的方式来塑造社会学、大学、社会以及我们自身的方法。[3]总而言之，在布尔迪厄那里存在人的解放的观点——人从对社会统治的误识形式的支配中解放出来。

但是，替代性建构(alternative construction)的自由空间似乎是十分有限的，布尔迪厄的著作大量谈论的是统治关系的再生产。或许正是布尔迪厄对于个人主义与主体性意识形态的强烈反对，使得他在思考社会学的解放潜力的时候显得非常谨慎。

---

[1] 布尔迪厄承认“普遍主体是永远不能一劳永逸地完成的历史成就。正是通过在历史权力空间中的历史斗争，我们才一点点地向着普遍性进步”(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190)。

[2] 他写道(1990c：183)：“每当知识所确立的操作法则的有效性部分地归功于误识的时候，知识本身就产生一种效力，在我看来，这种效力是解放性的。”正如华康德(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194)指出的，布尔迪厄热烈赞成“现代主义的启蒙规划”。

[3] 从布尔迪厄的作为社会分析的社会学研究这个概念中可以发现这一点。在社会分析中，社会学揭示出我们的实践的社会无意识。

布尔迪厄的科学概念是在法国的历史语境中形成的，在这个语境中，科学的实证主义哲学与法国的共和主义得到了相互强化。从19世纪晚期开始，追求科学意味着通过使用系统的经验调查方法打破对思想作品进行的纯文学研究，同时也意味着相信在不同的科学之下存在着普遍整体性，深信民主的推进依赖于科学的进步（Ringer 1992：207—225）。19世纪晚期出现的法国科学传统——布尔迪厄是其继承人——与纯文学的人文主义与普遍主义的观点尖锐对立。它也是深刻地反教权主义的：它反映了对于不是根植于实证知识的所有权威形式的怀疑。它表达了用世俗的道德取代一度由天主教教会代表的宗教的道德权威的需要。这个科学观当然激励了涂尔干，同时也塑造了布尔迪厄的思想。这就不奇怪在布尔迪厄那里存在规范因素——把科学联系于自由平等，相信科学的实践能够促进人类解放的机会。

学者协会的成员们，为捍卫知识的自主性团结起来！

布尔迪厄评论说，进行理性研究的思想自由是一种历史的与集体的价值观，捍卫这种自由应该是知识分子的首要关心之事。他宣称："是的，我是一个坚决的、固执的、绝对献身于科学自由的人……社会学家除了把自己交托给研究的逻辑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委任与使命。"（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187）[1]布尔迪厄指出，社会学不是依据外在利益来证明自己的存在理由，"社会学应该首先肯定自己的自主性"。社会科学家必须联合起来"努力保证理性思想得以存在的社会条件"（Bourdieu 1989a：103）。[2]布尔迪厄（1989b：374）希望通过"控

[1] 布尔迪厄使用"场域的自主性"一词，指的不是由美国专业社会学在20世纪50年代（Gouldner 1973a）从韦伯那里推断出来的"价值中立"的社会学，布尔迪厄严厉批评社会学中实证主义的价值/事实的二元对立。

[2] 相似地，古尔德纳（Gouldner 1973c：96，98）写道："一种解放的社会学的首要任务是维持关于社会的理性话语所需要的社会的与人的条件……以及自身作为实践的理性话语的存在条件。"

制纯科学在科学生产与科学传播的社会机构中的统治效力”，来推进科学进步。社会科学家们的首要的、也是最主要的任务，是“集体地捍卫自己的利益，捍卫保护他们的自主性所需要的方法”（Bourdieu 1989a：103）。[1]

布尔迪厄呼唤保护知识分子自主性的利益免受所有形式的政治与经济的影响，这种呼唤需要个体的以及集体的行动。布尔迪厄把知识分子的自由视作场域的特征，而不是个体的道德特征。他呼唤知识分子通过尽可能地确立保护与扩大思想自由的社会空间，来实践一种个体自由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190）。首要的关切之一应该是掌握知识生产的工具。这一捍卫知识分子团体利益的步骤将包括使学术著作的出版更少地依赖于商业利益，抵制把政治标准——包括身份政治——用于大学教师的聘用与晋升。捍卫科学实践的自主性免于社会扭曲的其他方法还包括：利用国际的而不是限于国内的纯评估集团，建立替代性的出版机构与研究中心来与垄断的出版机构与研究中心竞争（178）。

自从进入法兰西学院并牢固地确立了自己在法国社会学界的符号权力之后，布尔迪厄更感兴趣的是确立他在国际知识市场上的恰当地位。他表现出对限制观念自由交流的地方与国家的差异进行斗争有越来越强烈的兴趣，并提出“通过知识分子来确立一种世界范围的集体行动的目的与手段”的必要性（1989a，99）。布尔迪厄（1989b：374）寻求创立的严格的科学研究与论争的社会空间，将能够巩固跨学科与跨国家的不同理论、方法与材料的论争。他把《图书评鉴：欧洲书评杂志》的创办看作是这个观点的一种表达。

布尔迪厄认为，追求知识分子自由是一场反抗强大的阻力的艰难斗

[1] 古尔德纳（Gouldner 1973c：96）也设想过创造作为自主的自由社会空间的知识分子“新共同体”，以便“支持社会学与社会理论中的理性话语”。但是，正如佩尔斯（Pels 1995：103）敏锐指出的，古尔德纳追随哈贝马斯，把理想的理性言说共同体与利益加以分离，而布尔迪厄则把理性与利益联系起来。

争，包括反抗政府的行政权力、国家的权威、出版机构的商业利益，特别是传媒权力的集中。他对新闻持特别激烈的批判态度，把它视作主要的威胁，因为它把一种反智的文化生产形式引入到知识场域中。传媒通过用“可读性、‘新颖性’、时事性”来取代知识能力的适当标准，削弱了纯正的科学评论的权力，而这种评论在布尔迪厄看来是知识自主性的基本条件（Bourdieu 1989a：106，1996；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58）。[1]他认为对知识分子自主性的最大威胁来自于圈内的“江湖骗子”，他们通过在作品中创造一种新闻标准与知识标准的混合物，扮演着布尔迪厄所谓的“知识分子记者”或“记者知识分子”的角色。纯粹的学术评论的自主性与外在于科学场域的标准和利益妥协，而对公共的、特别是私人的基金的依赖会减少自主性——如果知识分子依据赞助者的要求相应地建构自己的研究的话。[2]布尔迪厄认为，那些最可能利用来自传媒、政治、商业、宗教场域等外部资源的人，事实上是一些知识场域竞争中的弱者，他们通过寻求知识场域外部的利益来补偿这种弱势（Bourdieu 1989a：104—105）。[3]他们是边缘化的文化生产者，扮演一种本质上反智的角色，并通过把科学场域政治化而造成对知识分子自由的威胁（Bourdieu 1990c：185）。布尔迪厄关于强化科学场域自主性的观点要求严把准入关，这种准入关迫使个体不论出于什么动机，都要依据科学的规则进行游戏。[4]

布尔迪厄对于完全依据社会学的自身标准、摆脱任何外部的政治、

---

[1] 布尔迪厄警告说：“最大的危险……是剥夺知识分子依据自己的标准评价自己及其生产的特权”（Bourdieu 1989a：106）。

[2] 布尔迪厄的大部分资助来自公共基金，他承认，由于他的工作类型的关系，要获得私人资助是非常困难的（Bourdieu and Haacke 1994：75）。

[3] 他写道：“有一种适用于所有文化生产的社会法则……异质性通过那些依据场域的特定标准处于受支配地位的行动者而被引入”，他补充说：“总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在科学上处于受支配的地位，很自然地站在还没有什么学术造诣的人的立场上，他们通过摧毁业已确立的学术体制，通过误解那些已经被理解的东西，通过力图把每个人都带回到起跑线，来获得至关重要的利益。”（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184）

[4] 值得注意的是，布尔迪厄对于“不忠诚竞争”的批评不是指向自我利益或者其他的个人动机。他不批评自利的行为本身，只要它被纳入“科学地看是适当的行为”就行（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177）。他强调：“我们必须创造一种条件，使得最差劲的、最平庸的参与者不得不依据当时普遍的科学规范行事。”（178）

经济与社会干扰的社会学实践的呼唤，揭示了他对职业的高度责任感，但同时也表现了他思想中的一个基本的矛盾。这种诉求与他的关于社会学的假设——所有的男人与女人(包括社会科学家)的信仰与行为是由社会影响塑造的——处于很尴尬的关系中。[1]很难看出这个基本的社会学见解如何能够被一种与它矛盾的理想取代。如果按照布尔迪厄说的，科学场域与其他充满分化与等级化的社会场域一样地发挥功能，那么，我们不清楚科学场域怎么能够逐步地变得只听从理性研究的独一无二的标准。布尔迪厄并不相信一个真正科学的世界社会学场域现在已经存在，因为那些限制纯科学实践的内外因素均未被消除(Bourdieu 1989b：385)。但是，布尔迪厄相信这是可能的，是值得争取的。这事实上表明了一种潜在的，逃过了他的利益世界、统治世界、策略世界与再生产世界的审视而出现的理想主义。

布尔迪厄对彻底的知识分子自主性的呼唤所提出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归根结底学者们是否真的能够执行针对他们自己的法则。对于科学界而言，难道真理声称的有效性不是最终依赖于它们是否能够赢得某些外部集团的认可以及财政的支持么？布尔迪厄的保护纯学术评估免于所有外部影响的愿望似乎只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效：理性探索的产品找到了科学界外部的偏爱与支持。科学自主性的条件似乎需要更广泛的对于科学价值的合法化。

更加重要的是，布尔迪厄可能低估了来自自主的知识界内部的对知识分子自由的威胁。问题可能不是与外部的国家或市场权力的妥协，而是来自知识分子内部强加符号暴力的能力以及对方法与资源的垄断(这种垄断窒息而不是解放对知识的探究)。[2]当然，布尔迪厄相

[1] 比如古尔德纳(Gouldner 1970：54)就指出了社会学家的客观性要求与他或她的基本假设——我们是由无数的方式决定的——之间的矛盾。

[2] 古尔德纳虽然希望新阶级的发展，但是他或许并不像布尔迪厄一样相信科学自主性的现实政治，因为古尔德纳(1970：488—489)怀疑知识分子跳出专业桎梏的能力。他写道："专业化的优待窒息了知识分子的好奇心，集团的利益反对公开谈论自家的丑闻，孝顺的牙齿咬住了真理的舌头。"

信，强化观念的竞争性交流的机构化框架内部的理性化的科学思维的批判定向，将对此提供足够的防范。但是，迄今为止的历史记录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表明知识分子本身就是自由探索的最好保护人。

最后，我们不清楚布尔迪厄所理想化的那种知识分子自主性如何能够得到资助（参见 Ansart 1990：248—249）。布尔迪厄（1990c：51）观察到，那些对权力最感兴趣的被统治群体，常常不读社会学的文献，也无力资助它。批判的社会学是一门“没有社会基础的社会科学”。布尔迪厄谈到了什么样的行为模式应该支配科学共同体，它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程，但对于财政资助几乎没有谈。大多数法国社会学家是国家公务员（包括布尔迪厄），他们的职业要么是大学教师，要么是国家中央研究院人员，这种保险的职业地位赋予他们一定的自由度，使得他们免于考虑学生的需求、市场的压力以及知识的时尚。布尔迪厄是否把这种公务员阶层的知识分子类型当作科学场域自主的基础——尽管它不能应用于其他的语境？他是否假定国家会资助他所主张的那种知识分子的自主性？

科学与政治

对布尔迪厄而言，争取自主的知识场域还有一个更深的目的：自主的知识场域将为他的科学的知识分子观念提供机构化的基础，这种科学的知识分子以科学和自由的、批判性的探索为名义参与政治。

布尔迪厄相信，社会科学家带来的不仅是他们的专业研究，而且也包括参与公共生活的道德与伦理力量。在 19 世纪末获得的文学、艺术，特别是科学场域的自主性中，布尔迪厄（1989a：101）发现了“伦理的整体性与伦理的能力”的核心价值，它成了一种纯粹政治的基础。这些价值与“政治经济场域中的金钱、权力以及显赫的荣誉等目的与价

值”是根本对立的。[1]它们是“伦理与科学的普遍主义的不成文的法律，以便实践一种道德上的领导”。布尔迪厄曾经把存在于超功利中的利益揭示为知识实践的被误识的特征，而这种特征现在则变成了值得有意识地追求的价值。自由与自主的知识价值在发达社会为权力而展开的斗争中变得与商业和政治价值并置而立。对布尔迪厄而言，这些价值根植于像科学这样的自主的文化场域的发展。

我们知道，布尔迪厄认为社会科学本身的任务不是在社会斗争中袖手旁观，而是把这种斗争本身当作研究的对象。在1975年《社会科学研究会刊》的创刊号(vol. 1, p. 6)中，布尔迪厄指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

> 并不把一种价值判断与另外一种对立起来，而是揭示这样一个事实：对于价值等级的参照是客观地铭刻在实践之中的，特别是铭刻在对这种等级本身的争夺之中，并表达为对抗性的价值判断。

通过揭示社会世界是一个为了争夺有价值的资源、争夺等级化地安排定义而展开冲突与斗争的场域，社会学揭穿了社会世界的理所当然的特征——“掩盖权力关系”(Bourdieu 1993d：12)。布尔迪厄认为，对于社会秩序的这种揭示，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因为它把矛头直指权力关系的有效性。社会分析具有政治效果。

在1970年的一次访谈中，布尔迪厄勾勒了他相信的科学所具有的那种政治冲击力：通过引用巴什拉的话“存在只关涉隐秘之物的科学”(there is science only of the hidden)，布尔迪厄指出，通过揭开被认为

[1] 在此，我们回到了布尔迪厄在文化与经济、文化与政治之间所提到的基本对立，但是，我们看到了一种朝文化方面的态度转化。被布尔迪厄看作对统治阶级加以分化的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基本对立，已经不再根据资源加以理论阐述。现在，文化资本变成了一种值得为之争取的价值。

是理所当然的权力关系的伪装，“真正的科学研究体现了对于‘社会秩序’的威胁”（Bourdieu and Hahn 1970：15）。科学研究因此“不可避免地实施一种政治的效果”。布尔迪厄认为，这不是某种人们可以选择的意识形态，因为“关于社会的科学是内在地具有批判性的”。真正的科学研究在本质上就表现出对于业已确立的权力的“威胁”。正是这种政治效果使纯粹科学区别于“为艺术而艺术”（Bourdieu 1993d：14）。由于社会学所揭示的权力关系的力量部分来源于这样的事实——它们并不显现为权力关系，所以，“所有的社会学话语均具有政治效果，即使是通过缺席”（Bourdieu and Hahn 1970：19）。“在政治斗争中，社会科学必然站在”被统治群体的利益一边（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51）。布尔迪厄（Bourdieu and Hahn 1970：20）指出了社会学家在现代社会中所能发挥的核心作用：“社会学家揭开并因而卷入群体与阶级之间的权力关系，他甚至可能对于这些关系的改变作出贡献。”[1]

这种推理表明了布尔迪厄对于社会科学在现代世界中的作用的思考中的极度理想主义。布尔迪厄对于批判的和职业化的社会学可以潜在地修正权力关系的信仰，指向对于社会学知识在现代分层社会中的权力的非同一般的要求，它同时指向对于科学的解放潜能的信任——在后库恩时代，这已经是一个不那么流行的观念了。而且，这不能揭示为什么许多同样赞成对社会学作为科学的非实证主义理解的社会学家，却并不站在被统治群体的立场上（帕森斯是一个著名的例子）。显然，布尔迪厄在他对于科学的理解中注入了进步的政治规划，他力图以科学权威的名义对这个规划加以合法化。

在上面引述的访谈中，布尔迪厄承认，即使社会学能够通过揭示权力关系来削弱他们，但它也可能被统治者所容纳让它恢复元气并为他们

[1] 布尔迪厄关于内在于社会科学实践中的政治方面的观点与阿尔都塞（Althusser 1970）对理论研究的正当性的证明不乏相似之处。阿尔都塞认为，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变成了政治的一种形式，正如从事理论研究变成了政治实践的一种形式。

自己的利益服务。 在揭示隐藏的权力机制的时候，科学可能服务于统治阶级，因为它可能导向另外一种更好的控制模式与社会操纵模式。那些处于统治地位的人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可以从现存的等级秩序中获益，并因此能够对付来自把他们的特权加以暴露的科学的威胁。 他们有利的资源还赋予他们为自己的特权地位找到另外的合法的资源的机会。 但是，布尔迪厄相信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当权力机制被暴露以后将失去效力，因为被统治者可以获得并运用这种知识。 对于布尔迪厄而言，科学是站在被统治的个体与群体一边的。

因此，布尔迪厄的科学概念以及他关于社会学在现代世界应该作些什么的理论带有政治的色彩。 科学或社会学是政治性的，因为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反对所有形式的符号统治。 他在积极的意义上思考社会科学家的知识分子职责。 不论研究行为看起来多么世俗，都是与理所当然的关于社会世界的假设进行斗争、征服它们、战胜它们的行为。 科学研究是反对所有形式的符号统治的斗争。通过揭露维护权力关系的那种研究中的独断专行的机制，社会科学家能够挑战现状的合法性。 由于现存权力关系失去了理所当然的特点，这就开启了另外的建构社会关系的方式的可能性。 因此，在布尔迪厄看来，正是在社会科学职业的目的上，政治与科学合二为一。 对布尔迪厄而言，“研究行为”认为本质上是政治行为。[1]

这表明了布尔迪厄在对科学本质的思考中存在着紧张——作为描述的科学与作为政治干预的科学之间的紧张。 一方面，他常常强调社会科学要反对对自己研究的社会斗争的党派偏见，社会冲突是研究的对象而不是发表党派偏见的场所，场域分析的视角提供了一个超越了狭隘的利益的更加全面的视点；另一方面，布尔迪厄又相信科学必然与被统治群体的利益站

[1] 事实上，《社会科学研究会刊》的创刊号(1975)的序言用布尔迪厄关于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辨识了这个双重特征，阿卡尔多(Accardo 1983)，佩尔斯(Pels 1995)，罗宾斯(Robbins 1991)以及华康德(Wacquant 1992)是另外几位抓住了布尔迪厄的社会科学研究理论的积极含义的学者。

在一起，因为通过揭露权力的机制，科学使它们变得相对无效。

这个论辩的路径再次指向布尔迪厄在赋予行使权力以合法性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它的假设是，科学拥有重要的权威性以便生产出此类政治效果，它同时假设：通过提高场域的自主性，科学的权威性与符号权力的积累一起产生。在科学场域的自主性提高的同时，科学所能够生产的潜在政治效果也同时提高。[1]实际上，他所寻求的这种科学的政治效果只有在享有一种高于政治的合法性时才可能。但这正是疑点所在。一旦科学实践的利益特点被广泛地为人所知，那么，科学本身就遭遇到了合法性的问题。正如一旦参与者把礼物交换的实践视作是与利益相关的，礼物交换就变得不可忍受了。一旦科学代表党派的而不是普遍的利益，那么它就失去了它所声称的优越的客观性。超功利性的意识形态对于科学所拥有的道德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正是布尔迪厄希望科学在政治领域实施的)而言似乎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当这种意识形态变得不再令人信服的时候，科学就失去了有效地卷入政治生活的符号权力。当皇帝不穿衣服出来的时候，检阅或许还会继续——但是不会长久。即使小孩也能够看出差异!

这一点显示了布尔迪厄的复杂的立场，如果不是最终矛盾的立场。为了获得理想的政治效果，必须对科学怀有一种把它作为超功利的知识与研究形式的信仰。但是，布尔迪厄自己对科学场域的研究的推动正强调了(科学这个)社会世界的政治特征。虽然知识分子的政治不同于选举政治，但是它们无疑都是政治。

*　　*　　*

布尔迪厄刻画的以科学的名义卷入政治舞台的模范知识分子与其他

---

[1] 布尔迪厄(1989a：100)提出了下面的假设来谈论提高场域自主性的政治效果："知识分子因其特定的专门知识(比如奥本海默的科学权威或萨特的知识分子权威)独立于世俗利益的独立性越大，他们通过批判权力来肯定独立性的倾向就越强烈，他们采取的政治立场的符号效力也就越大。"

因此，在一个相对自主的文化生产场域中成员身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布尔迪厄的思维中，它似乎产生出了与经济、政治资本的拥有者的权力进行斗争的倾向并更加有效地进行这种斗争。

几种知识分子的角色模型形成鲜明对比。他虽然坚决地捍卫学术自由而抵制一切外部干预，但他并不同情作为“象牙塔”的大学以及大学中的精英文化传统的监护人(参见布鲁姆：《美国精神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Allan Bloom 1987)。布尔迪厄反对维护、传播、圣化精英文化传统的教授角色，而与研究人员、与新的知识形式的创造者共命运。

布尔迪厄同样批判服务于统治集团或国家的研究者——作为专家服务于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他尖锐地批判现代的官僚国家及其为了政治的目的对于科学的利用。他要以知识分子自己设立的而不是政府、政治家或商人领袖设立的科学规划的名义参与政治。

他也反对把知识分子理解成为被统治阶级服务的角色。布尔迪厄主张增加知识分子团体的自主性，抵御外部影响，这个规范性观点与政治上的左派知识分子所持的观点尖锐对立。政治上的左派知识分子常常把自己看作站在领导地位或看作是为政治上他们所支持的被统治阶级(通常是工人阶级)提供某种服务，但是，布尔迪厄(1985c)反对这种政治行动主义的模式。

“同路人”(fellow traveler)的形象一直是左派知识分子中最重要的形象——特别是在冷战时期。在法国，同路人的角色使左派知识分子能够旗帜鲜明地支持左翼政党，但又与共产党统治的劳工组织或政治机构(法国共产党)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就允许它对共产党组织进行一些批判，但同时把自己的存在合法化为惟一严肃的游戏(the only serious game)。[1]萨特无

---

[1] “同路人”的标签在近年来受到右派知识分子特别猛烈的批判，这些右派知识分子强调左派知识分子与斯大林的恐怖行为合谋。参见 Caute 1964, Hollander 1981, Johnson 1988, Judt 1992。

在当代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氛围中，人们很难理解 20 世纪 50 年代法国的知识与政治气候，那个时代的法国共产党被看作是法国工人阶级的惟一有效的、有组织的声音。站在左派的立场就意味着与工人阶级站在一起，并因此获得其正式组织的合法性。

关于许多同路人实际上表现出多大的“批判性的距离”存在争论。奥里和西里内利(Ory and Sirinelli 1986:164)评论说，显示与最大、最有力的法国左翼组织团结一致的需要，自相矛盾地使得他们批判法国共产党已经变得相当困难，相反，那些已经离开法共的原法共成员倒是相对容易一些。

疑是 20 世纪 50 年代法国知识分子中承担这种角色的最著名典型。[1]布尔迪厄(1985c)的科学知识分子观与这种为被统治群体辩护的知识分子形象进行了决裂。

布尔迪厄的科学知识分子(形象)也不同于葛兰西(Gramsci 1971)的“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2]在葛兰西看到那些能够“理解”与“感受”自己与工人阶级的联系、因而用符号表达工人的集体身份与利益的工人知识分子 (worker-intellectuals) 的发展的地方，布尔迪厄看到的则是知识场域中的边缘化的参与者，他们受制于自己特殊的职业利益，并常常把自己的统治地位投射到对于被统治群体的利益的理解中。 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政治联盟变成了一种以结构性同源为基础的联盟，而不是以共同习性为基础的联盟。

同路人与有机知识分子的模型都共同拥有这种理念：知识分子应该使自己的特殊利益服从于工人阶级——他们注定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变革的历史主人——的利益。[3]布尔迪厄(1985c：93，1989a：109)反对这种支持者的角色 (support role，指把知识分子看作是支持工人阶级的人)。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知识分子必须首先追求自己的集体利益，然后才作为知识分子而不是作为被统治者的代言人介入政治。 通过捍卫、保护自己的批判性研究的那种利益，知识分子才能确立解构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关系的合法性，并因此实际上发展被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基础。 虽然布尔迪厄与古尔德纳一样，反对谈论作为普遍利益的代表的知识分子，但是他的分析实际上最终导致把批判性地解构权力关系的功能，与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对

---

[1] 虽然在后期，萨特公开反对法共以及公认的法国左派。

[2] 有机知识分子的功能是用符号表达他们所代表的群体的集体身份与利益，他们为特定的社会群体起着提供合法性与组织的作用。 葛兰西(Gramsci 1971)把传统的那部分人文知识分子(如艺术家、作家、学者、哲学家等)看作是支持资产阶级的，而把新壮大的技术知识分子(如工程师、科学家)看作是能够为正在出现的产业工人阶级提供集体观点的。 工人阶级与其知识分子之间的“有机的”联系是辩证的：知识分子促进工人阶级的形成，而工人阶级则产生自己的知识分子，后者反过来推动工人阶级，使之进一步发展壮大。

[3] 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 布尔迪厄的知识分子场域分析的贡献之一，就是表明左派知识分子的“错误信念”，这些左派知识分子通过把自己特定的知识场域位置中的利益投射到他们支持的被统治者的利益中而把这两种利益混合为一。

应起来。 然而，这种“知识的滴入效应”（trickle-down effect）是一种有关信仰的问题，因为从布尔迪厄自己的思想线索来看，界定被统治阶级的客观利益到底是什么，本身就是斗争的对象。 布尔迪厄没有考虑他为之辩护的普遍科学利益与被统治者的利益可能会冲突的情况。

布尔迪厄的科学知识分子模型不同于其他许多关于知识分子的关注范围的观点。 布尔迪厄（1980d）反对以萨特为代表的“总体性知识分子”的模型。 遵循左拉确立的榜样，萨特确立了一种典范的预言家的形式，这种形式成为法国知识界的一种传统，并把这种形式作为每个要进入法国知识界的知识分子的规范性模型（Bourdieu 1991d：36）。[1]做一个总体性知识分子，意味着能够批判性地谈论所有的当代事务（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185—186）。 对布尔迪厄而言，这不是作为一个科学家的社会学家所应该扮演的角色。 理由有三：（1）这样做在总体上意味着逾越了社会学家特定的能力界限；（2）这样做把社会学家的形象设立为一个社会的预言家，其卡里斯玛风格把权力关系进一步神秘化；（3）虽然以代表公众需要的面目出现，它事实上通过改进他或她在知识场域中的地位而服务于知识分子的自身利益。 布尔迪厄反对所有试图通过利用非科学的手段——比如传媒的流行性、政治上的正确性等——改进自己地位的做法。

与布尔迪厄一样，福柯也批判萨特式的总体性知识分子形象。 但是，布尔迪厄（1989a：108）把他的“特殊”知识分子的模型区别于福柯（Foucault 1980：126—133）的特殊知识分子——后者把他或她的政治活动限于专业领域。 布尔迪厄希望他的“知识分子大团体”更广泛地漫游，而不只是跨越几个有限的领域。 布尔迪厄与福柯之间的原则区别在于：布尔迪厄希望创造一种允许知识分子集体介入一系列问题的社会条件。 正如华康德（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190）指出的，布尔迪厄的立场更接近萨特与福柯的综合。

---

[1] 布尔迪厄对萨特的批评通过安娜·博斯凯蒂（Anna Boschetti 1988）而得到了扩展。 她是布尔迪厄的一个学生与合作者。

布尔迪厄(1990c：184)也反对曼海姆的自由漂流的知识分子形象。[1]他反对把知识分子理想化为脱离了阶级与知识场域利益的自由人。[2]布尔迪厄的知识分子社会学强调知识分子如何为特定的场域利益所束缚，但是，与曼海姆一样，他关于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的观点的确拥有这样的希望：通过肯定他们的合作利益，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可以起引导作用。[3]

最后，虽然布尔迪厄认为科学的知识分子首先应当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发展科学，但是，他并不赞同古尔德纳(Gouldner 1979)的新阶级理论。布尔迪厄(1985c：94)认为，急需“创建一个能够对于政治与经济权力的进行反思或提供劝诫的艺术家与学者国际组织(an international of artists and scholars)。但是，布尔迪厄的强化科学实践以免受外部干扰的自主性观念，似乎并不是要导向任何类似阶级意识、阶级组织以及阶级动员的东西。古尔德纳集中关注的是知识分子在更大的社会动员中的作用，而布尔迪厄则更加关注知识分子协会（intellectual guild）。

布尔迪厄本人的政治实践

布尔迪厄的政治实践与他的科学知识分子观念是对应的。可以分

---

[1] 虽然大家都认为自由漂流的知识分子形象是曼海姆创造的，但是曼海姆(Mannheim 1956)自己却相信知识分子只是“相对地”不受其阶级利益的影响——他强调这一点是为了回应对《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批评。曼海姆的确设想过一种自我批评的——虽然是技术官僚的——关于知识分子角色的观点，这种知识分子将充分独立于政治义务与狭隘利益以便把握一种总体性的社会观念，并因此能够更好地代表普遍利益。曼海姆似乎更加愿意接受技术官僚的角色形式，而布尔迪厄则明确地批判这种角色。即使是在他自己的实践中，布尔迪厄也显得不那么倾向于成为一个国家，包括1981—1994年的法国社会党领导的国家的“服务型知识分子”(service intellectual)。但是，布尔迪厄的确与曼海姆一样，认为社会科学家能够获得一种总体性的视点。场域分析正好是一种把握特定的冲突领域的总体性视点的尝试。

[2] 我们在布尔迪厄对于海德格尔的研究(Bourdieu 1988b)以及对于当代哲学的研究(Bourdieu 1983b)中发现了他的这种批评。

[3] 与布尔迪厄相似，曼海姆(Mannheim 1956：170)认为，知识分子不应该采取工人阶级的服务者的姿态，而应该忠实于自己的知识分子职责。

辨出三种普遍的政治活动类型：高度透明的政治参与、研究题目的选择、对知识分子实践的批评。

鉴于布尔迪厄对同路人、总体性知识分子以及其他专门知识分子角色的批评，不难理解他将会回避一些高度公开的政治表达类型——这种类型在法国知识分子中非常常见。布尔迪厄很少在政治抗议书上签字，或者参与示威活动和政治集会，也不公开为左翼政治党派和工会组织工作或与它们结盟。在法国的社会学家中，虽然布尔迪厄具有很高的学术威望，在法兰西学院拥有很高的地位，但是，图雷纳与莫林在法国的媒体上出头露面评论政治事务的情况却比他多得多。[1]布尔迪厄也不以一个特殊社会群体或事业(比如生态、女权、种族、和平)的辩护者的形象著称，而福柯就以关注心理健康与监狱著称。

与一些在20世纪50年代献身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比如拉杜里)以及60年代的极左派(比如安德烈·格吕克斯曼)而后又在70、80年代成为狂热的反共产主义者不同，布尔迪厄一直属于政治上的左派，一直是保守党的尖锐批判者。多年来，他一直站在法国社会党与法国社会党领导的工会的激进潮流一边，但是，布尔迪厄一直抵制充当同路人的角色，即使是在社会党人密特朗1981年当选总统的时候也这样。事实上，让许多左派知识分子感到惊讶的是，布尔迪厄在一个请愿书上签字，支持法国喜剧演员科吕奇(Coluche)在1981年的总统竞选中对抗密特朗。对布尔迪厄而言，科吕奇的候选人身份代表了对法国政治领袖的封闭世界的抗议，对法国政治生活的官僚组织的抗议。[2]然后，1981年12月，布尔迪厄开始与福柯合作，公开抗议法国社会党政府对波兰发生的雅鲁泽尔斯基军事镇压团结工会事件所持的不参与政策。[3]他1993年出版的论社会排挤与苦难的《悲惨世界》(*La misère du*

[1] 例如，图雷纳常常为《世界报》(*Le Monde*)撰写文章，就范围非常广泛的问题发表意见。

[2] 参见布尔迪厄访谈(巴黎，1993年11月)。

[3] 参见埃里蓬(Eribon 1991：298—308)对福柯与布尔迪厄之间这个合作努力的解释。

monde），代表了对法国社会主义忽视社会福利的尖锐批判。

虽然布尔迪厄批判服务于权力的专家型知识分子，但是他的确在一些场合帮助过密特朗政府。应密特朗对法兰西学院的要求，布尔迪厄在1985年参与编写了教育改革大纲系列丛书，1988年，当罗卡（Michel Rocard）出任总理的时候，布尔迪厄接受了一个委员会的主任职务，并研究教育课程，提出了一系列改革课程的建议（“法兰西学院关于未来教育的报告”，1990）。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早期，我们发现，随着媒体对布尔迪厄的关注越来越多，他的政治积极性也不断高涨。他坚持对面向媒体的知识分子提出批判（参见 Bourdieu 1996），但是，他自己通过访谈、上电视以及在法国的报纸发表讲话等，在媒体上频频露面。[1]此外，布尔迪厄不断地表明他对各种进步事业的公开支持。他参与了大量阿拉伯知识分子反对美国在1991年发动的对伊战争。他参加了抗议压迫阿尔及利亚知识分子的活动。他一直积极参加法国的反种族主义斗争，虽然没有参加什么正式组织。

布尔迪厄最重要的公共参与领域无疑反映在他的研究与写作中，在选择研究课题的时候，他似乎受到他相信该科学研究将具有多大程度的政治冲击力的指导。[2]他早期对阿尔及利亚农民文化的研究既关注殖民战争的恐怖，也关注解放战争之后可能产生的社会文化错位。《继承人》（1964）（Bourdieu and Passeron 1979）用详细的材料阐明了法国高等教育中持续的社会不平等，尽管教育发展了多年。对法国学生文化的研究也指向由学生文化的内在分化的阶级特征导致的动员法国大学生的困难。[3]最近以来，布尔迪厄的《悲惨世界》（1993）提供了由于当代

[1] 对《世界报》的研究表明，从1987年到1992年，布尔迪厄为这家著名的法国日报撰写特稿的次数呈现引人注目的增长。然而，他在《世界报》的曝光频率却没有图雷纳高。图雷纳更加接近萨特的知识分子模型，通过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而维持媒体的形象。

[2] 他承认，他对理论问题的选择受到当时个人面对的紧迫政治问题的激励。

[3]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虽然法国的学生运动领袖广泛承认这本书为他们批判地理解法国大学作出了贡献，但是，《继承人》的这个基本主题与1968年的广泛的社会动员是矛盾的。

法国经济的转型而造成的社会排斥与苦难的经验访谈资料。[1]这本书以及布尔迪厄早期对学生文化的研究，已经成为他把政治信息带给更广泛读者的最成功尝试。

但是，并非所有布尔迪厄的研究项目都有重要的政治冲击力，他对重点高校的批判性研究对改革这些精英机构的社会排斥特征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他为法兰西学院作的关于教育改革的报告，并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导致关于法国初级教育与预科教育的广泛的争论与改革。

但是，在总体上说，布尔迪厄的政治参与一直努力强化知识场域独立于外部经济与政治利益的自主性，他把自己的大量努力指向对抗“知识世界中隐藏的恶习”（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56）。他把自己的社会学实践理解为纠正社会—科学场域中的种种扭曲的一种参与模式，多数这样的实践采取了对社会科学中的实践进行尖锐批判的形式。我们或许会在布尔迪厄的《学术人》（1988b）中发现他所偏爱的那种政治参与方式，通过表明法国的大学职业如何由于对立的权力形式——这种对立的权力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国统治阶级的机构——而发生内部分化。《学术人》的研究目的在于增强对当代科学实践中这些扭曲形式的根源的意识，并强化科学场域独立于外部扭曲的自主性（Wacquant 1990：681）。

科学团体的另外的参与模式也值得一提。除了他自己的研究中心和专业杂志《社会科学研究会刊》以外，欧洲图书评论类的论坛《图书评鉴：欧洲书评杂志》也追随布尔迪厄的做法：通过与由语言和民族传统造成的科学交流的障碍的斗争，来强化科学场域的自主性。布尔迪厄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科学会议，在这种会议中，他发现了确立跨学科的专家之间、各种不同的方法论流派之

[1] 在《悲惨世界》中，布尔迪厄（1992：201—202）研究“社会苦难”的动机是把它当作与技术官僚式的对社会现实的再现进行斗争的方式。

间、各种理论框架之间以及各种民族文化传统之间进行交流的渠道的机会。[1]总的来说，布尔迪厄所喜欢的政治实践形式是紧密地与他关于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在现代社会中进行政治参与的观点吻合的。他认为，通过进行出色的社会科学研究，一个人同样可以从事进步的政治事业。这是他的科学知识分子理想的基础。

[1] 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1988年的芝加哥会议，布尔迪厄与该会的组织者之一科尔曼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以及政治倾向上有着尖锐的分歧（参见 Bourdieu and Coleman 1991）。布尔迪厄是科尔曼倡导的理性行动者理论的尖锐批评者，他同时明确地认同法国政治左派，而科尔曼则认同保守主义的美国全国学者协会。然而，布尔迪厄（1989b：374）把这次会议看成是与他的“科学政治（scientific *politique*）——即科学政策与科学政治学——一致的，其目的是巩固跨越多种分支学科的科学交流与争论，这种分支学科与民族传统联系在一起，同时也与社会科学的学科分化——分化为各种经验性的亚学科、各种理论范式、各种方法论流派——联系在一起”。

另一方面，布尔迪厄（1989b：373—374）不参加常规地组织的国内的或国际的社会学专业会议，他称之为“不守规矩的交流”（anarchical exchange），比如法国社会学会或国际社会学大会。

第十一章

为客观性而斗争：布尔迪厄对反思社会学的呼唤

由于布尔迪厄声称他的符号权力与符号暴力理论可以用于所有的符号再现形式，所以，在发展一种意在揭露隐蔽的符号权力形式的社会学实践的时候，他面临一个十分棘手的两难选择：我们怎么能够实践一种社会科学——它本身就是一种符号实践——这种社会科学不会同时再生产布尔迪厄坚决否定的社会区隔的效果？ 如果像他所主张的，所有的符号系统——包括科学本身——均体现了权力关系，所有实践——包括知识的实践——都是利益相关的，那么，怎么可能建构出一种不是另外一种符号暴力形式的社会科学呢？ 如果我们接受布尔迪厄的主张：知识分子的劳动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观点的限制并发挥着为了承认与合法性而进行斗争的场域内部策略的功能，那么，什么样的客观知识是可能的呢？ 考虑到他对知识分子角色的尖锐批评，布尔迪厄怎么能够证明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存在？

布尔迪厄对这个两难选择的解答是呼唤一种反思的社会学实践（1990f；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 他争论说，每一项社会学的研究都要求一种同时进行的、对于知识与（知识的）社会条件的批评性反思，正是这种条件使得研究成为可能。 如果社会学是确定人类实践的社会条件的科学，那么它必须同时也是确定知识实践——包括社会学——的社会条件的科学。 布尔迪厄对知识场域的分析表明：社会科学家不自觉地把特定的认识论假设与知识场域的利益转译为他们对社会

现象的“解释”。只有通过社会学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sociology)的实践，把社会学的方法运用于社会学的实践本身，我们才有希望获得一种摆脱知识实践的社会决定因素的方法。在布尔迪厄看来，这一“反思的回归”呼应了一种特定的紧急需要，因为，“关于社会学实践的社会决定因素的社会学是摆脱这些决定因素的惟一可能的基础”(Wacquant 1989)。

布尔迪厄论证社会学为什么需要一种反思定向，有两个目的。首先，反思性是进行完善的科学研究所必须的。与激进的建构主义(例如Ashmore 1989，Woolgar 1988)不同，布尔迪厄并不把反思性看作是对科学的攻击，而是一种完善科学实践本身的真正科学方法。他把社会学的社会学看作是不可避免的，因为

> [它]可以通过提高我们对于有社会基础的、在科学场域中发挥影响的统治结果的意识，通过推进以控制这些结果以及产生这些结果的机制为目的的斗争，帮助我们走向一种关于社会世界的社会学的整体性的科学场域。(Bourdieu 1989b：385)

第二个目的指向一种道德责任：扩展与他人进行自由的、批判性的研究与交流的机会。一种批判性的反思将“把对普遍性的追求与为了使追求普遍性成为可能的特定的生存状况普遍化而进行的持久斗争联系起来”(Bourdieu 1989a：110)。虽然布尔迪厄把自己的科学理想区别于哈贝马斯的理想，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与哈贝马斯的理想的言说共同体(speech community)相似的方面。

本章的焦点是分析布尔迪厄所说的反思社会学实践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将从考察布尔迪厄为反思社会学勾勒的三个基本步骤开始，然后将思考布尔迪厄如何实际地在自己的研究中应用反思性。而我特别关注的则是他的最有意思的反思性研究的样本，即《学术人》对法国大学教师职业的分析。

走向客观性的反思步骤

虽然布尔迪厄并没有为达到一种适当的反思态度提供单一的方法论诀窍，但是，在几个重要论述中，他还是阐述了他认为进行反思的社会学研究所需要的基本方面（Bourdieu 1987b：112—116；Wacquant 1989：18—19，33—34）。布尔迪厄首先关心以及长期坚持的前提假设是：必须控制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以免研究者的立场不自觉地被投射到研究对象中。正如我在第三章中提到的，这是布尔迪厄所说的“参与的客观化”（participant objectivation）（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68；Wacquant 1989：33）。

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问题已经作为一个中心问题出现在他研究阿尔及利亚的著作中（Bourdieu 1972，1977c. 1990h）。布尔迪厄认为，缺乏反思性观点的结果是“把这种关系投射到研究对象上”（Wacquant 1989：33）。这种投射的三个主要根源需要被控制以便使社会学的研究更加客观与科学。

首先，需要控制研究者从自己的社会背景中带给研究对象的价值、倾向、态度、知觉（如习性）。这意味着培养一种对研究者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的社会定位（social location）——如阶级出身、种族、性别——的批判意识，以及对这个背景可能会怎样塑造并影响研究的批判意识。布尔迪厄认为，研究者如果能够辨认那些渗透到自己的概念、研究客体的选择、方法中的个人的倾向与利益，那么他/她在获得客观性方面将更加成功。

社会背景的影响可能是被最广泛地承认的扭曲社会科学研究的偏见类型。事实上，从涂尔干、马克思、韦伯到曼海姆的古典知识社会学传统植根于一个基本的假设：所有的观念——包括社会学的观念——都是在社会中定位的。布尔迪厄评论说，尽管如此，研究者还是常常忽

视这一重要的社会学见解，并简单地把未经检测的“敌意”或“着迷”的倾向投射到自己的研究对象中。他把那些在研究政治上的被统治群体的同时，不加批判地为这些群体辩护的研究者——特别是大众文化的理论家——特别挑出来进行批评。对布尔迪厄而言，反思性首先意味着发展一种对阶级的有色眼镜——人们就是用这副眼镜来看待社会世界的——的批判性意识。

但是，布尔迪厄认为，他的工作超出了传统的关于阶级偏见的认识。正如我在第九章讨论过的，事实上，布尔迪厄认为，研究者的社会阶级起源与立场对科学研究的影响永远不是直接的。它从来都是受到研究者在文化生产场域中的位置调节的。场域位置(field location)是社会学家必须面对的第二个偏见之源。这样，反思性也意味着把场域分析的视角运用于社会科学的实践本身。

社会学本身是一个专业化的符号生产的场域，它处于科学场域与政治场域之间(Bourdieu 1989b：376)。它被极为不同的策略——从纯科学的到纯政治的——所贯穿，这些策略为着社会学的界定权而竞争不同的资源。对布尔迪厄来说，反思性意味着培养一种意识，意识到自己的知识立场与研究工作同时也代表争夺学术承认的斗争中的策略。它意味着承认社会学家在他的研究中，除了受到知识理想的驱动以外，还受到争夺学术承认的“实际利益”的驱动。反思性因此要求建构所有相互竞争的利益与斗争立场的(包括社会学家的)知识场域，以便降低社会学家把一种思想斗争的立场投入研究对象中的可能性。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重点从个体向机构语境的转移，这种语境在布尔迪厄看来提供了塑造个体策略的支配性的思想范畴以及职业机会与制约。对布尔迪厄而言，反思性意味着持续进行的对被用于社会科学实践中的范畴的分析与控制，而不是知识分子的内省。它不是集中关注作为主体的个体社会学家，而是塑造社会学家的研究工作的机构化的、认知的结构。这种定向引导布尔迪厄进行科学场域分析(Bourdieu 1975b)、法国高等教育的场域分析(Bourdieu 1988b，1989c)以及当代法

国知识场的场域分析。

但是，对布尔迪厄来说，反思性超出了对知识世界的场域分析，它还必须研究布尔迪厄所谓的“最基本的偏见”，即内在于学术视野与知识分子姿态本身的“唯智主义的”、“唯理论主义的”偏见。布尔迪厄反思规划中的第三步，也是最困难的步骤，包括考察使得社会科学的客观性诉求成为可能的认识论的与社会的条件。

布尔迪厄(1990i：382)评论说，“我相信在我们的学术思想模式与实践这个怪物之间存在不协调。”[1]“旁观者的”或者“学术的”观点，都需要与实践领域进行既是社会的也是认识论的决裂。建构理论视野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把自己从实践中抽离出来，以便观察实践。布尔迪厄认为这种对于社会世界的“旁观者”观点需要“一种机构化的处境——有充分的、用于勤奋研究的闲暇时间”(381)。旁观者观点的前提是从社会参与中抽离出来以便研究它，而这样的抽离需要闲暇时间——一种基本的、不受阶级必然性影响的自由。这样，布尔迪厄(1990h：53)就把对社会世界采取一种客观性的观点的可能性与特权的经济地位联系在一起了。

学术的视野也需要以一种与实际知识的认识论断裂为前提。由形式化的模型、图表、统计表等提供的对社会世界的科学视野，不同于实际参与社会世界的行动者的视野。这些行动者不具备完备的信息，不能清楚地阐述他们的目标，也不能清楚地预见结果。这种理解社会世界的学术模式把实际的知识转化为有意识的、系统的、超时间的理论知识。不能把反思性视角用于实际知识与理论知识之间的认识论差异，就会导致社会科学家把理论的实践与实际的行动混淆，并犯布尔迪厄所说的“唯智主义”的谬误。因此，这些社会科学家就会通过把关于理论实践的认识论假设投射到日常的实践中而错误地再现实践的实际特征

[1] 这把我们引向布尔迪厄关于如何从理论上阐述实践的批判反思的整个过程。这是布尔迪厄在他的对阿尔及利亚的田野调查中就已经开始提出的一个关键问题。

与倾向特征。布尔迪厄(1990i：382)写道：

> 那些没有分析过做一个科学家或者一个学者到底意味着什么的科学家或学者，那些没有分析过拥有一种学者的视野、并发现它的本质特征到底意味着什么的科学家与学者，会把他们的学术视野投入行动者的心理之中。

布尔迪厄认为，可能被一个研究者带入其对实践之理解的最基本的偏见的根源，存在于学术视野之中。它是“社会科学中最严重的认识论的谬误”，布尔迪厄的大部分文章就是针对这种谬误的(特别参见Bourdieu 1990h：14)。他引用乔姆斯基的语言学、列维－斯特劳斯对神话与亲属关系的结构主义分析以及理性行动理论，作为非反思性的观点的主要例子，它们都以自己的方式缺乏对于行动者的实际理解。[1]他们都通过把人类行动描述为要么是机构的反映，要么是个体的内在理性能力的反映，而把能动性还原为知识分子实践的一种镜像。但是，对布尔迪厄来说，能动性是实践性的、倾向性的，一种充分地反思性的实践社会学必须同时提供关于理论实践的理论，以及关于日常实践的理论。

在布尔迪厄看来，知识分子倾向于把模型与现实相混淆——即使他们对社会世界采取了极为不同的认知姿态与社会姿态——的原因是什么？布尔迪厄的回答是：知识分子被自己的专业意识形态所蒙蔽，这种专业意识形态强调普遍性、中立性与客观性。这些理想事实上代表为了知识的承认而展开的斗争中的利益与武器。在社会科学家那里，对客观性的要求或对社会世界的“最佳解释”的要求，代表了把所有其他观点相对化的尝试。社会科学家与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为了拥有

[1] 布尔迪厄(1990i：382)写道：在乔姆斯基的研究活动中，“好像普通人都是语法学家似的”。

“绝对的观点”（absolute viewpoint）而斗争，为了获得相对其他观点的优先权而斗争（Bourdieu 1987b：44—45）。因此，由于他们不能认识到他们的知识实践受他们自己的文化场域的竞争逻辑塑造的程度，而不能认识自己的实践的功利性特征。

这个反思过程导致布尔迪厄得到这样的结论：学术的视野包含认识论的至高无上性（epistemological sovereignty）。学术的视野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因为它包含对权力的追求。布尔迪厄（1988b：xiii）写道，这种“认知意志”（will to know）的动力来自“一种特殊的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客观性的要求由“对研究对象采取绝对的观点，……接受一种对知识世界的知识权力”所构成（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11；Wacquant 1989：32）。布尔迪厄评论说，这个诱惑是“社会学家的姿态中固有的”。布尔迪厄还肯定这是大学世界的“深层真理”。在相当罕见的自我表白中，他甚至承认这个动机曾经支配过他自己的行为（Wacquant 1989：3）。布尔迪厄认为，一个充分反思的过程要求研究者“把客观化的意图本身客观化”，要对知识分子那种要达到完全客观的、无偏见的观点的雄心本身进行批判性的考察——特别是当它代表一种支配其他观点的武器的时候。这样，布尔迪厄想要把认识论至上性的要求相对化，在今天，这种要求是作为支配性的真理表述而出现的，但是，实际上却毫无例外地体现了特殊的利益。

总之，布尔迪厄对于学术的推论模式的反思性的重视，意味着“理论化或理性化思考的倾向的社会基础”是双重的：首先是与实践的分离以便获得一种关于实践的“外在的与优越的观点”；其次是知识分子的“错误意识”或“坏信念”，这些知识分子拒绝承认自己追求关于对象是什么的客观观点的行为存在利益驱动，这个利益驱动就是：通过贬低别人的观点而积累符号资本。反思性为社会学家提供了与塑造他或她的社会学实践的这两种因素的批判的距离。

这三个反思步骤综合起来勾勒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自我批评的研究规划，以便生产更加客观的社会科学。但是，布尔迪厄（1990f）并不相信

一个充分反思性的观点是能够达到的，也不相信批判理论家能够充分理解其科学实践的功利性特征及其可能产生的结果。任何外在于斗争场域的“绝对”立场都是不可能达到的。布尔迪厄(1988b：6)写道：“任何对象都意味着这样一个观点，即使它是带着放弃一个人的立场的意图而产生出来的。”反思性只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实现。[1]在布尔迪厄看来，逃避被社会决定的命运的努力不可能完全实现，因为反思的实践本身也发生在社会地决定的环境中。由于我们的所有实践，包括知识实践，都是社会地决定的，所以，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的社会学的承诺是：通过揭露知识实践的潜在社会条件，我们可望部分地免于意识形态的干扰而进入对实际的社会生活的更加客观的把握。

这样，对布尔迪厄而言，反思性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达到客观性而同时又不陷入客观主义。使得一个超越的观察者的立场成为可能的社会与知识条件是什么？这种“旁观者”的姿态对于把人类实践对象化的努力产生的效果是什么？关于所有人类实践——包括知识实践——的总体性科学只有通过一种对科学实践本身的反思性回归才能获得。要想把知识的实践从专业意识形态转化为科学，惟一的途径是反思性地研究我们把社会世界对象化的努力本身。

因此，布尔迪厄的反思性首先且最重要的是对科学实践的一种场域分析，它并不集中于个体研究者个人。[2]布尔迪厄强调的是社会学家在为了学术承认而斗争的场域中的位置。对布尔迪厄来说，反思性意味着把应用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那种批判性考察同样应用于对观察者的位置的分析。布尔迪厄并不把自己的反思性理论化为一种暴露个人偏见

---

[1] 这促使布尔迪厄批评那种通过简单地提供一种导论性的声明(它被用来辨明一个人的思想的基础)解决问题的尝试。布尔迪厄认为，这种技术的问题是，它给人这样的印象：偏见的问题已经解决，随后的分析可以顺利进行而不再被质疑。但是，布尔迪厄坚持认为，反思性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它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把自己的视点当作客观的视点强加于人的倾向永远存在，因此，必须持续地保持警惕，不要让科学场域中竞争的专业利益的逻辑歪曲对另外一个场域中的斗争的分析。

[2] 在这方面，布尔迪厄的视点不同于古尔德纳(Gouldner 1970)的视点。古尔德纳的反思性力图把作为个人的科学家的视点加以定位，而布尔迪厄则把个人癖好的方面从自己的分析中排除了出去。

（这种个人偏见可以通过第一人称表达出来）的东西。[1]

尽管如此，布尔迪厄还是相信，提高对行动的社会决定因素的意识能够增强摆脱无知的可能性，就此而言，社会学的反思性仍然具有一种治疗功能。[2]在他对反思社会学的追寻中，我们发现，布尔迪厄的元理论的与方法论的关切通过一种关键的方式与他对实质性研究领域的选择相交叉。实际上，布尔迪厄的大部分经验研究是对布尔迪厄自己所身处的法国教育系统与知识界的研究。他评论说，这些实质性的领域比别的领域更能够使人深查知识分子文化的基本信念，即影响知识分子实践的基本的、被认为理所当然的概念范畴。

> 如果关于教育系统与知识界的社会学对我而言是基本的，那是因为通过引入——甚至比所有的反思形式更直接地——那些界定并事先决定何为可以理解的、何为已经理解的非反思的思想，也有助于对知识主体的理解。（Bourdieu 1982：10）

这样，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我们发现，布尔迪厄对自我批判的客观社会科学的寻求与他自己在法国知识界谋职的个人的与位置的利益交叉在一起。[3]反思性对布尔迪厄而言是一种知识场域的策略。

---

[1] 在这方面，布尔迪厄继承了法国知识界的传统。或许因为在美国的社会科学传统中，社会心理学与心理分析的势力要比在法国强大，所以，知识风尚中的“个人的”表达比在大西洋的这边受到了更多的强调。如果在美国，“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这个说法是伴随着特定的对社会思想的批判传统的，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个人的就是位置的”（the personal is positional）这种说法，把布尔迪厄与他们加以对比（虽然有些过于简单化）。

[2] 布尔迪厄研究的这个方面已经受到一些批评家的注意。霍夫曼（Hoffman 1986）把《区隔》看作既是一部科学著作，也是布尔迪厄的个人精神发泄行为。

[3] 这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布尔迪厄的反思社会学实践如何与特定的实质性研究领域——特别是对布尔迪厄有特别重要的职业与政治利益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要是布尔迪厄的研究关注的不是像解放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和扩展教育机会这些在法国具有政治意义的研究领域，或许这个（反思性的）视点就显得不那么关系重大了？有人怀疑对于反思性视点的需要在那些远离社会学家的领域以及（社会学家的）职业利益与政治争论不那么激烈的实质性领域，可能也不那么迫切。

布尔迪厄本人研究中的反思性

布尔迪厄主张，社会科学的反思实践必须扩展到所有的研究领域。在布尔迪厄自己的研究(包括早期的与近期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了这种信号——既在方法上，也在实质性研究领域的选择上。虽然布尔迪厄总是维持着对社会科学实践的批判姿态，但是，他对反思性的回归到底需要些什么这个问题的理解是在时间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从实质性的意义上说，布尔迪厄在60年代早期就把自己的研究重点从阿尔及利亚转向自己从业的法国大学与法国知识界。从概念上看，我们发现反思性的视角集中体现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场域”概念中，而近来则体现在对社会学的关注(sociological gaze)的越来越强烈的关心。在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布尔迪厄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反思的方面已明显成为布尔迪厄社会学的核心特征(参见 Bourdieu 1982，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

在布尔迪厄早期关于阿尔及利亚农民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一种反思的观点出现在他对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批评中。布尔迪厄(1986b)呼吁从“规则”转向“策略”，明显强调形式化的结构主义模型在解释实践时的局限性。虽然农民的行为是有模式、有规则的，但却不是像结构主义者认为的那样完全合乎规范或规则的。在结构主义的模型与农民实践的实际现实之间存在大量滑动。这个关键性的观察引导布尔迪厄发展出作为策略的行为的观念，并把实践的理论模型与实际的实践之间的差异理论化。这为布尔迪厄尖锐批评“学究的谬误”(scholastic fallacy)设置了平台。因此，布尔迪厄对于反思性的理解是根植于他早期的实践理论阐释的。习性的概念已经在实际的知识与形式化的知识之间作出了清楚的区别，布尔迪厄在对于学究式的知识进行批评的时候经常就依赖这个概念。后来，他概括了自己的立场，并在

下面的一段话中指出了研究的结果：

> 对理论观点（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实践观点（practical point of view）以及它们之间的重大差异的理论反思，引发了实践理论的变化，这种变化并不是纯粹思辨性的，它伴随着研究的实际操作程序的重大变化，也带来实实在在的科学方面的好处。比如，我们被引向关注仪式化实践（ritual practice）的特征，结构主义的逻辑中心主义倾向于忽视这种特征或者把它当作没有意义的、神话代数的无关紧要的东西；我们还特别被引向关注多方面、没有被决定的或不确定的现实，更不用说去关注部分的矛盾（partial contradictions）、充满了整个系统的模糊性，去解释它的灵活性、开放性，简言之，所有使它变成“实践的”东西，并因此而逐渐做到代价最小地（特别是依据逻辑的探究）回应日常生活与日常实践中的突发事变。（Bourdieu 1990i：384）

当布尔迪厄（1977b）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他的家乡法国南部的农民的婚姻策略的时候，他对结构主义的实践模型的怀疑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布尔迪厄回顾性地指出，他有意识地开始自己对法国农民婚姻实践的研究，把它作为一种“认识论的试验”，在这种试验中，他把自己用于阿尔及利亚农民的亲属关系研究的同一种方法用于他青年时候的社会世界（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67）。他想“观察一下把我自己的故乡世界具体化将会产生的结果”（163）。这个研究试验——它发现法国的农民婚姻模式是物质与符号交换的复杂策略——强化了他对形式化结构模型在解释社会世界方面的适用性的怀疑。

但是，只有当布尔迪厄把他注意力转向法国的大学的时候，也就是60年代中期，我们才更加充分地理解布尔迪厄的反思性关注的实质性焦点。在布尔迪厄对法国教育与知识分子的研究中，反思性所要强调的是：对功利性与非功利性之间的二元对立（他在早期的人类学研究中

就批评并丢弃了它)的思考在布尔迪厄的知识实践分析中已经变得更加关键。反思性意味着把知识分子实践看作是利益定向的，而不是绝对地由客观的观念或价值驱动的。知识分子场域的概念强调的就是布尔迪厄的分析的这个利益方面。

对布尔迪厄(1988b：xii—xiii)来说，法国学术界代表另外一种认识论的实验，因为它是科学实践以及布尔迪厄自己的职业生涯的聚焦之处。布尔迪厄显然相信，他可以研究学术场域的结构与动力学而又不陷入一种由于置身场域内部而导致的偏袒的立场，也不采取一种对场域的唯智主义态度。但是，布尔迪厄在使自己超越科学与知识名望场域内的竞争斗争、以便客观地描述法国学术界方面取得了多大成功？让我们看一看他在《学术人》(1988b)中对法国大学场域的最具有反思性的研究。

作为其不屈不挠的批判精神的反映，布尔迪厄在《学术人》第一章通过下面的警告提出了这个问题：一个科学地建构的、对一个熟悉的社会世界的解释，可能被非反思地解读与阐释为局内人的搬弄是非、侮辱诽谤、好谈轶事、直觉或仅仅从个人爱好出发的发泄情感。布尔迪厄对这个问题的特别的理论阐释产生了下列令人遗憾的结果，即指责读者不承认作者有责任心而进行歪曲性地解读。这使布尔迪厄蒙受损害，因为当(《学术人》的)导言解释他如何计划避免障碍的时候，这个导言应该更可能引发读者的信任，而布尔迪厄的警告则恰好相反，它引发读者的怀疑与防卫。

但是，尽管如此，布尔迪厄还是通过呼吁社会科学的反思性生产以及反思性阅读而提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社会学家生活并工作在一个文化消费以及文化生产的场域，我们阅读一部作品的方式是由我们在知识场域中的位置塑造的。布尔迪厄希望对他的作品进行科学的阅读，这种阅读不把他的分析性建构(analytical construct)还原为特定的个体的与争论的标签，或还原为政治立场。

《学术人》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学术界无聊的闲言碎语、搬弄是

非、好谈趣闻轶事、个人印象以及自我吹嘘。布尔迪厄提醒读者：这是一种系统地建构的对法国学术界的分析，而不是一种印象性的描述。在这方面，布尔迪厄是极为成功的。这一研究提供了一个对熟悉的职业世界的结构性描述，这个世界中的个体的社会身份“淹没于”对场域位置的关系性分析中。即使在使用法国学术界的名字来作为具体例子的时候，布尔迪厄也是警惕的：努力让读者的注意力集中于结构性的辩论。[1]但是，尽管如此，熟悉法国学术界的读者还是能够在布尔迪厄勾勒的知识分子肖像中辨认出特定的个体。例如，为了说明具有大量学术资本(academic capital)而较少知识资本(intellectual capital)的理想型教授(ideal-type professor)，布尔迪厄(1988b：84—85)附了一个带有大量传记细节的访探摘要，使一位著名的教授——其特征是“没有用”、他的工作是“可怜的”，他是一个“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说”的人——得以非常容易地被他的同行辨认出来。布尔迪厄偶尔也会控制不住自己，指名道姓尖锐地攻击他的某个竞争对手，比如雷蒙·布东，虽然这种情况非常少见(同上，16—17)。

布尔迪厄告诉我们，不加反思地把知识分子场域客观化，这样的努力相当于符号权力与暴力的策略，通过这种策略，研究者以科学的名义尝试“把自己当作是一个法官的法官”(15)。但是，就在前面几页，他把古尔德纳(Gouldner 1957)、克拉克(Clark 1963a，1963b)、古斯塔德(Gustad 1966)等人勾勒的理想类型的“准学术的分类学”贬低为“准—科学的符号/象征暴力形式”。布尔迪厄(1988b：12)认为，这种理想类型通过把注意力指向特定个体的特定实践活动而不是指向关系场域——这些个体只在这种关系场域中才获得了真正的、作为社会学家的重要性——所发挥的是“作为人身攻击的概念”(concept-as-insult)的作用。它们并没有充分地与被广泛接受的日常实践智慧决裂。

---

[1] 英文译本在一个场域图中展示了(《学术人》中所分析的法国知识分子的)全名，而法文版则只用了第一个字母。

现在，我们有可能承认布尔迪厄的观点，即某些理想类型的建构，比如“满天飞的社会学家”（jet sociologist，那些花在会议中的时间远远超过课堂上的教授），可以发挥委婉形式的人身攻击的功能，这种人身攻击形式最好是留给戴维·洛奇（David Lodge）的小说而不是出现在社会学家的分析中。但是，我们同样有可能发现，通过把竞争对手贬低为不那么“科学”（这无疑相当于一种符号暴力的形式），布尔迪厄自己仍然被锁定在竞争中以便强化自己在科学场域中的地位。[1]而且，布尔迪厄自己的《学术人》一书并不是价值中立的标签，在他眼中，比之于那些生产新知识的研究者的知识活动形式，它清楚地代表不那么合法的知识活动形式。因此，布尔迪厄自己只是部分地避免了学术区分的竞争逻辑。

反思性作为一种提高对塑造一个人的知识研究工作的社会世界力量的自我意识的技术，应该首先被用于针对研究者自己，布尔迪厄的这个主张，与他对绝大多数社会学家的著作的尖锐批判之间存在着不那么和谐的关系。[2]他很少分析自己在知识分子场域中的位置或者分析那些可能塑造甚至限制他自己眼界的因素。[3]相反，他的批判眼光是对准作为整体的知识分子场域或其中的某些位置的。他很少在他的分析开始前说明自己的特定位置与特定视点的局限性。看起来好像是：布尔迪厄相信通过表明别人的观点如何产生于在竞争场域中与利益相关的位置而对别人的观点进行批判，他自己就能够达到摆脱塑造他的研究工作的场域的决定作用的自由状态。我相信这只有部分的正确性。他对对方立

[1] 除此之外，在布尔迪厄对法国学术界的分析与古尔德纳关于学术的“本地人”和学术的“全球主义者”的类型学之间，存在着差异，也存在紧密联系，只是布尔迪厄自己不承认这种联系。

[2] 布尔迪厄（28—29）认为他对别的社会学家的批评是正当的，这种批评产生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意图”本身，只有当这种批评是“以一种更加严格的、对于与其生产的条件相伴的局限性的科学知识的名义进行”的时候，这种意图才是“正当的”。这里，布尔迪厄把自己的研究和批判方式混同于他的理想的—知识兴趣（ideal-knowledge interests），后者被认为应该是科学研究的惟一动力。

[3] 的确，布尔迪厄看不起这样的努力，认为这些努力把反思的阶段限于一部著作的导言部分，并常常成为不过是自恋的表演而已。

场的尖锐的批判风格以及他那种把自己的著作从其他人的著作中分离出来的冲动，最后留下的依然是本质上被法国知识分子与知识传统（参见本书第二章）塑造的研究文本。

这是否意味着布尔迪厄的反思性的分析与他自己的方法论规定相矛盾？ 是否说到底布尔迪厄还是不能摆脱他力图加以分析的法国学术体系的价值与传统（Jenkins 1989：643）？ 在我看来，这个批评指出了布尔迪厄勾画的事业的局限性，却不能取消其资格。

从一个严格的逻辑立场来看，布尔迪厄对发现某种程度的摆脱所有知识实践的功利性特征的可能性的肯定似乎是自相矛盾的。 因为所有行为的功利性的特征是从一开始就被（布尔迪厄本人）承认的，奇怪的是布尔迪厄却试图摆脱这个特征。 但是，在某些段落，他好像认为客观性的理想就在于摆脱所有的利益；然而，在另外的段落，他又强调这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摆脱知识实践的功利性的观点代表了布尔迪厄尖锐批评的客观主义的幻觉。 他似乎相信反思的实践可以帮助研究者摆脱扭曲科学知识的单纯理想化利益追求（the singular pursuit of ideal interests）的特定经济、文化、社会利益，而不是力图摆脱所有的知识分子利益。 在这方面，布尔迪厄的反思分析是非常成功的。

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的社会学还提供了对过去四十年中某些著名法国批判性思想家的机构化基础的洞见。 布尔迪厄对法国学术界的场域分析有助于法国之外的读者的理解：许多具有国际知名度的法国知识分子，比如阿尔都塞、巴尔特、德勒兹、福柯、德里达等，事实上都不是处于法国学术权力的顶峰。 虽然他们也许在国内与国际上发挥着重大的符号/影响力与学术影响力，但是从国家的机构资源的角度说，他们实际上是非常边缘化的（Bourdieu 1988b：xviii）。 而且，布尔迪厄认为，他的场域分析表明：就法国学术界的机构化权力而言，表现于当代法国思想界领袖著作中的“反机构倾向”无疑根植于这些思想家的边缘化位置（Bourdieu and Wacquant 1989：13—14）。 布尔迪厄的情况也是这样，他在学术场域地图中的位置也差不多是这样。

布尔迪厄对法国知识界的场域分析还加深了我们对布尔迪厄自己的知识策略的理解。他的反思性强调部分产生于他作为一个巴黎知识等级秩序中的“旁观者”的地理、社会与文化出身。布尔迪厄不是作为文化继承人，而是作为向上运动的文化积聚者进入法国知识界的。因此，他感到有责任有自我意识地考察他进入的但不是继承的新世界的假设，他对摒弃日常假设以及通过严格控制其语义内容仔细建构科学话语的需要的强调，与他的文化旁观者而不是文化继承人的经验非常吻合。

布尔迪厄的反思性还产生于他作为一个科学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傲慢自大形象的否定性反映——布尔迪厄发现这种傲慢自大在法国非常普遍。布尔迪厄把这种傲慢自大等同于巴黎知识分子的思想风格——喜欢作普遍性判断、藐视材料的收集与分析等世俗事务。[1]但是，布尔迪厄自己也把那种在巴黎高师继承的独特的批判风格内化了。他用这种批判风格有力地批判法国的高雅文化传统以及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反思性可以看作是布尔迪厄在法国知识场域突出自己的独特位置、推进一种独特的知识探究模式的策略性努力。对布尔迪厄而言，它已经成为一种在它寻求超越的场域中进行斗争的工具。这样，布尔迪厄的反思性就与他自己的职业轨迹紧密交叉。

[1] 在描述自己在法国大学的经验的时候，布尔迪厄(1988b：xxvi)写道：“在某种意义上显得非常独特的关于大学机构的社会学在我的研究中处于特殊地位，这无疑是因为我所感受到的特殊力量。我感到需要这种力量来理性地控制我的失望感，这是一个面对真理与价值的人所体会的失望感，他注定要献身于这种真理与价值，而不是躲避到自我毁灭的怨恨情感中去。”

第十二章

结　论

处于布尔迪厄社会学研究核心的是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各种形式的社会不平等没有遭到强有力的抵制而继续存在着？ 布尔迪厄认为答案在于文化的资源、实践与机构以何种方式发挥功能以维持不平等的社会关系。 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布尔迪厄知识规划的中心。 他对于文化如何掩盖社会权力、提供社会区分的工具的分析，是对当代文化社会学的最主要的贡献。 的确，布尔迪厄对于意识形态问题与错误意识问题的重新阐述，是他对于现代社会阶级与权力的研究的主要贡献。

发达社会中教育与文化市场的极大发展，巩固了更加精细微妙且难以觉察的文化统治机制的不断增长的作用。 在阐释他关于符号权力的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布尔迪厄对于统治模式的这个变化作出了深刻的分析。 他的著作表明：从物理的强制到更加软性的社会控制形式的变化，加固了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与合法化。 布尔迪厄关于符号暴力的政治经济学或许是帕森斯以后符号研究领域最雄心勃勃的、最重要的研究规划。 实际上，布尔迪厄是在文化领域做马克思在经济领域所做的事情：理解文化生活中权力的基本结构与权力的动力学。 他的理论语言的核心要素，比如社会与文化的再生产、文化资本、习性、场域、符号暴力等等，已经成为许多社会科学家的工作词汇的组成部分。

以比较的视角看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

在许多方面，布尔迪厄的雄心勃勃的研究规划横跨并综合了文化理

论的四个传统以及它们的主要理论家，伍斯诺等人(Wuthnow et al 1984)认为这四个传统决定性地塑造了当代文化的研究方法。布尔迪厄像伯格(Berger 1967, Berger and Luckmann 1966)一样吸收了现象学的成果，像道格拉斯(Douglas 1966, 1970, 1982)一样吸收了文化人类学的传统、特别是涂尔干的影响；像福柯(Foucault 1972, 1978a, 1980)那样吸收了法国新结构主义的传统；像哈贝马斯(Habermas 1970, 1971, 1973)那样吸收了批判传统。假如我们说布尔迪厄提供了一种(对上述传统的)综合，这或许是冒昧的，但是，他的研究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却的确综合了这些不同的传统的核心元素。与福柯一样，布尔迪厄研究了与权力密切关联的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深层结构；与哈贝马斯一样，布尔迪厄批判性地研究了被广泛接受的文化分类，他与哈贝马斯一样关注文化科学的认识论地位；像道格拉斯一样，他依据社会分层的范畴来理解文化，文化的区分委婉地表达着潜在的社会区分；与伯格一样，布尔迪厄认为宏观结构同样是行动者社会建构的对象。

在更普遍的意义上说，布尔迪厄对于在机构层面上研究文化这个当代趋势作出了贡献(Wuthnow 1987)。虽然他反对把人类行为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领域——与思想、信念、观念相关的主观领域，以及与具体的、可以观察到的行为相关的客观领域。但是，他的整个努力被视作从对于文化的主观研究转向更加机构化的研究这个变化的组成部分。他集中关注的是分类与实践的范畴，而不是强调对于行为的详细描述或对于行动者的情绪与意向的移情理解(如同现象学传统所做的那样)。他对于机构的强调尤其体现在场域概念中，这个概念要求我们关注行动者的位置、机构、资源以及它们在文化的生产、传播、消费中的斗争。

与其他当代的重要文化理论家相比，只有布尔迪厄力图把抽象的理论——反映了他对大陆哲学遗产的继承——与经验研究以及对于方法的清晰的反思结合起来。他同时在抽象与具体两个方向上进行发展——这是当代其他社会科学家中还没有人采用的方法。这在社会科学——

特别是社会学——由于不断加剧的专业化(在方法、理论以及研究对象等方面)而变得越来越碎片化和内部不断分化的时代，是非常令人注目的(Swartz 1988)。

对于那些在社会科学领域工作的人来说，布尔迪厄是一种灵感之源，因为他表明社会理论与经验研究并非不可调和，而沉浸在材料里也并不一定丧失理论的基础，相反会巩固理论的基础。他对于阿尔及利亚农民家庭的人类学研究(《实践理论大纲》1977c，《实践的逻辑》1990h)、对于当代法国消费与生活方式的研究(《区隔》1984a)、对于法国文学的研究(《艺术的法则》1992)、对于法国高等教育的研究(《再生产》，Bourdieu and Passeron 1977，《学术人》1988b，《国家精英》1989c)——这里提到的都是最全面、最著名的一些著作——都是通过严密的社会理论进行的经验研究。其中的每部作品无疑都是相关领域的未来研究的基点。

作为权力的文化

在布尔迪厄的所有理论概念中，“文化资本”的概念呼唤我们关注市场社会中文化资源的权力方面，它无疑因此而受到了最广泛的接受。这个概念是非常有力的，它激发了布尔迪厄对教育社会学、文化社会学以及分层社会学的出色研究。通过对于语言、知识、文化风格塑造人际互动的细致而无所不在的方式的关注，这个概念促进了我们对于把社会背景效应转化为不平等的学校教育成绩以及随后的就业机会的过程的理解。在教育社会学中，这个概念使得人们能够细致地研究孩子从家庭中继承下来、并随后带到学校的文化资源如何影响学术成就(DiMaggio 1982；Lareau 1989)。在艺术社会学中，这个概念还被有效地用以表明，家庭与学校的文化社会化如何塑造了对艺术的行为与态度(DiMaggio 1977；DiMaggio and Useem 1978，1982；Zolberg 1989)。

文化资本的概念位于西方思想中两种激烈对抗的知识传统的中间点。一方面，通过把文化等同于资本的一种形式，布尔迪厄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认为文化是一种具有自主性的权力资源，它不能被理解为经济因素的上层建筑衍生物；另一方面，布尔迪厄也突破了把经典教条的普遍价值神圣化的人文主义传统。他认为观念与审美价值体现了生产这些价值的人的实际利益。这样，布尔迪厄通过作为一种权力形式的文化的理论，把这两个不同的传统联系起来。

布尔迪厄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在现代社会中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对立作为一种基本的权力区分机制发挥着作用。它区分了那些把对权力的诉求建立在经济资源基础上的精英与以及那些更多地依赖于文化资源的精英。特别是在《区隔》一书中，我们发现，布尔迪厄努力依据其相关的不同资本类型的构成以及他们的相应的生活方式，对阶级与阶级内部的不同群体进行理论阐释与经验描述，这种努力是一种大胆的、富有原创性的分层研究方法。依据其资本的数量与构成以及在场域中的社会轨迹来阐述社会阶级，体现出了一种多维度的、动态的关于阶级等级的观点，这种观点不同于主流的身份获得研究。

在一个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发达工业社会的理论显得不那么令人信服的时代，布尔迪厄提供了一种颇有吸引力的替代理论，因为他关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在数量与重要性上都不断增长的知识职业与服务性职业。但与后工业社会理论家，例如丹尼尔·贝尔(Bell 1973，1988)不同，布尔迪厄表明这些新的文化实践如何体现了新的统治形式与社会利益。而且，布尔迪厄关于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分配的理论，以及文化资本通过学校教育而代代相传的理论，已经生产出关于现代社会中精英分化的强有力的洞见：扩大的英才教育的受益者不再是资本家，而是具有文化资本的专业人员家庭的孩子。

布尔迪厄对于文化资源调节阶级差异——特别是在趣味与生活方式的领域——的精细研究，与后现代的消费文化理论是尖锐对立的。后者认为，在后工业社会的消费模式中，阶级的差异正在淡化(Baudril-

lard 1981)。 布尔迪厄认为，尽管有大众消费市场的兴起，文化实践在法国依然是潜在的阶级区分的标志。 布尔迪厄的研究引起了不同国家的比较研究。 例如在美国，有人认为消费者选择的差异更多的是收入差异的结果而不是布尔迪厄所说的是社会地位、荣誉的结果，而且阶级—文化的差异类型更可能是上层与下层群体的特征，而不是中产阶级群体的特征，后者的消费选择更直接地受到大众市场的标准化的影响。

在市场机制渗透到现代生活所有领域的发达社会，作为一种资本形式的文化对于分析社会分化过程是一种有用的概念化的工具。 但是在市场机制还不十分发达的国家，这个概念似乎就不那么有用了。 在那些与法国相比高雅文化传统不那么强大、而文化差异十分显著的社会，这个概念的流行就不那么令人乐观了。 此外，这个概念暗示着一种关于能动性的观念，它把行动者归结为老谋深算的投资者，不管他们处于社会分层秩序的哪个位置，他们的动力都是把自己的投资机会最大化。作为资本的文化(culture-as-capital)这个隐喻在解释媒体、艺术、学术等行业的时候特别有用，在这里，个体寻求把自己的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回报，这对于解释那些为孩子寻求有价值的教育类型的家庭也特别有用，但是对于分析没有多少权力资源的群体就不那么有用了。

当布尔迪厄分析文化实践如何采取符号价值的形式并掩盖其在把社会不平等合法化时的作用的时候，他能够以特别深刻的洞见拓展并重构韦伯的合法化理论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 但是，他对于权力的合法化方面(尤其是其间接的、隐蔽的效果)的强调使得他比较少地分析纯粹的经济权力与武力强制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没有消失的重要性。 他对于误识的强调可能高估了错误意识在使被统治者继续处于被统治地位方面的作用。 个体与群体常常清楚地看到权力关系的任意性，但是缺乏改变它们的必要资源。 布尔迪厄对知识分子在为等级社会提供认知分类时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深刻分析也可能高估了知识分子在某些现代社会中在统治其他社会精英方面的重要性。

社会变迁

布尔迪厄是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早期的与主要的奠基者之一，但是他对于文化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的强调也留下了许多问题。虽然他不是僵化的决定论者(像许多批评者指责的那样)，但是他的概念框架显然更加关注连续性的模式而不是变迁的模式。习性、文化资本以及场域的概念强调的是维护从过去延续下来的结构的倾向。习性的特点显然是通过习惯的方式处理新的情况，它利用资本积累更多的资本；场域使社会地位的重大安排成为可能，也使其连续性成为可能。布尔迪厄的框架并不鼓励研究者去寻求变迁的形式。变迁的根源在他的著作中时有暗示，但是从来没有成为关于变迁的动力学的令人信服的阐释。抵制与变迁的理论上的一个可能性存在于习性的期望与场域提供的位置之间的错位。但是，使期望落空的状况如何转化为有效的变化动力依然需要进一步阐明。

习　性

布尔迪厄对于当代社会理论的主要贡献之一，是提出了解决能动性与结构之间关系的理论。他认为，结构再生产着制约并起着制约的作用，这一观念与行动者创造结构的观念并不是不可协调的，为此，布尔迪厄实际上成为最早把行动者重新带入社会分层的结构模型的后结构主义社会学家之一。布尔迪厄所说的行动者是策略家——虽然他首先把策略理解为一种心照不宣的利益计算与差异寻求，而非有意识的选择。他的习性概念既为阐述能动性/结构问题提供了纲领性的研究程序，也指向了一种理想型的行动模式。这个研究程序来自这样的理论：情境

所提供的机会或限制与延续的倾向之间的相遇产生了行动，这种延续的倾向反映着被个体带入情景之中的过去经验、传统以及习性的社会化。对于个体行为的适当解释需要把人类行为的可以观察到的规则与个体和群体的表征结合起来。这个纲领性的程序通过声称学术研究的微观层次与宏观层次、客观层次与主观层次不应该被理论的或方法论的专门化形式加以分离而向学院化的社会学提出了挑战。布尔迪厄认为，理论与经验研究必须同时在这两个层次上进行，而不是像今天经常见到的那样把注意力限于一种材料类型或分析层次。

虽然很难经验性地进行具体阐述，但是习性同时还指向一种理想的行为类型，即习惯化的、实践性的、心照不宣的、倾向性的，同时又是结构化的行为类型。文化被理论化为遵循共同的主导模式的实践，这种模式囊括了行为的认知方面、物质方面以及态度方面。布尔迪厄的一些最有启发性的分析指出了这样的共同倾向，正如法国大学教师的贵族式禁欲主义的例子所表明的，这些教师在娱乐、运动、身体呵护、饮食等方面表现出有意养成的节制。虽然我在第五章批评布尔迪厄没有痛快地具体阐明在什么情况下这些方面中的哪一个是更重要的，但是我依然相信，布尔迪厄对于个人行动的理解比简化的理性行动者或结构模型更接近于概括了人类行动的复杂性的理论。后者把人类行动归因于有算计的选择和外部的制约。但是，布尔迪厄还批评诠释学与现象学的行动研究方法没有能够考虑与更广泛的结构制约有关的因素。布尔迪厄的这一观点，即行为是由特定情境中的机会和制约与行动者的倾向（即过去的经验、传统以及习惯的积淀）之间的互动产生的，似乎构成了对这些二中择一的观念（alternative views）的重大超越。

虽然习性的概念关注竞争性的社会过程中自我选择的动力学，但是客观的机会内化为期望以及主观的志向适应客观机会的过程，与该概念所暗示的过程相比，常常是更为复杂甚至矛盾的过程。而且，无论是对外部制约的适应，还是寻求区别于竞争者，在布尔迪厄的概念中，这两种不同的能动性类型之间的关系只是并列在一起，布尔迪厄并没有清

楚地说明它们的确切关系。布尔迪厄强调哪种类型的能动性，这常常取决于他所研究的问题，而没有说明其中一种发挥更主要作用的条件。

场　域

如果说习性的概念为阐述与研究结构与能动性的关系提供了有价值的方向，那么，场域的概念则为研究更加机构化层面上的文化活动提供了帮助。布尔迪厄的场域分析框架有助于理解文化在机构层面上调节阶级关系的方式。它通过对于各种形式的文化资本的生产、传播、消费领域的辨识，提供了关于文化的政治经济学。在布尔迪厄的所有概念中，这个概念是目前被理解得最不够、但对未来的社会学研究而言，又是最有前途的概念。

场域概念建立在布尔迪厄以下认识的基础上：各种社会单元在相互对立中发展自己的同一性，而对于它们的社会学特点的适当理解要求把它们置于这种对立力量组成的更大的领域中。这个概念指向一个冲突与斗争的领域——这个领域是与特定的有价值的资源类型的出现同时发展的，同时表明随着场域自主性的获得把个人与群体卷入到对于有价值的文化资源的竞争的那种结构与过程，如何产生了社会封闭的形式。场域的概念激励研究者们去寻找一个特定领域中的冲突的根源，把这个冲突与更大的阶级与权力的领域联系起来，并表明对立的派别实际上共享、却又很少承认的东西是什么。

对于文化分析而言，布尔迪厄界定场域的某些结构特征的努力，赋予场域概念以比市场概念更多的理论前景。场域的所指要多于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场域精确地阐释了权力关系与等级关系。结构极性(structural polarities)观念、等级化的位置的观念、对于资源的竞争的观念、权威与异端之间的斗争的观念以及竞争者之间共享的“基本信念”的观念，都阐明了产生场域并有助于形成其自主性与功能的内在结

构化机制。 它们提供了比市场概念更加丰富的对于生产者—消费者关系的解释。

文化场域的相对自主的观念同时超越了工具主义与结构主义关于现代社会中社会阶级、市场以及政府如何塑造文化生活，特别是教育的观点。 通过关注随专家群体发展、传播与控制自己的特定身份文化而出现的内部的结构化机制，相对自主性的概念有效地强调了特定的机构与专家利益是如何出现并与外部的要求相冲突的。 在这里，布尔迪厄的思考与关于国家的相对自主性的讨论（参见 Block 1977；Skocpol 1979：24—32）中提出的问题相交叉。 布尔迪厄对这个论争的贡献是要求人们关注文化的、专业的以及结构的利益，正是这些利益赋予了中央机构——比如教育部门或国家——以独立于资本主义的阶级利益的某种自主性。

相对自主性的概念使布尔迪厄赋予文化场域的内部分析以优先性。但布尔迪厄没有解决作为危机与变迁的一种可能的资源的场域之间的冲突这个重要问题。 他认为艺术作品或学校课程不但反映了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利益，而且也反映了艺术家与教育工作者中间的等级与冲突，这有效地抵制了阶级的还原论。 但是，对于场域的内部结构机制的强调，也导致对于文化场域与其外部要求之间冲突的潜在根源的忽视。

布尔迪厄对知识分子场域的分析表明了知识分子如何被定位于一个竞争性的舞台中，这个竞争舞台有自己的结构与动力学，这种结构与动力学既塑造了知识分子的知识行为，也塑造了他们的政治行为。 场域分析的用途在于提示我们对于知识分子行为的影响方面不能完全通过社会阶级的背景或地位或者知识分子在机构中的位置加以充分把握。 相反，场域分析要求研究者在探索为了争夺稀缺资源以及符号承认——它们对于知识分子的环境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进行的斗争的机制的时候，考察所有这些层面。 在知识分子研究与文化生活研究中，这种重点的转移可以在弗里茨·林格（Ringer 1992）的德国与法国思想史的比较研究中发现。

文化场域的观念通过提出调节概念而避免了以往的那种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的争论，这种调节概念从社会角度讲立足于知识分子的生活，但是又避免了阶级还原论。对知识分子的场域分析还表明，新阶级的理论试图错误地依据阶级地位来评估受高等教育群体的政治意义。场域分析暗示，通过把知识分子定位于职业环境中，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政治行为。但是，当个体的观念与艺术的风格被归结为其场域位置的时候，还原论的问题没有解决，只是以场域还原论的形式重新出现。布尔迪厄对于文化生产者的分析似乎没有留给生产者以超越自己的场域利益的机会。

场域分析提供了对不同类型的资本为权力与特权而展开的斗争领域的引人入胜的结构图绘，提供了描绘现代政治生活中可以调用的经济与文化资源的富有见解的方法。布尔迪厄用这种方法，对文化上富有的知识分子与经济上从属的群体之间的政治关系进行了敏锐的观察。他表明，相对于资本家而言，知识分子与工人都处于从属的地位(虽然在不同的斗争场域)，这就创造了政治联盟的基础(虽然是不稳定的)。但是，他的强有力的分析技术却没有研究这种政治联盟可能形成的社会过程。困难在于，许多群体在各自的场域中处于相同的地位，但是，并不是所有这样的群体相互之间都能结成联盟。把同源关系的观察与对政治联盟形成的解释混为一谈，这样做的风险是我在第六章中说到的“结构主义的神秘化”。布尔迪厄的场域分析需要一种研究政治行为与政治动员的实际过程的政治社会学。

反思性、科学和政治

我们已经知道，布尔迪厄反对科学实证主义而偏爱彻底的反思性的社会学实践。布尔迪厄认为，经验数据的组织与分析、常识或科学范畴的使用、专业人员的利益以及社会科学家对研究对象的态度等，都体

现了一种基本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妨碍了充分客观地把握世界。事实上，他认为，只有把研究程序与职业利益都置于批判性的反思之中，社会学家才能摆脱这些因素的扭曲性的影响。

布尔迪厄相信，通过社会学的社会学，他作为一个研究人员可以获得摆脱学术场域内部竞争的扭曲性影响而不是简单地再生产它们的重要方法。但是，在这一关于社会学的反思性实践的观念与他对于抵制再生产循环的可能资源的分析之间出现紧张关系。在他的理论构架中，抵制与变迁存在的理论上的可能性在于习性与场域的机会结构之间的错位，而不是在于反思性思维的力量。但是，布尔迪厄把一种社会学的观点阐述为人类解放的资源，这种社会学的观点似乎既强调理论的力量，同时也强调抵制现存社会秩序的结构性基础。如果变迁的资源的确来自习性与场域之间的结构性错位，那么，他可能要求社会科学或要求他自己发挥怎样的批判作用呢？从另一方面看，如果科学理性（虽然其质量不断提高）希望获得对塑造我们行为的那种社会力量有更大的控制权，那么，作为一种资本形式的文化观念似乎就有了局限性。布尔迪厄既肯定理性的力量，又肯定科学所需要的必要的物质条件。但是，这两个肯定之间存在不稳定的紧张而且不一致。

布尔迪厄相信，在被统治群体与精英的斗争中，社会科学的批判力将有助于被统治的群体。布尔迪厄把自己的社会学看作是一种反对所有形式的统治的政治干预的形式。但是，关于什么时候被统治群体将具有按照社会科学的批判性结论积极地抵制统治的倾向与能力，这一主要问题他却说得非常少，这意味着一种布尔迪厄替社会学家想象的理想化的政治角色，但是这个角色依然需要建立在真正的政治哲学的基础上。

如果说布尔迪厄本人没有能力使自己完全摆脱为了科学场域中的承认而进行的竞争性斗争，然而，他的努力依然使他与法国学术界保持非同寻常的批判距离，并对法国学术界有深刻的了解。《学术人》阐述了许多当代法国知识界的超级明星——包括巴尔特、德里达、福柯以及

布尔迪厄本人——激进批判姿态的机构化基础，他们都是法国大学系统与教师职业内部机构化权力中心的边缘化人物，并非在古尔德纳的《西方社会学面临的危机》一书出版二十多年以后，社会学家才受到强烈的挑战，被要求把他们用以对付别人的批判性的研究方法用于对自己的实践进行批判性考察。 虽然无法完全摆脱分析的或道德的两难处境，但是，布尔迪厄对于反思性的呼唤依然提出了今天的社会科学的最紧迫任务：需要获得一种更加客观的——虽然不是客观主义的——对于社会世界，包括我们自己的社会世界的把握。

参考文献

Accardo, Alain. 1983. *Initiation à la sociologie de l'illusionnisme social.* Bordeaux: Editions le Mascaret.

Accardo, Alain, and Philippe Corcuff. 1986. *La sociologie de Bourdieu: Textes choisis et commentés.* Bordeaux: Editions le Mascaret.

Alexander, Jeffrey C., Bernhard Giesen, Richard Munch, and Neil J. Smelser, eds. 1987. *The Micro-Macro Link.*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lthusser, Louis. 1970. *For Marx.* New York: Vintage Books.

Amiot, Michel. 1984. L'enseignement de la sociologie en France: Résumé et conclusions d'une enquête conduite à l'initiative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25: 281–91.

Ansart, Pierre. 1990. *Les sociologies contemporaines.*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Apple, Michael, ed. 1982. *Cultural and Economic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Essays on Class, Ideology and the Stat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Apple, Michael W., and Lois Weis. 1985. Ideology and schoo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 and culture. *Education and Society* 3: 45–63.

Aron, Raymond. 1965. *Main Currents in Sociological Thought.*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68. *La révolution introuvable.* Paris: Julliard.

———. 1983a. *The Committed Observer.* Chicago: Regnery Gateway.

———. 1983b. *Mémoires: Cinquante ans de réflexion politique.* Paris: Julliard.

Ashmore, Malcom. 1989. *The Reflexive Thesis: Wrighting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achelard, Gaston. 1980. *La formation de l'esprit scientifique: Contribution à une psychanalyse de la connaissance objective.* 11th ed. Paris: J. Vrin.

Baudelot, Christian, and Roger Establet. 1973. *L'école capitaliste en France.* Paris: François Maspéro.

Baudelot, Christian, Roger Establet, and Jacques Malemort. 1973. *La petite bourgeoisie en France.* Paris: François Maspero.

Baudrillard, Jean. 1981.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trans. Charles Levin. St Louis: Telos Press.

———. 1988a. Fatal strategies. In *Jean Baudrillard: Selected Writings*, ed. M. Poster, 185–206.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8b. The masses: The implosion of the social in the media. In *Jean Baudrillard: Selected Writings*, ed. M. Poster, 207–1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averez, Nicolas. 1993. *Raymond Aron: Un moraliste au temps des idéologies.* Paris: Flammarion.

Becker, Gary. 1964. *Human Capital.*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1976.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ell, Daniel. 1973.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76.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88. *The End of Ideolog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enda, Julien. 1927. *La trahison des clercs.* Paris: Grasset.

Bénéton, Philippe. 1975. Discours sur la genèse des inégalités dans les sociétés occidentales contemporaines. *Revue franç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 25 (1): 107–22.

Benzécri, J.-P. 1973. *L'analyse des Données: Leçons sur l'analyse factorielle . . . du Laboratoire de statistique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 VI.* Rediges et publies sur la direction du professeur J.-P. Benzécri. Vol. 1: L. Bellier et al., *La taxinomie;* vol. 2: J.-P. Benzécri et al., *L'analyse des correspondances.* Paris: Dunod.

Berger, Bennett. 1986. Taste and domin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6 May): 1445–53.

Berger, Peter. 1967. *The Sacred Canopy.*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Berger, Peter, and Thomas Luckmann. 196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Bernstein, Basil. 1971–75. *Class, Codes and Control: Theoretical Studies towards a Sociology of Language.* 3 vol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Besnard, Philippe. 1987. *L'anomie: Ses usages et ses fonctions dans la discipline sociologiqu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Block, Fred. 1977. The ruling class does not rule: Notes on the Marxist theory of state. *Socialist Revolution* 33: 6–28.

Bloom, Allan David. 1987.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How Higher Education has Failed Democracy and Impoverished the Souls of Today's Student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Bloor, David. 1976. *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Blumer, Herbert. 1969.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Boltanski, Luc. 1987. *The Making of a Class: Cadres in French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schetti, Anna. 1988. *The Intellectual Enterprise: Sartre and 'Les temps moderne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Boudon, Raymond. 1969. La crise universitaire française: Essai de diagnostic. *Annales* 24 (May–June): 738–64.

Boudon, Raymond. 1970. Mai 68: Crise ou conflit, aliénation ou anomie? *L'année sociologique* 19: 222–42.

———. 1971. Sources of student protest in France.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395 (May): 139–49.

———. 1974. *Education, Opportunity, and Social Inequality.*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 1979. *La logique du social.* Paris: Hachette.

———. 1980. *The Crisis in Sociology: Problems of Sociological Epistemolog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86. *L'idéologie: Ou l'origine des idées reçues.* Paris: Fayard.

Bourdieu, Pierre. 1962a. *The Algerians.* Boston: Beacon Press.

———. 1962b. Célibat et condition paysanne. *Etudes rurales* 5/6 (April): 32–136.

———. 1963. Sociologues des mythologies et mythologies de sociologues. *Les temps modernes* 211 (December): 998–1021.

———. 1965. The sentiment of honour in Kabyle society. In *Honour and Shame: The Values of Mediterranean Society,* ed. J. G. Peristinay, 191–241.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holson.

———. 1966. Condition de classe et position de class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 (2): 201–23.

———. 1967a. Postface. In *Architecture gothique et pensée scolastique,* ed. E. Panofsky, 136–67.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 1967b. Systems of education and systems of thought.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4 (3): 338–58.

———. 1968. Structuralism and theory of sociological knowledge. *Social Research* 35 (4): 681–706.

———. 1970. The Berber house, or the world reversed.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9 (2): 151–70.

———. 1971a. Champ du pouvoir, champ intellectuel et habitus de classe. *Scolies* 1: 7–26.

———. 1971b. Genèse et structure du champ religieux.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12 (3): 295–334.

Bourdieu, Pierre. 1971c. Intellectual field and creative project. In *Knowledge and Control: New Directions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ed. M. F. D. Young, 161–88. London: Collier-Macmillan.

———. 1971d. Le marché des biens symboliques. *L'Année Sociologique* 22: 49–126.

———. 1972. *Esquisse d'une théorie de la pratique. Précedée de trois études d'ethnologie kabyle.* Geneva: Droz.

———. 1973a. Cultural reproduc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In *Knowledge, Edu-*

c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ed. R. Brown, 71–112. London: Tavistock.
———. 1973b. The three forms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2 (1): 53–80.
———. 1974a. Avenir de classe et causalité du probable.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15 (1): 3–42.
———. 1974b. Is a sociology of action possible? In *Positivism and Sociology*, ed. A. Giddens, 101–13.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 1974c. The school as a conservative force: Scholastic and cultural inequalities. In *Contemporary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ed. J. Eggleston, 32–46. London: Methuen.
———. 1975a. La lecture de Marx: Quelques remarques critiques à propos de *Quelques remarques critiques à propos de "Lire le Capital."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5/6: 65–79.
———. 1975b. The specificity of the scientific field and the social conditions of the progress of reason.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4 (6): 19–47.
———. 1977a. The economy of linguistic exchanges.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6 (6): 645–68.
———. 1977b. Marriage strategies as strategies of social reproduction. In *Family and Society: Selections from the Annales*, ed. R. Foster and O. Ranum, 117–44.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1977c.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77d. Symbolic power. In *Identity and Structure*, ed. D. Gleeson, 112–19. Driffield: Nafferton Books.
———. 1979. *Algeria 19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0a. *Le sens pratique*.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 1980b. The production of belief: Contribution to an economy of symbolic goods.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2 (July): 261–93.
———. 1980c. *Questions de sociologie*.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 1980d. Sartre. *London Review of Books* 2, no. 20 (October 20): 11–12.
———. 1981. La représentation politique. Eléments pour une théorie du champ politique.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37 (February–March): 3–24.
———. 1982. *Leçon sur la leçon*.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 1983a.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or the economic world reversed. *Poetics* 12 (November): 311–56.
———. 1983b. The philosophical establishment. In *Philosophy in France Today*, ed. A. Montefiore, 1–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4a.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84b. La délégation et le fétichisme politique.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52–53 (June): 49–55.
———. 1984c. Le champ littéraire: Préalables critiques et principes de méthode. *Lendemains* 36: 5–20.

———. 1985a. Delegation and political fetishism. *Thesis Eleven* 10/11: 56–70.
———. 1985b. The genesis of the concepts of "habitus" and "field." *Sociocriticism* 2 (2): 11–24.
———. 1985c. Les intellectuels et les pouvoirs. In *Michel Foucault, une histoire de la vérité*, 93–94. Paris: Syros.
———. 1985d. The market of symbolic goods. *Poetics* 14 (April): 13–44.
———. 1985e. Social space and the genesis of groups. *Theory and Society* 14 (6): 723–44.
———. 1986a.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ed. J. G. Richardson, 241–58.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 1986b. From rules to strategies. *Cultural Anthropology* 1 (February): 110–20.
———. 1986c. La science et l'actualité.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61 (March): 2–3.
———. 1987a. The biographical illusion. *Working 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Center for Psychosocial Studies*, no. 14. Chicago: Center for Psychosocial Studies.
———. 1987b. *Choses Dites*.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 1987c. The force of law: Toward a sociology of the juridical field. *Hastings Journal of Law* 38: 209–48.
———. 1987d. Legitimation and structured interests in Weber's sociology of religion. In *Max Weber, Rationality and Irrationality*, ed. S. Lash and S. Whimster, 119–36. Boston: Allen and Unwin.
———. 1987e. Revolt of the spirit. *New Socialist* 46 (February): 9–11.
———. 1987f. What makes a social class? O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istence of groups.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32: 1–18.
———. 1988a. Flaubert's point of view. *Critical Inquiry* 14 (Spring): 539–62.
———. 1988b. *Homo Academicu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8c. La vertu civile. *Le Monde* (November 16): 1–2.
———. 1988d. *L'ontologie politique de Martin Heidegger*.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 1988e. Penser la politique.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71/72: 2–3.
———. 1988f. Program for a sociology of sport. *The 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5 (2): 153–61.
———. 1988g. Vive la crise! For heterodoxy in social science. *Theory and Society* 17, no. 5 (September): 773–88.
Bourdieu, Pierre. 1989a. The corporatism of the universal: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s in the modern world. *Telos* 81 (Fall): 99–110.
———. 1989b. Epilogue: On the possibility of a field of world sociology. In *Social Theory in a Changing Society*, ed. P. Bourdieu and J. S. Coleman, 373–87.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9c. *La noblesse d'Etat: Grands corps et grandes écoles*.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 1989d. Social space and symbolic power. *Sociological Theory* 7 (1): 14–25.

———. 1990a. Animadversiones in Mertonem. In *Robert K. Merton: Consensus and Controversy*, ed. J. Clark, C. Modgil, and S. Modgil, 297–301. London: The Falmer Press.
———. 1990b. Droit et passe-droit. Le champ des pouvoirs territoriaux et la mise en oeuvre des règlements.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81/82: 86–96.
———. 1990c. *In Other Words: Essays toward a Reflexive Sociolog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0d. The intellectual field: A world apart. In *In Other Words: Essays toward a Reflexive Sociology*, 140–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0e. La domination masculine.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84: 2–31.
———. 1990f. A lecture on the lecture. In *In Other Words: Essays toward a Reflexive Sociology*, 177–9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0g. Les conditions sociales de la circulation des idées. *Romanistische Zeitschrift für Literaturgeschichte* 14 (1/2): 1–10.
———. 1990h. *The Logic of Practi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0i. The scholastic point of view. *Cultural Anthropology* 5 (4): 380–91.
———. 1991a. Aspirant philosophe. Un point de vue sur le champ universitaire dans les années 50. In *Les enjeux philosophiques des années 50*, 15–24. Paris: Centre Georges Pompidou.
———. 1991b.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religious field.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13: 1–43.
———. 1991c.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trans. Gino Raymond and Matthew Adams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1d. Le champ littéraire.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89 (September): 4–46.
———. 1991e. The peculiar history of scientific reason. *Sociological Forum* 5 (2): 3–26.
———. 1991f. *The Political Ontology of Martin Heidegg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2. *Les règles de L'art: Gènese et structure du champ littérair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 1993a. Esprits d'État: Genèse et structure du champ bureaucratique.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96/97: 49–62.
———. 1993b.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93c. Haute couture and haute culture. In *Sociology in Question*, 132–38.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 1993d. *Sociology in Question*, trans. Richard Nice.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 1994. *Raisons pratiques: Sur la théorie de l'action*.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 1995. La Cause de la Science: Comment l'histoire sociale des sciences

sociales peut servir le progrès de ces sciences.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106–7 (March): 3–10.

———. 1996. *Sur la télévision.* Paris: Liber.

Bourdieu, Pierre, and Luc Boltanski. 1975. Le titre et le poste: Rapports entre le système de production et le système de reproduction.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2: 95–107.

———. 1977. Changes in social structure and changes in the demand for education. In *Contemporary Europe: Social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Patterns*, ed. S. Giner and M. Scotford-Archer, 197–227.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1981. The educational system and the economy: Titles and jobs. In *French Sociology: Rupture and Renewal Since 1968*, ed. C. C. Lemert, 141–5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Bourdieu, Pierre, Luc Boltanski, Robert Castel, Jean-Claude Chamboredon, and Dominique Schnapper. 1965. *Un art moyen: Essai sur les usages de la photographie.*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 1990. *Photography: A Middle-Brow Art*, trans. Shaun Whitesid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ourdieu, Pierre, Luc Boltanski, and Pascal Maldidier. 1971. La Défense du Corps.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0 (4): 45–86.

Bourdieu, Pierre, Salah Bouhedja, Rosine Christin, and Claire Givry. 1990. Un placement de père de famille. La maison individuelle: Spécificité du produit et logique du champ de production.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81/82: 6–35.

Bourdieu, Pierre, Salah Bouhedja, and Claire Givry. 1990. Un contrat sous contrainte.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81/82: 34–51.

Bourdieu, Pierre, A. Casanova, and M. Simon. 1975. Les intellectuels dans le champ de la lutte des classes. *La nouvelle critique* 87 (October): 20–26.

Bourdieu, Pierre, Jean-Claude Chamboredon, and Jean-Claude Passeron. 1991. *The Craft of Sociology: Epistemological Preliminaries.* 2d ed.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Bourdieu, Pierre, and James S. Coleman, ed. 1991. *Social Theory for a Changing Society.*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Bourdieu, Pierre, Alain Darbel, Jean-Pierre Rivet, and Claude Seibel. 1963. *Travail et travailleurs en Algérie.* The Hague: Mouton.

Bourdieu, Pierre, and Monique de Saint Martin. 1974. Scholastic excellence and the values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 In *Contemporary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ed. J. Eggleston, 338–71. London: Methuen.

———. 1978. Le patronat.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20/21: 3–82.

———. 1982. La sainte famille. L'épiscopat français dans le champ du pouvoir.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44/45: 2–53.

Bourdieu, Pierre, and Hans Haacke. 1994. *Libre-Echange.* Paris: Seuil/les presses du réel.

Bourdieu, Pierre, and Otto Hahn. 1970. La théorie. *VH 101* 2 (Summer): 12–21.
Bourdieu, Pierre, and Jean-Claude Passeron. 1967. Sociology and philosophy in France since 1945: Death and resurrection of a philosophy without subject. *Social Research* 34 (1): 162–212.
———. 1968. L'examin d'une illusion.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9 (special issue): 227–53.
———. 1977.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London: Sage.
———. 1979. *The Inheritors: French Students and their Relation to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ourdieu, Pierre, Jean-Claude Passeron, and Monique de Saint Martin. 1965. *Rapport pédagogique et communication.* The Hague: Mouton.
———. 1992. *Academic Discourse: Linguistic Misunderstanding and Professorial Pow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Bourdieu, Pierre, and Abdelmalek Sayad. 1964. *Le déracinement. La crise de l'agriculture traditionnelle en Algérie.*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Bourdieu, Pierre, and Loïc J. D. Wacquant. 1989. For a socioanalysis of intellectuals: On *Homo Academicus.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34: 1–29.
Bourdieu, Pierre, and Loïc J. D. Wacquant.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owles, Samuel, and Herbert Gintis. 1976. *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Educational Reform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Economic Life.* New York: Basic Books.
Brint, Steven. 1984. 'New Class' and cumulative trend explanations of the liberal political attitudes of professional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0 (1): 30–71.
———. 1991. The powers of the intellectuals. In *Sociology and the Public Agenda,* ed. W. J. Wilson, 51–70.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 1994. *In an Age of Experts: The Changing Role of Professionals in Politics and Public Lif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rint, Steven, and Jerome Karabel. 1989. *The Diverted Dream: Community Colleges and the Promise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in America, 1900–198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rubaker, Rogers. 1985. Rethinking classical sociology: The sociological vision of Pierre Bourdieu. *Theory and Society* 14 (6): 745–75.
———. 1993. Social theory as habitus. In *Bourdieu: Critical Perspectives,* ed. C. Calhoun, E. LiPuma, and M. Postone, 212–34.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
Brym, Robert J. 1987. The political sociology of intellectuals: A critique and a proposal. In *Intellectuals in Liberal Democracies: Political Influence and Social Involvement,* ed. A. G. Gagnon, 199–209. New York: Praeger.
Caillé, Alain. 1981. La sociologie de l'intérêt est-elle intéressante? *Sociologie du Travail* 23 (3): 257–74.
———. 1992. Esquisse d'une critique de l'économie générale de la pratique. *Cahiers du LASA* 12/13: 109–219.
———. 1993. *La démission des clercs: La crise des sciences sociales et l'oubli du poli-*

tique. Paris: Editions la Découverte.

Calhoun, Craig. 1993. Habitus, field, and capital: The question of historical specificity. In *Bourdieu: Critical Perspectives*, 61–88.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alhoun, Craig, Edward LiPuma, and Moishe Postone, eds. 1993. *Bourdieu: Critical Perspectiv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amic, Charles. 1986. The matter of habi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5): 1039–87.

Caute, David. 1964. *Communism and the French Intellectuals, 1914–1960*. London: André Deutsch.

Centers, Richard. 1949. *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Classes: A Study of Class Consciousnes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arle, Christophe. 1987. *Les élites de la République, 1880–1900*. Le sens commun.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 1990. *Naissance des "intellectuels," 1880–1900*. Le sens commun.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Cherkaoui, Mohamed. 1981. Changement social et anomie: Essai de formalisation de la théorie durkheimienn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2 (1): 3–39.

Chiari, Joseph. 1975. *Twentieth-Century French Thought: From Bergson to Lévi-Strauss*. New York: Gordian Press.

Chomsky, Noam. 1965.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Cicourel, Aaron V. 1973. *Cognitive Soci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Clark, Burton R. 1962. *Educating the Expert Society*. San Francisco: Chandler.

———. 1963a. Faculty culture. In *The Study of Campus Culture*, 39–54. Boulder, Colorado: Western Interstate Commission for Higher Education.

———. 1963b. Faculty organization and authority. In *The Study of Academic Administration*, ed. T. F. Lunsford, 37–51. Boulder, Colo.: Western Interstate Commission for Higher Education.

———. 1973. The Wesleyan story: The importance of moral capital. In *Academic Transformation: Seventeen Institutions under Pressure*, ed. D. Riesman and V. A. Stadtman, 367–81. New York: McGraw-Hill.

Coleman, James S. 1990.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ollectif "Révoltes logiques." 1984. *L'empire du sociologue*. Paris: Editions La Découverte.

Collins, James. 1993. Determination and contradiction: An appreciation and critique of the work of Pierre Bourdieu on language and education. In *Bourdieu: Critical Perspectives*, ed. C. Calhoun, E. LiPuma, and M. Postone, 116–38.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ollins, Randall. 1971. Functional and conflict theories of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6: 1002–19.

———. 1975. *Conflict Sociology: Toward an Explanatory Science*. New York: Aca-

demic Press.

———. 1979. *The Credential Society: An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nd Stratifica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1981a. Cultural capitalism and symbolic violence. In *Sociology Since Mid-Century: Essays in Theory Cumulation,* 173–82.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1981b.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984–1014.

———. 1989. Review of *Homo Academicu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5 (2): 460–63.

Colquhoun, Robert. 1986. *Raymond Aron: The Sociologist in Society 1955–1983.* 2 vols.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Connell, R. W. 1983. The black box of habit on the wings of history: Reflections on the theory of reproduction. In *Which Way is Up? Essays on Sex, Class, and Culture,* 140–61.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Cookson, Peter W., Jr., and Caroline Hodges Persell. 1985. *Preparing for Power: America's Elite Boarding Schools.* New York: Basic Books.

Coser, Lewis A. 1965. *Men of Ideas: a Sociologist's View.*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Crozier, Michel. 1969. *La société bloqué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Crozier, Michel, and Edouard Friedberg. 1977. *L'acteur et le systèm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Current Research. 1972. Paris: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Dalton, George, ed. 1968. *Primitive, Archaic and Modern Economies: Essays of Karl Polanyi.* Boston: Beacon Press.

Debray, Regis. 1981. *Teachers, Writers, Celebrities: The Intellectuals of Modern France.* London: Verso.

DiMaggio, Paul. 1979. Review essay on Pierre Bourdieu.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4 (6): 1460–74.

———. 1982. Cultural capital and school success: The impact of status culture participation on the grades of U.S. high school studen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7 (2): 189–201.

DiMaggio, Paul, and John Mohr. 1984. Cultural capital,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marital sele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0 (6): 1231–61.

DiMaggio, Paul, and Walter Powell. 1983.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147–60.

Domhoff, G. Willliam. 1983. *Who Rules America Now?*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Dougherty, Kevin J. 1994. *The Contradictory College: The Conflicting Origins, Impacts, and Futures of the Community Colleg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Douglas, Mary. 1966.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1970. *Natural Symbols: Explorations in Cosmolog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1982. *In the Active Voic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Drouard, Alain. 1982. Réflexions sur une chronologie: Le développement des sciences sociales en France de 1945 à la fin des années soixante.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23: 55–85.
Dufay, François, and Pierre-Bertrand Dufort. 1993. *Les normaliens: De Charles Péguy à Bernard-Henri Lévy: un siècle d'histoire*. Paris: Editions Jean-Claude Lattès.
Durkheim, Emile. 1951. *Suicide*, trans. John A. Spaulding and George Simpson.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 1966. *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trans. Sarah A. Solovay and John H. Mueller.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1977. *The Evolution of Educational Thought*.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1995.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trans. Karen E. Field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Durkheim, Emile, and Marcel Mauss. 1963. *Primitive Classification*, trans. and ed. Rodney Needha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isenstadt, S. N. 1973. *Tradition, Change and Modernity*. New York: John Wiley.
———. 1987. 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al elites. In *Intellectuals in Liberal Democracies: Political Influence and Social Involvement*, ed. A. G. Gagnon, 157–65. New York: Praeger.
Elias, Norbert. 1978. *What is Sociolog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Elster, Jon. 1979. *Ulysees and the Sirens: Studies in Rationality and Irrational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5. *Making Sense of Marx*.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ribon, Didier. 1991. *Michel Foucault*, trans. Betsy Wi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yerman, Ron, Lennart G. Svensson, and Thomas Soderqvist, eds. 1987. *Intellectuals, Universities, and the State in Western Modern Societie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eatherstone, Mike. 1987. Consumer culture, symbolic power and universalism. In *Mass Culture, Popular Culture and Social Life in the Middle East*, ed. G. Stauth and S. Zubaida, 17–46.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Ferry, Luc, and Alain Renault. 1990. French Marxism (Pierre Bourdieu). In *French Philosophy of the Sixties: An Essay on Anti-Humanism*, 153–84. Amherst: Universit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Feyerabend, Paul. 1978. *Science in a Free Society*. London: New Left Books.
Foucault, Michel. 1972. *The Arche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Random House.
———. 1978a.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 1978b. Introduction to Georges Canguilhem. In *On the Normal and the*

Pathological, ed. R. S. Cohen, ix–xx. Dordrecht: Reidel.

———. 1980.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ed. C. Gordo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Gagnon, Alain G. 1987.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s in liberal democracies: Political influence and social involvement. In *Intellectuals in Liberal Democracies: Political Influence and Social Involvement*, ed. A. G. Gagnon, 3–16. New York: Praeger.

Galbraith, John Kenneth. 1971.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Garfinkel, Harold. 1967.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Garnham, Nicholas. 1986. Extended review: Bourdieu's *Distinction*.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34 (2): 423–33.

———. 1993. Bourdieu, the cultural arbitrary, and television. In *Bourdieu: Critical Perspectives*, ed. G. Calhoun, E. LiPuma, and M. Postone, 178–9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arnham, Nicholas, and Raymond Williams. 1980. Pierre Bourdieu and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2 (3): 297–313.

Gartman, David. 1991. Culture as class symbolization or mass reification: A critique of Bourdieu's *Distin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7 (2): 421–47.

Geertz, Clifford. 1974.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Gerth, H. H., and C. Wright Mills. 1964. *Character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1970.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Giddens, Anthony. 1973.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1979.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82. Durkheim, Socialism and Marxism. In *Profiles and Critiques in Social Theory*, 117–32.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iroux, Henry A. 1983. Theories of reproduction and resistance in the new sociology of education.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53 (August): 257–93.

Goffman, Erving. 1950–51. Symbols of class statu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94–304.

———. 1961. *Asylums*.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1967. *Interaction Ritual*. New York: Doubleday.

———. 1969. *Strategic Interactio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1971. *Relations in Public*.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1974. *Frame Analysi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1981. *Forms of Talk*.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Goldthorpe, John H. 1980. *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Structure in Modern Britai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Gouldner, Alvin W. 1954. *Patterns of Industrial Bureaucracy.*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 1957. Cosmopolitans and locals: Toward an analysis of latent social roles—I.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 (3): 281–307.
———. 1970. *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73a. Anti-minataur: The myth of a value-free sociology. In *For Sociology: Renewal and Critique in Sociology Today,* 3–26.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73b. The norm of reciprocity: A preliminary statement. In *For Sociology,* 226–59.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73c. The politics of the mind. In *For Sociology: Renewal and Critique in Sociology Today,* 82–127.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79. *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 New York: Oxford.
———. 1980. *The Two Marxisms.* New York: Seabury.
———. 1985. *Against Fragmentation: The Origins of Marxism and the Sociology of Intellectua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ramsci, Antonio. 1971. *Prison Notebooks,* trans. and ed.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y Smith.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Greenacre, Michael J. 1984.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of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Grignon, Claude, and Christiane Grignon. 1980. Style d'alimentation et goûts populaires.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21: 531–69.
Grignon, Claude, and Jean-Claude Passeron. 1984. *Sociologie de la culture et sociologie des cultures populaires.* Vol. 4. Paris: Documents du GIDES.
———. 1985. A propos des cultures populaires. *Cahiers du CERCOM* 1 (April).
Gurr, Ted Robert. 1970. *Why Men Rebe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ustad, J. W. 1966. Community, consensus, and conflict. *The Educational Record* (Fall): 439–51.
Habermas, Jürgen. 1970. Toward a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n *Recent Sociology,* ed. H. P. Dreitzel, 114–48. New York: Macmillan.
———. 1971.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Boston: Beacon Press.
———. 1973. *Theory and Practice.* Boston: Beacon Press.
———. 1979. What is universal pragmatics? In *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1–68. Cambridge: Polity Press.
Halbwachs, Maurice. 1959. *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Class.*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Halle, David. 1991. Bringing materialism back in; Art in the houses of the working and middle classes. In *Bringing Class Back In: Contemporary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ed. S. G. McNall, R. F. Levine, and R. Fantasia, 241–59.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Hanks, William F. 1993. Notes on semantics in linguistic practice. In *Bourdieu: Critical Perspectives,* ed. C. Calhoun, E. LiPuma, and M. Postone, 139–55.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arker, Richard. 1990. Bourdieu: Educa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Pierre Bourdieu*, ed. R. Harker, C. Mahar, and C. Wilkes, 86–108.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Harker, Richard, Cheleen Mahar, and Chris Wilkes, eds. 1990.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Pierre Bourdieu: The Practice of Theor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Harker, Richard K. 1984. On reproduction, habitus and educ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Education* 5 (2): 117–27.
Héran, François. 1987. La seconde nature de l'habitus. Tradition philosophique et sens commun dans le language sociologique.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28 (3): 385–416.
Hoffman, Stanley. 1986. Monsieur Tast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33 (6):45–48.
Hofstadter, Richard. 1963.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Hollander, Paul. 1981. *Political Pilgrim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7. American intellectuals: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of social criticism. In *Intellectuals in Liberal Democracies: Political Influence and Social Involvement*, ed. A. G. Gagnon, 67–86. New York: Praeger.
Honneth, Axel. 1986. The fragmented world of symbolic forms: Reflections on Pierre Bourdieu's sociology of culture.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3 (3): 55–66.
Honneth, Axel, Hermann Kocyba, and Bernd Schwibs. 1986. The struggle for symbolic order: An interview with Pierre Bourdieu.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3 (3): 35–51.
Hout, Michael, and Maurice Garnier. 1979. Curriculum placement and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in Franc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52: 146–56.
Hout, Michael, and William R. Morgan. 1975. Race and sex variation in the causes of the expected attainments of high school senior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1: 364–91.
Huszar, George B. de, ed. 1960. *The Intellectuals: A Controversial Portrait*.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Inglis, Roy. 1979. Good and bad habitus: Bourdieu, Habermas and the condition of England.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27 (2): 353–69.
Isamberg-Jamati, Vivane, and Monique Segré. 1971. Systèmes scolaires et systèmes socio-économiques. *L'Année sociologique* 22: 527–51.
Jacoby, Russell. 1987. *The Last Intellectuals: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Age of Academe*. New York: Basic Books.
Jakobson, Roman, and Morris Halle. 1956. *Fundamentals of Language*. The Hague: Mouton.
Jenkins, Richard. 1982. Pierre Bourdieu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determinism. *Sociology* 16 (2): 270–81.
Jenkins, Richard. 1989. Language, symbolic power and communication: Bour-

dieu's *Homo Academicus*. *Sociology* 23 (4): 639–45.
———. 1992. *Pierre Bourdieu*. London: Routledge.
Johnson, Paul. 1988. *Intellectual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Joppke, Christian. 1986. The cultural dimension of class form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On the social theory of Pierre Bourdieu.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31: 53–78.
Judt, Tony. 1992. *Past Imperfect: French Intellectuals*, 1944–1956.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ahl, Joseph. 1953. Educational and occupational aspirations of "common man" boys.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42: 521–62.
Karabel, Jerome. 1972. Community college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42 (November): 521–62.
———. 1994. Marx and the question of intellectuals. Princeton: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Manuscript.
Karabel, Jerome, and A. H. Halsey, eds. 1977. *Power and Ideology in Educ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arady, Victor. 1981. The prehistory of present-day French sociology 1917–1957. In *French Sociology: Rupture and Renewal since 1968*, ed. C. C. Lemert, 33–4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Karen, David. 1990.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0 to the present. In *Education and Society: A Reader*, ed. K. J. Dougherty and F. M. Hammack, 264–79.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Kuhn, Thomas 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mont, Michèle. 1989. Slipping the world back in: Bourdieu on Heidegger. *Contemporary Sociology* 18 (5): 781–83.
Lamont, Michèle, and Annette Lareau. 1988. Cultural capital: allusions, gaps and glissandos in recent theoretical developments. *Sociological Theory* 6 (2): 153–68.
Lareau, Annette. 1989. *Home Advantage: Social Class and Parental Intervention in Elementary Education*. New York: The Falmer Press.
Latour, Bruno. 1987. *Science in Action*.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Latour, Bruno, and Steve Woolgar. 1979. *Laboratory Lif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London: Sage.
Lebard, L., A. Morineau, and K. Warwick. 1984. *Multivariate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and Related Techniques for Large Matrices*. New York: Wiley.
Lenski, Gerhard E. 1952. American social classes: Statistical strata or social group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8 (2): 139–44.
———. 1954. Status crystallization: A non-vertical dimension of social statu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 (4): 405–13.
Le Roy Ladurie, Emmanuel. 1982. *Paris-Montpellier: P.C.-P.S.U. 1945–1963*. Paris: Gallimard.

Lévi-Strauss, Claude. 1966. *The Savage Mi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69. *The Elementary Structures of Kinship.* Boston: Beacon Press.

———. 1973. Introduction à l'oeuvre de Marcel Mauss. In *Sociologie et anthropologie*, ed. M. Mauss, ix–lii.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Lewin, Kurt. 1951. *Field Theory in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Harper.

Lindenberg, Daniel. 1975. *Le Marxism introuvable.* Paris: Calmann-Lévy.

Lipset, Seymour Martin. 1991. No third way: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the Left. In *The Crisis of Leninism and the Decline of the Left: the Revolutions of* 1989, ed. D. Chirot, 183–232.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MacLeod, Jay. 1987. *Ain't No Makin' It: Leveled Aspirations in a Low-Income Neighborhood.*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1995. *Ain't No Makin' It: Aspirations and Attainment in a Low-Income Neighborhood.* Rev. ed.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Mann, Michael. 1970. The social cohesion of liberal democrac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5 (June): 423–39.

Mann, Michael. 1973. *Consciousness and Action Among the Western Working Class.* London: Macmillan.

Mannheim, Karl. 1955. *Ideology and Utopi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trans. Louis Wirth and Edward Shil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 1956. The problem of the intelligentsia: An enquiry into its past and present role. In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91–170.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Martin, Bill, and Ivan Szelenyi. 1987. Beyond cultural capital: Toward a theory of symbolic domination. In *Intellectuals, Universities and the State*, ed. R. Eyerman, T. Svensson, and T. Soderqvist, 16–49.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1978.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Marx–Engels Reader*, ed. R. C. Tucker, 469–500. New York: W. W. Norton.

Mauss, Marcel. 1967. *The Gift.* New York: Norton.

McCall, Leslie. 1992. Does gender fit? Bourdieu, feminism, and conceptions of social order. *Theory and Society* 21 (6): 837–67.

Merleau-Ponty, Maurice. 1962.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Merton, Robert K. 1968.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Enlarged ed.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1973.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ed. N. W. Stor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eyer, John W. 1970. The charter: Conditions of diffuse socialization in schools. In *Social Processes and Social Structures*, ed. W. R. Scott, 564–78.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1977. The effects of education as an institu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 (1): 55–77.

Michelson, Roslyn Arlin. 1990. The attitude-achievement paradox among black adolescent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3 (1): 44–61.

Miller, Don, and Jan Branson. 1987. Pierre Bourdieu: Culture and praxis. In *Creating Culture: Profiles in the Study of Culture*, ed. D. J. Austin-Broos, 210–69. Boston: Allen and Unwin.

Miller, S. M. 1976. *Breaking the Credentials Barrier*. New York: Ford Foundation.

Mills, C. Wright.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a misère du monde. 1993. A. Accardo et al.,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ierre Bourdieu. Editions du Seuil.

Mouriaux, R. 1980. Review of *La distinction*. *Sociologie du Travail* 22(4): 475–77.

Murphy, Raymond. 1988. *Social Closure: The Theory of Monopolization and Exclus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ttl, J. P. 1969. Ideas, intellectuals and structures of dissent. In *On Intellectuals: Theoretical Studies, Case Studies*, ed. P. Rieff, 53–122. New York: Doubleday.

Nisbet, Robert A. 1966. *The Sociological Tradi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Oakes, Jeannie. 1985. *Keeping Track: How Schools Structure Inequal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Ogbu, John U. 1978. *Minority Education and Caste: The American System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1990.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the socialization of competence. In *Education and Society: A Reader*, ed. K. J. Dougherty and F. M. Hammack, 390–401.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Ogburn, William Fielding. 1922. *Social Change*. New York: Viking Press.

O'Gorman, Hubert. 1986. The discovery of pluralistic ignoranc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ehavioral Science* 22 (October): 333–47.

Ory, Pascal, and Sirinelli, Jean-François. 1986. *Les intellectuels en France, de l'Affaire Dreyfus à nos jours*. Paris: Armand Colin.

Parkin, Frank. 1971. *Class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Order: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apitalist and Communist Societie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1979. *Marxism and Class Theory: A Bourgeois Critiqu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arsons, Talcott. 1947. Introduction. In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3–86.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 1951. *The Social Syste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1968.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2 vol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els, Dick. 1995. Knowledge politics and anti-politics: Toward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Bourdieu's concept of intellectual autonomy. *Theory and Society* 24: 79–104.

Peterson, Richard A. 1985. Six constraints on the production of literary works. *Poetics* 14: 45–67.

Polanyi, Karl.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Poster, Mark. 1975. *Existential Marxism in Postwar Fr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oulantzas, Nicos. 1975. *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London.
———. 1977. The new petty bourgeoisie. In *Class and Class Structure*, ed. A. Hunt, 113–24.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Powell, Walter W., and Paul DiMaggio, eds. 1991.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rost, Antoine. 1970. Une sociologie stérile: *La reproduction. Esprit* 12: 851–60.
Przeworski, Adam. 1977. Proletariat into a class: The process of class formation from Karl Kautsky's *The Class Struggle* to recent controversies. *Politics and Society* 7: 343–401.
Ringer, Fritz. 1992. *Fields of Knowledge: French Academic Cultur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1890–192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ist, Gilbert. 1984. La notion médiévale d''habitus' dans la sociologie de Pierre Bourdieu. *Revue européenne des sciences sociales* 22(67): 201–12.
Ritzer, George. 1988. Sociological metatheory: A defense of a subfield by a delineation of its parameters. *Sociological Theory* 6 (Fall): 187–200.
Robbins, Derek. 1991. *The Work of Pierre Bourdieu: Recognizing Society.*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Robinson, Robert V., and Maurice A. Garnier. 1985. Class reproduction among men and women in France: Reproduction theory on its home groun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250–80.
Rosenbaum, James E. 1976. *Making Inequality: The Hidden Curriculum of High School Tracking.* New York: Wiley.
Ross, George. 1987. The decline of the Left intellectual in modern France. In *Intellectuals in Liberal Democracies: Political Influence and Social Involvement*, ed. A. G. Gagnon, 43–65. New York: Praeger.
———. 1991. French intellectuals from Sartre to soft ideology. In *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s: Social Theory in a Changing World*, ed. C. C. Lemert, 47–73.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Sahlins, Marshall. 1981. *Historical Methaphors and Mythical Realiti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Sartre, Jean-Paul. 1960. *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Paris: Gallimard.
Saussure, Ferdinand de. 1974.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London: Fontana.
Schiltz, M. 1982. Habitus and peasantisation in Nigeria: A Yoruba case study. *Man* 17 (4): 728–46.
Schücking, L. L. 1966. *The Sociology of Literary Taste*, trans. B. Battershaw. London: Routledge.
Schumpeter, Joseph A. 1975.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3d e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Schwartz, Barry. 1981. *Vertical Classification: A Study in Structuralism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ewell, William, Robert Hauser, and Alexander Portes. 1969. The education and early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proces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4: 82–92.
Sewell, William H., Jr. 1992. A theory of structure: Duality, agency, and transform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 (1): 1–29.
Shils, Edward. 1972.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wers and Other Essay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irinelli, Jean-François. 1988. *Génération intellectuelle.* Paris: Fayard.
Skocpol, Theda. 197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6. The dead end of metatheory. *Contemporary Sociology* 16: 10–12.
Smith, David N. 1974. *Who Rules the Universities? An Essay in Class Analysi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Sulkunen, Pekka. 1982. Society made visible: On the cultural sociology of Pierre Bourdieu. *Acta Sociologica* 25 (2): 103–15.
Swartz, David. 1977. Pierre Bourdieu: The cultural transmission of social inequality.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47 (November): 545–54.
———. 1981. Classes, educational systems and labor market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2 (2): 325–53.
———. 1988. Introduction. *Theory and Society* 17: 615–25.
Swidler, Ann. 1986. Culture in action: Symbols and strateg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 273–86.
Szelenyi, Ivan, and Bill Martin. 1988/89. The three waves of New Class theories. *Theory and Society* 17 (5): 645–67.
Thapan, Meenakshi. 1988. Some aspects of cultural reproduction and pedagogic communicatio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March 19): 592–96.
Thompson, E. P. 1963.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V. Gollancz.
Thompson, John B. 1991. Editor's Introduction. In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1–3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iles, Mary. 1984. *Bachelard: Science and Objectivit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7. Epistemological history: The legacy of Bachelard and Canguilhem. In *Contemporary French Philosophy*, ed. A. P. Griffiths, 141–5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illy, Charles. 1978. *From Moba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Touraine, Alain. 1968. *Le Mouvement de Mai ou le communisme utopiqu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 1973. *Production de la Société.*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Tucker, Robert C. 1978. *The Marx–Engels Reader.* 2d ed. New York: W. W. Norton.
Veblen, Thorstein. 1979.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Verdès-Leroux, Jeannine. 1981. Une institution totale auto-perpétuée: Le 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36/37: 33–63.

Wacquant, Loïc J. D. 1987. Symbolic violence and the making of the French agriculturalist: An enquiry into Pierre Bourdieu's sociology. *The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Sociology* 23 (1): 65–88.

———. 1989. Toward a reflexive sociology: A workshop with Pierre Bourdieu. *Sociological Theory* 7 (1): 26–63.

———. 1990. Sociology as socio-analysis: Tales of *Homo Academicus*. *Sociological Forum* 5 (4): 677–89.

———. 1992. Toward a social praxeology: The structure and logic of Bourdieu's sociology. In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2–59.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3a. Bourdieu in American: Notes on the transatlantic importation of social theory. In *Bourdieu: Critical Perspectives*, ed. C. Calhoun, E. LiPuma, and M. Postone, 235–6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3b. From ruling class to field of power: An interview with Pierre Bourdieu on *La noblesse d'Etat*.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0 (3): 19–44.

———. 1993c. Solidarity, morality and sociology: Durkheim and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ociety. *Th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Social Research* 1 (Autumn): 1–7.

Warner, Loyd W., and Paul S. Lunt. 1941. *The Social Life of a Modern Commun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Warner, R. Stephen. 1993. Work in progress toward a new paradigm for the sociological study of relig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 1044–93.

Weber, Max.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ed.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2 vol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illiams, Raymond. 1963. *Culture and Society*. 3d ed.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 1965. *The Long Revolution*. Harmondsworth: Pelican Books.

Williams, Rhys, and N. J. Demerath. 1991. Religion and political process in an American c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 417–31.

Winch, Peter. 1958. *The Idea of a Social Science and Its Relation to Philosoph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Wolpert, Lewis. 1993. *The Unnatural Nature of Scien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ood, Robert Coldwell. 1993. *Whatever Possessed the President? Academic Experts and Presidential Policy*, 1960–1988.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Woolgar, Steve. 1988. *Science: The Very Idea*. London: Tavistock.

Wright, Erik Olin. 1985. *Classes*. London: Verso.

Wuthnow, Robert. 1981. Two traditions in the study of religion.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20 (March): 16–32.

———. 1987. *Meaning and Moral Order*.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uthnow, Robert, James Davison Hunter, Albert Bergesen, and Edith Kurzweil. 1984. *Cultural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Zolberg, Veral. 1989. Le Musée des Beaux-Arts, entre la culture et le public: Barrière ou facteur de nivellement? *Sociologie et Sociétés*. 21(2): 75-90.

译后记

本书的翻译始于2002年初，当时我在北京大学高丙中先生那里复印了此书的英文版，看了以后觉得在英语学界关于布尔迪厄的研究中，它虽然不是十分具有创见性，但是却把布尔迪厄的基本思想介绍得非常清晰，对于想要了解布尔迪厄的思想而又刚刚起步的初学者来说是一本很好的入门书。于是萌发了翻译的念头。正好那时我的朋友汪宇先生非常热心地为我联系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并买到了此书的版权，我于是开始翻译。但是不久我去了美国，翻译的事情不得不暂时搁置。直到2003年6月回国才重新继续翻译。由于事务繁忙，翻译工作进展缓慢，直到今天终于译完，已经是过了合同规定的期限，心中非常不安。好在出版社的朋友非常理解与支持，使得翻译工作得以顺利结束。我诚恳地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激与谢意。

翻译进展缓慢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由于布尔迪厄是一个用法语写作的理论家，所以此书中也夹杂许多法语的术语名词以及文章、著作的名称。我尽可能地借助工具书把这些术语名词翻译成中文，但是不能肯定是否准确。为了避免误导或以讹传讹，在这种情况下，我一律在中文后面附上法语原文以便对照。对于有些重要的英文术语也尽量在括弧中附上原文。

布尔迪厄的理论博大精深，其运思与论述之缜密、精致甚至艰涩，令人叹为观止。即使是翻译这部介绍性的著作，也经常使我感到因此而产生的翻译的困难，何况其中还引用了布尔迪厄的许多著作原

文。 加上本人英文水平有限，所以翻译中的不妥乃至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方家指正。

陶东风

2003 年 12 月于北京花园村